

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

1944 ~ 1946 年间国共政争

◆ 邓 野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
1944 ~ 1946 年间国共政争

著 者 / 邓 野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政编码 / 100005
网 址 / <http://www.ssdph.com.cn>
责任部门 / 编辑出版中心
(010) 65232637
项目经理 / 杨 群
责任编辑 / 陈文桂
责任校对 / 敏 珊
责任印制 / 同 非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客户服务中心
(010) 65285539
法律顾问 /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

开 本 / 889 × 1194 毫米 1/32 开
印 张 / 15.25
字 数 / 376 千字
版 次 / 200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 - 80190 - 092 - 8/D · 031
定 价 / 29.8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客户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 :1944 ~ 1946 年间国共政争 / 邓野
著.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11

ISBN 7 - 80190 - 092 - 8

I. 联... II. 邓... III. 国共合作 - 史料 - 1944 ~
1946 IV. K265. 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83598 号

ISRC CN - M43 - 03 - 301 - 01 / V · G

定价 : 80.00 元

目 录

导 论 联合政府的口号与国共关系的最终分野	1
第一章 国共力量的消长与国共合作基础的演变	
——联合政府口号的推出	1
一 一号作战与中国政治	1
二 联合政府口号的推出	16
三 联合政府旗帜下的第三势力	31
四 中共的两个部署	38
第二章 国共关于改组政府的谈判与破裂	45
一 史迪威出局与赫尔利入局	45
二 赫尔利斡旋下的国共谈判第一回合	56
三 国共政略的重新调整	65
四 赫尔利斡旋下的国共谈判第二回合	75
第三章 国共第二套政治部署的展开	86
一 两个大会	88
二 第三方面的斡旋	91
三 中共关于“解代会”的筹备	96

第四章 中苏谈判：外交与政治.....	101
一 国民党对苏联与中国政治的认识.....	101
二 雅尔塔决议与中苏谈判的启动.....	107
三 中苏谈判第一阶段.....	119
四 中苏谈判第二阶段.....	131
五 中苏条约的批准.....	143
第五章 重庆谈判	
——政治背景的转换与政治态势的转换.....	151
一 日本突然投降与中共最初的应变方针.....	152
二 蒋介石的两张牌.....	156
三 两周较量的结果.....	160
四 邀请与应邀：国共两党的决策经过.....	163
五 谈判的主题与双方的策略.....	173
六 主题的交锋与两党政治理念的展示.....	180
七 僵持下的妥协——不了之局.....	190
八 重庆谈判留给历史的痕迹.....	199
第六章 国共战略方向的确立与展开.....	203
一 中共战略方向的调整.....	204
二 中共向北发展部署的展开.....	213
三 中共的东北战略部署.....	217
四 国民党的战略考虑与展开.....	223
第七章 苏军的双重性与东北问题.....	232
一 东北行营退出与再入长春.....	233
二 中共东北战略的再调整.....	246
三 国、苏关于东北经济合作的争论.....	248

第八章 政治协商会议	
——政治背景与政治态势的再转换.....	259
一 政协会议的国内背景.....	260
二 政协会议的国际背景.....	264
三 政协会议的组成、议题与性质.....	271
四 政协会议前奏曲.....	278
五 政协会议五项议题的争论与结论.....	283
六 政协余论.....	300
第九章 中国政局的多向发展.....	306
一 中共对政协会议之后的时局判断.....	306
二 国共关于整军方案的谈判.....	309
三 国民党对政协协议的不满及其焦点.....	320
四 中、苏在东北经济合作问题上的继续争执.....	326
五 国、共在东北问题上的继续争执.....	332
六 反苏反共游行的爆发.....	339
第十章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与两个僵局的形成.....	349
一 二中全会开幕与主题辩论.....	349
二 国共就两个焦点问题的磋商.....	357
三 二中全会期间的蒋介石.....	364
四 二中全会与国民党内部力量的变化.....	369
五 二中全会的政治后果——两个死结.....	373
第十一章 政争之归宿：四平决战.....	382
一 三角格局的结束与东北问题的演变	
——国共四平对峙的形成.....	383

二 中共进占长春的考虑与决策	
——政治要求之下的军事方针.....	392
三 四平决战与重庆谈判.....	398
四 战局的转折与谈判的转折.....	410
五 关于四平之役的评价.....	421
第十二章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终结	
——最后的谈判.....	426
一 停战条件与停战令.....	426
二 各方面对时局的看法.....	432
三 中共的部署与反击.....	437
四 最后的谈判.....	441
五 不宣而战.....	452
结束语 民国政治的逻辑与民国政治的历史局限.....	458

导论 联合政府的口号与 国共关系的最终分野

1944 ~ 1946 年间，从第二次国共合作全过程来看，这是两党关系最后的政治转型时期。国共关系的政治转型本身并不是一起开创历史记录的事件，不过，这一回的形式、性质与以往截然不同，这一回两党关系的政治转型，直接表现为国家秩序的政治转型。因此，两党关系的转型过程，其政治主题集中体现为两种国家政体的对立：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的对立。

由两党关系的转型而引出国家秩序的转型，由此，国共政治关系发展到其全部历史关系的最高阶段。这次政治转型的失败，决定了国共两党由政争走向战争的最后的政治分野。

迄今，没有人明确提出上述概念，没有人发现 1944 ~ 1946 年间是国共关系的一个完整的政治转型时期，没有人发现其间完备的政治形态、统一的历史主题和连贯的发展线索，因为，没有人认识到这段历史的特殊之处，从而将这段历史内在的政治主题联系并贯通起来。

过去，关于这段历史的研究基本形成一个定式：首先，以 1945 年 8 月中日战争终止为分界，依此将历史分为战时与战后两个阶段；然后，按照不同的历史阶段，相当严格地分别论述不同的历史主题。根据这个定式，抗战阶段的主题是中日民族问题，战后阶段的主题是国共政治问题。根据这个定式，1944 ~

1946年间是不能捏合为一个整体的。因此，将两个历史阶段的衔接部位贯通起来，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时期提出，本书的这一命题和结构多少有些不合过去研究的章法。

如此看来，本书的命题能否成立，有必要对传统的思维定式略作清理。

1944~1946年间是抗战末期和战后初期两个历史阶段的衔接部位。一般说，两个历史阶段的交替，就是两个历史主题的交替，以往的研究正是按照这一思维习惯而展开的。然而，发生于1945年8月的历史阶段的交替，其不同于一般的特殊之处表现为，历史阶段的交替并不以历史主题的交替为基础，因此并不表现为历史主题的交替。这一历史阶段的交替是以中日战争的终止为基础，问题在于：中日问题并非抗战末期中国政治的主题。

因此，怎样认识贯穿于1944~1946年间历史过程的政治主题，是解读这段历史的关键。具体讲，关键在于把握两点：第一、怎样认识抗战末期中日问题和国共问题的主次关系。第二、抗战末期和战后初期这两个历史阶段，是以怎样的政治主题衔接并贯通起来的。

中日战争以国、共、日三个参战方为主体，构成两国三方的战争形式，这种战争形式的构成，决定战争的性质不可能是单一的。还在抗战之初，毛泽东于1937年8月提出：在联合抗日的情况下，要把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贯通起来。^①民族革命指中日问题，社会革命指国共问题，贯通指联系，指两种范畴、两种性质的革命，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这就是说，整个抗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卷，第17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战时期，中共始终是将两个革命联系起来一并展开的。当然，两者之间有一个主次关系，问题在于：主次关系是以战争的进程而调整的。

中日战争始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但迟至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民族革命才调整为中国政治的主题而居于主导地位。这就是说，民族革命是否居于主导地位并不是无条件的，视战争进程而调整。一个因战争进程而调整的问题，同样，也可以因战争进程而再调整。

1944年，德国战败已成定局，日本的覆灭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中国的抗战进程步入末期。那么，抗战末期中国政治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争取怎样一个抗战结果。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由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来赢得抗战胜利的果实。这个问题的提出，其实就是民族革命与社会革命主次关系的再调整，社会革命转换为中国政治的主题。

两种革命主次关系的再调整，首先表现为国共合作基础的再调整。抗战之初，以抗日为基础，国共实现了第二次合作。抗战末期，随着争取怎样一个抗战结果这一问题的提出，调整国共合作的基础亦随之提上议程。毛泽东对赫尔利说：中国需要在民主的基础上团结全国抗日力量。^①把民主作为合作的基础，这就把调整两党合作基础的问题提了出来。民主指联合政府，毛泽东说：我们对国民党的方针，自国共合作以来，就是改良方针……现在的口号是改组政府、改组统帅部。这个口号不是改良主义的，而是革命性的。毛称：这是一个原则的转变。^②

从改良到革命这一原则的转变，就是国共合作基础的调整，

^①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56页。

^②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53、576页。

而这个基础的调整，也就是民族革命与社会革命主次关系的调整。只有将这个主次关系具体地转换过来，争取怎样一个抗战结果这一问题的提出，才能具体地体现出来。那么，代表这种调整与转换的标志是什么？就是联合政府口号的提出。

综上所述，以联合政府口号为标志，中国政治的主题于抗战末期的1944年发生转换。因此，1945年8月的历史阶段的交替，是一种甚为特殊的历史现象，它并不以居于主导地位的社会革命的交替为基础，而是以居于次要地位的民族革命的终止为基础，主要表现为中国政治舞台的角逐者，由两国三方变为一国两方。正因为历史的主题没有中断，因此，历史阶段的交替并不影响中国政治本来的运行轨迹，联合政府这个抗战末期提出的政治主题，战后依然延续下来，继续成为战后初期中国政治的主题。

总之，以历史主题为根据，从历史主题的发生、发展和终结的全过程来看，1944~1946年间是一个相当完整的国共关系的政治转型时期。

最后，笔者的结论是，通常的以1945年8月划分历史阶段的方式可以成立，但必须充分认识这个问题的特殊性，因此，通常的按照历史阶段分别论述不同历史主题的方式则应重新清理，因为这种通常的方式不能反映这段历史不同于通常的特殊之处，既不能将真实的历史主题表述清楚，更不能围绕主题的发生和发展，展开连续的、系统的叙述。人们迄今所看到的有关这段历史的叙述，都是支离破碎的。

其实，历史的分期可以根据不同的主体、不同的侧重面，采取不同的方式，通常的历史阶段分期方式，并不是惟一的方式。第二次国共合作历时10年，整个过程亦当分为前、中、后三个阶段，从这个视角来看，1944~1946年间显然是这个历史过程

的后过渡阶段。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成立方式，是一种成立于原有的一党训政秩序之内的合作方式，表现为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的、不对等的“朝野”合作方式。这一方式是抗战初期国共力量的对比在政治上的体现。抗战末期，随着国共力量对比的消长，旧有的合作方式已经不能反映此一消长所产生的新的政治格局，为此，改变两党合作的基础与方式，变不对等的朝野合作为对等的朝内合作，被中共提上国共谈判的议程。这种变化与要求的集中体现，正是联合政府的口号。

联合政府口号的实质，就是关于国家权力的再分配，这一命题的对象，就是国民党的一党训政制国家政体。训政制直接来自孙中山的有关学说。孙在《建国大纲宣言》一文中对辛亥革命失败的经验做了总结，认为原因是新生政权建立之后，没有经过军政、训政两个阶段而直接进入宪政。孙说：“盖不经军政时代，则反革命之势力无繇扫荡”，“不经训政时代，则大多数之人民久经束缚，虽骤被解放，初不瞭知其活动之方式。”^①有鉴于此，孙将建国程序分作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这个学说为国民党执政之后推行一党训政制国家政体，提供了直接的政治依据。1944～1946年间，由于联合政府口号的提出，一党训政这个在国父遗教名义下奉行多年的政治学说和政治体制，遭到空前的批判，从此动摇起来。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后期，就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分离时期。整个过程围绕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这一政治对立而展开，这一时期发生在中国的全部重大的历史事件，都是这一政治对立的直接或间接的体现。为此，构成这一时期历史走向的基本线索和基本

^①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102、103页，中华书局，1987。

内容，这些线索和内容，也就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由政争走向战争的线索和内容。

综上所述，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后期这个视角看问题，1944～1946年间，显然是一个形态完备、主题鲜明、线索清晰的相当完整的历史阶段。

1944～1946年间，两个具有独立武装的合作政党，主要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协商如何将一党训政的国家政权，变为多党联合执政，这在国共关系的全部历史记录中，是仅有的一次特殊的政治现象。这种现象的发生，从根本上讲，是国共力量的互为消长在政治上的反映。

在中国，任何严格意义上的政治格局的变动，都是以武力的消长为最终依据。在长达两年的谈判过程中，双方对阵态势和双方所处地位都不是稳定的，曾多次反复，这是双方的实力反复消长所产生的政治现象。由于这个特点的存在，因此，从国共谈判的历史看，没有任何一次有如此次，谈判与武力的关系如此紧密，由此而产生一种并不常见的现象，此即通常所说：谈谈打打，打打谈谈。

1944～1946年间，自国民党推行一党训政制以来，中国政局呈现出一段少见的多元化的政治现象。民盟发展到其历史的巅峰，为第三方面争得一席之地。美、苏两国的直接介入，形成民国以来前所未有的强大的国际干涉力量。这些力量对于中国政局的走向构成相当的制约作用，由于这种制约，中国政治呈现出少见的多元化现象。

然而，这些所有的内外力量，其自身的利益都不能通过自身而直接获取，都必须通过国共两党而具体体现。因此，看似多元的政治现象，最终，仍然归结为国共两党的对阵。多元现象并不

能改变以国共为主导的政治格局。

这些所有的内外力量，都是怀抱着各自的现实利益和政治理念而介入国共对阵的。他们的全部利益和全部理念，与国共两党都不是全部统一的，也就是说，现实利益统一与否，与意识形态统一与否，并不具有天然的一同性。由于这种局部的非同一性的存在，这就为国共两党在他们中间施展局部性的联合、分化、中立，提供了纵横捭阖的余地。这个余地既是局部的，又是广阔的。

这是一个任何一方都缺乏足够的稳定力量的年代。由于这个特点的存在，这也是一段少见的历史活跃时期。这一点反映在现象上，表现为政局的走向极为不确定。结果往往不是最终的，一个结果的产生，往往只是一个问题的重新产生，因此，问题的提出、展开、反复、转移，游移不定，目不暇接。

这种现象的产生，相当程度上来自诸多利益相互作用下所形成的政治的合力。由于任何一方的利益都难以单方面地直接体现出来，诸多利益往往通过反复地相互交换而体现出来，所以结果往往不是最终的，往往成为另一次交换的筹码。因此，把握这段历史的走向，应当十分留意跟踪诸多利益的走向，尤其留意跟踪诸多利益之间是怎样接合的，又是怎样交换的。

这是一个需要英雄而又产生英雄的年代。由于历史的条件提供了一个足够展示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舞台，因此，那些在这个舞台上活动的人们，足以将其文韬武略一展无余。

这是一个把政治真正演化为艺术的年代。在这里，民国政治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无不发挥到极致，留下一笔丰厚的政治遗产。

政治家关注结果，而历史学家则关注过程。也就是说，历史学家的兴趣在于：结果是怎样导致的。本书将集中论述这样一个问题：1944 ~ 1946 年间，围绕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的对立，国共两党是怎样由政争走向战争的。

让我们从头开始，走进那个非凡的年代。

第一章 国共力量的消长与 国共合作基础的演变

——联合政府口号的推出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并未完全消除两党分歧，因此两党的谈判时断时续地进行着，以调整这些分歧。在历时数年的谈判中，中共也提出一定的政治要求，如要求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等等，但总体看，谈判侧重于军事问题，如要求增加中共军队的编制、数额等等。这种例行谈判在 1944 年发生彻底的改变。

一 一号作战与中国政治

1943 年 3 月，蒋介石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契机，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宣扬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当年 5 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蒋一度企图闪击延安，以军事手段解决中共问题。6 月，胡宗南致电蒋：“攻击开始时间，预定七月勘日，并预定一星期完成战局。”蒋批示：“须俟有命令方可开始进攻，否则切勿行动，并应极端秘匿，毋得声张。”^①

一时间国共关系继皖南事变后再度紧张起来，中共称之为第三次反共高潮。同年 6 月底，中共谈判代表周恩来、林彪离渝返

^① 唐纵日记，1943 年 6 月 29 日。《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 366 页，群众出版社，1991。勘日为 28 日。

延，此后，国共谈判中断。

1944年初，国共双方都做出缓和关系的姿态。1月初，胡宗南将逼近陕北的军队撤出两个师，随后，“委座谕邵力子转告董必武，我军在陕北囊形地带已令撤出一二个师，至于共军撤不撤，则听之。”^①

1月16日，毛泽东约见军令部驻延安联络参谋郭仲容，17日郭报告军令部：“本月十六日，毛泽东先生约谈，表示目前中共拟于周恩来、林祖涵、朱德总司令中，择一或三人同行到渝，晋謁委座请示，并嘱报告请示可否。”2月2日，军令部复电郭：欢迎朱、周、林来渝。^②

这样，国共恢复谈判一事提上日程。

2月4日，毛致电董必武：“观察今年大势，国共有协调之必要与可能，而协调之时机，当在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但今年上半年我们应做些工作。……拟先派伯渠于春夏之交赴渝一行，恩来则准备于下半年赴渝。”2月17日，毛再次约见郭仲容，告知先派林伯渠赴渝。^③

4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研究林伯渠赴重庆谈判一事。任弼时的看法与毛泽东相同，认为国共具体问题的解决是在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为什么毛、任都做出这样的时间估计呢？其原因正如任弼时所说：“也就是要当美国出来要求国共团结、实行对日反攻时，争取国民党承认我们提出的条件。”^④

① 唐纵日记，1944年1月13日。《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404页。

②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5编（4），第261、262页，国民党中央党史会，1985。

③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493、496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年谱》，1944年4月15日，中央文献出版社等，1993。

这就是说，单纯的国共谈判不能解决问题，而必须有美国的干预，而美国出面干预的时间估计在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因此中共把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也放在这段时间。那么美国为什么不早不晚会在这段时间出面呢？因为美军有可能于此时在中国登陆，因此美国必然出面干预国共关系，以确保美军作战顺利。由于中共的着眼点放在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因此林伯渠赴渝主要是做一些缓和和工作。

关于中共此次谈判的意图，1944年3月10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做如下判断：“共党此次派员来渝交涉之意向，不外两端：（1）要求取得正式名义，承认其合法地位，企图以后之出路与发展。（2）作为宣传材料。”这是蒋根据以往谈判的经验和遗留问题所做出的判断。为此，蒋拟定的应对方针是：“（1）政治放宽，军事从严。（2）政治可划定区域，军事不能指定专区。”^①

国民党方面为这次谈判做了相应的准备，1944年3月，何应钦拟出了一个《中共问题政治解决办法草案》；4月16日，蒋介石将该案批示给张治中、王世杰参考。该案核心是军令政令的统一，就五个大的事项拟定如下方案：第一，绝对服从军令；第二，十八集团军可增编一个军；第三，严格遵守政府法规；第四，陕甘宁边区称为陕北行政区；第五，以上四项如能办到可以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②该草案大致体现了蒋的“政治放宽，军事从严”的意思，以政治的宽，换取军事的严。

国民党方面的谈判代表是张治中与王世杰。4月21日，王世杰日记载：“蒋先生指定予与张文伯与行将来渝之中共代表林

^①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5编（4），第188页。

^②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5编（4），第255、256页。

祖涵，磋商中共问题的解决。”^①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王世杰开始长期从事国共谈判，由此而构成王世杰政治生涯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时期。

此次谈判本来应在重庆进行，4月28日，蒋介石决定王世杰、张治中先赴西安与林伯渠进行初步商谈。^②4月29日，王世杰日记载：“今日与陈布雷、张文伯商赴西安事。张文伯以为不宜赴西安，宜令林祖涵直接来渝。晚间张向蒋先生商请，但蒋先生仍认为文伯与余宜先赴陕作初步商谈。”^③蒋介石这个安排，意思是先在西安摸一下中共的底。

4月30日晚，蒋向张治中、王世杰面授机宜，“勉彼等对林谈话不可过于相信，并不可过于放宽。”这是对于张、王基本立场的指示。另外，“委座之判断，林此来之目的，在要求中央承认中共部队为国军，然后要求中央之供应，与租借军火之分配。”^④租借军火指美国租借法援华物资，事后看，蒋这个判断大致准确。

5月2日，王世杰、张治中和中共代表林伯渠、王若飞同日抵达西安。

5月3日，王世杰、张治中前往十八集团军西安办事处礼节性拜访了林伯渠，约定翌日开始商谈。王世杰日记载：“晚间接陈布雷长途电话，谓蒋先生嘱中宣部对外国记者发表予来西安与林祖涵接洽，张文伯来西安别有任务云云。实则文伯与予负同一

① 《王世杰日记》1944年4月21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编印，1990年。张治中文字白，但王日记中均称文伯。

② 《王世杰日记》1944年4月28日。

③ 《王世杰日记》1944年4月29日。

④ 唐纵日记，1944年4月30日。《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427页。

任务。”^①

把两个人担负的同一件事故意说成两件事，王世杰似有不解。蒋的意思是不愿造成两位中央大员远迎中共代表的印象，以避免抬高中共身价，因此宣称仅王一人为此而来。从这些细微的指示中可以看出，此次谈判是林、王、张三人在前台出面，而毛、蒋二人在后台直接掌握，几乎就是毛、蒋的直接较量。

5月4日，会谈开始。王世杰日记载：“午前约林祖涵与予及张文伯开始商谈。……予等询中共对于解决目前僵局之方案，彼谓彼并未带有新方案，彼等之意见已由周恩来、林彪于去岁提出，迄未经蒋先生批复，彼愿政府对该方案予以答复。予等当嘱其电延安询毛泽东等有无新意见”。^② 这表明，中共此次谈判的方案，基本上以林彪在渝谈判方案为基础。

5月6日，双方再次会谈。王世杰日记载：“午前与林祖涵续谈，所谈以军事问题为主，此君仍持讨价还价之意，似无努力解决问题之真诚。……今日对于中共军队改编之数额则谓至少应编为六军（十八个师），又远出林等（按：指林彪）去岁所提意见之外。”^③

5月7日，双方继续会谈。王世杰日记载：“商谈陕甘宁边区承认问题。予所最注意者，一为区内法令须经中央核准，一为该区停止发行钞票。林虽表示在原则上同意，但实际上殊无尊重

① 《王世杰日记》1944年5月3日。

② 《王世杰日记》1944年5月4日。

③ 《王世杰日记》1944年5月6日。1942年12月24日，林彪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向国民党方面提出四点意见：（1）在允许中共合法的条件下，允许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等地办党；（2）八路军、新四军编为四个军十二个师；（3）陕甘宁边区改为行政区，人员、地域不动；（4）八路军、新四军黄河以南部队，在抗战胜利后北移（《毛泽东年谱》中卷，第417、510页）。

中央法令之意。”^①

5月8日的会谈议题侧重于中共合法地位的承认问题，王世杰表示：“抗战完毕实行宪政，国民党自可依其党纲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地位。”^②

至此，西安谈判基本结束。5月10日，林伯渠致电延安：“张、王的态度是倾向照林彪提案解决，但不愿做正面肯定的表示。他们办法是探求我们能接受的意见向蒋报告，再由国民党中央作一提示案，交我转延安接受。”^③显然，接续林彪原案，此即国民党对于此次谈判的最初准备。

从国、共对各自代表的最初指示来看，从西安的初步接洽来看，此次谈判大体上仍以原林彪案为基础，延续着几军几师的旧时议题，一切似乎预示，这又是一次周而复始的例行谈判，既未出格、亦无悬念。

背景的转变，从根本上改变了此次谈判的政治走向。

自1938年武汉会战之后，中国战场大致处于相持状态，这种相持状态于1944年猛然发生剧烈变动。

1944年1月，日军大本营拟定“一号作战纲要”，规定作战目的是：“占据湘桂、粤汉及平汉铁路南段沿线要地，以消灭敌空军主要基地，封锁其活动。”要求当年4月，日华北方面军“击溃以第一战区军主力为主之敌人，占据并确保黄河以南平汉铁路南段沿线。”^④

一号作战是抗战末期日军在华发动的规模最大的最后的战略

① 《王世杰日记》1944年5月7日。

② 《王世杰日记》1944年5月8日。

③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11页。

④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撰《河南会战》，第51页，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译印，1987。

进攻，同时也对抗战末期的中国政治构成了影响最为深刻的政治背景。

一号作战发动之前，河南日军已经出现异常动向，但重庆统帅部并未做出一致性判断。3月4日，军令部长徐永昌记载，据情报：“敌已将平汉黄河桥修葺，可通汽车，此似是一种姿势，至其欲打通平汉线之宣传，在今日看则完全眩惑伎俩而已。”^①蒋介石的看法不同，“蒋先生以为敌必拟打通平汉线而修复之。”^②国民党在河南地区的兵力主要掌握于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手中，汤于3月25日的一份上呈报告中认为：日军“是否企图打通平汉或转用他方尚难判定。”^③

就在此刻，新闻机构报道了一条并不引人注目的消息，苏联外交部副部长与日本驻苏大使于3月30日签署了《关于北萨哈连日本油矿和煤矿租借区移交苏联的议定书》，同日，两国还签订了日苏渔业协定延期议定书。萨哈连即库页岛。

这样两条表面看来纯属经济性质的消息，或者不为人关注，或者令人费解。4月1日，徐永昌在日记中写道：“北库页岛煤油及煤炭利权转让苏联，并与苏延长渔业条约五年，三月三十日在莫斯科签署。”^④徐永昌记载此事，说明此事引起了他的注意，但此事意味着什么，徐的判断一字没有，说明徐尚未读懂。

相反，毛泽东则极为敏锐地一眼识破其背后的战略意图。4月5日，毛泽东在一份电报中指出：“近日，日将库页岛权益还苏，北和苏联，南抗美、英，进攻中国（打通平汉路甚至粤汉路），‘打荡’敌后，东条此项政策，更加明显，因此日蒋冲突，

① 《徐永昌日记》1944年3月4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编印，1991。

② 《徐永昌日记》1944年3月18日。

③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2编（2），第622页。

④ 《徐永昌日记》1944年4月1日。

今年必更剧。”^①毛通过日本“北和苏联”的战略动向，对其下一步战略意图、战略方向，相当迅速地做出了后来证明是相当准确的判断，反映出毛作为战略家的极其敏锐的一面。

4月中旬，代表日军此项战略意图的一号作战在河南发动。迟至5月中旬，徐永昌才算明白过来，他在日记中写道：“纽约时报昨日社论云，日本基于日苏库页岛协定保证苏联继续在远东保持中立，故敢自东三省抽调精锐部队向西、南两方发攻势。”^②在一号作战发动近一个月之后，芸芸众生这才看出日苏库页岛协议与一号作战的关系，仅此一点，足以展现毛泽东的过人之处。

一号作战发动之后，国民党内部对于日军战略意图的判断仍是混乱的。4月24日，军令部表示：“本部判断，敌人之攻击：一、因抽兵而先发攻势，以防我反攻；二、声北击南，其目的恐仍在粤汉线；三、打击有力之汤部，防其活动并妨害我之抽兵。”^③汤部指汤恩伯部。

此时各方面情报陆续传来，4月27日，“法军事代表团团员翁布朗称，越南极可靠情报，倭企图开始打通平汉、粤汉两铁路。”^④但这个情报仍未被重庆统帅部一致接受，徐永昌仍持己见：“敌传打通（恢复）平汉铁路，殊无理由，余以为主要在打击我汤集团或抢麦，亦可能为掩护换防。”^⑤

河南战役展开之际，正是国共西安谈判之际，王世杰在日记中对此做了记载：“敌军近在河南发动攻势，连日许昌、临汝均陷，洛阳亦岌岌可危。”“敌军逼近洛阳，洛阳告急。闻此次豫

①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05页。

② 《徐永昌日记》1944年5月15日。

③ 《徐永昌日记》1944年4月24日。

④ 《徐永昌日记》1944年4月27日。

⑤ 《徐永昌日记》1944年4月30日。

战之挫败，半由于汤恩伯副总司令长官之不得民心。”^①王对军事颇为忧虑，但他的政治反应同样是迟钝的，他完全没有意识到，河南的军事溃败正在演变为国共谈判的政治背景。如同陷入军事被动一样，国民党必然陷入政治被动。

与国民党的迟钝相反，毛泽东迅速将战局的变化与国共谈判联系起来。收到林伯渠的电报后，毛认为林彪原提四点要求已不适应新的情况，5月16日，毛致电林伯渠，提出一个20条要求的谈判方案。其中，关于全国政治问题的要求有3条：1. 请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之自由；2. 请政府开放党禁，承认中共及各爱国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爱国政治犯；3. 请政府允许实行名副其实的人民地方自治。此外，关于两党悬案问题有17条，主要有：要求将中共军队编为16个军，47个师，为委曲求全，目前至少编为5个军，16个师。要求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华北、华中、华南各抗日根据地的民选政府为合法地方政府，等等。^②

毛泽东所提新案与林彪原案最大的不同之处有两点：第一，林彪案仅涉及两党双边问题，毛的新案则提出了全国性的问题。第二，林彪案以军事问题为主，只涉及局部性的政治问题，而新案则提出了全国性的政治问题。

将全国性的政治问题提上国共谈判的议程，这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以来的第一次；“民主政治”要求的提出，尽管还不太具体，但却标志着国共谈判的内容和性质正在或即将发生深刻的变化，这个变化必将对中国政治的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

① 《王世杰日记》1944年5月6、9日。

②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12页。

5月17日林伯渠与王世杰、张治中同机飞抵重庆。18日，王世杰见蒋，其日记载：“午前谒蒋先生，报告与林祖涵谈话情形，并郑重主张此次务成立若干初步解决办法，若干时以后，或可促毛泽东作进一步解决之商谈。蒋先生似亦以予之意见为然。”^①王世杰所说的解决办法，是指林彪原案的解决办法，但林彪案已被取消。

5月22日，谈判在重庆继续进行，王世杰日记载：“晚间在张文伯宅与林祖涵晤见，林交来一函，提出十七条款，谓系奉延安之命而提出者，其本人在西安所表示之意见，似将完全撤废，如此翻覆，予与文伯均愤怒，因对彼将其所提十七条款拒绝接受。”^②王世杰所说的17条，实际上就是中共的20条，其中有国共之间的问题为17条，王将中共20条称为17条，说明他完全未把那3条全国性政治要求放在眼里。由于新20条完全脱离了林彪原案，故王、张拒绝接受。

5月23日，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致电毛泽东，对国共谈判方针提出看法，认为蒋因河南战事失败，对其军事、政治、经济、外交均产生了“严重影响”，在这种背景下，蒋“对共党无办法”；为此，“我们从延安出发时的一些估计，必须随情况的改变而改变了”。“林彪同志过去提案已不适合今天情况”，“我们完全同意中央所提二十条每条的精神”，“新二十条虽不能马上实现，但可否定过去，成为今后新的谈判的基础”。^③

对此，毛泽东6月3日复电：“完全同意你们对时局的估计与对谈判的方针，你们的意见和我们是一致的。”^④根据河南战

① 《王世杰日记》1944年5月18日。

② 《王世杰日记》1944年5月22日。

③ 《林伯渠文集》，第403、404页，华艺出版社，1996。

④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17页。

役这一新情况的出现，中共迅速放弃了林彪原案。

尽管王世杰、张治中以强硬的姿态拒绝接受中共的谈判方案，但战局的发展对国民党更加不利。日军连连得手后，5月上旬形成对洛阳的进攻态势，为保豫西和西北安全，5月上旬，第8战区胡宗南部抽兵出潼关参战。5月14日，蒋介石令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副司令长官汤恩伯率部反攻。5月17日，侍从室的林蔚对徐永昌说：“午前委员长尚令电话询蒋、汤，蒋、汤皆谓现在实掌握不到部队，委员长至此始觉无可奈何。”^①

5月25日，洛阳陷落，河南战役发展到顶点。

在这种局面下，国民党对中共并无多少办法，故而也不主张把问题弄僵。此时，王、张已拟出一个对中共的提示案，同意中共编为4个军10个师，基本上是林彪在渝谈判时所提要求。5月31日，王世杰、张治中向蒋力陈中共问题应设法解决，认为：“即令为暂时的或局部的解决亦属必要，因此时如不解决，将来反攻时仍须商谈。且依予等所拟方案，如获中共大体接受，则即中共不诚意执行，政府之损失亦不过若干师之军费而已。”对于这个意见，“蒋先生允细加考虑后决定”。^②允许中共编为4军10师，其军费是要由政府负担的。王的意思是以此将中共问题大体解决，如不奏效，亦仅损失少许军费而已。

数日后，蒋同意了王、张方案。王世杰记载：“蒋先生对于与张文伯所拟中共问题政治解决方案，未多更动，予以核定。”^③

蒋介石所核定的张、王方案，即“中央政府提示案”，基本内容为：中共军队编为4个军，10个师；陕甘宁边区改称陕北

① 《徐永昌日记》1944年5月17日。

② 《王世杰日记》1944年5月31日。

③ 《王世杰日记》1944年6月3日。

行政区；抗战结束后，召开国大，实施宪政，中共与其他政党享受同等待遇。^①共3项18条。这个中央提示案基本上以林彪原案为基础。

当国民党盘算着以几军几师的军费解决中共问题之际，中共对于国共关系的认识已完全超出国民党的盘算范围。

毛泽东一开始就将战局的发展与政局的转换联系起来，并从这个角度考虑并提出问题。5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做报告，毛说：“蒋介石的三个主力之一汤恩伯如何完全无能，日寇乱冲一顿，他们就乱跑一顿”。“现在胡宗南也有一部分军队调到河南去了，如果胡宗南也和汤恩伯一样，蒋介石的三个主力就塌掉两个，中国政治局面就会起大的变化，国民党与共产党力量的对比也会起变化”。^②这就是说，在国民党一部分主力正在“塌掉”之际，毛泽东敏锐地感觉到，这一势态的发展，将会引出中国政治局面的变化和国共力量对比的变化，而这种变化说到底，就是国共地位的变化。

以洛阳失陷为标志，日军的一号作战告一阶段。在这个背景下，6月5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召开了一次城市工作专题会议。

中共长期以农村为发展重点，然而中共的政治地位能否得到大幅度的提升，一个重要标志是能否占有中心城市，城市工作问题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提出来的。所谓城市工作就是在抗战结束之际看谁先进城，谁先夺取城市。在这次会议上，毛说：将来可能出现三股子力量，即罗斯福的美军、蒋介石和共产党，看谁先进

^①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5编（4），第296、270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37页，人民出版社，1996。

城。刘少奇说：我们现在进入城市的条件，超过世界各国的党。……可以实行“先到为君，后到为臣”。周恩来说：我们先进了城，人民选举我们，我们就是合法的，国民党要反对我们，他就是非法的。^①

在这里，刘少奇提出了君与臣的问题，也就是要在抢先进入中心城市的基础上，使中共成为“君”，而使国民党成为“臣”，从而根本调整国共关系。

提出城市工作的根据是什么呢？毛说：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抗击了四分之三的敌军，根据地人口有八千多万，整风和生产取得了成效，国民党在精神上物质上都下降，汤恩伯一败如水，英、美舆论和民主政团同盟都同情我们，国民党内部有分化。^②也就是说，城市问题的提出，是以国共力量的消长，以及国内外政治环境的转换为根据的。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就日军一号作战对国民党的打击及其后果做如下估计：毛说，日寇这次大规模进攻，目的在于打通粤汉、平汉两路，消灭蒋介石野战军，其进攻可能造成四种变化：一是国民党大大削弱，美国增加援助后恢复战斗力；二是国民党大大削弱，美国暂不增加援助，但不投降；三是国民党大大削弱后，一部分投降，一部分继续抗战；四是完全投降。毛泽东认为：在一、二两种情况下，美国、国民党、共产党三股力量必然要对日反攻收复大城市，届时，我们应争取起决定作用。^③毛的四种估计也就是四种不同的结果，然而前提都一样，都是国民党大大削弱，故提出了中共应起“决定作用”的论点。

任弼时发言认为：第三种可能是国民党大大削弱，何应钦投

①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67、368页，人民出版社，1994。

② 《刘少奇年谱》上卷，第444页。

③ 《任弼时年谱》1944年6月5日。

降，我们与地方实力派、民主政团同盟结成民主同盟，而以共产党为领袖。^①

关于城市工作的开展，刘少奇在会议上讲：现在是否来得及？来得及！敌人正在进攻正面，我们可以利用时间。刘少奇指出了完成这一任务的有利条件，其中之一是：我们有近五十万军队和十几个根据地，而且有可能扩大军队到几百万人。^②

彭真说：通过国民党河南战争的失败，要认识夺取大城市要靠我们。过去把国民党当作正统的观念要改变。^③ 张闻天说：提出城市工作问题在思想上要有一个大的转变。过去认为国民党是老大哥，今后我们就是老大哥。毛最后说：对蒋介石又拥护又批评……将来可能成立各党联合的民族联盟。^④ 我们就是老大哥，这是中共对自身地位的全新认识。在这里，毛泽东提出了成立各党联合的民族联盟的可能性，联合政府的构想已经呼之欲出。

这次会议于6月5日当日做出《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该指示首先指出：“过去人们认为从大城市与交通要道驱逐日寇的任务，似乎只有国民党才能胜任；现在必须改变此种观点，认为有些只有依靠我党才能胜任”^⑤。在当年12月25日的一份指示中，中共中央指出：“只有我们占领大城市以后，我们才能成为最后胜利者”^⑥。

城市工作会议的召开，中共把战后谁为“君”谁为“臣”

① 《任弼时年谱》1944年6月5日。

② 《刘少奇年谱》上卷，第445页。

③ 《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年谱1902~1997》上卷，第24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④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67、368页。

⑤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243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⑥ 同注⑤，第433页。

的问题提了出来。这个问题的提出表明，中共已经把战后中国政治怎样安排提上了议事日程，而这个议事日程的提出则表明，抗战末期，中国政治的主题开始转换，争取怎样一个抗战结果，成为全部中国政治的主题。适时地将视角向后转移，是一种深谋远虑的表现，问题在于：随着政治主题的转换，旧有的国共合作方式亦必须随之而改变。政治主题的转换还表明，在抗战末期，尽管对日作战尚未结束，但日本问题已不再是中国政治的主要问题，而已经退居为中国政治的一个背景。

由于中共 20 条为国民党所拒绝，出于策略的考虑，5 月 31 日，毛泽东致电林伯渠：“十二条均属事实，请求政府解决极为必要，为尊重他们的意见，改为十二条，其余八条作为口头要求，仍请政府考虑解决。”^①中共新提 12 条中，关于全国的政治要求仍为 3 条，与原条款大致相同；关于两党悬案，原为 17 条，现改为 9 条，主要要求未变，仍要求中共军队编为 16 个军，47 个师，目前至少编为 5 个军，16 个师。

在中共召开城市工作会议的当日，6 月 5 日，林、董、王致电延安：“新修改十二条收到后，约定张、王今晚会谈，再交他们。”“我们估计，蒋目前虽极困难，但绝无解决问题诚意……具体解决问题，要在英美主力将要在远东战场行动时。所以，我们这几天并不急切去催张、王”^②。6 月 5 日，双方代表再度见面，并互换提案。王世杰日记载：“予与文伯于今日午后六时约林祖涵谈话，予将蒋先生核定案交林，林亦持有一函致予与文伯，其内容系将前次延安所提十七条（被我与文伯拒绝者）减

^①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 516 页。

^② 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统一战线工作》，第 107 页，重庆出版社，1990。

为十二条。予告以此函我等不能转陈，如彼欲我等收下，亦只能留在我与文伯之处，彼亦无异议。”^①也就是仅以个人名义收下而不是以政府名义收下，半推半就，实际上就是收下了。

以国共双方互换提案为标志，此次谈判告一段落。综上所述，以河南战役为背景，中共迅速摆脱旧时的谈判条件，首次提出了全国性政治要求，将两党关系的改变与国家政治的改变联系起来，从而使国共谈判的性质发生重大变化。6月5日互换的两个提案，一个以脱离了林彪原案的新的条件为基础，另一个仍以林彪原案为基础。那么，接下来的谈判将向哪个方向发展呢？这一点取决于战局的进一步发展。

二 联合政府口号的推出

正当汤恩伯在河南溃败之际，6月6日，欧洲盟军发动了诺曼底战役，开辟了期待已久的欧洲第二战场。对此，重庆统帅部的反应喜忧参半。徐永昌记载：“关于欧洲第二战场之开辟，敬之极为兴奋，逢人便道，喜不可支。”而徐则认为：“此事无论前途，未便乐观……我当面敌人正可借英美努力对欧之时，向我发动决定性之打击。”^②

何应钦所以“喜不可支”，是指望盟军此举能够牵制日军的进攻，如同当年的珍珠港事件那样，将国民党从危机中解救出来。

然而，国民党自身却难以摆脱困境。洛阳失陷后，重庆统帅部对于日军下一步的进攻方向，在判断上仍然处于混乱状态。军令部判断日军将继续向西，进攻西安。6月12日，蒋介石批准

^① 《王世杰日记》1944年6月5日。

^② 《徐永昌日记》1944年6月7日。

了军令部所拟“预防敌人进入潼关”的作战指导。6月18日，在蒋召集的会议上，军令部次长刘斐判断：“敌必冲至衡阳，可能入桂林。”事后看，这个判断相当准确。但徐永昌认为：“敌兵力不足，只要我能力拼，尚不至企图入桂。”^①直至当年7月，汤恩伯仍判断日军的进攻方向是西安。^②侍从室主管情报的唐纵后来在总结河南战役失败原因时，第一条便是：“对于敌情判断错误，始终没有预料到敌人打平汉路”^③。判断的失误，使国民党难以摆脱军事被动。

另一方面，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对于日军的一号作战没有明显的牵制作用，过不了多久，何应钦便不再“喜不可支”了。

日军的进攻构成了国共谈判的第一个背景。不久，第二个背景也展现出来，此即美国对国共关系的干预。中共于年初做出恢复国共谈判的决定时，便预料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美国将出面干预国共关系，这个预测相当准确。6月18日，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由苏联飞抵新疆迪化，此次访华的目的之一，正是过问国共关系。

王世杰代表蒋前往迪化迎接。19日，王陪同华莱士参观新疆女子学院。王记载：“该学院图书室中有王临川全集。华氏素极钦佩王安石，予因告以王荆公之精神，可于其奏折中‘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三语见之。”接下来华莱士来了一个现买现卖，“华氏旋向学生演说，即征引此数语，并谓蒋先生持此三语将必克服中国未来之一切困难。”^④20日，

① 《徐永昌日记》1944年6月12、18日。

②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2编（2），第632页。

③ 唐纵日记，1944年6月26日。《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438、439页。

④ 《王世杰日记》1944年6月19日。

华莱士飞抵重庆。

6月22日、23日，蒋与华莱士连续会谈两天。蒋对战局失利的解释是：开罗会议的军事决定未能照原议实行，以及美方不肯将运抵昆明的军械交中方使用，等等。关于中共问题，“蒋先生力述中国共产党宣传之虚伪（广播述其拥护抗战、拥护统一、拥护蒋委员长等口号均绝对不可信），蒋先生并谓中共确以苏联为背景。”王世杰参加了会谈，他看到，对于蒋关于中共的解释，“华莱士氏初不甚信，经详谈后，似亦相当的相信。”最后，“蒋先生力述美国如期望中国政府‘政治解决’的主张成功，最好在对中共问题表示冷静，或更劝中共服从中央命令，不可一味督促中国政府速求解决。”^①蒋的意思就是不希望美国插手中共问题，以防止中共问题国际化。

6月23日会谈时，华莱士表示：“中共问题既有苏联为背景，中国似宜从早与苏联直接恳谈。”蒋表示当尽力为之。华莱士还谈到德黑兰会议时，斯大林曾对罗斯福提出，苏联在远东无不冻港，希望大连成为自由港；蒋答，这个问题罗斯福在开罗会议时已提出，蒋当时已应允。^②

华莱士访华前后，中共加强了对美宣传，重点强调国民党的独裁制与美国民主制的对立。6月23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欢迎华莱士先生》，称赞罗斯福的四大自由，表示四大自由在中共区域已“见诸实施”。抨击国民党“箝制舆论，统制思想”，要求“立即废止独裁、实行民主”，希望华莱士“帮助中国人民促进这些迫切需要的改革”。

尔后，《解放日报》于美国国庆日发表社论，称美国为“资本主义世界最典型的民主国”，“与社会主义的苏联成为民主世

① 《王世杰日记》1944年6月22日。

② 《王世杰日记》1944年6月23日。

界的双壁”。称国民党拒绝实行民主制度，“民主的美国已经有了它的同伴……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势力。我们共产党人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过的工作”^①。

这显然是力图借助美式民主体制以破坏国民党的训政体制，并分化国、美关系，力争美国在华重新选择合作“同伴”。

华莱士究竟相信国、共何方之说，姑且不论。总之，华莱士此行开创了美国最高当局直接过问国共关系的先例，中共问题的国际化正在浮出水面。

华莱士访华期间，国民党的军事形势继续恶化。日军攻占洛阳后，没有向西进攻西安，而是向南发起了湖南战役，由此展开一号作战的第二阶段。6月18日，日军攻陷长沙，这是继洛阳之后，又一重要城市失守，这一点再次体现在国共谈判上。

7月2日，毛泽东致电林伯渠、董必武：“我党曾多次派大员赴渝谈判，有充分理由邀请张、王来延一商。如不能来两人，则来一人。如两人均不愿来，则林偕美军事人员回延”。^② 提议张治中、王世杰赴延安谈判，是要促成一种两党对等的姿态，以提升中共地位。

7月3日，林伯渠向王世杰、张治中口头转达了中共对于6月5日国民党提示案的意见，共四点：（一）民主尺度放宽；（二）中共军队编为16个师；（三）希望王世杰和张治中赴延安细商；（四）恢复中共在渝电台。^③

① 《解放日报》1944年7月4日。《胡乔木文集》第1卷，第130、133页，人民出版社，1992。

②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24、525页。

③ 《王世杰日记》1944年7月3日。

7月6日，王世杰就中共的口头答复与林伯渠谈话，表示中共如有解决问题的实意，“断不可空空洞洞的提出‘民主化’等条件以相搪塞，因民主化必须一步一步的实现”。^①王世杰认为中共的民主要求空洞，这成为拒绝中共民主政治要求的一个主要理由。

7月13日晚，林伯渠与王世杰、张治中再度会谈。王世杰记载，林的要点是：“希望予与文伯至少有一人赴延安一谈，如均不能往，希望中央对中共所提十二款予以研究答复”。^②

此刻，由于林伯渠在重庆的谈判仍无进展，7月19日，毛泽东在一份内部指示电中指出：国共谈判无进展，实际上仍不承认我党的合法地位……林伯渠尚在重庆，但是根本调整国共关系，要待蒋更困难及美方施以更大的压力时才有希望。^③在这里，毛提出了“根本调整”国共关系的问题，而这种调整需要两个条件，即“蒋更困难”和美国施加更大压力。

这个“蒋更困难”的时刻不久便到来了。洛阳、长沙失陷后，美国对蒋及其国民党军已丧失信心。7月7日，罗斯福致电蒋，提出由史迪威指挥所有在华美军及中国军队，包括中共军队，引发了后来名噪一时的史迪威事件。对此，蒋没有立即拒绝，蒋采取了两个步骤：其一，与罗斯福谈条件；其二，整顿部队，以求扭转局势，从而在世人面前“证明”自己。

7月8日，蒋复电罗斯福，表示此事要有一个准备时期，同时提出：与美方“军事之彻底合作，必须以政治合作为基础”^④。

① 《王世杰日记》1944年7月6日。

② 《王世杰日记》1944年7月14日。

③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30页。

④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3），第636、637页。

这个政治合作，是指对中共的政治合作，意思是在这个基础上考虑史迪威指挥权问题，这是蒋的反条件。

关于史迪威的指挥权，蒋最初的态度是，“有取忍辱负重之意，拟以原则同意”。为此，蒋指定何应钦、徐永昌、刘斐三人对此做具体研究。结果，何应钦“拟飞英一察美方艾森豪威在彼指挥情形”，即参考美国将领指挥欧洲盟军的经验，而徐永昌的意见是：“由我统帅部选定一、二重要战场，如六、九两战区交渠指挥，先行试办，再为决定”。对于美方这一要求，徐永昌不无感慨地写道：“百年桎梏解除未久，而有此类情势发见，诚可愤叹。”^①百年桎梏解除未久指1943年1月刚刚废除不平等条约，而现在却要将军队交外国人指挥，故颇为愤慨。

史迪威指挥权的核心问题是中共军队是否归其指挥。最初，蒋对这个问题的考虑是复杂的。7月23日，蒋在与徐永昌磋商此事时，徐仍主张将部分战区交其指挥，但是，“蒋先生主张完全接受，理由：（一）八路军既归其指挥，当不能如前捣乱，否则其种种恶行及虚伪宣传不辩可明；（二）将来我军进出东三省时，必与苏军接触，有美人在中间，至少能得到公道”^②。显然，蒋对于史迪威指挥权的考虑较为复杂，把当前对付中共与将来对付苏军联系起来。

王世杰亦赞成此议。7月26日，王对蒋说：“美国将领任此指挥之职，或可间接减少苏联加入远东战事后之困难。”这个意见与蒋的考虑有一致之处，因此王的印象是：“蒋先生似渐赞成罗议”^③。

当然，上述议论并不说明蒋已做出最后决定，甚至也不说明

① 《徐永昌日记》1944年7月18日。

② 《徐永昌日记》1944年7月23日。

③ 《王世杰日记》1944年7月27日。

蒋已有一个倾向性意见，但说明史迪威指挥权提出之初，蒋也曾有过多角度的考虑，也曾有过将包括中共在内的全部军队交出更为有利的考虑。但是，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是蒋难以做出决定的。

当美、蒋关系因史迪威问题出现裂痕之际，美国与中共的关系有了重大进展。华莱士访华时，在6月22日与蒋会谈中，“对于派遣美军事侦察人员（侦察日本军情）赴华北及陕北中共区域一事亦曾讨论，并有所商定。”^①在美方的敦促下，1944年7月22日，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在组长D. 包瑞德率领下进驻延安。

对此中共极为重视，中共随后发出外交工作指示，认为美方此举是“对我新民主中国有初步认识后的实际接触的开始”，“应把这看做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中共已做出一个深远的考虑，争取美方“作战方面的合作和援助，有了军事合作的基础，随后文化合作，随后政治与经济合作就有可能实现。”^②

7月26日，在为美军观察组举行的宴会上，毛泽东向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谢伟思提出一个问题：美国是否有可能在延安建立一个领事馆。^③这个问题并非空穴来风。

当年5月，美国共产党解散，同时成立非政党性质的“共产主义者政治协会”，白劳德任协会主席。在协会成立大会上，涉及中国问题时：“大会并提议在陕北边区建立美国军事代表团和领事代表机关。”此事引起了中共的注意，《解放日报》报道了这一消息。有趣的是，此事也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蒋于7月

① 《王世杰日记》1944年6月22日。

② 《南方局党史资料·统一战线工作》，第118、119页。

③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31页。

22 日指示外交部情报司收集有关材料。^①

美国“共协”提出的是两件事，现在，美军观察组已进驻延安，因此毛便提出另一件事，设立领事馆。当然，此事后来并无结果，并且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与美国“共协”的呼吁并无关系，此事反映出中共力图使其外交工作走得更远一些。

综上所述，洛阳、长沙失守，蒋在军事上陷入极度困境，蒋的政治地位急剧削弱，这种情况反映在国共关系上，引出了中共空前地提出王世杰、张治中赴延安谈判的要求；反映在国际关系上，引出了美方提出史迪斯指挥权的要求；反映在中共政治地位的提升上，迫使蒋同意了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

当以上事件发生之际，正是衡阳战役发生之际。蒋能否扭转军事态势，从而对国人有所交待，在罗斯福那里争回地位，并对国共谈判取得优势地位，衡阳战役的成败将产生直接的影响。为此，蒋力图整顿部队以利再战。

7 月 9 日，蒋在曾家岩官邸会议上说：“多亏有洛阳、长沙之败，否则种种腐坏现象俱不得知”^②。7 月 12 日，蒋下达一道手令，要求各战区“严加整饬，并制定连坐法，以期振刷士气，挽回颓风”。徐永昌对此信心不足，徐认为：“所谓连坐，北伐时本已定有法则，但未见实行。即古人之军法今日果能实行，则其效亦可立见，倘只是空谈，虽朝夕言之有何益哉”^③。

7 月 21 日，蒋在官邸会议上再次对僚属强调：“外人看我们直不当人，非但不当军人，须知此次胜利于我无与，我军事萎靡已极，抗战胜利之日，即我们灭亡之时。豫湘战事失败下来，我

①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 5 编（4），第 100、101 页。

② 《徐永昌日记》1944 年 7 月 9 日。

③ 《徐永昌日记》1944 年 7 月 13 日。

们军事在国际上已无地位，此次如不能得到改革，得到回头……则吾人真无人格、无羞耻。”讲话中，蒋“声色俱厉，数数击案如山响”^①。

由于上面这些原因，蒋对衡阳之役寄予了极大的期望。蒋接到罗斯福要求之初，即于7月8日致电时在美国的孔祥熙，强调：“中国战局并未如外人所观察者之危急，不久当能有事实之证明”^②。蒋所说的事实证明，便是指衡阳战役，力图通过此次役的胜利，“证明”一切。

衡阳守军为国民党第10军军长方先觉部，该军所属3个师并配属一个师，共17000人左右。在衡阳外围地区蒋介石集结了约8个军，总兵力10万以上。衡阳战役由6月22日开始到8月7日结束，持续47天，其间也有过数次极为残酷的攻防战，8月8日，方先觉率所属4个师长集体投降日军。^③

衡阳战役是一号作战中关键意义的一役。衡阳失守，在政治上、军事上、内外舆论上，对国民党、蒋介石都是一次重大的打击。汤恩伯在河南的失败，引出了中共关于民主政治的要求和城市工作的动议，衡阳失守又将引出怎样的结论呢？

衡阳战役期间，重庆当局就王、张赴延安一事继续磋商。8月2日，王世杰就此事向蒋提出建议，王氏日记载：“予今日特向蒋先生提出主张，认为延安约请予或张文伯赴延安商谈之议，纵令彼之用意在延宕或对外宣传，我不可却之。盖我如完全拒绝，林祖涵势将托词要求返延安报告请示，此一谈判在表面上将

① 《徐永昌日记》1944年7月21日。

②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3），第636页。

③ 饶少伟：《方先觉衡阳投敌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40辑，第162～180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

告破裂或停顿，在目前举国乃至中外注目于此一谈判时，此种破裂殊多不利。予并向蒋先生建议指定张文伯乘飞机赴延安作三数日谈。蒋先生亦以予所言为是，但谓如赴延安，仍以予往为宜。”^① 中央政府的代表赴延安谈判的先例是没有的，王世杰的建议深刻反映了国民党的所处态势，和国共地位的变化。

8月4日，王世杰约见林伯渠、董必武，告以两件事：“（一）予与文伯将给彼等所提十二条意见以书面答复，彼应促中共对中央六月五日提示案迅提切实答案；（二）如彼等有答案送来而其内容不太坏，予将提请中央派文伯或予本人偕林赴延安一商。”^② 显然，王世杰把他与张治中的延安之行看做了对中共的一个要价，王是颇为看重中央代表这一身价的。

8月10日，王世杰、张治中对中共所提12条复函林伯渠，关于中共对民主政治的要求，王、张表示：国民党方面承诺，“在抗战结束后一年以内，实行宪政，予各党派以同等地位，此种申示，意义较为明豁，亦较为具体，倘中共欲于此种申示之外，更标举若干毫无边际之抽象文句，如‘实行民主政治’，‘保证自由’等等，于事实究竟有何裨益”。^③ 以毫无边际的名义再度拒绝中共关于民主政治的要求，但就在此刻衡阳失守。

8月12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题为《衡阳失守后国民党将如何》，毛泽东为该社论加写的几段话中指出：“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同一日，毛致电林伯渠、董必武：“衡阳失守，敌后抗战地位更形重要，我军四十七万须要求政府全部承认，不要谈五军十六师了。”^④ 敌后抗战地位指中共地位，中

① 《王世杰日记》1944年8月2日。

② 《王世杰日记》1944年8月4日。

③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5编（4），第274页。该复函为王世杰起草，见《王世杰日记》1944年8月10日。

④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33、534页。

共地位因衡阳失守而更形重要，因此中共的谈判要求随之看涨。从5军16师到47万，这不是一个数字的变化，这就是政治。

早在一号作战的第一阶段，即河南战役期间，毛泽东即预测国民党军队如继续溃败，“中国政治局面就会起大的变化”。这表明，尽管此时的国共谈判仍然围绕5军16师而谈，但毛的着眼点已经放在了政治局面的变化上。随着河南战役的结束，毛又相应地提出了城市工作方针；该方针的实质是，在此基础上，建立“联合的民族联盟”，其政治的着眼点在逐步地具体化。7月，毛提出国民党代表赴延安谈判的要求，以促成两党在政治上对等的地位，这是推动政治局面转化的一个措施。当衡阳战役处于一个多月胶着状态期间，毛的着眼点已经放在“根本调整国共关系”上面，只是这种“根本调整”需要一个条件，即“蒋更困难”之时。

上面这段回顾表明，在日军一号作战发起之后，毛的思路是连续一贯的，并随着战局的发展逐渐延伸、逐渐具体。现在，当衡阳陷落后，一切也都成熟了，毛果断地摒弃了几军几师的枝节问题，在毛的构想中，一个长时间思索的重大的政治构想，最终瓜熟蒂落。

8月17日，在董必武请示国民参政会有关事宜的来电上，毛泽东写下了日后改变国共关系，也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几句批示：“应与张、左商各党派联合政府。……以上请周考虑拟复。”张、左即张澜、左舜生。根据毛的指示，8月18日，周恩来草拟了致董必武、林伯渠的复电：请考虑目前由我党向全国提议并向国民党要求提前召集各党派及各界团体代表会议，改组政府，然后由此政府召开真正民选的国民大会……这一提议是否可能引起大后方响应，尤其是小党派、各地方实力派的同情。^① 改组政

^①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36页。

府的提议，将把国共谈判推上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8月10日，王、张对中共12条做出答复后，8月30日，林伯渠复函王世杰、张治中，转达中共中央对国民党6月5日提示案的答复，认为该提示案与中共的要求“在原则上相距太远，无法接受。”“一切问题，都看国民党有无准备实行民主政治的决心和诚意。如果有，就应该在抗战期中立即实行宪政，而不推在抗战之后。”“我们这里绝对没有乘国民党形势不利而提出什么过高的要求，更没有利用国民党处境困难而拖延不愿解决”。^①

当日王世杰这样记载：“今晨林祖涵送来复函一件……对于中央提示案肆意反驳，强调实行民主保证自由等问题，函末促请予与文伯赴延安一行。”王已看出中共的侧重点在民主政治，为此，王向蒋建议：中共“如欲参加政府，政府可在行政院予以地位”。蒋认为中共无诚意，不允。王说：“我对中共政策，应须想到两三个月后苏联参加远东战事，中共军队与苏联连合时之状态。我应预采一种方法，防止苏联届时承认中共政治组织或接济其军火，使与政府对抗。”^②

苏联参加远东战事，由此而引出的苏联与中共的接合问题，是抗战末期国民党高层极为关注、颇感棘手又苦无良策的问题。从这个考虑出发，王建议将中共纳入政府，以此对中共与苏联的接合起到限制作用。

9月4日，王世杰见蒋，“关于答复林祖涵八月卅日来信事，经向蒋先生详陈，允对中共邀请予及文伯赴延安一行一节，作原

^① 《林伯渠文集》，第406~411页。

^② 《王世杰日记》1944年8月30日。两三个月后苏军参战，是王世杰自己的估计，此事是抗战末期国民党高层不断估计的一个问题，但直至雅尔塔会议才做出正式决定。

则上之接受，惟声明彼方必须派负责代表偕返陪都。”^① 9月9日，王世杰再次“与蒋先生商讨中共谈判事。最后决定在答复林祖涵函中仍表示予与文伯可往延安一行（该函决定于十一日发出）。”^② 显然，王世杰对他或张治中延安之行的条件，与最初相比已降低了许多，但仍抱有成行的指望。然而也就在此刻，中共即将推出一个重大的政治建议，这个要求的提出，将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共谈判的内容，也将从根本上改变国共谈判的性质。王世杰永远未能踏上延安之行。

9月4日，延安致电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时机已经成熟，其方案为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军、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代表，开国是会议，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同时指示：“望你们在起草回答张王的信中加上此项主张，以说明这是我们对于实施民主政治的具体步骤和主张。”^③

9月5日，第三届国民参政会第三次大会开幕。9月6日，林、董、王致电延安，请示提出改组政府和成立联合政府的办法。7日，延安复电：“同意用我党中央的名义致函参政会，并利用林在参政会报告机会，提出我党关于改组政府之主张和步骤的办法”^④。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致函参政会，以郑重表示这是一个正式的提案。

9月14日，林、董致电延安：我们曾与各民主党派商量我党将提出改组政府的问题，他们不赞成我用党的名义正式向参政

① 《王世杰日记》1944年9月4日。

② 《王世杰日记》1944年9月9日。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323页。

④ 《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第241页。

会提出，因为这样会引起大争论，他们不便表态。他们赞成我在大会报告中顺便提出。“顺便”提出，也就是不作为正式提案提出，这样，各党派可避免直接的、正式的表态，从而避免与国民党正面摊牌。这个意见是可以理解的。15日，毛复电林、董、王：各民主党派既不赞成我党单独向参政会提改组政府事，即请作罢。至于林在报告谈判经过时是否应顺便提到此点，则请你们斟酌情形决定，可提则提之。但在再复国方代表信中则必须正面提出。^①显然，这是一个充分顾及各党派政治处境，为其留出充分回旋余地的考虑。

9月15日，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大会上报告此次国共谈判的经过，最后“顺便”提出：“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是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这样，中共关于建立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公开地提了出来。

联合政府既然是因军事力量的变化而提出的，因此，中共在提出改组政府的同时，也提出了改组统帅部的要求。10月10日，周恩来在延安发表题为《如何解决》的演说，阐述了联合政府问题，同时补充道：“这一联合政府须有权改组统帅部”，要求“成立联合统帅部”。^②这样，联合政府与联合统帅部，形成一个完整的军政要求。

联合政府，是中共在经历了十余年的武装割据之后，第一次向国民党提出中央政府权力再分配的政治要求，这一要求的提出，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共谈判的性质，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政治的性质，从而把国共围绕国家政权的斗争，在形式上和实质上

^① 《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第242页。

^② 周恩来：《如何解决》，《解放日报》1944年10月12日。

都推上了更高的阶段。

毛泽东对于联合政府的提出给予高度评价，1944年10月25日，毛在一次报告中说：中国的局势起了很大的变化。从今年四五月间到现在变化就更大。……我们对国民党的方针，自国共合作以来，就是改良方针，不是打倒它。……现在的口号是改组政府、改组统帅部。这个口号不是改良主义的，而是革命性的。^①

1945年2月3日，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毛泽东说：去年九月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是正确的。这是一个原则的转变，以前是你的政府，我要人民，九月以后是改组政府，我可参加。联合政府仍然是蒋介石的政府，不过我们入了股，造成一种条件。^②

联合政府既然是“革命性”的，是“原则的转变”，也就是说，第二次国共合作原有的基础、形式、内容和性质，都必须发生根本性变动。

中共提出联合政府的根据是什么呢？1945年3月31日，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联合政府是具体纲领，它是统一战线政权的具体形式。这个口号好久没有想出来，可见找一个口号、一个形式之不易。这个口号是由于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大溃退、欧洲一些国家建立联合政府、国民党说我们讲民主不着边际这三点而来的。这个口号一提出，重庆的同志如获至宝，人民如此广泛拥护，我是没有料到的。”^③

在毛泽东所说的三个根据中，欧洲国家的先例是一种来自外部的启示；国民党说中共讲民主“不着边际”的论点，可以视

①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52、553页。

②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76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0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为来自对手的启示；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无疑是国民党的军事溃败。这一溃败极大地削弱了国民党的军事力量，从而极大的改变了国共力量的对比。联合政府的提出，从本质上讲，它是国共力量对比的变化在政治上的反映。

三 联合政府旗帜下的第三势力

毛泽东关于联合政府的第一个批示是，要求与民盟的张澜和左舜生商谈。这表明，中共是将这个构想与第三方面的反应联系起来一并考虑的。因为，联合政府就是多党制政府，因此民盟赞成与否，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这一口号的成败。

民盟于1941年10月10日在香港成立，由三党三派组成，当时称“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三党：中国青年党，领导人曾琦、左舜生、李璜等；国家社会党，领导人张君勱、张东荪等；第三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领导人章伯钧等。

三派：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等，该会1942年加入民盟；职业教育社，领导人黄炎培、冷遹、钱永铭等；乡村建设派，领导人梁漱溟等。

1944年9月更名为“中国民主同盟”，取消政团二字，以便无党派人士参加。青年党为民盟第一大党。

民盟得以产生的基本条件之一，是国共两党的对立。“民盟之父”梁漱溟这样说：民盟形成的条件之一就是“国共两党之矛盾对立”，“若是两大党融洽无间……亦许没有此第三者之出现。反之，他们的尖锐对立，恰便促成了现在的民盟。”^①这就

^① 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596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

是说，民盟的产生与生存，都是以国共对立为条件的。

民盟既然因国共对立而产生，那么它的政治作用也必然因此而确立。张澜说：“民主同盟组织的动机，是因调解国共两党以求全国团结并无效，三十年春间，遂由各小党派协商，结合国共两党以外之各党派，而组织一民主政团同盟。……居于国共两党之间，调和监督”。^①这就是说，民盟的活动主要是在国共之间起“调和”作用。

民盟最著名的政治口号是：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代表其对国共两党的基本态度。

关于民盟与国共的区别，1941年10月，民盟机关报“光明报”在社论中这样说：“他本身不是一个政党，所以不要看做国内两大党之外，政治上又增多一竞争的单位”。另外，“就是大家都没有武力，作其政治要求的后盾。此为联合内的构成员（各党派或个人）之一共同点，而以与联合外的两个方面相较，则此为其一重大之不同点。他们的前途，只能以言论以理性去活动”。^②

没有武力，仅靠言论，确为民盟与国共两党的基本区别。从这个意义上讲，民盟的存在实际上竖起了一支政治标尺，通过这支标尺，可以测量出这样一个问题：以言论为武器的政团，在民国政治中到底可以走多远。

抗战期间第三方面自身发起的政治运动主要是宪政运动，然而这个运动最终被国民党接了过去。

① 四川师范学院《张澜文集》编辑组编《张澜文集》，第207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

②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10、11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

1943年9月，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决定战后一年之内召开国大、实施宪政，蒋介石在开幕词中说：“宪政实施以后，在法律上本党应该与一般国民和普通政党处于同等的地位，在法定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的原则之下享同等的权利”。^①此言一出，第三方面人士便将筹备宪政一事提上了议事日程。

王世杰日记9月17日载：“日昨张君勱、左舜生来谈，提议由政府与参政会共组宪政筹备机关（如委员会之类），吸收党外人员，共同讨论推进关于言论、结社、自由之开放及民选机关等问题。……予以今晨请蒋先生考虑，蒋先生谓在原则上可以接受此议。”^②9月25日，蒋出席参政会会议，“谓将组织‘宪政实施筹备会’，以推动一切宪政筹备工作”^③。这样，筹备会一事提上了日程。

第三方面一开始便显露出其固有的软弱。10月2日，王世杰邀请第三方面人士商讨该会筹备事项，结果多数人主张“所有会员均由蒋主席指定”^④，自动放弃提名权。在讨论该会人选时，“蒋先生对左舜生、李璜等极不满，布雷亦极力反对章伯钧等等参加。”王世杰则表示：“以上诸人之不足恃，予固深知，但抗战以来，政府措施为社会所不满者甚多，给此种人以发言机会，无形中亦可减少社会怨气”^⑤。王世杰的意思是，这些人充其量发发牢骚，不足为患。

10月14日，该筹备会机构问题被提到国防最高委员会讨

① 荣孟源、孙彩霞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第829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

② 《王世杰日记》1943年9月17日。

③ 《王世杰日记》1943年9月25日。

④ 黄炎培日记，1943年10月2日。《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5辑，第41页，中华书局，1979。

⑤ 《王世杰日记》1943年10月5日。

论，会议“决定设一宪政实施协进会（或其他相似名称）于国防最高委员会内”^①。名称与机构的归属确定下来。最后，人选问题再生波澜，王世杰 10 月 18 日记载：“今日与布雷、力子续商宪政实施协进会。……布雷对张澜之加入似极不赞同，结果彼于请示蒋先生后将张澜之名除去。”^② 这样，民盟主席被私下除名。

1943 年 10 月 20 日，宪政实施协进会公布规则和名单，隶属于国防最高委员会，蒋介石任会长，共 53 名委员，主要由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两部分组成。周恩来、董必武、张君勱、左舜生、梁漱溟等入选，黄炎培、张君勱、左舜生、董必武等任常务委员，孙科、黄炎培、王世杰为召集人。^③ 该会于当年 11 月 12 日成立，蒋介石发表讲话：“我相信有了这个组织以后，不仅政府有了莫大的助力，各地民意机关和全国同胞的观感也将为之一新。”^④

黄炎培对此事甚为积极，据其日记所载，仅 1943 年 11 月，黄参与有关的活动达 11 次。从黄的记载看，这些活动也就是上流人士之间频繁地磋商、座谈与酬酢，主要话题仍然是主张言论自由这类老生常谈，并筹办一个《宪政》月刊，与其说是宪政运动，更像是上流社会中的清议。此类运动的效果，正如王世杰所期望那样：“给此种人以发言机会，无形中亦可减少社会怨气。”实际上是减少对国民党的怨气。

《宪政》月刊于 1944 年 1 月创刊，黄炎培任编委和发行人。黄是十分认真地做宪政这件事的，他撰文说：“现在宪法虽尚待

① 《王世杰日记》1943 年 10 月 14 日。

② 《王世杰日记》1943 年 10 月 18 日。

③ 《中央日报》1943 年 10 月 20 日。

④ 《中央日报》1943 年 11 月 13 日。

制定公布，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早经国民会议制定……欲养成全国上下守法习惯，与其求之于未来之宪法，何不返而求之于现时有效之约法与一切法规乎？”^①

由于当时没有找到其他的政治口号，中共一度决定参加这个运动。1944年3月1日，毛泽东说：“中央决定我党参加此种宪政运动，以期吸引一切可能的民主分子于自己周围……除我党代表已参加重庆方面国民党召集的宪政协进会会议外，延安亦已举行宪政座谈会。”^②

3月5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宪政运动。周说：“这个运动先开端于中间党派，后来有地方实力派参加，如黄炎培很积极。……国民党现又提出宪政运动，是为了取得民主的政治资本来掩护党治，对付我们，束缚我们。”周赞成“参加宪政运动，表示我们要从政治上解决问题，另一方面也影响中间派。”^③

毛、周的主要着眼点是吸引、影响第三方面。然而问题是“宪政”从来不是中共自己的旗帜，这个首先由第三方面自己提出，尔后又被国民党接了过去的口号，中共很难再以同样口号将第三方面吸引到自己周围。因此，中共在宪政运动中的作为十分有限，实际上被边缘化。

宪政协进会成立后，也曾高论盈庭。孙科曾发表演说：“对外须独立自由，对内须有政治与经济之自由，法西斯国家欲在无自由中求安定，民主国家则无自由不能安定，政治民主人民自会自动去做，无民主只能政府去做，必无善果。”^④

然而，宪政运动一开始便显露出与生俱来的缺陷，其文章、

① 黄炎培：《关于宪政实施文件两种》，《宪政》月刊第3号，1944年3月。

②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498页。

③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第572页，人民出版社等，1989。

④ 《徐永昌日记》1944年5月17日。

著述和议论，基本限于对未来的讨论和描绘，对于现实问题则毫无干预之力。黄炎培看到了这一点，他说：“如一群饥民，不思眼前如何得食，而争研究明午之菜肴如何方为精美。”^① 眼前如何得食，代表了第三方面对宪政运动的反思。

尽管宪政运动只是在“研究明午之菜肴”，但蒋介石仍然对它规定了政治界线。1944年6月，蒋对黄炎培等人说：“各方民主潮流之高涨，是抗战七八年来一种收获，唯不宜借此攻击政府，除此一点外，民主潮流越高越好”^②。蒋氏此言颇可玩味。所谓政府即国民党一党制政府，不能攻击政府实际上便不能攻击一党制，如此民主潮流愈高，便愈脱离民主轨道，因而，“越高越好”。

在这种状态下，宪政运动成为脱离大众、冷冷清清的贵族运动。黄炎培当面对蒋说：“宪政运动热闹限于陪都，以有领袖主持于上，敢说敢写。内地则不然，以成都之开明，而茶酒肆尚有‘莫谈国事’之禁条。”^③ 此即宪政运动的成效。

林伯渠于9月15日提出联合政府的口号后，民盟赞成与否，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这一口号的成败。蒋介石看出这一点，迅速展开对民盟的分化，蒋的首选目标是投机性较强的青年党。

王世杰9月22日记载：“连日蒋先生延见左舜生、李璜，告以国民党决计扶植中国青年党，并将密令各党部与之合作。”^④ 蒋对左、李原本“极不满”，甚至不愿其参加宪政协进会，蒋所

① 黄炎培日记，1944年4月30日。

② 黄炎培日记，1944年6月14日。

③ 黄炎培日记，1944年6月14日。

④ 《王世杰日记》1944年9月22日。

以回过头来“扶植”这个“极不满”者，是因为青年党为民盟第一大党，将青年党分化出来，便在很大程度上分化了民盟；通过瓦解民盟，从而瓦解中共的联合政府口号。

蒋开出“扶植”青年党的支票后，青年党立即开始投机。王世杰9月25日记载：“午后李璜来谈中国青年党候选参政员人选事，意欲于第四届参政会多获三、四席。”王世杰当即开出条件：“予告以中国青年党过去之弱点，在联络军阀，今后当设法断绝军阀关系，则信誉可增。”^① 军阀指中共以及与民盟关系较密切的龙云等地方实力派。王的意思很明白，只要与之脱钩，增加几个席位不成问题。

1944年11月10日，蒋介石在官邸召集特种会议，商讨国民党对各党派的立场，何应钦、吴铁城、陈立夫、王世杰、陈布雷等出席。会议的结论是：“对共产党为惟一有敌性之党”，“对共党以外之各党派应采宽放政策”。围绕这个基点，会议提出了相应的政策，此即：“对民主同盟，分合不加干涉，听其自然”，“对各党派均可合作，对青年党更可首先表示，本党即可通飭各级党部不必与青年党冲突”。^② 这是联合政府口号提出之后，国民党拟定的与中共争夺第三方面的计划。

民盟在联合政府问题上有一个认识过程，如前所述，最初并不赞成林伯渠在参政会正式提出这一议案，而是要求林在报告国共谈判时“顺便”提出。林伯渠后来说：小党派“他们一方面讲民主，一方面又怕得很。比如我们这次提出联合政府，先和他们商量，他们就提出要慢慢地来。以后我们把这个问题公开了，并很好地向他们作了解释……他们才答应了。”^③

^① 《王世杰日记》1944年9月25日。

^② 唐纵日记，1944年11月10日。《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470页。

^③ 《林伯渠文集》，第442页。

联合政府的口号一经提出，立即显示出巨大的政治吸引力。如果说宪政只是为第三方面提供了一个“研究明午之菜肴”的前景，那么，联合政府则提供了“眼前如何得食”的可能性。联合政府就是多党联合执政，从而最大限度地代表了第三方面的政治利益，因此国民党对民盟的分化活动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收效甚微。

1944年10月10日，民盟发表政治主张，郑重表示：“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自此，在联合政府的旗帜下，中共与民盟建立起统一战线。

联合政府的口号，将中共统一战线政策最大限度地具体化，从而将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吸引到自己周围，因而最大限度地将统一战线的政治优势具体的展现出来。这个口号的提出，开创了中共统战工作最为有声有色的局面。

另一方面，联合政府的口号，最大限度地代表了第三方面的政治利益，空前地提升了第三方面的政治地位，从而最大限度地调动了第三方面的积极性，开创了第三方面全部历史活动中最为有声有色的局面。

四 中共的两个部署

中共当然不会仅仅将联合政府作为一个口号提出，并静候结果。1944年9月以后，中共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围绕联合政府这一中心，做出政治与军事两项部署。政治部署是提出了建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问题，作为对联合政府的配合；军事部署是实施南下战略，为进占中心城市做准备。

1944年9月1日，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张闻天对时局做了这样的估计：“日本在大陆上是攻势，想多占陆地，因为它

估计美军要登陆，为防止美国登陆，故极力扫荡中国。所以进攻衡阳后，还要继续前进，打通粤汉路，打到桂林，进一步可能指云南，进攻昆明，这样使美国登陆不可能”。对蒋的估计，张这样说：“对于蒋介石来说，究竟变还是不变，现在是日本人打他，美国人压他，这种情况下有可能变一点，如何变，组织联合政府的可能不是完全没有，但是彻底的变蒋介石就要垮台”^①。毛泽东说：变而不倒与先变后倒均有可能。^②

鉴于联合政府蒋既有接受也有不接受的可能，为此，中共提出了一个更为主动的设想。周恩来在9月1日的会议上提出：明年我们可组织解放委员会。^③此即“中国解放区联合委员会”，简称“解联”。此议最早始于何时尚不清楚，总之，周9月1日提出这个问题时，距毛8月17日提出联合政府仅半个月，因此，这两件事应当是差不多同时酝酿的。9月22日，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认为：不管蒋介石是否改组政府，我们可以先成立中国解放区联合委员会。^④

关于“解联”的性质，中共中央在1945年3月15日的一份指示中较为完整地做了说明：“一方面成为各解放区的联合政权机关，但不称为政府，而称为解放联合会；另一方面又保持其抗日人民的民主阵线的性质。这一组织在政权上说，它将是地方性的联合政权，不是第二中央政府，但同时，又因为国民党政府必不承认它，故又是独立性质的地方政权。在全国没有联合政府时，它将是促进联合政府实现的一种主要动力，在全国有了联合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传记组编《张闻天年谱》下卷，第712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

②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41页。

③ 《周恩来年谱》，第581页。

④ 《刘少奇年谱》上卷，第450页。

政府时，它将是联合政府的组成部分”^①。这就是说，“解联”既是一种政治实体，又是一种政治手段，其意义主要是作为联合政府的一种呼应，一种配合。总之，“解联”就是“作为尔后组成独立政府的初步步骤”^②。

“解联”的作用，毛概括为四个：组织沦陷区，加强解放区，帮助大后方，促进联合政府。^③

在9月22日的会议上，刘少奇提出：除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外，还可以成立解放军，八路军、新四军的名义已经不适用。^④这是目前看到的以解放军的名称取代八路军、新四军的最早的动议。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主要标志，是中共在名义上取消独立的政权——苏维埃共和国，与之相联系，在名义上也取消了独立的军队——工农红军，在名义上加入了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

解放区联合委员会和解放军的成立动议表明，中共已经有了再一次公开建立独立政权和独立军队的设想。

这样，中共自1944年8月中旬提出联合政府的构想以来，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迅速形成较为完整的两套方案：

联合政府是政治方案，与之相联系、相配合的军事方案即联合统帅部。

中国解放区联合委员会是另一政治方案，与之相联系、相配合的另一军事方案，即组建解放军。

上述两套方案中，联合政府是主体，“解联”是配合。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48页。

②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69页。

③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64页。

④ 《刘少奇年谱》上卷，第450页。

提出城市工作方针之后，1944年8月毛泽东就有派部南下的设想。毛曾对王震说：“明年要反攻，我们要占大城市，华南根据地要很快建立与发展。”但最初只考虑派16个连的干部、战士南下。^①

王首道回忆：“八月间，我获悉，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拟遣一支部队挺进华南，深入敌后，建立抗日革命根据地。”^②当年8月，正是毛泽东提出联合政府这一设想之际，看来，毛是把政治部署与军事部署作为一个整体予以通盘考虑的。

中共的南下战略部署，实际上主要是两条路线：其一，新四军一师粟裕部由苏中地区南渡长江，南进至浙江东部地区；其二，八路军三五九旅王震部由延安沿河南、湖北南渡长江，南进至湘南、粤北地区。两条南下路线负有不同的战略目的。

1944年8月21日，毛泽东致电新四军张云逸、饶漱石等，指示：“美军准备在中国登陆，要求和我军配合作战”，“美军在中国登陆时间，据有些美国人估计已不在很远。因此请你们认真布置吴淞、宁波、杭州、南京间，特别是吴淞至宁波沿海及沪杭甬铁路沿线地区的工作”^③。8月26日，华中局迅速做出指示，就毛泽东的要求做出了相应的部署。

11月2日，毛泽东、刘少奇再电饶漱石、张云逸等，进一步指示：“美军可能在杭州湾登陆，而我们在那一带工作还很薄弱。为了配合美军登陆及准备夺取杭州、上海、苏州、南京等大城市……请你们考虑下列步骤：（一）设立苏浙军区，以粟裕为司令员，谭震林为政委，统一指挥苏南及全浙……（二）除即调两团外，准备再从一、二、三、四各师中调五至

① 《王恩茂日记》1944年8月8日，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② 《王首道回忆录》，第223页，解放军出版社，1987。

③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37、538页。

六个团南进。”^①

12月26日，刘少奇与陈毅致电饶漱石、张云逸等，就整个新四军的战略方向做如下指示：“华中局及四军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担任发展长江以南地区，以便将来能确保宁、沪、杭三大城市中的人民之完全胜利。”^②

当年12月，粟裕率新四军一师主力南下。1945年1月，苏浙军区成立。

上述部署“总的战略设想是一旦战略反攻时期揭幕，我们能够破敌、收京、入沪、配合盟军登陆，使我们在日寇崩溃时处于有利的战略地位。如果那时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则我们能够在东南独立的就地坚持，成为全国抗击国民党军进攻的一翼。”^③

王震部的南下意图略有不同。1944年10月3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王恩茂参加了这次会议，王记载：“讨论的结果，我们去湖南要以衡山为中心创造根据地，其任务是抗日和阻挡从西面下来的反共反人民反民主的祸水”^④。会议决定由任弼时向南下干部报告中央这一决定。

11月4日，任弼时在对南下干部讲话时说，南下的目的是准备在抗战结束时，“在河南、湖北筑一道堤，准备用这道堤堵住国民党从西面冲来的反共反人民的逆水”。任弼时又说：“我们有什么意图呢？我们要想到在反攻的时候，在把日本人赶走以后，占领武汉，占领长沙。……如果那个时候国民党还不进步，国民党这股逆水从西边冲下来，我们就要占住这些城市进行抵

^① 《刘少奇年谱》上卷，第454页。

^② 《刘少奇年谱》上卷，第458页。

^③ 《粟裕战争回忆录》，第317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

^④ 《王恩茂日记》1944年10月30日。

抗。今天估计，国民党的这股逆水大致会分三股从西边冲下来，即由西安到洛阳、郑州为一股；由宝鸡、汉中往襄阳、武汉为一股；从重庆往沙市、长沙为一股。……我们要有这个精神准备，要有夺取城市，占领武汉、长沙、郑州这些地方的计划。”^①

也就是说，王震部的战略意图是，与中原李先念等部在湖南、湖北、河南三地“筑一道堤”，抗战结束之际，将国民党军队堵在西南、西北。

王震部于1944年11月由延安出发，该部共分六个大队，其中一、二、三大队为三五九旅战斗部队，四、五、六大队为干部大队。四大队以原湘赣苏区红6军团老干部为基础；五大队以原湘鄂西苏区红2军团老干部为基础；六大队以原鄂豫皖苏区第四方面军老干部为基础。三个干部大队的任务是，回到原地区，恢复和扩大根据地。

五大队队长为贺炳炎，政委廖汉生。廖汉生在回忆中写道：针对日军的南侵，“党中央提出了‘敌人攻到哪里，我们跟到哪里’的战略决策：决定组织八路军南下支队，跟在南侵日军后面，挺进湘粤边界地区”。^②

王震部南下时人员共有4200人，其中干部700余人，战斗人员近3000人。^③

本章小结 日军的一号作战对于中国政治的直接影响在于，迅速引起了国共力量的消长，而国共力量对比的变化，必然引起中国政治格局的变化。联合政府口号的提出，就是这一系列变化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选集》，第368、370页，人民出版社，1987。

② 《廖汉生回忆录》，第293页，八一出版社，1993。

③ 《王恩茂日记》1945年4月22日。

在政治上的反映。

联合政府口号的提出，标志着中共开始将争取怎样一个抗战结果的问题提上议程，标志着中共开始将改变国共合作的方式与基础的问题提上议程。问题在于：国共合作方式与基础的改变，就是国家政治秩序的改变。联合政府的对立面，即国民党政权建立以来所推行的一党训政制政体。自此，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的对立，成为抗战末期至战后初期，即 1944 ~ 1946 两年间，中国政治全部问题的焦点。

第二章 国共关于改组政府的 谈判与破裂

华莱士副总统访渝期间，曾与蒋介石商定中美两国元首互派私人代表之事。不久，蒋致函华莱士：“兹派孔祥熙博士为私人驻美代表。罗总统之代表，请即派来，以便共同计划军事政治经济各项大政等等。”^① 8月，罗斯福宣布赫尔利为其私人代表，9月6日，赫尔利抵渝。

赫尔利后来告诉王世杰，他来华时罗斯福指示其任务为：“促进中国统一，与维护蒋先生领导地位。”^② 促进中国统一，首先必须促进国共谈判，因此赫尔利随即就国共谈判问题展开斡旋。

赫尔利的到来，开创了美国政府直接介入国共谈判的先例，以此为标志，美国亦从此直接卷入中国政治。美国的介入，使原有的国共谈判的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同时也使国共谈判的走向增加了新的变数。

一 史迪威出局与赫尔利入局

赫尔利抵渝不久，即提出介入国共谈判的要求。对此，国民

^① 唐纵日记，1944年7月8日。《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443页。

^② 《王世杰日记》1944年10月17日。

党方面的反应是复杂的。王世杰记载，9月19日，“今日上午予与何敬之、张文伯在黄山与罗斯福代表赫利将军谈中共问题之解决办法。赫利谓：（1）苏联表示不支援中共；（2）赫氏愿意以协助者资格参加此项谈判，并偕我等赴延安一行。”对此，王世杰表示了三点意见：“（一）赴延安商谈一次殊有益，因毛泽东为中共惟一能做主之人；（二）赫氏参加抑或有益，惟何时及以如何方式参加尚需详细考虑；（三）赫氏如参加应注意设法使中共方面不因此而认美国为其奥援，因而对中央政府更强硬。”^①看来，王对赫尔利的介入是有顾虑的，主要是担心中共以美国为“奥援”，为此，赫尔利的要求最初未被接受。

此时，国共对峙继续加剧。9月18日，毛泽东致电林伯渠、董必武：“仍可请五参政员及张治中、王世杰来延，但不必再催，来与不来，或迟或早来，听其自然。”^②9月22日，《解放日报》发表文章，称国民党在谈判中的态度是“夜郎自大，耍些无赖手段”。称张治中、王世杰拒绝将中共12条谈判方案转交政府的做法，“除称之为无赖或流氓手段外，无以名之。”^③

王世杰对这篇评论这样看：“延安解放日报于数日前登一论评，评国共谈判，气益嚣张。指斥中央政府之态度为‘夜郎自大’，并谓中央之政令为违反民意之政令，中央之军令为引致抗战失败之军令，故彼等不能接受云云。文中尤其主张改组统帅部及政府。予觉目前中央对敌军事既迭遭挫折，中共方面之叫嚣固意中事，国共谈判应否继续进行，似不能不重行考虑。”^④

王世杰、张治中于9月10日致函林伯渠，答复林8月30日

① 《王世杰日记》1944年9月19日。赫利即赫尔利，下同。

② 《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第244页。参见《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45页，该电发于9月18日。

③ 《延安权威人士评国共谈判》，《解放日报》1944年9月22日。

④ 《王世杰日记》1944年9月29日。

函后，由毛亲笔修改的复函于10月13日由林伯渠交张、王。复函仍敦促张、王赴延安谈判，而中共是否派负责代表赴重庆，“要看延安谈判结果如何而定”。复函强调成立联合政府，“如果一党专政的局面继续不变……国家统一断乎不能实现。”并且表示：“全部敌后解放区的军队与政权，是一定要请国民政府承认的”。^① 国共对峙的局面没有任何松动，与此同时，蒋的国际环境也急剧恶化起来。

王世杰在10月4日日记中这样写道：“中共鉴于目前政府军事不利，复受外论压迫，显系采取政治攻势，无与政府解决问题之意。”

在这里，王世杰将中共采取政治攻势的背景归结为两点：政府的军事失利和“受外论压迫”。如前所述，毛泽东曾把联合政府的提出归结为三个根据，其实，还有第四个根据、第四个背景，此即王世杰所说的“外论压迫”。

联合政府提出之际，正是美、蒋关系因史迪威指挥权问题而急剧恶化之际，美、英舆论大肆抨击蒋政权作战失利、政治独裁、贪污腐败，以此压蒋向史迪威交出军权。此次“外论压迫”是抗战以来蒋政权的国际处境最为不利的时期，美国压蒋交出军权，这实际上构成了中共压蒋交出政权的第四个根据和第四个背景。

自中共于9月15日提出联合政府要求之后，9月18日，罗斯福亦致电蒋再次提出史迪威指挥权问题。这一次罗斯福没有采用通常的外交辞令，颇不客气地指出：“因阁下延搁委任史迪威将军指挥中国所有之军队，致损失中国东部之重要土地”。“盟军在太平洋之跃进诚属迅速，但除非阁下立即积极行动，在太平

^① 《林伯渠文集》，第420~423页。

洋之迅速跃进对于中国战局之影响亦将不免有‘来不及’之叹。”意思是如再不将指挥权交出，盟军在太平洋的迅速进展也“来不及”挽救中国战场的失败。为此，罗斯福颇不客气地要求：“立即委托史迪威将军授予全权指挥所有中国之军队”。^①“来不及”一词，当然是十分蔑视、十分难听。

罗斯福的来电与林伯渠在参政会提出联合政府的要求，几乎同时，因此事实上造成这样一种局面：中共压蒋交出政权，而美国则压蒋交出军权。在这种双重压力下，蒋介石政治性格中倔强的一面被引发出来，断然决定罢免史迪威。因为如果接受美国的军权要求，便无法抵挡中共的政权要求；反过来，只有顶住美国，才能顶住中共。在这样的背景下，史迪威问题急转直下，一发不可收拾。

9月26日，蒋致电孔祥熙，通报撤换史迪威的决定，表示：“吾人如再恢复独立抗战之态势，则对内政与军事情势，决不能比现在更坏。只要内容简单，无外力牵制，则国内一切措施方能自如，决不如今日皆受人束缚之苦痛也。”^②

此时，蒋对美方的情绪已激动到顶点，蒋曾问陈布雷：“美国是否有意迫本人下台？”又说：“我何爱乎四强”。^③意思是不会为取得四强地位而不惜一切代价。9月30日，蒋在国民党中常会上讲：史迪威问题“已向罗斯福总统要求改派他人来华指挥。……如罗斯福不赞成即决裂亦所不惜。”蒋还说：“本人不愿任总裁，但在战时决不轻言退让，胜利后即行辞退。如果不辞退，只有自杀。”^④可见蒋的情绪相当激动。

①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篇（3），第658、659页。

② 瞿韶华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4年9月26日，台北“国史馆”，1994。

③ 唐纵日记，1944年9月10日。《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459页。

④ 唐纵1944年10月6日反省录。《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463、464页。

正当史迪威事件尖锐化之际，9月28日，丘吉尔在英国下院演说中称：“美国虽以过分之援助给予中国，该大国仍遭受严重之军事挫败。”^①对此，王世杰这样判断：“丘吉尔前日在下议院发表演说，指责中国虽受美方‘过分之援助’而军事终受重大挫折，实属令人失望云云。言外之意显欲借此讥讪中国。察词中处处以英美苏三国负欧洲局势责任，英美负远东责任为言，显有排斥中国于‘四强’之外之意。”^②丘吉尔与蒋的关系一向不睦，看到蒋与美国矛盾加剧，乘机“讥讪”蒋。

如果说蒋对罗斯福尚不敢公开翻脸，对于丘吉尔便没有多少顾忌了。蒋决定拿丘吉尔开刀，将其不怕决裂的姿态公开摆出来。10月1日，蒋在曾家岩官邸对僚属说：“外人非难我们……吾人即不顺从他们亦无甚了不得，无论其不接济物质与金钱，我们仍抗战不屈，彼亦不能即以我为敌。吾人已让至无可再让，我们愈求彼，彼愈无礼。……今日吾苟一动摇，即要做英美之汪精卫，不亡国亦被瓜分共管。”下定决心不做“英美之汪精卫”。最后，蒋指示：“丘吉尔日前在其下院发表缅甸战事，离事实太远，有伤吾人，实甚应反驳，以军事发言人发出。”^③

10月3日，重庆军委会发言人发表谈话，称美国的援助基本供给陈纳德的第14航空队，中国东部军队所得，“自珍珠港事件以迄于今，其实际数量不足供给英美军队一个师作战力量一星期之用。”^④同日，《大公报》发表社论，称美国租借法的援助中国确有一份，但“中国所得到的并未‘过分’！……英国所得占百分之三十以上，而中国只得百分之一二！这如何说

① 《大公报》1944年10月30日。

② 《王世杰日记》1944年10月1日。

③ 《徐永昌日记》1944年10月1日。

④ 《中央日报》1944年10月3日。

是‘过分’？”^①

在做出上述公开表态后，10月5日，蒋约五院院长谈话，“蒋先生力言，我国单独抗战时较现在好，以后还是要准备单独抗战”。^②

王世杰对局势的发展甚为忧虑，他这样认为：“近日我已与丘吉尔冲突……苏联仍不愿与我商谈任何问题。现在又因中美联军司令人选问题与罗斯福及美军部冲突，显然自造孤立状态，倘此种趋势不即改正，前途真不堪设想。”^③至此，蒋的国际环境空前恶化，在美苏英中四强中，陷入孤立状态，但蒋则认为，单独抗战也比受外人牵制更为有利，故在史迪威问题上决心不改。

王世杰、张治中这段时期均为蒋介石政治决策的主要参与者，但在撤换史迪威问题上，蒋却未与王、张磋商。10月3日晚，蒋与王、张谈话时，“文伯询问蒋先生何故于发电要求撤换史迪威尔参谋长之前，不与文武僚佐细商。蒋先生说，系因预知我等不会同意此项办法。”有意回避王、张。最后，王世杰表示：“罗斯福复电来时，务让大家参加意见。”^④王、张意思是，在罗斯福就史迪威问题复电蒋时，能够参加意见，以便对此事有所节制。

10月6日，赫尔利向蒋转交了罗斯福的复电，同意解除史迪威中国战区参谋长职务，但同时要求史迪威继续留任缅北战场远征军的职务，表示：“余觉吾等设使将史迪威自缅甸战事方面予以撤换，其结果之严重，将远甚于阁下所意料者也。”^⑤

① 《大公报》1944年10月3日。

② 《王世杰日记》1944年10月5日。

③ 《王世杰日记》1944年10月6日。

④ 《王世杰日记》1944年10月3日。史迪威尔即史迪威，下同。

⑤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4年10月6日。

对于罗斯福做出的这种一半让步，10月9日，王世杰向蒋力言：“不宜再拒绝罗斯福之提议。但蒋先生仍倾向于再拒绝。”当晚，王又“往晤宋子文，彼亦主张再拒绝，谓蒋先生如对此事让步，则将成为‘傀儡’。”^①王世杰9日的一番游说使蒋、宋担心夜长梦多，于是反常地采取行动，当10日晨王再见到宋时，王记载：“宋子文告我，谓昨晚与我谈后，彼再向蒋先生请示，蒋先生意甚坚决，命其立即发电，昨晚夜半已去电拒绝罗斯福提议矣。予闻之忧闷不已。”^②该电的确发于9日半夜，要求罗斯福“即请阁下调回史将军，而另派胜此重任之将领来华以替代之”^③。

10月9日半夜彻底拒绝史迪威之后，10日，蒋发表双十演说，强调“自爱自重，自立自强”。蒋说：“我们抗战七年余，前四年半的单独抗战，固然是艰辛，而最近三年来与联合国共同作战的期间，我们的负担也是十分沉重。”“我们与联合国共同作战，诚然是休戚相依……但要知道反侵略战争中所需要而欢迎的乃是要本身能自立自强和独立分担作战任务的国家。”^④蒋是在告诉罗斯福，没有美国他也能单独抗战。此后罗斯福迅速撤换了史迪威，改派魏德迈接任，此一事件至此结束。

在彻底拒绝史迪威、军权危机解决之后，于是蒋再回过头来继续国共谈判，解决政治问题。经过史迪威事件一番波折，国共谈判出现新的动向。

10月11日，王世杰与赫尔利磋商中共问题，王说：“目前

① 《王世杰日记》1944年10月9日。

② 《王世杰日记》1944年10月10日。

③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4年10月10日。

④ 《中央日报》1944年10月11日。

中共态度益趋极端，逐渐增加其要求，故予等尚不拟即赴延安。”^① 王世杰、张治中不赴延安，国共谈判继续处于僵局的情况下，为打破这一僵局，蒋介石只得同意赫尔利介入国共谈判。

10月13日，王世杰“晚间在蒋先生官邸商议宜否由赫尔利将军出面调解政府与中共间之纠纷。蒋先生倾向于请其出任调解。”为此，王世杰提出三点意见：“（一）赫氏暂不赴延安（予与文伯亦暂不去延安）；（二）赫氏可约在渝之林祖涵、董必武一谈……（三）如中共愿意美国调解，彼将于请求中国允许之后，提出解决方案。”^② 蒋同意这三点意见。“彼”指赫尔利，即赫尔利的方案须经国民党同意，其调停活动须在国民党的掌握下进行，以防中共以美国为“奥援”。

对中共的缓和工作继续展开。10月16日，邵力子出面宴请国共双方代表林伯渠、董必武、王世杰、张治中，以及胡政之等几位参政员参加。“文伯在餐后力斥延安邀请予等赴延安之无诚意，谓其一面邀请，一面在延安报纸攻击予等之手段‘无赖’”^③。尽管宴会上张治中怒气难消，但国民党此举仍然是缓和情绪的一种表示。

接下来赫尔利出场了。

根据蒋介石和王世杰的安排，10月17日，赫尔利第一次约见了董必武与林伯渠。当日董、林致电延安，报告赫尔利谈话要点。赫尔利说：他约林、董谈话是蒋介石允许的，蒋也允许他必要时去延安；中共军队组织、训练都好，力量强大，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种因素；蒋介石为抗日的领袖，是全国公认的事实。董、林判断蒋的心态是：“怕我们不承认他是抗战领袖”。

^① 《王世杰日记》1944年10月11日。

^② 《王世杰日记》1944年10月13日。

^③ 《王世杰日记》1944年10月16日。

10月19日，毛泽东在董、林来电上写下一段批示，对近一时期政局的发展做如下总结与判断：“九月下半月至十月上旬，蒋对罗、丘压力，硬抗了几个星期。在此期间，对我方亦表示硬性。但在双十演说出了一通气之后，又软下来。对美国软，对我方亦随着软些。邵力子召集的国、共及中间三方会议，决定派五参政员来延及要求延安停止骂蒋等，即其表现。蒋最怕指名批评他，美国亦怕我们不要蒋，故在许蒋存在条件下，可以做出一些有利于我们的交易来。”^①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批示，就国际背景与中国政治的关系做了一个精彩的说明。史迪威事件与联合政府的要求，本来是毫无关联的两件事，然而在实际运作中，两者却不期而遇，这种相遇无意中形成了一种政治的合力，此即中共压蒋交出政权，而美国则压蒋交出军权。在这样一种态势下，蒋亦将两者联系起来通盘考虑、通盘应对，对罗、丘的“硬抗”与对中共的“硬性”相联系，此即军权与政权两个问题互为关系的反映，亦即史迪威事件的政治背景。

那么，蒋为什么拒绝史迪威的军权要求之后，又接受赫尔利介入国共谈判的政治要求？为什么“硬抗”之后忽又“软下来”？因为，蒋的政治危机并未因史迪威的罢免而彻底消除。

10月18日，赫尔利第二次约见董必武、林伯渠，董、林当日致电毛，报告谈话情况。赫尔利说：他拟约张治中、王世杰和我们谈，得出两党合作初步结果后，他拟向蒋介石谈。蒋同意后，他便到延安来和毛泽东谈，求得双方合作的基础。最后蒋、毛见面，发出宣言，两党便合作起来了。^② 赫尔利首先安排了一

^① 以上均见《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51、552页。

^②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52页。

个完整的议事程序，而不是议事内容，可以看出，他对自己的出面自视颇高。

在向中共方面通报了谈判程序安排之后，10月19日，赫尔利又与王世杰磋商此事。王记载：“赫尔利将军约余与文伯在彼之寓宅与林、董晤谈。予谓此甚不便，亦无益。”赫尔利说：“林、董表示愿求得统一，并谓中共愿拥护蒋委员长。”王不屑地说：“此种表示为彼等一贯之词”。见其程序安排的第一步便迈不开，赫尔利打出一张牌，他说：“美军不久即将在中国海岸登陆，如届时中国仍然分裂，中共在美军登陆地区之军队不受中央政府指挥，则美军将如何应付？”

赫尔利不动声色的几句话，将抗战末期中国政治极为微妙的那层纸捅破。美军登陆与苏军参战两个问题，正是赫尔利急于插手国共谈判的主要原因，也是蒋介石为什么屡屡宣称“单独抗战”之后忽又“软下来”的根本原因，因为中共如与美、苏两军联合，蒋便不能“单独”控制局面了。

接下来的谈话茅塞顿开，王世杰表示：“予与文伯暂不与林、董在赫氏寓宅晤见，但予将拟一解决中共问题方案，请其考虑后以彼之名义提出。”对于王将要草拟的这一方案，赫尔利明确要求道：“承认中共为政党及承认实行民主政治两点似不能不列入。”当晚，王见蒋，“蒋先生谓不妨即时承认中共之合法地位，任其公开。”^① 蒋、王“软下来”。

10月21日，王世杰记载：“午前与赫利晤谈，出示予与文伯所拟之解决方案，彼甚赞成。”^② 10月23日，赫尔利第三次约见林伯渠、董必武。24日，林、董报告延安：赫尔利说，蒋介石21日交给他一个方案，被他拒绝，据赫尔利说，蒋的方案意

^① 《王世杰日记》1944年10月19日。

^② 《王世杰日记》1944年10月21日。

思是要消灭共产党。^①

一切都清楚了，赫尔利在王世杰面前称“甚赞成”，在林、董面前又称予以“拒绝”，翻云覆雨，两面邀宠，赫尔利迅速奠定了他在国共两党之间的政治掮客的地位。

此时，中美关系降到一个新的低点。

10月20日，罗斯福致电蒋，同意撤回史迪威。10月28日，双方约定该日同时发表史迪威的解职令。王世杰在当天日记中写道：“一星期来，美国与英苏协议，先后宣告承认法国临时政府，与意大利政府，事前均未与我接洽，亦未通知我政府。蒋先生对此甚愤慨。”^②中国的“四强”地位再次被边缘化。

11月2日，王世杰日记载：“美国报纸群起批评中国，其引火线为史迪威尔问题。……在批评言论中，多以我政府之不民主、贪污为言，甚至谓蒋先生不肯用全力抗日，重视对内作战之准备。”^③

在这样一个局面下，王世杰认为：“中美关系显然恶化。予省思全局，忧闷无极。中央政府宜即改组行政院，以新中外耳目，并迅速设法解决中共问题，一面谋增进中美之友感，否则前途真不堪设想。”^④显然，王世杰所考虑的两个问题，即中美关系和国共关系的改善，都只能通过赫尔利来进行。大约是对赫尔利希望过切，又引出王世杰对赫尔利的某些神经过敏的判断。

在国民党方面草拟出国共谈判新方案后，接下来的问题便是赫尔利能否前往延安了。11月3日，张治中、王世杰与赫尔利再度磋商中共问题，王世杰日记载：“彼谓在美之美国军官及外

① 《毛泽东年谱》中卷，552页。

② 《王世杰日记》1944年11月28日。

③ 《王世杰日记》1944年11月2日。

④ 《王世杰日记》1944年10月29日。

交官均劝彼勿作调解之尝试，因中共实不愿与腐败之国民政府妥协。但赫氏自己则决意尝试，并拟于日内赴延安与毛泽东面谈……予等当即赞同其前往。”^①

本来，国民党同意赫尔利介入国共谈判有一个条件，即“赫氏暂不赴延安”，为何忽又赞成？翌日，王对蒋此举做了解释。王记载：“晚间与蒋先生谈赫利拟赴延安事。予谓彼此项计划必已先征罗总统之同意，故予日昨赞成之。倘此举终归无效，美政府对我政府之疑怨，当可稍减。蒋先生亦以为然。”^②

王的意思是，在史迪威问题上刚刚拒绝罗斯福，在赫尔利问题上不能再拒绝罗斯福了。其实，赫尔利赴延安已得罗斯福同意，很大程度上是王世杰自己的猜测，结果却是自己吓唬自己。这样，赫尔利取得赴延安批准。

在得知赫尔利即将来延安后，11月6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讨论赫尔利来延安一事。毛说：蒋介石要赫尔利来调停，可得救命之益。至于能拿出什么东西来，多少可以拿一点。^③

11月7日上午，就赫尔利拟定的五条谈判方案，王世杰、张治中“先往蒋先生商议，旋往赫氏寓宅详商，当将原件略加修正，仍为五条，交彼带往延安磋商。”^④ 赫尔利带来了什么呢？

二 赫尔利斡旋下的国共谈判第一回合

11月7日下午，赫尔利与林伯渠飞抵延安。

① 《王世杰日记》1944年11月3日。

② 《王世杰日记》1944年11月4日。

③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55页。

④ 《王世杰日记》1944年11月7日。

毛泽东、周恩来在机场迎接赫尔利，并陪同检阅了仪仗队。在去寓所的路上，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组长 D. 包瑞德担任翻译。包瑞德回忆：“为赫尔利将军翻译是一个困难的任务，因为他谈吐随便，语言不精，而且谈话过程中喜欢东拉西扯，思路难以捉摸。因为见到路边的乡民，将军便谈起自己在俄克拉荷马的老朋友的奇闻轶事，而这对毛泽东也许毫无意义。”^① 轻率、目中无人、自以为是，包瑞德准确地记述了赫尔利的性格弱点，这个弱点将使赫尔利在调停国共关系的头一回合中，大吃苦头，败下阵来。

11月8日上午，毛泽东、周恩来与赫尔利举行了第一次正式会谈，赫尔利向中共递交了那份“协定的基础”五条，并对此做了说明。毛泽东当即询问：这五条代表了何人的思想。意思是这五条是赫尔利自己的意见还是国民党方面的意见。赫尔利说是他自己的观点，又说是我们大家制订出来的。并表示：我觉得，这些条款似乎是公正的。^②

11月8日下午，双方举行第二次会谈，以毛泽东的发言为主。毛强调：中国需要在民主的基础上团结全国抗日力量。因此必须改组现在的国民党政府，建立包含一切抗日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联合国民政府。关于改组军队，毛说：我以为应当改组的是丧失战斗力、不听命令、腐败不堪、一打就散的军队，如汤恩伯、胡宗南的军队，而不是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新四军。^③

在听到毛泽东对国民党的抨击后，赫尔利说：他觉得主席关于委员长和国民党的言论，听上去似乎是中国之敌的声音。毛怔

① D. 包瑞德：《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第73页，解放军出版社，1984。

②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第76页。包瑞德参加了赫尔利在延安的全部四次会谈。

③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56页。

了一下，然后说：将军，我刚才关于蒋介石和国民党的说法，罗斯福总统、丘吉尔先生、孙科博士和孙中山夫人早就说过了，难道您认为他们都是中国的敌人？

赫尔利接着说：委员长打算在军事委员会给中共一个席位。赫尔利鼓励中共参加，认为这样至少能够让共产党人的一条腿迈进大门之内。毛泽东反驳道：如果一个人双手被缚，即使他的一条腿迈进了大门也无济于事。^①

赫尔利鉴于他带来的方案不被中共接受，转而请中共方面提出方案。

11月9日下午，双方举行第三次会议，主要是讨论中共的方案，会谈进展顺利，赫尔利说：在我看来，这些建议完全是合理的，但它们还远远不够。如果毛主席不反对的话，我愿意仔细加以研究，并于明日上午提出我的建议。当时在场的包瑞德感觉到，当赫尔利表示要从中共方案的基础上扩大加以研究之后，“共产党人似乎有点吃惊”。

包瑞德认为：“将军提出扩充共产党人的条款从而使之更有利于共产党人的建议，显而易见是越轨了。”包瑞德又说：“我并非律师，我提不出关于‘和谈者’（中国人称之为调停人）的特殊品质的要求。但我觉得，如果双方之间的不信任和对立达到了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深刻与激烈程度，那么正确的行动原则最好是不要提议修改某一方的提案。”^②

包瑞德的意思是，作为调停人应保持中立立场，如果参加修改某一方提案，等于就介入到某一方的立场。而赫尔利的特别之处在于：他既接受了国民党对他的原方案的修正，又接受了中共的再修正，这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方案，他都予以接受下来，而

^①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第78、79页。

^②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第80页。

且都是十分轻易地接受下来，并且两个对立的修正案他都参与了意见。^① 赫尔利这种奇怪的行为方式是由于缺乏经验，还是个性所致，或者不懂中国政治之深浅，或者兼而有之？这里姑且不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轻易地接受某个方案，反过来，必然可以轻易地放弃某个方案。

11月9日晚，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毛向全会报告了同赫尔利的会谈情况，指出：经过三次会议修改后的五点协定，没有破坏我们的解放区，把蒋介石要破坏解放区的企图打光了；破坏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使共产党得到合法地位……明天签字后，我们的文章做完了，问题即在重庆了。^②

赫尔利为什么同意联合政府？周恩来在会议上做了分析，周说：蒋介石认为我们参加政府和成立联合政府是有区别的，赫尔利则将两者混而为一，所以以为蒋不至于为难。估计蒋介石必定会对这次会谈做出的协定提出修改。^③ 周恩来关于赫尔利将参加政府与联合政府混而为一的分析是正确，这正是赫尔利未弄懂的地方。

11月10日上午，毛泽东、赫尔利在新的五点协议上签字，这项协议最主要的是第二项，即：“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并颁布及实行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由所有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④

① 王世杰曾与赫尔利“详商”国民党的修正案，可见赫尔利参与了意见。《王世杰日记》1944年11月7日。

②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57页。

③ 《周恩来年谱》，第587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第572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签字之后，周恩来提醒赫尔利：这些条款首先必须径直交给委员长，而不能让宋子文或任何别的国府官员先看到它们。^①周恩来此言反映出他对国民党内部情况的深入了解。

当日，周恩来与赫尔利、包瑞德等同机抵达重庆。这是周恩来自1943年6月底与林彪一同离渝后，时隔一年多，再次返渝。

看来赫尔利并未将周恩来的提醒放在心上，他恰恰将新的五点协议于11月11日上午首先交给了宋子文、王世杰，当即引起宋、王极度不满。王世杰日记载：“予责以何不坚持彼原提议五条，彼谓彼已坚持但无效，因改定如此。予谓此大不妥，彼颇懊丧，但不免为中共辩护。予与子文旋往蒋先生处报告并略商，未作决定。”可以看出，王世杰对赫尔利带回来的这个协议相当吃惊。由于当时距史迪威被解职仅20来天，因此，尽管对赫尔利此举甚为不满，但王世杰仍然“向蒋先生言，不可使赫利成为史迪威第二。”^②意思是刚刚赶走史迪威，不能再将赫尔利赶走了。

正如周恩来在延安所预料的那样，11月12日，蒋介石、宋子文、王世杰决定对该协议再做修改，“并希望改定文件由赫尔利以彼之名义提出，作为彼之最后主张”^③。仍将赫尔利推在前台。13日，王世杰与赫尔利商讨修改协议问题，王表示了一项基本原则：新协议中“‘联合国民政府’及‘联合军事委员会’等名称必须删改”^④。

11月14日，王世杰与张治中拟定修正案，并上报蒋，王、

①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第82页。

② 《王世杰日记》1944年11月11日。

③ 《王世杰日记》1944年11月12日。

④ 《王世杰日记》1944年11月13日。

张提出：“对于邀共产党人员参加政府及军事委员会一节，拟不明白列入协定中，但拟口头向赫利及中共作此然诺。”^①该修正案的核心就在这里，将联合政府和联合军事委员会，改为参加政府、参加军事委员会。两者的区别在于，联合政府即各党派一律平等，而参加政府则表明政府仍是国民党的。周恩来在延安时就说，赫尔利将两者“混而为一”，现在，终于被国民党将其“区别”开。

这几日蒋的心情也颇不平静，在11月15日日记中蒋写道：“共党本为一破坏抗战之卖国叛徒……而今美国竟视为中国抗战之重心，强迫我政府非与其妥协不可，天下事之颠倒是非，淆乱邪正有如此之甚者，实属梦想不到，恐为有史以来所罕有之怪事。”^②

在18日日记中蒋又写道：“今日美国要求我与共党妥协，而欲牺牲我国体人格，若我无限度的一意迁就，此乃由我自弃，乌乎可？故决示以最后之界限，至于美国将来是否接济，则概可不论，否则患得患失，何以自立，何以济世耶！”^③蒋再次做出与美国决裂的准备。

11月15日，王世杰“将协定修正案面交赫利，彼颇有难色。”^④此后，赫尔利与宋子文共同对王、张案参与了修订，获得了认可。11月21日，王世杰、张治中将此新的修正案交赫利，并做最后的商讨。王世杰日记载：“彼要求将中共‘参加军事委员会’改为以委员资格参加军委会，予当即表示同意。未几，彼忽大发牢骚，与前次温和态度相反，力称政府不愿求得解决，而中共则希望觅得解决。并指责政府诿过失于彼（赫利）

① 《王世杰日记》1944年11月14日。

②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5编（4），第188页。

③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5编（4），第189页。

④ 《王世杰日记》1944年11月15日。

为不当。……彼最终谓愿将政府修正案持示周恩来，并与周恩来作更大之奋斗。文伯遂勉其继续努力。”^①在这次商讨中，赫尔利又一次显出对中国政治的隔膜。他主动提出中共以委员资格参加军委会，其本意是要使中共职务更具体，并有一定实权，以便于中共接受此案。然而军委会委员恰恰是个毫无实权的职位，正因为如此，王世杰可以不经蒋介石首肯，“当即表示同意”。此事后来引起中共方面极大不满。

此次国民党方面提出的修正案共为三条：

第一，国民政府为达成中国境内军事力量之集中与统一，以期实现迅速击溃日本，及战后建国之目的，允将中国共产党军队加以整编，列为正规国军，其军队餉项军械及其他补给，与其他部队受同等待遇，国民政府并承认中国共产党为合法政党；

第二，中国共产党对于国民政府之抗战及战后建国，应尽全力拥护之，并将其一切军队移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辖，国民政府并指派中共将领以委员资格参加军事委员会；

第三，国民政府之目标本为中国共产党所赞同，即为实现孙总理之三民主义，建立民有民治民享之国家，并促进民主化政治之进步及其发展之政策。除为有效对日作战之安全所必须者外，将照《抗战建国纲领》之规定，对于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及其他人民自由加以保障。^②

国民党方面这个新的修正案与赫尔利最初带往延安的五条相比，实质是相同的，实际上都是以中共交出军队为一切问题的前提。只是在具体问题上有所改动，如言论、出版自由，以及根据赫尔利的提议，中共以委员资格参加军事委员会。如前所述，王世杰原来的意见是，中共参加军委会和参加政府两点，均以口头

^① 《王世杰日记》1944年11月21日。

^②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日期》第5篇（4），第294页。

答复中共，而不以文字列入协议，或许是顾及赫尔利的意见，故将参加军委会一条列入了协议。

11月21日，赫尔利首先会晤王世杰、张治中，并接受了他们的修正案；接着会晤周恩来，并向周宣读了国民党修正案。赫尔利对周说：在你们所提的方案中，我认为最重要者，就是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以及参加决策机构。……他们开始也不愿意你们参加中枢机构，因为这是神经中枢，一切军队调动和外国物资的来源与分配都要经过那里。我也说服他们接受了。至于联合政府，他们是怕你们插进一个脚趾，会把他们挤掉……但蒋介石最终仍然告诉我：他将允许你们参加政府，但不愿写在这个建议上。赫尔利还表示：也许他们（按指国民党）这个建议才是谈判的基础。^①

赫尔利的谈话表明，从这个时候起，他的调停人的立场开始转向国民党。

周恩来当即表示：参加政府和军事家委员会，只是挂名，毫无实权。^②

11月21日下午，周恩来、董必武再度拜会赫尔利，周提出了几个问题：赫尔利将军是否仍同意我们为实现中国团结必须以组织联合政府为前提的主张？赫尔利答：我不能使用同意的字眼，因为我不是谈判的当事人，我只是见证人。我认为联合政府的主张是适当的。周恩来又问：参加政府是否说我们只能处于观察者的地位，而不能有实权？赫尔利答：并不等于有实权，但事在人为。^③

① 转引自杨奎松《失去的机会》，第171、17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② 《周恩来年谱》，第580页。

③ 《周恩来传》，第575页。

周恩来将当天会谈情况致电毛泽东，毛批道：“党治不动，请几个客，限制我军”^①。寥寥数语，点明了国民党方案的要害。参加政府即表明，国民党仍是主人的地位，而中共仅为客人，“请客”即指明参加政府与联合政府的区别。

11月22日，按赫尔利的安排，周恩来与王世杰在赫尔利寓所见面。这是王世杰自当年5月参加国共谈判以来，与周恩来的第一次见面；也是自赫尔利调处国共关系以来，国共代表首次直接见面。会谈中，“周表示对于政府方案未容纳‘联合政府’主张，表示不能赞同，但为目前求得初步解决起见，彼将飞往延安一二日即返”。周要求王世杰对中共参加政府一事做说明，王说：“党外人参加政府工作事，国民党原无排斥之意，唯在法律上国民党如宣告结束训政或党治，则事涉孙中山先生建国大纲之变更，自非经过党代表大会不能决定，即蒋先生亦无自由决定之权。”^②此即坚持训政体制的根据。国民党在遇到政治麻烦时总是祭出一个回旋的法宝，并且屡试不爽，此即“总理遗教”。

当日下午，在王世杰陪同下蒋介石会见了周恩来与董必武，蒋表示政府的尊严不能损害，周表示坚持联合政府，指出政府是内阁，并非国家，不称职，就应该改组。^③王世杰记载会见仅半小时。当天蒋在日记中写道：“观周之态度，已不如从前恭顺矣。”^④

由于双方意见根本无法接近，12月7日，周恩来返回延安，赫尔利调停国共关系的第一回合，以失败而告结束。周在渝不足一个月即返，是周在渝逗留时间最短的一次。

①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60页。

② 《王世杰日记》1944年11月22日。

③ 《周恩来年谱》，第589页。

④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5编（4），第189页。

赫尔利是在国共谈判处于停顿状态时介入调停的，在此次调停中，赫尔利或者是对中国政治不了解，或者是在两党之间玩弄两面手段，或者是不顾一切地捞取个人政治资本，或者各方面因素兼而有之，总之，经赫尔利如此一番鼓舌，国共谈判总算恢复了，并且，国共谈判的主题实际上转换为改组政府。也就是说，从前的谈判是怎样解决中共的军队数额问题，自此转变为怎样解决国民党的一党训政问题，即政府改组问题。

或许鉴于赫尔利显示了他的调处能力，11月29日，赫尔利被任命为驻华大使。

三 国共政略的重新调整

11月20日，周恩来已察觉国民党不会接受赫尔利由延安带回的五点协议，周致电毛泽东：“蒋在目前至多只能接受联合统帅部，请客式政府，决不会答复协定。我们须以联合政府及解放区委员会去逼求”^①。

当赫尔利于11月21日向周恩来转交了国民党方面的反建议后，2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毛说：来一个协定，去一个协定，现在又来一个协定，我们坚持同赫尔利在延安签订的协定是有道理的，现在蒋介石不同意，要发动一个尖锐的批评。我们开七大宣布组织解放区联合委员会，这是一种步骤；另外一个步骤解放区联合委员会暂时不搞，还是提成立联合政府。^②毛提出了两个方案供大家讨论，刘少奇赞成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刘说：联合政府有两个，一个是以蒋为主的，一个是以我为主的。蒋介石不搞国是会议，不改变政策，

^① 《周恩来传》，第574页。

^②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60、561页。

我们参加是没有好处的。解放区联合委员会快点成立好。半年后即可看清形势。^①

中共此刻已大体上决定成立“解联”。11月25日，毛致电周恩来：“请与有关朋友商解放区联合会事。……你回延后准备即开七大，并接着不很久即开解联。”^②在联合政府被拒后，中共立即将“解联”提上议程，之所以行动如此迅速，因为战局又有了新的发展。

周恩来重庆谈判之际，战局再度发生重大变动。自8月衡阳沦陷后，日军作战方向转向广西，而广西战场的中心为桂林。11月10日，即周恩来抵渝当日，桂林失守，12日柳州失守。11月14日，王世杰记载：“桂林、柳州相继失陷，陪都人心亦不免浮动，因惧敌军悉力西进也。”^③

面对继续恶化的局势，蒋似乎也无能为力了。11月24日，在曾家岩官邸，“蒋先生先述党政军各机关之不振作，无战时气象，言下甚愤慨。张文白冷笑曰：仅如此说说恐终无效。冷嘲慨叹兼而有之，蒋先生无言。”^④蒋已智竭力穷。

日军攻占广西后继续向西，王世杰记载：“敌军自广西向西前进，后方人心颇动摇。”11月30日，王就贵州防务询问张治中，张答：“敌来则不可守，敌不来则可守”^⑤。国民党几乎丧失抵抗能力。

日军一号作战的最后一击，是12月2日攻占贵州独山。重庆局势极为震动，12月3日，蒋在曾家岩官邸召集军政会议，

① 《刘少奇年谱》上卷，第456页。

②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61页。

③ 《王世杰日记》1944年11月14日。

④ 《徐永昌日记》1944年11月24日。

⑤ 《王世杰日记》1944年11月27、30日。

布置“渝市之紧急处置与警卫”^①。王世杰日记12月6日载：“战事形势可虑。敌军自桂边进入黔省，几乎毫未遇抵抗。独山为险要，已于二日被敌占领。我军尚未集中贵阳，且亦不卜其战斗力如何。予语子文、天翼，应对可能之危险早定一切计划。”^②当时，重庆已有迁都成都的传言。

攻占独山是整个中日战争期间，日军深入中国内地最为深远的一次行动。此次行动的原因是，在广西作战中，鉴于张发奎部未被歼灭，张部向西溃退，于是日军发起这次追击行动，日军作战方案将此次追击限定在独山附近。鉴于深入中国内地过远，12月4日，日军撤离独山。王世杰日记12月8日载：“我军在黔进击敌军，克服三合及独山。数日以来陪都之恐慌顿减。”^③由于对日军的整个战略意图，尤其是日军下一步行动仍不甚明了，当时普遍预测日军下一步将进攻昆明，因此，整个局势仍然是严峻的。

在这种局面下的国共谈判，正如蒋所感觉那样，中共“已不如从前恭顺矣”。

12月7日，周恩来返延当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听取了周恩来关于此次国共谈判的汇报。会议认为：国民党所提三条明显地不同意成立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因此无法求得双方提案的基本共同点。准备公开与赫尔利在延安达成的五点协议，决定周恩来、董必武不再去重庆谈判。这次会议最为重要的决定是：筹建解放区联合委员会，由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发起，由周恩来等人组成准备委员会。^④

① 《徐永昌日记》1944年12月3日。

② 《王世杰日记》1944年12月6日。

③ 《王世杰日记》1944年12月8日。

④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63页。

12月8日，毛泽东与周恩来一同会见了包瑞德，意思是通过包瑞德这一非正式的渠道，将成立“解联”一事非正式地传递出去。根据包瑞德的记录，毛泽东谈话要点如下：

共产党的军队必须服从全国军事委员会的改编。这就意味着把我们的军队完全置于委员长的控制之下……与这种相当于完全投降的交换条件相应的是，总共才给我们一个全国军事委员会的席位……事实上，整个全国军事委员会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开会了。

美国的态度有些让人迷惑不解。我们提出了五点建议，其中的基本点是建立联合政府。赫尔利将军也同意这些显然是公平的条件，而且事实上，五点建议的大部分内容，是在他的建议之下提出来的。现在美国又来认真地要求我们接受需要牺牲我们自己的反建议，这是我们难以理解的。

让美国继续支持蒋介石，直到他把昆明、贵阳、重庆、西安、成都等都失掉，那时，也许美国将会明白，支持蒋介石是如此的无用。我们不像蒋介石，我们并非必须要别的支持。

由于蒋介石已拒绝成立联合政府，我们决心不再让步。我们已决心采取一个决定性的步骤。我们正向我们控制的各地区的国民参政会建议，组成代表所有这些地区的“联合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组成，将是组成一个独立政府的初步的步骤。

我们已经关住了大门，但是窗户还敞开着。那“五点建议”就是窗户。我们愿意在今天、明天、甚至后天回到联合政府中去。但是，到了大后天，等到重庆、昆明、贵阳、成都、西安都失守以后，我们就不会按照我们早先提出的条件去参加了。^①

毛泽东反复提到蒋有可能失去昆明、贵阳等城市，是估计日军一号作战将继续进行，将向云、贵、川方向攻击，蒋可能遭到

^① 以上均见《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第91～98页。

更大的失败。毛谈话的核心是中共将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这一“独立政府”。

毛发言之后，包瑞德发表了几点个人意见，其中关键有三点：其一，组成一个联合委员会进而建立一个独立政府的做法，将给蒋介石一个绝好的机会。借此，他会宣称，他历来的关于共产党人是叛乱分子的说法，已被毋庸置疑地证实了。意思是此举将给蒋介石口实。其二，如果你们和国民党破裂，不仅蒋介石，而且美国的大部分舆论或许都要认为你们是叛乱分子。意思是将难以得到美国的同情和支持。其三，如果日本人在昆明和贵阳被国民党和美国军队击退，你们将十分难堪。^①意思是国民党军也有获胜的可能。包瑞德从反面提出的几条意见，其核心是劝告中共留有余地。

12月9日，毛泽东在六届七中全会会议上说：在目前情况下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也要从反面考虑一下。虽然不叫政府而叫解放区联合委员会，但是要想到美国不帮助，蒋介石取消八路军，中间派不赞成，我们是否会孤立。毛决定“解联”只成立准备委员会，对此不要公开发表讲话，看看情况再决定。^②显然，包瑞德的意见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

12月12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再度研究“解联”问题。原先较为坚决主张尽早成立“解联”的刘少奇表示：解放区联合委员会何时搞，主要是时机问题。现在条件部分成熟，还未十分成熟。与美国交涉来往还要一个时期，在此期间，不必搞解放区联合委员会。到赫尔利对蒋介石绝望时即可搞了。^③

周恩来也同意晚点筹备“解联”，周说：因联合政府的口号

①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第98、99页。

②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64页。

③ 《刘少奇年谱》上卷，第457页。

更为响亮，并说，迟搞无害，如蒋介石失败了，联合政府中我们就是大股，是中心。^①

最后，毛泽东决定：解放区联合委员会暂缓成立，报上也不宣传，可放口头空气。现在全国总的任务是建立统一中国一切力量的民主联合政府。^②

周恩来关于如蒋失败联合政府中我们就是大股的说法，仍然是中共当时一个基本判断的反映，即判断日军一号作战将继续进行。毛泽东在12月15日的一次演讲中说：“敌人是否会停止它的进攻呢？我看还不会停止，它还有可能再向我国西南部及西北部进攻。”^③这与包瑞德的谈话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如果蒋在西南、西北继续失败，中共在联合政府中当然就是“大股”了，因此“迟搞无害”。总之，暂缓成立“解联”，就是暂不与国民党公开破裂，观察局势的下一步发展。

当中共对策略做进一步考虑之际，国民党对其策略做出了调整。12月18日，王世杰记载：蒋介石约宋子文、王世杰、赫尔利“续商中共问题，并嘱予等拟新方案。”^④新方案于12月21日拟出，主要是在原三点方案的基础上，“并拟允许党外分子参加国防最高委员会及行政院；至于中共军队之整编及指挥，则不妨暂使美国军官参加。此案拟由子文、辞修、文伯及予四人提请蒋先生核夺，再提交中共。”^⑤新方案与原三点方案相比，主要有两点更动：第一，将原来的口头允诺中共参加政府，改为文字允诺；第二，将中共“一切军队移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

① 《周恩来年谱》，第592页。

②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64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414页。

④ 《王世杰日记》1944年12月18日。

⑤ 《王世杰日记》1944年12月21日。

辖”，改为由美国人指挥。第二点赫尔利对周恩来已谈过。

当日，赫尔利致电毛泽东，希望周恩来去重庆谈判。

12月22日，毛复电赫尔利：“在目前，吾人认为国民政府尚无根据我们提议的五条方针来进行谈判的诚意，而周恩来将军又因有某种会议需要准备，一时难以抽身，故我们提议请你先派包瑞德上校来延一谈。”^① 看得出，包瑞德给中共方面留下了好感。

数日后，赫尔利将此消息转告了国民党方面，王世杰日记12月25日载：“今晨赫尔利语宋子文，谓毛泽东来电，周恩来现时不能来渝，以后谈判彼提议于延安举行云云。中共态度之日趋恶劣可以概见。但予意认为我政府仍应以宽忍态度应付此事，至少借以取得美国政府之同情。”^② 这就是说，此刻国共两党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做给美国人看的。

12月27日，包瑞德飞赴延安，不过他此行并非受赫尔利指派调停国共关系，而是受魏德迈的参谋长麦克卢尔的派遣，就美军一个空降师可能在中共控制的山东沿海建立滩头阵地一事，与中共方面商讨该师的后勤保障问题。美军在中共区域登陆，必将形成两军联合作战的局面，而这一点不仅将使中共实力增强，也将使中共的政治地位进一步增强。因此，中共对此事极为重视，毛、周、朱德、叶剑英一同与包瑞德谈此事，包瑞德感到：“对于在他们地区内有一支大规模美国部队的前景，共产党领袖们似乎相当高兴。”由于受命所限，在商谈中“我从不提及与国民党谈判成立联合政府一事。”^③ 这是包瑞德最后一次到延安。

①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68页。

② 《王世杰日记》1944年12月25日。

③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第103页。

王世杰等人12月21日草拟的新方案，蒋介石于28日认可，但蒋此刻已有另一个重大的政治考虑。

自中共提出联合政府这一主张之后，国民党方面只是在具体条款上与中共做战术性质的争论，难以摆脱战略上的总体被动的态势，因此，蒋介石一直在考虑拿出一项总体的战略对抗方案。中共提出联合政府，打出的是实施民主政治的旗帜，为对抗这面旗帜，蒋介石经过一番深思，决定打出另一面民主政治的旗帜以相对抗，此即提前召开国大，实施宪政。

孙中山在其晚年的重要著述《建国大纲》中，将建国程序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认为：“盖不经军政时代，则反革命之势力无繇扫荡”；“不经训政时代，则大多数之人民久经束缚，虽骤被解放，初不瞭知其活动之方式”。孙认为，民国初年临时约法失败的原因，“乃由于未经军政、训政两时期，而即入于宪政”。^①孙中山的这一思想，反映了他对民初以来的政治经验的总结，也为国民党执政之后推行训政体制提供了政治依据。

国民党原拟于1937年召开国大，制颁宪法，还政于民，即实行宪政。为此，1936年搞了一个国大代表选举，当时中共和其他党派均处于非法状态，均未能参加国大代表选举，国大代表基本上为国民党控制。后因抗战爆发，国大未能召开，宪政亦未能实施。

1943年9月，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决定，抗战结束之后一年之内召开国大。同时决定：“凡前次依法产生之国民大会代表，除因背叛国家或死亡及因他故而丧失其资格者外，一律有效”。^②这个本来安排在战后召开的会议，现在蒋介石考虑将其

^① 《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102、103页。

^②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第844页。

提前召开，以实施宪政的名义，打出另一面民主政治的旗帜以抗衡中共的联合政府主张。

所谓宪政，主要是制订和颁布宪法。宪政对蒋介石、国民党来讲，有三点可以作为对中共的抗衡：第一，制宪首先要开国大，而国大代表基本为国民党控制，因此可以搞出一个有利于国民党的宪法。第二，根据通常的宪政原则，由得票多的政党执政，国民党当时的实力有把握在选票上超过中共，从而继续执政。第三，更重要的是，一旦行宪，中共对国民党一党训政的攻击即失去依据，从而在政治上摆脱被动局面。

召开国大、实施宪政的程序即孙文的“建国大纲”。根据建国大纲所规定的程序，在国大召开之前，国民党仍然处于一党训政的地位，国大召开之后，国民党则是还政于民。国父遗教为国民党直接抗衡中共的政治要求提供了两点依据：第一，以国大抗衡中共关于召开各党派会议的要求；第二，以还政于民为口号，以此抗衡联合政府，理由是还政于民，不能还政于各党派，因而不能成立联合政府。

蒋介石关于提前实施宪政的构想，最初是随着联合政府的提出而产生的，尔后，随着联合政府的争论加剧，而逐步下定决心。9月15日，林伯渠在参政会首次公开提出联合政府主张后，9月16日，蒋在参政会演说时便表示了提前实施宪政的想法。蒋说：“本席正在考虑提议在明年召开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如果到那个时候，抗战形势好转，宪政或有提前实施的必要”。^①当日，王世杰日记载：“今日蒋先生在参政会讲话，强调实施宪政之决心，并准备提前其期限……措词与态度使全场感

^① 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0，第507页，国民党中央党史会，1984。

动。”^①

12月8日，在日军进出独山前后那段日子，蒋介石对国民党内民主派孙科谈到中共问题时说：“联合政府不能答应，但口头允许共产党参加政府，宪政可以提早。”^②表明蒋关于提前实行宪政以对抗中共政治攻势的想法已经明确了。

1945年元月一日，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其中说：“为了早日确定国家宪政基础与百年大计，我觉得我们国民大会的召集，不必再待之战争结束以后”。“我现在准备建议中央，一俟我们军事形势稳定……就要及时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③此言一出，中共立即明白是什么意思了。中共对此评论道：“为了抵制全国人民所瞩目的立即建立联合政府，蒋氏搬出了挡箭牌”^④。

蒋在设计战略方案的同时，又设计了一个战术方案，企图战略、战术双管齐下。1945年1月4日，王世杰日记载：“晚间蒋先生为予言，彼意可于行政院成立一个‘战时行政会议’，即一种战时内阁，由七人至九人组成。中共及其他党外分子可参加此会议。嘱予起草条例（此一计划意在容纳中共所谓‘联合政府’之要求，而谋中共问题之解决）。”^⑤

战时内阁的组成，由于有中共与其他党派参加，从现象上看，似乎也是一种“联合政府”，以此应对中共的联合政府要求。实际上，由于训政体制没有变动，因而这个战时内阁并非最高权力机构，仍处于国民党党治之下。

提前实施宪政与战时内阁，是蒋介石对付中共的一个完整的

① 《王世杰日记》1944年9月16日。

② 唐纵日记，1944年12月8日。《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476页。

③ 朱汇森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5年1月1日，台北“国史馆”，1986。

④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5、6页。

⑤ 《王世杰日记》1945年1月4日。

两手安排：一手是临时手段，一手是根本手段。这样，自中共1944年9月15日正式提出联合政府的要求以来，经过长时间的政治被动，蒋介石终于制定出对付中共政治攻势的完整的政治方案，无论对付国际舆论还是国内舆论，都有其一定的根据。

从宪政和战时内阁的提出来看，蒋介石作为国民党领导人，在国民党内确有其过人之处，其考虑问题的角度，较之他人更高、更深。王世杰等人在具体问题上出谋划策颇为不少，然而根本解决问题的大政方针，仍然出自蒋。王世杰曾这样评论：“中枢执政诸人中，自蒋先生以外，并无任何人有政治家的表现”。^①

毛泽东提出了联合政府，蒋介石提出了提前实施宪政，毛、蒋以各自的深谋远虑，实证了在各自党内的领袖地位。

这样，经过一段短暂的政治对峙之后，国共均对各自的方针重新做出考虑与安排，形成了各自的两套方案。中共：第一方案为联合政府，第二方案为解放区联合委员会；国民党：第一方案为战时内阁，第二方案为提前行宪。

在上述方案形成之后，新一轮的较量即将开始。

四 赫尔利斡旋下的国共谈判第二回合

蒋介石提出“战时内阁”的方案之后，赫尔利以及国民党方面的几位谈判代表再一次行动起来。

毛泽东1944年12月22日致电赫尔利，表示周恩来不能来重庆，并表示以后谈判应在延安举行之后，12月30日，赫尔利致函毛泽东表示：“深信国民政府之诚意，为获得解决，愿作相当让步”。赫尔利提出二点建议：“一、行政院宋代院长子文、王世杰博士、张治中将军及余本人，同赴延安，作短期之勾留，

^① 《王世杰日记》1944年6月27日。

与阁下面商一切；二、若原则上已获同意，则毛主席及周将军应与吾人同回重庆，以完成协定。”^①

1945年1月5日晚，王世杰、宋子文、赫尔利，一同“研讨中共问题，当经商定由赫氏电复毛泽东，并建议请子文及予与张文伯赴延安一行”^②。中央大员集体赴延，是要将球踢给延安。

1月11日赫尔利收到毛泽东的复函，王世杰日记载：毛函“谓不欲赫利、宋部长及予与文伯等赴延安，以免徒劳往返，并谓彼党继续秘密会商为无益之举……此一变化又为出政府预料之外”^③。毛的要求是：“在重庆召开国是会议之预备会议，此种预备会议应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政团同盟三方代表参加，并保证会议公开举行”^④。毛表示如国民党同意这一提议，周恩来可到重庆磋商。

毛函核心是提出了民盟参加谈判一事。

国共谈判历来是在国共间进行的，所涉及的内容以军事问题为主，因此，尽管中共不断地与民盟有所磋商、勾通，但因民盟所处地位与军事问题没有直接的关系，民盟除参与调解外，不可能直接参加谈判。联合政府的提出，将民盟参加政府的问题纳入这一口号，从而为民盟直接参与国共谈判创造了政治条件。

提出民盟参加国共谈判，是中共策略的一个重大措施。此举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民盟自建立以来所处的政治边缘的地位，获得了直接参政的权力。变两方谈判为多方谈判，从而在实际上进进了政治的多元化，而任何的多元化都是对一党训政机制的破

①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5编（4），第297页。

② 《王世杰日记》1945年1月5日。

③ 《王世杰日记》1945年1月11日。

④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72页。

坏，同时也使中共获得了同盟军，改变了孤军奋斗的局面。总之，将民盟引入国共谈判，从此，在中国政治中，民盟在名义上和实质上真正取得了“第三方面”的一席之地。

国民党精心策划的战时内阁，最后定名为“行政院战时政务委员会”，1月15日，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其组成条例。战时内阁既然是在形式上模仿联合政府，因此，如同中共在提出联合政府时首先考虑到第三方面一样，国民党首先考虑的也是这一点，因为，如无民盟参加，战时内阁便无法模仿联合政府了。

条例通过后，王世杰当即提议：“暂缓对外发表，俾便先向各党派作一度接洽”。对此，“蒋先生亦赞同”。当日，王世杰约见民盟秘书长左舜生，“与左舜生谈战时政务委员事，促请中国青年党及国家社会党推荐二人参加。”但结果却是：“左与中共似有相当默契，颇不赞同单独参加。”王世杰只得“严词敦促其采取独立的立场”。^①

也就在当日，民盟发表时局宣言，重申：“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权”。这个宣言的起草者，正是先前为蒋介石私下召见许以扶持，尔后又为王世杰严词敦促采取独立立场的左舜生。^②战时内阁条例通过当日即遭遇民盟此一宣言，国民党生下的是一具死婴。

1月20日，赫尔利再度致函毛泽东，说他相信国民政府准备做出重要让步，建议再派周恩来来到重庆谈判。对于赫尔利的此次邀请，中共中央是如何考虑的，目前尚缺材料，总之，1月22日，毛复电赫尔利，同意派周恩来赴渝谈判。周行前，毛指示三点：第一，争取联合政府，与民主人士合作；第二，召开党派会议作为具体步骤，国民党、共产党、民盟参加；第三，要求国民

^① 《王世杰日记》1945年1月15日。

^② 黄炎培日记，1945年1月13日。

党先办到以下各项——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叶挺、廖承志等。^① 将“与民主人士合作”列为首要之点，这将是周恩来此次赴渝的重要活动。

1月24日，周恩来抵渝。为收先声夺人、公开谈判之效，行前，周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讲话，说明此行目的是：召开党派会议，作为国事会议的预备会议，以便正式商讨国事会议和联合政府的组织及实现的步骤问题。^②

周恩来抵渝，是赫尔利斡旋下的国共谈判二度交手。

周恩来抵达重庆当晚，在宋子文住宅与国民党方面进行了初步会谈。王世杰日记载：周恩来说，“中共不愿参加国民党党治下之‘战时内阁’，须先召集‘各党派会议’，并宣告‘党治’之废除，然后能成立彼所提议之‘联合政府’。其意显然在延宕，无求解决之诚意。赫利不甚明了情形，复与宋子文争论颇烈。”^③

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中共周恩来此来，以要求召开‘国是会议’与改组‘联合政府’及废除党治为其口号，绝无妥协之意。……对于破坏我国家法规与革命制度者，决不能再有迁就也。”^④

显然，中共的立场没有任何松动，其主要原因是中共仍然判断战局将继续朝着不利于国民党的方向发展。1月28日，刘少奇致电周恩来，要求南方局将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刘说：“为了准备可能的日本对于云、贵、川的进攻以及将来国内的重大事

①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74页。

② 《周恩来年谱》，第597页。

③ 《王世杰日记》1945年1月24日。

④ 《蒋总统秘录》第14册，第7页。

变，我们必须在大后方的农村中建立可靠的基础”^①。判断日军继豫、湘、桂战役之后，有可能继续向云、贵、川进攻，这一点是毛、刘、周共同的看法。基于这一判断，因此中共的谈判立场也是坚决的。

由于中共此次采取变两党秘密谈判为三方公开谈判，因此，民盟的介入是此次谈判的一个重要特征。

根据毛泽东“与民主人士合作”的指示，周恩来在渝与民主党派和社会名流进行了广泛的接触，民盟人士亦与中共相当合作，这一点引起国民党方面不满。王世杰日记1月27日载：“午后黄炎培、李璜来谈，予与邵力子先生均责民主同盟不应随时附和中共，忽视其素所主张统一与团结。民主同盟之分子，大都为机会主义者，故予今日坦然指摘之。”^②

但王世杰的坦然指摘并未收效，2月26日，张澜在《华西晚报》发表文章，表示：“如国民党徒以三民主义为口号，仍想藉训政为名，保持一党专政的独裁，民主同盟亦绝不合作。”针对国民党指摘民盟为中共所利用，张文表示：“三民主义未见实行，而使民主同盟起而要求，并让共产党得而利用，这是国民党人应该自己反省的。”^③

此刻，不仅民盟站到了中共一边，国民党内部也产生分化。1月28日晚，孙科宴请周恩来，民盟方面的黄炎培、章伯钧、李璜等，以及国民党方面的王世杰、邵力子等作陪。周恩来重申中共关于党派会议、联合政府的要求。黄炎培提议：“先由非正

① 《刘少奇年谱》上卷，第460页。

② 《王世杰日记》1945年1月27日。

③ 《张澜文集》，第208、209页。

式会议，如今夕之会，商有眉目，报告领袖裁决正式进行。”^①

席间，“孙哲生痛斥国民党过去之错误，谓其反共而走入华西斯途径，力言国共必须合作，国民党必须容纳中共，最后并赞成周恩来所提议之‘国是会议’”。面对孙科突如其来一番话，王世杰不无调侃地讲了三条意见：“一、孙哲生先生在党内党外如此指斥本党，足见国民党党内空气之自由，并非如外间所言，党内无民主。二、国共双方须互让才能合作。三、予希望其他各党中亦有人如孙先生，以客观态度考虑己党之是非功过。”^②

孙科的立场，中共心中有数。早些时候林伯渠说：孙科主张结束训政，认为蒋无办法，但其目的是，“要我们和他联合，要我们帮助他当行政院长，把政权交给他。”^③

正当国共新一轮政治对峙形成之际，国民党方面的态度突然发生大角度转变。

1月30日，王世杰、张治中在与周恩来的会谈中表示：倾向于召集党派会议。^④

2月1日晚，邵力子邀集周恩来、王若飞、孙科、王世杰、左舜生、黄炎培等三方人士继续商谈。黄炎培记载：“王雪艇（早退）”^⑤。王世杰为何早退？原来当晚蒋介石也在开会商讨中共问题，有陈立夫、吴鼎昌等人参加。王世杰发言说：“共产党是一种病菌，在太阳下便死亡，在黑暗中便发育，本党应一面健全自己的政治，一面允许中共公开活动，如此我们便可以战胜中

① 黄炎培日记，1945年1月28日。

② 《王世杰日记》1945年1月28日。

③ 《林伯渠文集》，第442页。

④ 《周恩来年谱》，第599页。

⑤ 黄炎培日记，1945年2月1日。王世杰字雪艇。

共，如纯赖军队或特务警察与之斗争，则成功难而失败易。”^①

2月2日，王世杰与周恩来继续商谈，“对于召集若干国民党以外人员及无党无派人员，开会协商一事，彼此已大体同意。”^②当晚，周恩来报告延安：蒋介石、王世杰有可能接受党派会议。^③

2月3日，周恩来将他起草的“关于党派会议的协定”草案交给王世杰，内容如下：

党派会议应包含国民党、共产党及民主同盟三方代表。

党派会议有权讨论和解决如何结束党治、如何改组政府。

党派会议应公开进行，并保证各代表有平等地位及来往自由。^④

同时，王世杰也起草了一份方案，将党派会议名称改为“政治咨询会议”，理由是便于无党派人士参加。内容如下：

第一，结束训政与实施宪政之步骤。

第二，今后施政方针与军事统一之办法。

第三，国民党以外党派参加政府之方式。^⑤

王世杰在当天日记中写道：“今晨予草就协议草案，其内容为召集一十余人之会议，由国民政府召集，中共、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民主同盟各派一人至三四人不等，并约其他无党派人士数人参加，商议结束训政、统一军事及容纳国民党以外之人于政府之方案。周恩来允电延安请示。予以尔后偕张文伯面陈蒋先生，蒋先生以为可行。”^⑥

① 《王世杰日记》1945年2月1日。

② 《王世杰日记》1945年2月2日。

③ 《周恩来年谱》，第600页。

④ 《周恩来传》，第583页。

⑤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5编（4），第302、303页。

⑥ 《王世杰日记》1945年2月3日。

周、王两案的主要区别在于，周案为单向的，即只提对国民党的政治要求；而王案则是双向的，既有国民党自身的结束训政问题，也有对中共的统一军事的要求。

总之，由于国民党同意召开这个会议，并把会议主题定为结束训政，因此国共立场已有很大的接近。这一点，第三方面人士也看出来，黄炎培在日记中写道：“国共问题，雪艇、恩来二人迭次谈判，实有眉目，而不愿宣布。余为联：‘不求甚解，乐观厥成’。”^①

此时，日军的一号作战已经结束，蒋介石最困难的时期已经渡过，那么，蒋为什么在一号作战和史迪威事件这种最困难时刻未向中共妥协，而现在却突然大角度妥协？这一点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觉。

2月3日，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毛说：“如何避免缴枪，要采取慎重步骤”；“要反对右的危险”。此时，全世界的目光集中于雅尔塔，决定世界战后秩序的雅尔塔会议即将于2月4日召开。2月3日，毛致电周，判断：“红军迫近柏林，各国人民及进步党派声势大振。苏联参与东方事件可能性增长。在此种情形下，美、蒋均急于和我们求得政治妥协”。^②

这个判断是准确的，雅尔塔会议的一项重要议程，正是决定苏军入华参战；美、蒋所以急于妥协，正是力图在苏军入华之前解决中共问题，以防到时中共与苏军联合。2月5日，毛指示周：“对王世杰提案不完全拒绝”，“请于三四天内探明各方真意后回延。”^③各方指美、苏、英三方在苏军即将入华情况下，对国共问题的态度，毛的意思是要观察一下局势的发展。

^① 黄炎培日记，1945年2月8日。

^②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76页。

^③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77页。

2月8日，黄炎培宴请周恩来、左舜生、孙科、王世杰等三方人士。如前所述，孙科是赞成国共合作的，但国共合作的障碍来自国民党的一党训政制度，而训政制则又来自乃父的有关学说。为了既顾及各党派参政的要求，又顾及乃父的遗教，孙科提出一个两全主张：各党“共同训政”^①。这个不伦不类的提议没有引起任何响应。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2月9日，周恩来约见王世杰。王记载：“周恩来来访，谓延安对予所草拟之‘政治咨询会议’（周恩来原议为党派会议）尚未能接受，但可考虑，并云彼奉召须先返延安一商。其实予所草拟之件，十九均系周恩来所提议或已同意者，周竟谓此为予所草拟，又显有借词推诿之意。”^②

2月10日，赫尔利约宋子文、张治中、王世杰与周恩来继续会商。在周表示要返延磋商后，赫尔利主张周与国民党方面发表一个已由赫尔利和宋子文起草的声明，说明谈判有所进展，周断然拒绝。^③ 赫尔利此举的意思是避免国共谈判破裂造成不利影响。

2月11日，周恩来致电毛：苏、美、英和蒋四方对国共问题的真实态度是，苏联倾向于扶持民主运动和组织联合政权；美“深恐分裂”，正“拉拢局面”；英“不耐此种拖延，想另打开局面”；蒋“无民主可能”，但形式上想敷衍。^④

2月11日，赫尔利要求周恩来自己起草一个共同声明，并说将向罗斯福报告国共关系已接近。周表示：党派会议蒋只接受

① 《王世杰日记》1945年2月8日。

② 《王世杰日记》1945年2月9日。

③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78、579页注③。

④ 《周恩来年谱》，第601、602页。

形式，连名字都改了，实质也未接受。再次拒绝发表共同声明。

2月12日，毛泽东复电周恩来：“断然拒绝赫尔利，完全正确”。为什么要拒绝赫尔利的提议呢？毛接着说：“今日美新闻处广播美洲十家华侨报纸要求废止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可见我党主张已得海外拥护。外国多数舆论亦是拥护此项主张的。美政府扶蒋主张可能被迫放弃，我党必须攻掉此项主张。”^①

也就是说，明令废除一党专政的要求，在海外已经得到拥护，故不怕与国民党弄僵。而拒绝赫尔利，则是要“攻掉”美国的扶蒋政策，毛认为有此可能。

对于中共态度转趋强硬的原因，蒋介石是如何判断的呢？他在2月11日日记中写道：“俄国对我交涉迁延，中共态度转劣，当受三国会议之影响也。”^②三国会议即雅尔塔会议。在这种情况下，2月13日，蒋介石会见了周恩来，王世杰日记2月14日载：“昨晨周恩来谒见蒋先生，予及赫利均在座。蒋先生向周恩来讲话时声色俱厉，其最要之点为：（一）建国大纲所定之还政于民的程序不能变更，国民党只能还政于未来之国民代表大会，不能将政权移交于中共所要求召集之‘党派会议’；（二）中共不能推翻国民党或蒋先生本人，因此，必须与国民党彻底合作。周恩来态度亦倔强，辞出后甚愤愤。”^③

2月16日，周恩来返回延安，赫尔利斡旋下的国共谈判第二回合，再次以失败而告结束。

本章小结 赫尔利介入国共谈判，标志着中共问题国际化。中共的政治回旋余地获得扩展的同时，也增添了若干不确定的

①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79页。

②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5编（4），第302页。

③ 《王世杰日记》1945年2月14日。

变数。

在赫尔利倒向国民党之后，中共将民盟引入国共谈判，于是，对阵的形式由 1: 2 变为 2: 2，赫尔利左右国共对阵态势的地位，受到有效的遏制。

赫尔利与民盟的相继介入，国共谈判的方式由两方而三方、而四方，这种多元化局面的产生，本身就是对一党训政制的动摇和破坏。

国共关于改组政府的谈判以失败而中断，然而问题在于，经过此番较量，国共谈判的基础已悄然改变。国民党 6 月 5 日的中央提示案，以几军几师为基础，现在则以改组政府为谈判基础。在这个新的基础上形成的新的对立集中反映为：是成立各党派的联合政府还是各党派派代表参加国民党控制下的政府。

抗战末期，苏军入华参战问题一直是一只看不见的手，随着雅尔塔会议的召开，这只手正在显现出来。苏联背景的显现，已经并将继续对国共策略的调整产生重大影响，不过，国共都是以不动声色的方式来应对这个问题的。

第三章 国共第二套政治部署的展开

自周恩来2月16日返回延安，直至当年8月底毛泽东赴渝谈判，国共谈判中断了半年。在此期间，国共都展开了各自的第二套政治部署。

3月1日，蒋介石在宪政实施协进会发表演讲，蒋说：“共产党最近的要求是要中央立即取消党治，将政权交给各党各派组织的联合政府，而在我们政府的立场，是准备容纳其他政党（包括共产党）与全国无党无派的有志之士参加政府。但在国民大会召开以前，政府不能违反建国大纲，结束训政，将政治上的责任和最后的决定权，移交给各党各派，造成一种不负责任的与理论事实两不容许的局面”。蒋最后宣布：“预定于本年十一月十二日国父诞辰召开国民大会，以实现宪政”。^①

针对蒋3月1日这个讲话，中共中央于3月15日通告全党，拟于中共七大时提议：“在延安召开全国各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准备成立中国人民解放联合会”^②。

那么，国共对于当前的时局是怎样的认识的呢？

2月25日，中共中央致电留渝的王若飞，对国共谈判的内外条件做如下判断：“真正能逼蒋让步的条件，还没完全成熟：

①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5年3月1日。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48页。

国际方面，苏联还未参战，苏、美、英还未直接干涉中国政治；国内方面，大后方民主运动还未形成公开阵线。……而解放区的统一机构也还未组成。因此，蒋利用目前某些情况还可能拖一时期，国共谈判也不能望其速成。”^① 解放区统一机构即解联，这是内部条件，外部条件主要是苏军参战。中共的意思是，这两个条件成熟之后，再与国民党进行新一轮政治谈判。

4月底，陶希圣致函胡适，对当前态势与时局发展做如下分析，陶说：“一年多以来，中国共产党以‘民主、团结、抗战’宣传于国内外，颇收成效。……先生在美，当熟悉美国人士接受此种宣传而指斥政府，殆成为流行之风气。”关于苏军参战问题，他这样说：“倘使苏联向日宣战，而以大兵取右翼包抄之势，向察绥、河北进兵，以取东北，苏、共会师，则北方大势既去”。为扭转不利态势，重庆的英、美人士建议：“倘若政府力求民主象征之‘国会’与‘言论自由’之实现，而能集合民主主义者于政府之四周，则孤立之延安无能为力。”陶表示：“政府亦有鉴于此，日益向民主之方向而进行。而今冬之国民大会，乃为进行之一目标”。^②

可以说陶函把召开国大的意图说清楚了，此举也是为了创造内外两个条件，对外争取英、美，对内争取第三方面，从内外两方面孤立中共。

综上所述，国民党的召开国大、实施宪政，共产党的召开解放区代表大会、成立解联，此即国共两党各自采取的第二套政治部署。不过，在这两个大会之前，国共两党首先召开了各自的党代表大会。

^① 《南方局党史资料·统一战线工作》，第146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下，第11~14页，中华书局，1980。

一 两个大会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召开七大。

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做书面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毛在其他讲话中对中共的政治主张进行了阐述，毛说：“我们的主张是什么呢？我们主张在彻底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建立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国家，表明中共意在夺取全国政权。

毛又说：“在中国，已经没有一个人还敢说‘训政’或‘一党专政’有什么好处，不应该废止或‘结束’了，这是当前时局的一大变化。”要求立即宣布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国、共、民盟、无党派代表人士联合组成的临时的中央政府。

毛还表示：“我们的大会应向各解放区人民提议，尽可能迅速地在延安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以便讨论统一各解放区的行动”；“中国解放区现在已经成了全国广大人民抗日救国的重心”，“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的召集，将对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起一个巨大的推进作用。”^①

5月5日至5月21日，国民党召开六全大会。蒋介石在六大开幕词中说：“我在去年国民参政会时，以及今年元旦对全国的广播，两次说明我们结束训政、实施宪政的决心，三月一日我对宪政实施协进会致词，更具体表示要在本年十一月十二日总理八十诞辰召集国民大会，以实现宪政。……我今天特向大会陈

^① 以上均见《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50、62、90页。

述，希望大会代表诸君对我这一个主张正式予以接受。”^①

国民党六大正式决定于当年 11 月 12 日召开国大，为配合宪政的实施，5 月 18 日，六大通过了一个“促进宪政实现之各种必要措施案”，要求三个月内取消军队中的党部；各级学校不设党部；三青团改属政府领导；等等。^②

在六大期间，蒋反复强调的是中共问题。5 月 7 日，蒋在大会发言道：“我坦白地告诉大家，本党在国内一般社会及国外一般舆论中，地位和信誉是逐渐低落，最近这一年间，更是受尽嘲谑诋毁”。“不久以前，共产党在延安举行了他们所谓‘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们大会的报告与宣言，真是狂妄荒谬，对本党肆意丑诋，污蔑万分！”蒋要求各位代表痛切反省，否则，“那我们真是要生无立足之地，死无葬身之所！”^③

5 月 14 日，蒋在总理纪念周上讲话：“共产党盛唱联合政府，与准备召集民族解放委员会，如果召集民族解放委员会，是自速其灭亡，但所唱联合政府，乃亡我国民政府之毒计。”^④包瑞德在延安即对毛泽东说过，成立解联将使蒋获得攻击中共的口实，看来蒋的确不怕解放区联合会，而怕联合政府。

5 月 17 日，六大通过了《本党同志对中共问题之工作方针》，表示对中共问题仍坚持以政治方式解决，同时谴责中共一贯坚持武装割据，“最近更变本加厉，提出联合政府口号，并阴谋制造其所谓‘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企图颠覆政府，危害国家。凡我同志均应提高警觉”。^⑤

六大在《本党同志对中共问题之工作方针》中提出了一系

①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第 903 页。

②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5 年 5 月 18 日。

③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5 年 5 月 7 日。

④ 唐纵日记，1945 年 5 月 14 日。《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 509 页。

⑤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5 年 5 月 17 日。

列与中共争夺政治力量的工作方针，如：“大量吸收农工党员，发展本党在农工社会中之组织”；“吸收富于革命性之知识分子，并正确的领导青年”；“争取第三者对本党之同情”等等。^① 这些方针实际的效果可以说恰恰相反。

把争取第三方面列入中共问题的工作方针中，这实际上表明，在国民党看来，第三方面与中共是一条阵线的。事实上亦是如此，正如唐纵所说：“各党派本身力量不足与国民党相抗衡，欲利用共产党之声势以自抬身价，故无形中各党派已成为共产党之尾巴！”^②

此时的国民党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陷入混乱状态，尽管其文件表示要“大量吸收农工党员”，但在其大会开幕之际就遇到一个尴尬问题，有人“质询农工代表之有无”，组织部长陈立夫“承认无农民代表为憾事”^③。一个宣称要大量吸收农工党员的政党，在其代表大会中却无农民党员，这其实不是“憾事”，而是国民党阶级属性的反映，也是对“大量吸收农工党员”的一个讽刺。

5月18日蒋在大会上说：“一般人对政府要求其打倒资本，又要求其吸引资本；要求打倒帝国主义，又要求帝国主义援助；此真难乎为政府当局矣。”^④ 蒋介石感到困惑的这个问题，其实就是三民主义的理论与国民党政权的性质难以统一的反映。

唐纵对于国民党六全大会如是评价：“本党在此次会议中完全表现为一保守性之政党而非革命性之政党。查其原因，国民党党员大部分为公务人员，此种党员在十余年来一党专政的

①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5年5月17日。

② 唐纵日记，1945年5月31日。《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515页。

③ 《徐永昌日记》1945年5月7日。

④ 《徐永昌日记》1945年5月18日。

长时期中，地位提高了，财产增大了，生活优裕了，大家希望保持其原有生活与地位，故不希望改革，以动摇其自己之地位。”^①这是唐纵对于一党专制之下所生弊病的认识，即党员公务员化。

与此同时，唐纵着力研究了中共七大，认为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主张保持私有制并发展资本主义的提法，是中共的一个很大的转变，“这一个转变在中国收得很大的效果，后方许多工商界和国民党内部失意分子，过去对于共产党恐怖的心理，已完全改观。”^②

尔后，唐纵将中共七大研究报告呈蒋，7月20日，蒋批示“交中央党部作一比较研究，以资改进”，表示了借鉴中共经验改进国民党的意思。关于中共党章中对于党员权利等项规定，“委座批示本党应切实仿效实施”^③。

借鉴对手的经验，此为政治家通常采用的手段，然而问题在于：许多问题可以认识，但未必能“仿效实施”。

二 第三方面的斡旋

民盟的成立即以调和国共矛盾为主要任务，国共此次对峙的形成，再次为他们提供了这一机会。

5月26日，褚辅成、黄炎培、左舜生向王世杰表示：“中共问题政府应继续与延安谈判。”在此之前，本已有一个参政员赴延安访问的安排，在国共形成僵局的情况下，王世杰考虑“不妨任延安视察团傅斯年、王云五诸君赴延安一行。”王将这一意见报告

① 唐纵 1945 年 5 月 31 日反省录。《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 514 页。

② 唐纵 1945 年 6 月 30 日反省录。《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 522 页。

③ 唐纵日记，1945 年 7 月 20 日。《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 524 页。

蒋，“蒋先生亦以为可”。^①这样，参政员访延一事提上日程。

6月1日，王世杰约“黄炎培、褚辅成、王云五、冷遯、傅斯年诸人在蒋先生官邸商中共问题。当经决定由彼等先电延安询其态度。”^②对于第三方面这次出面斡旋，蒋的态度是：“无成见，诸君意如何，当照办。”^③这是个配合的意思。

6月2日，褚辅成、黄炎培、冷遯、王云五、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七位参政员致电毛泽东、周恩来，表示：“团结问题之政治解决，久为国人所渴望。自商谈停顿，参政会同入深为焦虑。月前经辅成等一度集商，一致希望继续商谈。”^④该电由黄炎培、傅斯年起草。^⑤

一面向中共劝和，一面则向国民党劝和。6月7日，左舜生向国民党方面表示：“国共谈判，陷于停顿，长此僵持，恐酿内战，过去参政会曾决议派遣延安考察团，但团员均系无党派人士，对于党派问题无兴趣，亦无主张，故迄未成行。近赫尔利大使对此亦乏积极精神。本人向认国共两党，必可接近，对于调停此问题颇具信心，甚愿政府能允许本人前往延安一行，从中调解，如政府不能自动请本人前去，则本人愿以私人旅行名义前往，希望政府不必阻难。”^⑥

6月18日，毛、周复电七位参政员，表示：国民党拒绝党派会议，坚决召开包办分裂之国大，已进一步造成内战危机。诸公的热心呼吁，倘能使当局觉悟，我党无不乐于谈判。^⑦这就是

① 《王世杰日记》1945年5月26日。

② 《王世杰日记》1945年6月1日。

③ 黄炎培日记，1945年6月1日。

④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607页。

⑤ 黄炎培日记，1945年6月1日。黄记载该电6月6日才发出。

⑥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5编（4），第64、65页。

⑦ 《周恩来年谱》，第610页。

说，国大问题是重开谈判的主要障碍。该电同时欢迎七参政员到延安商谈。

同日，毛泽东另电王若飞：“估计蒋得此消息后，不一定要他们来，如仍许其来，即使无具体内容，只来参观，亦应欢迎之。”^① 18日下午，王若飞将中共欢迎访延的来电转告了黄炎培，黄随即将此消息转告了国民党方面的雷震。^②

在得知毛泽东复电后，6月23日，王世杰向蒋建议：“对褚、左等七人赴延安之议宜予同意，赫利大使亦谓美方可供给飞机便利。蒋先生同意。”^③

当日，赫尔利约见民盟人士，表示：“美国方面竭诚希望中国内部能切实团结，目前国共问题之僵持状态，必须打开，中国政治上之第三力量，对此必须有所尽力。”“本人深信国民党中央亦希望打开僵局，蒋委员长曾亲向本人表示，如中国能民主团结，则渠可立即成为与华盛顿、林肯相同之伟人，由此可知蒋委员长并无拒绝与中共团结合作之意。”^④

这样，参政员访问延安一事，国、共、美三方均打开绿灯。为此，七位参政员于6月26日商定出一个三点方案，作为国共重开谈判的基础。该方案为：（一）由政府迅速召集政治会议；（二）国民大会交由政治会议解决；（三）会议之前，政府先自动实现若干改善政治之措施。这样，在中共的党派会议和国民党的政治咨询会议均被对方否决后，第三方面提出了第三个建议：政治会议。而第三方面为政治会议规定的任务是，解决国大问题。7人同时决定，由左舜生将该意见写成书面报告，交邵力子

①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607页。

② 黄炎培日记，1945年6月18日。

③ 《王世杰日记》1945年6月23日。

④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5编（4），第66、67页。

转蒋，“俟同意后，偕赴延安”。^①

6月27日上午，褚辅成等七人以及王世杰、邵力子在中央研究院商讨昨日提出的三点斡旋方案。王世杰说：“昨函如送领袖，必大遭拂怒。”此言一出，众参政员心灰意冷，表示：“延安行作罢了”。当日下午，“七人会商，准备散伙”。这时，黄炎培说：“撞壁须撞到壁，今壁尚未见，仅凭旁人预测势将撞壁，便放手了，岂为合理。”于是决定下午见蒋，去撞一次壁，为免遭“拂怒”，商定将三点调停意见不向蒋递交书面方案，仅由褚辅成做口头建议。见到蒋时，大约仍出于对蒋的顾虑，褚辅成仅提到前两项意见，对此，蒋答：“余无成见”。^②撞壁竟撞过这一关。

大约因赫尔利赴延安时自作主张，结果使国民党极为被动的前车之鉴，王世杰虽赞成七参政员赴延，但却不赞成他们自提方案。6月30日，王世杰对王云五、褚辅成、傅斯年三人说：“彼等赴延安，只宜主张国共续谈，不宜自提主张，免使政府陷于困难。”^③不能自提主张，等于抹煞第三方面的政治地位，因此这个意见不可能被接受。

7月1日，除王云五因病未能成行，其余六位参政员在王若飞陪同下飞抵延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到机场迎接。毛与黄炎培是第一次正式见面，毛对黄说，从前在上海江苏省教育会为杜威举办的演讲会上见过黄。^④

① 黄炎培日记，1945年6月26日。

② 黄炎培日记，1945年6月27日。

③ 《王世杰日记》1945年6月30日。

④ 黄炎培日记，1945年7月1日。1949年黄炎培由香港到北京参加新政府，8月1日与毛谈话时，“毛问，知道我们第一次相见在哪里？我答不知。毛说，江苏省教育会欢迎杜威博士，你演说中国一百个中学毕业生，升学者只多少多少，失业者倒多少多少，这一大群听众中间有一个毛泽东”（黄炎培日记，1949年8月1日）。

7月3日晚，毛、周与六位参政员达成两点共识：“（1）国民大会停止进行。（2）从速召开政治会议。”此外，中共对于政治会议的组织、议题等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但并不要求与六位参政员商讨^①，意思是仅作为自己的意见提出，并不要求对方答复或同意，为第三方面留出余地。中共对政治会议的意见与最初的党派会议基本相同，要求议题为结束一党专政与建立联合政府，并要求会前释放政治犯。^②

参政员在延安逗留五天，左舜生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他们的招待所，“设备虽异常简单，打扫得却十分清洁。……招待所的厕所是几个土坑，可是装得有纱门，地下洒了不少的石灰，绝少苍蝇、蚊子之类”。从这些极为细小的事情上，左舜生看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共“志不在小”。^③

7月5日，六位参政员返渝。

如前所述，参政员赴延前，王世杰曾反对他们的自提主张，6日，王见到他们后在日记中写道：“彼等在延竟同意两条件：一为国民大会之停开，二为召集政治会议。”^④对此颇为不满。7月7日，第四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开幕，下午黄炎培见到蒋，蒋对他们的延安之行只是“略有询问”^⑤，似乎兴趣并不大。

此时，正是中共七大之后，中共的重点是召开解放区代表大会，成立解联。而蒋介石的重点则是中苏谈判。这样，参政员所提出的政治会议一事被搁置下来。

① 黄炎培日记，1945年7月3日。

② 《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第288页。

③ 左舜生：《近三十年见闻杂录》。转引自《中华民国史纪要》，1945年7月1日。

④ 《王世杰日记》1945年7月6日。

⑤ 黄炎培日记，1945年7月7日。

三 中共关于“解代会”的筹备

在中国，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变动，其最为深刻的原因，都来自军事实力的消长。中共所以敢于筹备召开解代会准备成立解联，其依据也就在这里。

那么中共此刻对于国共力量对比具体是怎样判断的呢？判断来自两个方面：其一，中共力量的发展；第二，国民党力量的削弱。1944年10月10日，周恩来在延安发表题为《如何解决》的演讲，其中谈到国共力量的对比。周说：“我们敌后人民在这七年多所发展起来的抗日部队五十七万正规军及二百二十万民兵总计起来，几已达到国民党现有部队的相等数目。我们敌后人民，在这七年多所建立起来的五百九十一县地方政权，几已达国民党政府失去的七百二十一县的百分之八十二。”^①此即中共军力与政权的基本实力。

在中共力量发展的同时，国民党的力量则是在削弱。1944年11月8日，毛泽东在延安与赫尔利谈话时说：“自今年4月起，在日寇进攻面前，国民党军队已由300万减至195万。”^②

为此，1944年底，中共做出一个重要的政治判断：国共力量的对比，已经“几乎平衡”。1944年12月9日，中共中央在讨论是否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时，陈毅致信毛泽东，赞成成立，陈说：“这是中国抗日民主运动的一个里程碑，一个新阶段。这标志着由国共平衡向共强国弱的大角度的转变，这个转变，目前时机业已成熟”。^③陈毅不仅提出“国共平衡”的论点，

^① 周恩来：《如何解决》，《解放日报》1944年10月12日。

^②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47页。

^③ 陈毅传编写组：《陈毅传》，第313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

并且还提出，局势正发生“共强国弱”的转变。这两个论点似乎都为毛泽东接受下来。

1944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指示，该指示经毛泽东修改审定，指示说：“最近八个月，中国政治形势起了一个大变化。国共力量对比，已由过去多年的国强共弱，达到现在的国共几乎平衡，并正在走向共强国弱的地位。我党现在已确实成了抗日救国的决定因素。”又指出，如果数年后能达到一百万至一百五十万有纪律有训练的军队，又有充足的粮食，中国的命运就可由我们掌握了。^①

国共力量“几乎平衡”，显然是过高的估计；正在走向“共强国弱”，则是更高的估计。之所以做出如此估计，主要是对国民党军在一号作战中所受打击程度估计过高，同时估计一号作战将向云、贵、川延伸，国民党将继续遭受重创。但是，国共力量差距的缩小，则是事实。

总体而言，中共是这样描述各方实力的，1945年4月1日，毛泽东在与谢伟思的谈话中说：“重庆控制下地区1.9亿人口，日军占领地区1.6亿人口，共产党地区1亿人口”。^②毛泽东等于是在告诉美国人：中共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一。基于这一认识，“解联”一事经过提出与放下的反复之后，又一次提上议程。

6月19日，中共召开七届一中全会，这次会议除选举新的中央领导外，主要议题就是讨论成立“解联”一事。毛泽东说：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国民大会是危险的，故我们拒绝参加。我们决定不参加，把一个问题摆在美、蒋面前，也使中间派有文章做。这次国民大会开不开得成，蒋介石下决心的时候是在十一月。不

^①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68、569页。

^② 《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 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第338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

开的好处是大家不合法；开的好处是蒋介石骑虎难下，成为众矢之的。我们的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则是稳当的、有利无弊的。它可能向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向联合政府发展，选举一个解放区联合会；另一个也是向联合政府发展，但要经过一个曲折。成立解放区联合会，这是一个重大的步骤，前途就是成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政府。^①

毛泽东这段话是对国大与解代会两个大会的结果所做的分析。蒋如果不开国大，立宪政府便不能成立，其一党训政制便继续处于不合法的地位，从而不能摆脱被动的处境。如果召开国大，因中共拒绝参加，这种单方面的国大又将使蒋处于众矢之的地位。相反，毛认为中共的解代会则是稳当的，它既可成立一个以中共为主体的联合政府——解放区联合委员会，其性质是新民主主义政府。另一方面，也可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政府，从而继续维持国共合作的局面。

周恩来在七届一中全会上发言说：国民党如独裁地召开所谓国民大会，我们就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同他对立，日期定在十一月，现在民主党派和外国记者也知道我们要开这个会。^②

七届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及其筹备事项的决议》。

两天后，6月21日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发表通电，希望各解放区迅速派出代表来延安，参加解放区代表会议的筹备工作。^③尔后，各军政、群众团体纷纷表示响应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通电，《解放日报》几乎天天刊载有关这个会议的消息。

7月13日，“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正式成

①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607、608页。

② 《周恩来年谱》，第610页。

③ 《解放日报》1945年6月23日。

立，周恩来等 25 人为常务委员。当日，筹委会发表通电：“决定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于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十一月在延安举行”，称会议“将是一个促成国民党一党专政之迅速结束与民主的政府之迅速产生的大会”。^①从而公开宣告中共将单独成立“政府”。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各解放区进行了解代会代表选举，苏中地区便选出了季方、黄逸峰等十余人。^②

8月6日，周恩来致电李济深：十一月各解放区将在延安召开人民代表会议，欢迎派员前来。^③这表明，在日本投降前数日，解代会仍在积极筹备。

本章小结 国共两个党的代表大会，相继推出国民大会与解放区代表大会两个决议。两个决议的推出，意味着中国将同时推出两个政府，而两个政府的推出，则又将意味着这样一个问题：哪个政府代表中国。但至少意味着某一个政府代表着中国的某一个部分。从这个角度看问题，解代会的召开对于中共来讲，可以说是“有利无弊”的。至此，国共在一个新的更高的基础上，形成更为尖锐的对立。

正如毛泽东所说，国共对立“使中间派有文章做”。六位参政员访延，正是要在国共之外做出第三篇文章。参政员访延如果说有什么结果的话，那就是证实了这样一个问题：当第三方面完全脱离国共立场，力图提出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第三种方案时，第三方面的政治分量是微弱的。国共均以客气的方式对参政员的访延施以礼遇，但同样客气地将其方案搁置起来。一般情况下，第

^① 《解放日报》1945年7月14日。

^② 《管文蔚回忆录续编》，第271页，人民出版社，1988。

^③ 《周恩来年谱》，第612页。

三方面的独立方案不能左右国共的既定政策。

国共僵局既然在现有条件下形成，那么，便不可能通过现有条件而化解。国共两个党代会既然将两个政府的可能性推了出来，那么，国共必然以这个问题为中心，采取不同的策略增加筹码，从而在新的条件下争取国际和国内对自己政府的接受或者再确认。

中共的主要策略是，加速成立解联，造成两个政府的既成事实，在美军登陆和苏军参战的情况下，中共一旦与之联合作战并夺取中心城市，中共的“新民主主义的政府”必将获得一席之地。

蒋介石的情况是，日军一号作战停止后，其政权的削弱态势暂趋稳定。国际方面，因赫尔利已公开倒向蒋，美方阵脚基本稳定，剩下的主要问题便是苏军入华。为此，蒋的主要策略是，开辟一条与苏联沟通的渠道，通过苏联对其政权的再确认，稳固其合法地位，从而将对手那个潜在的政府，封杀腹中。

由于苏联对于国共来讲都是一个十分敏感、十分微妙的问题，因此蒋采取的手段也是十分隐蔽的。

第四章 中苏谈判：外交与政治

雅尔塔会议做出苏军入华参战的决议。由于这个问题涉及一系列中苏国家关系，因此，中苏谈判一事由此而启动。1945年7月至8月，宋子文与斯大林在莫斯科先后举行两轮会谈，最后签署了中苏条约及其一揽子附件。

中苏谈判是在雅尔塔协议这一国际背景和国共对立这一国内背景下举行的，它必然将两个背景纳入会谈。因此，它既是外交谈判，又是政治谈判，既有外交利益的争论，又有政治利益的交换，从总体上看，尤其从蒋介石的角度看，这是一次外交谈判掩盖之下的政治谈判。

这种谈判性质，决定了中苏条约的性质，因此，中苏条约既是一个不平等的外交条约，又是一个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蒋介石政治要求的政治条约。总括而论，中苏谈判以及中苏条约，典型地体现了“外交是内政的继续”这一政治规则。

一 国民党对苏联与中国政治的认识

国民党自执政以来，由于中共与苏联的关系，因此在对苏外交上基本没有作为，国家关系长期处于冷漠状态。抗战爆发之后，两国关系有所改善，于是，蒋介石身边的几位谋士开始考虑一个问题：能否以一种积极的、主动的姿态，与苏联建立更为紧密的国家关系，从而在苏联与中共之间打入一个楔子，为解决中

共问题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

1940年6月，侍从室主管情报的第六组组长唐纵，向蒋呈交一份报告，题为《国际现势之观察及其对策》。报告力主“联苏”，认为：“联苏或可因而隔断中共与苏联之关系”。关于联苏的可能性，唐纵认为：“苏联何厚于中共？取其同情也，今吾人能同情苏联，苏联何取于野党而不亲近于我政府？”唐纵的意思是，中共仅为在野党，苏联在中共那里的所得，肯定比不过居于执政地位的国民党，因此，只要国民党采取有效措施，苏联是能够抛弃中共而与国民党接近的。

对于唐纵这个报告，蒋的批示是：“可嘉勉”^①。唐纵对蒋这个批示这样认为：“前次我对于欧战前途之观察与对策，今日奉委座批示‘可嘉勉’，并签名。凡公事蒙签名者，表示对此事之郑重，此即委座对我报告之郑重批示也。”^②看来，蒋对唐纵的上述论点是重视的。

1944年1月，侍从室秘书邵毓麟，拟定一个《与苏共、中共斗争之实施计划说帖》，对于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做如下判断：“自政治上观察，苏联与英、美已形对立，我介其间，举足轻重。从世界全局看去，苏俄得我则胜，失我则败。”基于“我”之于苏联举足轻重这一判断，该说帖主张主动与苏谈判，以求得两个结果。说帖指出：“我们应该对苏采取外交攻势，楔入苏联与中共之间，造出其矛盾，更从中分化之”。说帖又指出：“我之亲苏，非徒亲苏，乃为制共而亲苏，故对苏谈判，必须有相当之诚意与实惠，而借此亲苏之态势，抑或可收到美、英

① 唐纵：《国际现势之观察及其对策》。《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676～681页。

② 唐纵日记，1940年6月11日。《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133页。

加强援我之利益。”^①

唐纵和邵毓麟都是从分化苏联与中共的关系这个角度，提出各自的看法与建议，但这些毕竟是较为抽象的政治考虑。真正使国民党迫切感到需要改善中苏国家关系的，则是一些更为现实的政治问题，首先是苏军入华参战问题。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后期，国民党高层人士中关于苏军入华参战的话题多起来。之所以关注这个问题，是因为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另一个问题，此即苏军入华后可能与中共直接联合。

1943年6月，熊式辉与王世杰讨论苏军参战后将给中国带来怎样的影响。王说：“我政府最应先行设法谋共产党问题之解决，即不能完全解决，亦当求得部分之解决。否则日苏决裂后，我纵欲进兵华北或东北，将因共军之阻挠而不能遂行战略。倘共军或苏军先入东北，前途之危机正复不少。”^②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为避免东西两线作战，因此与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随着战争进入后期，同盟国均意识到苏联在击败德国之后，必将加入东方战场，对日宣战。王世杰所说的“日苏决裂”即指这件事。而苏军参战的地区，由于中国只有东北地区最便苏军展开进攻，并为日军主力集结地区，因此均估计苏军将由东北入华参战。于是，怎样解决苏军与中共在东北会合，成为国民党高层议论的中心话题。

1944年5月17日，孙科在与黄炎培的谈话中，对局势的发展有这样几个看法：“（1）欧战今年可结束；（2）苏联必在东方参战；（3）东北将为苏军力所及；（4）如我内政上无良好措置，如苏联兵力所及，可能将政治交与中共；（5）中共将于其间大

^① 邵毓麟：《使韩回忆》，第2、3页，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

^② 《王世杰日记》1943年6月15日。

扩张武力，黄河以北全入掌握以后，大局可以推想而知。”^①

苏联“可能将政治交与中共”，孙科的担心在国民党内并非孤立。同年8月，王世杰对蒋说：“我对中共政策，应须想到两三个月后苏联参加远东战事，中共军队与苏联连合时之状态。我应预采一种办法，防止苏联届时承认中共政治组织或接济其军火，使与政府对抗。”^②

同样，这个问题也是美国关注的重点。赫利尔曾对他之所以急于介入国共谈判这样解释：“美国之意在防止苏联于加入远东战事后承认中共政府为对手”^③。

他们的这种担心是有根据的。苏联进兵东欧后，建立了一批共产党政权，在苏联支持下新疆成立的“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也证明了这一点。

唐纵和邵毓麟的意见，都是从给予苏联实际利益入手，从而分化苏联与中共的关系，其立论颇为自负，认为“我”之于苏，“举足轻重”。而王世杰、孙科、赫尔利等，则是从苏联在远东参战后，苏联将与中共取得联合这个角度提出问题，他们都预测到东北前景的复杂性，关于中共在苏联的支持下“与政府对抗”的预测，使他们不寒而栗。

不论人们的看法如何不同，但有一点相同，即都把中共问题与苏联联系起来，因而也都把苏联作为解决中共问题的一条渠道。1944年6月华莱士访华谈及中共问题时，蒋介石一再说明“中共确以苏联为背景”，对此，华莱士表示：“中共问题既有苏

① 黄炎培日记，1944年5月17日。

② 《王世杰日记》1944年8月30日。

③ 《王世杰日记》1944年11月21日。

联为背景，中国似宜从早与苏联直接恳谈。”蒋表示“当尽力为之”。^①

上面这些都只是议论和设想，真正具体把对苏谈判推动起来的，是一位并不十分引人注目的人物——钱昌照。钱昌照为宋子文的智囊，钱认为在战后的对外关系中，不要有严重的敌对关系，要设法与苏联友好相处。钱回忆道：“我同宋子文谈，最好由蒋派专人去，看斯大林愿否接见，同斯大林以外的人谈是没有用的。1944年夏，蒋叫宋子文（那时宋任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请苏联驻我国大使彼得罗夫吃饭，由卜道明任翻译，提出中苏会谈的建议……彼得罗夫不久回复说，斯大林元帅愿意在10月间与我方举行会谈。”^②谈判日期后因故一再推迟，但宋子文访苏一事由此而提上议事日程。

综上所述，以中共问题、苏军参战问题、东北问题为出发点，国民党将展开对苏外交一事提上议事日程。而就在此时，发生了新疆问题，使得国民党更加迫切需要举行中苏谈判。

1944年8月至1945年8月，新疆伊犁、塔城、阿勒泰地区先后发生民族起义，史称“三区起义”。1944年11月12日，起义军在伊犁成立了“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这次起义是在苏联的支持下进行的，当年参与起义的赛福鼎说：“我们认为苏联政府的有力支持，是三区革命从爆发到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③

新疆问题的发生，一方面有苏联因素，但最主要的是盛世才

① 《王世杰日记》1944年6月22、23日。

② 《钱昌照回忆录》，第96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彼得罗夫1945年5月出任驻华大使，钱昌照的回忆不甚准确。

③ 《赛福鼎回忆录》，第388页，华夏出版社，1993。

的暴政所致。当年6月，王世杰到新疆迎接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返渝后曾向蒋汇报新疆问题。王认为：“盛世才之困难，一为与苏联不睦，一在纯用高压，动辄逮捕并杀人犯数百人，遂至人人不安，彼自己亦不安。”^①

三区起义发生后，国民党方面迫切感到需与苏联方面进行商讨，于是宋子文访苏一事更加迫切。王世杰日记载：“新疆方面伊宁发生归化俄人事变，苏联领事公然为之支持。……宋子文部长原拟赴苏访问，询苏方意见，但苏方则一再推延，谓须迟至明年二月。”^②

1945年2月2日，王世杰在日记中记载：“苏联驻华代办向我外部询问，宋部长拟访莫斯科，其所拟提出之问题为何。午后子文约亮畴、达铨及予磋商。予主张现时不宜明白提出任何具体问题……但予主张对若干具体问题，仍须准备方案，俟抵苏时与其领袖晤谈后，观察当时情势及苏方态度，酌量提出（中苏同盟问题，东三省及大连、旅顺、中东铁路等问题，中共问题，新疆问题等，我均须有内定之态度或方案）。”^③

王世杰这则日记反映了三个问题：第一，中苏谈判一事已正式提上两国议事日程；第二，王世杰所拟定的几项会谈议题，除外蒙问题未曾料到外，其他问题都是后来中苏谈判中的主要问题；第三，重庆当局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有三点，即中共问题、东北问题、新疆问题，这三个问题正是后来中苏谈判中，中国方面主要的“交换条件”。上面三点表明，中苏谈判的准备和谈判的基本内容，都是在雅尔塔会议之前拟定的，中苏谈判与谈判内容，本来与雅尔塔会议并无直接关系。

① 《王世杰日记》1944年6月28日。

② 《王世杰日记》1944年12月3日。

③ 《王世杰日记》1945年2月2日。

2月11日，王世杰又在日记中记载：“苏联方面对于宋子文访苏之议，原已约定以本月为期，最近苏联又托词延展，谓以本年四五月间为便。意者苏联预计可于尔时结束欧战，参加对日战争。”^①

2月11日，正是雅尔塔会议结束之日，苏方推迟谈判，显然是要将中苏谈判与雅尔塔会议有关中国的决议衔接起来，从而以雅尔塔协议的名义，迫使中方在谈判中接受苏方的若干条件。雅尔塔协定与王世杰原拟中苏谈判的内容比较，主要是增加了外蒙问题，以及对苏联在中国东北若干权益的强制性规定。

总之，本来是早已拟定的中苏谈判，后来则笼罩在雅尔塔协定的阴影之下，似乎仅仅是雅尔塔会议延伸出来的一个附加的谈判。其实不然。可以这样认为，中苏谈判，本来是中国当局基于自身的多种政治考虑，而要求与苏方举行的一次以政治目的为主要的政治谈判。尔后，苏方又为这个谈判注入了若干雅尔塔协定的内容，使之又具有了若干牵涉国家利益的外交谈判的性质，这两方面因素加在一起，形成了后来的中苏谈判。正因为如此，所以中苏谈判既有若干雅尔塔协定的内容，又有若干与雅尔塔协定无关的中方原拟内容。因此中苏谈判既是一次外交谈判，更是一次外交谈判掩盖之下的政治谈判。

二 雅尔塔决议与中苏谈判的启动

由于国民党军在日军一号作战中的溃败，美国对蒋丧失信心，于是美国加紧敦促苏联参战，以求减少美军的损失。

1944年10月14日，驻英大使顾维钧在华盛顿与李海上将谈话后报告蒋介石：“谈及远东军事，彼对我近月抗战能力不及

^① 《王世杰日记》1945年2月11日。

往年……殊为焦虑”。顾维钧问道苏联将来在远东参战问题，“彼答想必加入，但料苏俄愿在远东取得旅顺不冻港，英必赞成，美亦无反对之意”。^①

顾维钧来电引起蒋介石注意，要求顾对美苏意图提出意见。11月9日，顾复电蒋：“以钧推测，美方曾表示，希望苏联早日参加对日战争，俾促日寇之败，并探苏联之意。而苏联隐示，欲乘机取得旅顺，为参加条件之一，李海上将向钧提出此点，并将英、美态度见告，似欲探询我方感想。”^②顾氏的复电可以说把问题的由来说清楚了。

1945年2月4日至11日，美、苏、英召开雅尔塔会议，其中一项秘密协定规定，苏联于欧战结束两三个月后对日宣战，作为参战条件，该协定承认了苏联的几项要求，涉及中国权益的主要有两大项：第一，外蒙古现状予以维持；第二，“苏联应恢复以前俄罗斯帝国之权利”。在这些被恢复的帝俄时代的权益中，主要有：大连为国际商港，苏联拥有优越权；恢复旅顺为苏联租用之海军基地；中东铁路以及通往大连的南满铁路，由中苏两国合组公司经营，苏联拥有优越权。

由于苏联不便向中方直接提出上述要求，因此协议载明，由罗斯福向中方提出，以获得蒋介石的同意。同时，苏联表示将与中国政府签订一项友好条约。

这是一个强国之间多方利益相互交换而形成的一揽子政治交易，中国利益成为其中的一个筹码。

雅尔塔协定明文规定恢复苏联帝俄时代在东北的权益，这与时代潮流是相背离的。两年前，当中国与英、美两国签署平等新约、基本废除不平等条约之际，踌躇满志的蒋介石出版了《中

^①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2），第539页。

^②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2），第540页。

国之命运》一书，蒋写道：“到了今天，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初步工作，是已经做到了，三民主义与国民革命的成绩，亦已经昭著于国民的面前了。”为此，蒋大力宣扬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号召国民“共赴于三民主义的信仰之下，加入中国国民党”。^①不料两年后一项新的不平等条约又强加于中国，这对蒋的“国民革命的成绩”无疑是一个讽刺。

以往的不平等条约由中国自己承认、自己签署，雅尔塔协议的一个主要特点在于，是在中国方面不知晓的情况下，由几个大国私下决定。因此，这个协定具有更大的不平等性和更大的强制性。

由于该协定当时极为保密，蒋是后来才陆续得知有关消息。

4月29日，蒋与赫尔利做了一次长谈，王世杰在座。赫尔利主要介绍了雅尔塔协定苏联的参战条件，关于旅顺租借问题，“蒋先生谓‘租借地’方法甚不好，但云容详细考虑后再谈。……赫氏复谓：当前有两大事须于九十日内办好：（一）使中共参加中央政府，以免苏联于某一事件发生后，借口承认中共。（二）与苏联成立一个协定，解决以上各项问题。”^②赫尔利所说某一事件指苏军参战，解决各项问题指解决苏军参战的各项条件。

这次谈话表明，蒋对于旅顺的“租借”问题较为重视，因为这将直接抹煞蒋在《中国之命运》中所宣称的“昭著”的革命成绩。而赫尔利重视的是中共问题。赫尔利要求在90天即三个月左右解决中共问题，也就是要求在7月底或8月初苏军参战之前解决问题。

① 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第176页，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84。

② 《王世杰日记》1945年4月30日。这是29日的谈话，王30日补记。

赫尔利提出了中共问题与苏方条件两件事，基本上是将此分做两个问题分别看待的，而蒋则迅速将这两个问题贯通起来。5月6日，蒋与赫尔利再做长谈，这是蒋对赫尔利提出的两件事所做的答复。王世杰记载：“今日赫尔利在山洞蒋先生官邸与蒋先生谈二小时。一为中共问题。蒋先生谓此事与中苏关系为一个问题。一为中苏问题。蒋先生谓，在不妨害中国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及行政完整之原则下，可容纳苏联对东北之合理主张。”^①

在这里，蒋将中共问题与中苏国家关系视为一个问题，一语点明问题的关键，也就是可以通过中苏国家关系的改善，而解决中共问题。这样，蒋实际上便为即将到来的中苏谈判确立了一个基点。那么，中苏国家关系怎样改善呢？此即第二个问题，就是满足苏联的条件。这第二个问题显然是从属于第一个问题的。尽管蒋也强调不“妨害”中国主权，接受“合理”要求，实际上只要接受苏方条件，便不可能不妨害主权，不可能是“合理”的。事后看，蒋对不妨害中国领土、主权、行政的要求，主要是文字上的要求，求得保全体面，并对苏方的一系列优越权做出一定的技术性限制。

雅尔塔协定是背着中国而制定的一项强制性协定，要求蒋与之抗衡，的确不现实，问题在于：蒋将这些本来是强制性的规定，变成了反条件，变为解决中共问题的反条件。

1945年4~5月间，宋子文、顾维钧等赴美参加联合国旧金山会议。在此期间，罗斯福已于4月中旬病故；5月7日，德国正式投降。这样，苏军参战，击溃日本，以结束二次大战，成为各大国首脑最为关注的问题。而苏军参战又有一个参战条件问题须与中国达成协议，于是中苏谈判迫在眉睫。5月23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要求顾维钧、王宠惠，就中苏谈判问题，“缜密

^① 《王世杰日记》1945年5月6日。

研讨应付方案”^①。

5月26日，宋子文复电蒋，转告顾维钧的意见：“顾谓美国在罗总统时，原期中国陆军对击溃日本能负大部责任，但以去年我国军事失利，罗感觉我国力量不够，美国舆论又不愿见大部美国士兵牺牲，故罗转而盼苏联能参加远东战争。苏联因深悉此情，故提此要求，苏联亦知此项要求不合世界潮流，不敢即提，而盼在相当时间由罗总统提出。顾意苏联此时亦未必敢提，我国最好佯装不知，尽量拖延，苏或不致提出。此时应否由第三者美国参入讨论，似须考虑”。^②顾维钧的意思是，不让第三者美国提出苏联参战条件，苏联又不便直接提出，这样，中方可“佯装不知”，将此事拖延过去。

顾维钧是一位纯粹的外交家，顾氏的意见从外交的角度看，或许是个不错的主意，至少可以拖延一段时间，讨价还价的余地还是有的。然而顾氏的意见完全没有涉及一个根本问题，即中共问题。由于已经签订了雅尔塔协定，因此，重庆政府不能阻止苏联出兵东北，问题便在于：如果不承认苏方条件而与苏方签约，苏军进入东北之后，重庆政府对其便难以约束，从而导致苏军公开支持中共，而这一点才是蒋介石考虑的主要问题。或许在蒋看来，苏军参战条件，恰恰是楔入苏联与中共之间的那个“实惠”，恰恰是一笔政治交易的筹码。总之，蒋在中苏谈判问题上持积极态度，宋子文本来与顾氏意见大致相同，倾向于拖延，而蒋则电令宋必须于6月底返回重庆。

1945年5月8日，苏联新任驻华大使彼得罗夫向蒋递交了国书，正式履任。苏联在此时更换大使，是为即将开始的中苏谈

^①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2），第547页。

^②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2），第548页。

判所做的一项安排。自此，中苏谈判拉开了序幕。

在中苏谈判的准备阶段，从现象上看，问题的核心集中在旅顺的“租借”问题上，这是蒋介石极为关注的一个问题。

美国为什么在旅顺问题上支持苏联的要求呢？后来，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曾对宋子文说：“美国对旅顺问题态度，有特殊困难，因美既拟永久占领日本附近海岛，无法拒绝苏联使用旅顺，故罗总统有此让步”^①。将日本与旅顺问题联系起来，看来，美苏之间有一个利益均等的问题。

那么，苏联恢复帝俄时代租借旅顺的理由又是什么呢？赫尔利曾与彼得罗夫谈及此事，王世杰记载：“赫利大使于前日曾与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谈东北问题。彼得罗夫表示谓：英国如能保有香港，苏联应亦可以保有旅顺。”^②将香港与旅顺问题联系起来，看来，苏联与英国之间也有一个利益均等问题，这大概就是英国在雅尔塔同意苏联租借旅顺的原因吧。

利益均等，是近代以来列强在华轮番争夺势力范围的基本口实，美、苏、英在旅顺租借问题上的三角均等关系，是一起以他国权益做交易的典型事例，是强权政治的一次深刻表露。

6月3日，蒋介石与彼得罗夫进行第一次实质性的谈话。蒋略为寒暄后，针对苏联希望恢复帝俄时代在华特权，蒋说：“苏联自革命以后，帮助我国争取独立、领土主权完整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已于民国十三年先于其他国家，正式宣布取消帝俄与中国所缔结之不平等条约，及放弃其一切特权……本人认为此乃中苏友谊合作之历史基础，并认为现在仍有恢复民国十三年时代中苏合作之可能。”显然，蒋试图以列宁时代的对华政策，来堵苏联的嘴。接下来蒋具体谈东北问题，希望苏联能够帮助中国恢复东

①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2），第608页。

② 《王世杰日记》1945年5月25日。

三省主权，表示：“盖我全国人民咸认不平等条约、领事裁判权及租界等事为国家的耻辱，一致痛恨，吾人为革命党人，自应注意人民之心理与要求”。

或许王世杰已将彼得罗夫关于英国保有香港的论点报告了蒋，因此，蒋特地说道：“香港问题虽尚待与英国商议，但九龙必须收回。”九龙为租借地，1943年中英签署新约时，蒋当时就要求收回九龙，但被英方拒绝；英方当时表示战后解决这一问题。现在，蒋重提这个问题，意在不给苏联留下租借旅顺的依据。

最后，蒋表示在东北的行政主权恢复之后，东北的铁路、商港可予苏联便利，军港可与苏联共同使用。^①

在与苏方周旋的同时，蒋亦指望得到美方的配合。6月8日蒋致电宋子文，嘱宋在见杜鲁门时，就旅顺问题提出三个解决方案：第一，为国际海空军根据地；第二，中、美、俄共同使用；第三，如上两项为苏联反对，则必须为中、俄共同使用。“若俄提归其独占或租让，则我必反对到底，决不许可也。”^②前两项方案显然是“以夷制夷”意思。6月9日，宋子文面见杜鲁门后致电蒋，报告会谈情况。关于旅顺问题，“杜鲁门总统同意此乃最困难之问题”，宋就蒋所提三个方案做了陈述，但杜鲁门表示对罗斯福签订的协定“决予支持”。^③这样，蒋介石在美国人那里未能获得支持。

6月11日，蒋再电宋：“此事罗、杜既皆赞同，则中前电各种步骤其第一、第二步骤不必与杜再商……今后只要俄国尊重我主权与行政之完整，则中国可允其对军港共同使用，但不能再用租借名义。……但此点可由我国与俄直接交涉为宜，不必再托美

①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2），第549~551页。

②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2），第554页。

③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2），第556页。

国转达。”^① 蒋电反映了两点结果：第一，蒋原提三个方案中，只剩最后一个方案，即中苏共同使用；第二，在“租借”问题上，蒋已不能指望美国的支持，只能单独与苏方交涉。

6月12日，蒋介石在重庆再次与彼得罗夫谈话。蒋在前次谈话中，关于苏联革命后已放弃帝俄在华不平等条约的那些话，并未使苏方稍为收敛。彼得罗夫首先表示：“苏联准备开始关于缔结中苏友谊互助条约之谈判，但有几个先决条件，拟先提出讨论。”这几个先决条件即雅尔塔协定所规定的几个条件，其中之一便是：“恢复旅顺港之租借，建立苏联海军根据地”。蒋说：“租借地一类的名义，我中国人民认为是国家的耻辱，我们不好再用这种名义，中苏友谊互助条约是一种光荣的条约，如有租借地一类的名义，则将失去条约的原意。”彼得罗夫说：“‘租借地’与‘租界’不同，‘租界’的意思包含着领事裁判权等等的特权，‘租借地’却不包括这样的特权。”“苏联如果租借旅顺，自应规定租借的时期，而且领土主权完全属于中国”。蒋介石说：“既有租借地，便是领土主权的不完整，因为中国的军港，自己不能管理，不能使用，便是领土主权不完整”。彼得罗夫提到雅尔塔会议丘吉尔和罗斯福对苏联这一要求的支持，表示租用旅顺决不会用以反对中国。蒋回答道：“当然不会反对中国，但不可因此使中国变成不平等的国家”。^② 这次谈话虽未解决问题，但双方论点均已摆明。

由于重庆政府的惟一指望只有美国，因此，6月13日，宋子文再次与杜鲁门谈旅顺的租借问题。杜鲁门说：“为减少中美两国生命之牺牲，渠所念虑者，为如何使苏联立即加入作战，而

^①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2），第557、558页。

^②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2），第559~562页。

非枝节问题。”^① 尽管蒋介石把“租借”问题看做极为严重的主权问题，但在杜鲁门看来，与苏军参战以减少美军伤亡相比，不过是个枝节问题。杜鲁门当然不可能将旅顺问题放在美国利益之上。这一点表明，在即将开始的中苏谈判中，蒋介石将很难得到美国的有力支持，在雅尔塔协定的框架之内，蒋介石的还价余地将是十分有限的。

6月15日，赫尔利正式将中苏协议的纲要，以及杜鲁门对此的建议转交蒋介石。杜鲁门这一举动，也就是雅尔塔协定所规定的，由美方出面敦促中方接受苏联条件而采取的正式的敦促与表态。实际上杜鲁门这一来函的内容，赫尔利于6月11日已转告蒋介石。^②

杜鲁门函件首先开列斯大林的几项承诺：“彼（按：指斯大林）决尽其所能促进中国在蒋委员长领导下之统一”，“战事结束后中国应由蒋委员长继续领导”等等。尔后是斯大林的几项条件，即雅尔塔协定所规定的几项条件。最后，杜鲁门对上述条款表示支持。^③ 可以看出，斯大林十分了解蒋希望得到什么，帮助蒋“统一”，其潜词就是助蒋解决中共问题。斯大林向蒋抛出诱饵。

6月20日宋子文返回重庆。6月25日，王世杰与宋子文商定了中方的几条原则：“（一）旅顺口在中苏拟订同盟条约期内，可与苏联共同使用，其行政权仍归中国。（二）对于中东、南满两铁路及大连港之‘特殊利益’问题，应明白规定其范围，不用特殊利益名词。（三）外蒙问题暂不提出讨论。”^④

①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2），第564页。

② 《王世杰日记》1945年6月11日。

③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2），第567、568页。

④ 《王世杰日记》1945年6月25日。

6月26日，蒋介石再约彼得罗夫谈话，这是在宋子文赴苏之前，蒋介石为此次谈判定下的基调。话题首先由杜鲁门6月15日来函说起，蒋介石说：“本人认为中苏两国有关的事情，应由中苏双方直接商议，美国同意与否，没有关系。本人希望宋部长抵莫与史大林元帅谈话，能不拘外交形式，开诚商议中苏两国密切合作的根本问题，尤其是关于政治问题，希望能彻底商谈。”撇开美国的意见，意在表明此次谈判不以国际背景为基础，要求不拘外交形式地彻底商谈政治问题，至此，蒋的真实意图表露出来，这就是蒋为此次谈判确定的基调。

彼得罗夫询问中方对苏联的几项条件的意见，蒋再次表示：旅顺问题，“‘租借’一类名称切不可再用”。彼得罗夫又问：是否除旅顺不宜用租借名义之外，其他条件已无多大出入，蒋表示其他条件可在莫斯科谈。蒋说：“关于外蒙问题，苏联于一九二四年在条约中，曾经承认外蒙的领土与主权是应属于中国的。……本人解决外蒙问题的方针，是赋予外蒙的高度自治领，即其外交、军事均可独立，而宗主权则应属于中国。但此系将来的事情，现在对外蒙问题，最好不提”。^①

蒋的谈话向苏联方面发出了两个明确的信息：第一，外交方面，旅顺租借的名义不能使用，外蒙问题以后再谈；第二，政治问题是这次中苏谈判必须“彻底商谈”的问题。

在中国代表团的人员组成上有这样一个插曲。如前所述，在中苏谈判的预备阶段，问题的焦点集中于旅顺的租借问题，宋子文于6月6日致电蒋介石，报告罗斯福对苏联租借旅顺的要求曾表赞同，这样，宋子文感到“如此则情形更见复杂矣”。^②考虑

^①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2），第570、571页。

^②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2），第554页。

到中苏谈判将是一次极为复杂的外交交涉，为此，宋子文曾考虑，由那位中国最负盛名的外交家顾维钧，与他同行莫斯科。

但蒋介石另有安排。6月3日，蒋在与彼得罗夫谈话时，彼得罗夫问到宋子文的同行人员名单，蒋说：“尚未决定，不过本人以为到苏联，不比到其他国家，最好少带外交官，有壹、两个好翻译就行。”彼得罗夫说：“是的，对于这种有实际任务的访问，可不必多带外交官。”^① 双方竟然都主张不多带外交官，其中显然有一种虽未说破但双方都能意会的意思。

6月13日，宋子文致电蒋介石，报告美国总统顾问霍浦金斯与斯大林的谈话记录。关于中国代表团，斯大林对霍浦金斯说：“不赞成偕同顾维钧前往，惟必须自带译员，史氏认为顾维钧只系一职业外交家，其所代表委员长之权力远不若余（按：指宋子文自己），故其期望与余相晤。”^② 斯大林竟亲自出面反对顾维钧前往莫斯科，大约是因为苏联对东北的权益要求，就国际公理而论，破绽甚多，担心顾氏的争辩会使谈判久拖不决。结果是，宋子文以蒋介石的名义要求顾继续参加旧金山联合国会议，而不去莫斯科。而顾氏自己的判断是：“委员长可能认为我的反对意见将会给宋的谈判增添麻烦。”^③

一次外交名义下举行的谈判，而蒋介石与斯大林却都不愿职业外交官参与其间，这表明，双方的着眼点都不是外交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中国代表团的人员构成再次证明，中苏谈判既是外交谈判，更是外交谈判掩盖之下的政治谈判。

中苏谈判之所以带有浓厚的政治谈判性质，是由国共对峙的

①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2），第552页。

②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2），第567页。

③ 《顾维钧回忆录》第5册，第549页，中华书局，1987。

尖锐化决定的。毛泽东5月31日在中共七大一次会议上讲，陈布雷看到《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后说：“只有两个字，就是‘内战’”^①。国民党内这种紧张气氛，唐纵的几则日记有所反映。5月31日，唐纵在反省录中写道：“共产党的攻势甚锐，气势迫人，令人惶恐不安。”“在今年反攻的时期，可能发生国共两党正式战争。”“共产党准备召集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以与国民代表大会相抗衡。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欲以此号召不满现状之各党派共同夺取国民党之政权，联合政府即为瓦解国民政府之手段。”^②

然而在这个政治危机面前，国民党看不到能从美国人那里获取有效的支持。唐纵在6月9日的反省录中写道：“在国共两党本身情势之发展，非战争无法解决。但美国除对日本作战外，另无继续作战之兴趣。美国在对日作战获得胜利之后，希望为战争所付之代价，能从中国市场上获得补偿，赫尔利、魏德迈即为执行此一政策之人”。^③

在既不能接受联合政府，又不能指望美国的帮助这种情况下，唐纵看到：“苏联与中国之邦交在形态上坚持国内团结与政治进步，即对中共让步改组联合政府，但在实质上要求收回中东铁路与取得旅顺大连之港口，外蒙独立，新疆分割。”^④也就是说，苏联一方面支持联合政府，但实质上则是希望在华获取实际利益，苏联方面有机可乘。

蒋介石在工作方法上有这样一个习惯，每临大事，即不批公文，以便从日常事务中摆脱出来，集中思考问题。唐纵在6月8

①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91页。

② 唐纵1945年5月31日反省录。《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515页。

③ 唐纵1945年6月9日反省录。《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518、519页。

④ 唐纵1945年5月31日反省录。《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515页。

日日记中记载：“委座又不看公事，想在研究问题和重要人事，共产党的问题，对苏外交问题，东北问题，新疆问题”^①。唐纵这个观察是准确的，此刻，蒋介石即将展开其政治生涯中一次极为特殊的政治赌博。

6月20日，宋子文返回重庆。当日，王世杰记载：“宋子文自华盛顿飞抵重庆，予与谈中苏问题。彼以为苏联将不惜放弃中共，与我订约。予意苏联订约之意不必为放弃中共，此正予之所虑。”^② 宋、王的看法有所不同，事后看王世杰的看法是对的。但是，不论他们的看法如何不同，有一点则是相同的，即中苏谈判的目标，直指中共。

当宋子文启程赴苏之际，也是黄炎培等六位参政员即将赴延安斡旋之时。6月29日，唐纵与陈布雷有这样一段对话：“陈主任对于时局甚为忧虑。最近有七位参政员赴延安，事先向主席请示，主席表示非常宽大，愿与共党及各党派、无党无派人士商谈……陈主任为这等事晚上失眠。”然而唐纵已经没有了一个月前“惶恐不安”的状态，而是底气十足地对陈布雷说：“大局是好转的，宋子文往莫斯科，我看会有结果的。中苏邦交的改善，对于共产党是一个解决的途径，陈主任不敢相信。”^③

总之，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宋子文踏上莫斯科之旅。

三 中苏谈判第一阶段

1945年6月27日，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一行，由重庆启程赴苏。代表团原定代表为二人，即宋与蒋经国，宋提出加入

① 唐纵1945年6月8日反省录。《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518页。

② 《王世杰日记》1945年6月20日。

③ 唐纵日记，1945年6月29日。《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521页。

钱昌照，理由是此事为钱所促成，蒋介石又加派沈鸿烈。钱昌照说：“正式代表就我们四个人”^①。随行人员有外交部次长胡世泽^②，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卜道明^③，还有刘泽荣等。正如蒋所要求的那样，四位正式代表中，除宋子文可算外交官外，便没有一位职业外交官。本来，“蒋先生欲令鲛生偕宋赴莫斯科”，周鲛生为著名国际法专家，但与职业外交官一样，周鲛生最后并未参加代表团。

将职业外交官和国际法专家排斥于外，仅带几名翻译，代表团的这种构成，体现了蒋介石与斯大林早先的安排。据胡世泽后来告诉顾维钧，谈判期间“大多数问题都是由宋子文和钱昌照进行研究的。”^④

行前，中国方面拟有一个“对苏交涉方针”，共9项：

(1) 为苏联对日参战后军事上之便利起见，旅顺军港中国允许苏联共同使用，但主权与行政必须归于中国……军港范围只以旧军港为限，不得有附属地，即旧日所谓辽东半岛连金州、复州等地在内，此决不可能。

(2) 大连商港，中国愿辟为自由港……但行政自须由中国独立自主。

(3) 中东铁路以及南满铁路中国允许与苏联组织公司经营。但此两铁路全部之主权及土地皆属于中国。

(4) 1924年以前，中国与帝俄所订关于东三省一切条约，应照苏联宣言一律废除，并照1924年北京条约之精神重新订立新约。

① 《钱昌照回忆录》，第96页。

② 胡世泽之父胡惟德曾任前清驻俄公使，胡世泽幼年在俄上学，故俄语极佳，此次担任代表团翻译。

③ 卜道明即卜士奇，中共叛徒，通俄语。

④ 《顾维钧回忆录》第5册，第568页。

(5) 外蒙地方中国愿准其为自治领，在中国宗主权之下，成立自治政府。

(6) 关于新疆西北部叛变迭起，苏联不得卖与其武器及弹药，伊宁、伊犁叛乱地区必须由中国收复。

(7) 中国为求国家统一，对于全国之军令、政令必须彻底统一，不许具有武力之政党——共产党之存在。苏联对于今日犹在武力割据妨碍中国统一之中国共产党，不做任何国际舆论上、政治上或物质上支持，并愿设法劝告中共将武力交还政府，统一指挥，以利对日作战。

(8) 中国政府决定实现民主宪政……因之中共一经交还武力，其军令、政令归政府统一时，则政府必予中共以一般政党同等之待遇。

(9) 交涉之精神与态度：甲．中苏彼此认为当从友好方面做起。乙．此后两国在国际场合中皆密切合作，政治上的发言，当彼此尊重。丙．此后两国经济可为更密切之互助。丁．苏军在东三省应于日本投降条约签订之日起，三个月至半年期内撤退完毕。戊．苏对日参战时，中苏两国组织联合参谋团，由中国派遣参谋团驻于苏军司令部。己．中国政府不能改组为联合政府，但中共如将军令、政令归中央统一时，则政府将来可委派中共党员为部长、会长或委员之职。^①

9项方针中，总体上看，1、2、3、5为苏方条件，以及中方对该条件的若干限制；6、7、8三项为中方条件，这样，前后部分实际上构成交换条件。第9项一般看是一些技术性问题，引人注目的是其中提出了对联合政府的明确否定。将联合政府问题列

^① 秦孝仪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第734～737页，1978。转引自西村成雄《雅尔塔“密约”对国民政府的冲击与接收东北》，《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3期，第106、107页。

入对苏交涉的最后一条最后一款，表明这个问题是此次谈判的归结点。

宋子文一行于6月30日飞抵莫斯科，这是国民党执政以来，第一次派出政府首脑访苏。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等高级官员，以及驻苏外交使团使节到机场迎接。当日，宋子文报告蒋：“苏联欢迎礼节极为隆重，与欢迎邱吉尔首相相等”^①。获得如此礼遇，看来宋子文心情不错。当日傍晚，宋子文偕驻苏大使傅秉常，对斯大林做了礼节性拜访，约15分钟。

7月2日，宋子文与斯大林举行第二次会谈，也是第一次正式会谈。中方出席人员有傅秉常、蒋经国、胡世泽。苏方有莫洛托夫、彼得罗夫等。

会谈一开始便决定逐条讨论雅尔塔协定苏方条件，首先即外蒙问题。宋子文说：“关于外蒙，蒋委员长已告彼大使，非目前可以解决之问题……现在可予搁置，吾人不拟提出此问题。”斯大林表示：“吾人对此点不能同意”。随后斯大林阐述了苏方观点，他说：“外蒙在地理上之地位，可使他人利用之，以推翻苏联在远东之地位……如吾人在外蒙无自卫之法律权，苏联将失去整个远东。”“日本即使投降，亦将再起，因此之故，苏联在外蒙领土应有自卫之法律权”。这段话的意思是，为保障苏联远东地区安全，苏联需要在外蒙驻军，如果外蒙不独立，苏联在外蒙驻军便无法律依据。尔后斯大林说：“外蒙人民不愿加入中国，亦不愿加入苏联，彼等要独立，为中国计，割去外蒙，实较有利。如此问题不能实现，外蒙古将成为所有蒙古人团结号召之点……外蒙将统一所有自内蒙至北蒙之蒙古人民”。这是说，如不同意外蒙独立，中国将失去内蒙，显然这是威胁。宋子文表

^①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2），第572页。

示：“吾人无法向人民宣布吾人将放弃任何一部分领土”。随后，宋子文将话题转入其他议题。

如前所述，在此次谈判的准备阶段，中方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是旅顺的租借问题。宋子文说：“关于租借旅顺口一点，蒋委员长已经面告贵国大使，吾人愿将该港由中苏两国共同使用，吾人不愿再有租借地，其理由至为明显”。不料斯大林爽快地表示：“为迁就蒋委员长之愿望起见，吾人对此可能觅得一共同之语词，余不愿开一于中国有害之先例。”斯大林为何做出此项让步？当然不会是无条件的。

接下来话题再次转入外蒙问题。宋子文再次表示：“关于外蒙问题，愿再向史太林统帅陈述，此问题实为中国所不能解决问题。”斯大林说：“蒙古人民不愿与中国共处，吾人基于同样理由，曾放弃芬兰与波兰。余深知中国之困难，但此种困难必须克服，吾人无法觅得其他途径。旅顺问题吾人业已让步，阁下对此问题，亦应让步。”原来斯大林在旅顺的让步，是要换取中方在外蒙问题上的让步。最后，宋子文表示，该问题超出了他所奉训令的范围，须请示蒋，提议外蒙问题暂停讨论。

见外蒙问题受阻，旅顺问题尚不足以换取中方在外蒙问题上的让步，斯大林再抛诱饵，主动将话题转入中国内政问题。斯大林问：“中国是否将容纳若干自由分子参加政府？”仅此一句，足以引起对方的无限兴趣。宋答：“吾人曾试与中共妥协，三月间吾人拟成立一战时内阁，即为容纳共党参加，余自赫雷大使方面获知，阁下对共产党认为实似农政改革主义者。”赫雷即赫尔利，赫尔利访苏时，斯大林曾对其表示过对中共的上述看法，此时，宋子文似乎想要得到证实。对宋子文的提问，斯大林说：“彼等诚为爱国者，但是否系属共产党，则颇有疑问。”在得到斯大林这个对中共至少是贬义的评价之后，宋子文信心大增，话题朝实质迈进。宋说：“吾人希望有一个统一之军队及一个中央

政府，吾人不愿有如张作霖军阀，或另组割据政府与军队之政党。但如中共（此惟一有军队政府之政党）愿与吾人合作，吾人仍愿请其参加战时内阁，亦即参加政府，吾人实无意压迫彼等。”斯大林肯定地说：“中国只能有一个政府，由国民党领导……如非国民党人士亦能参加政府，而仍由国民党分子领导，实甚有益。但此为自身问题，余不过顺便提及”。宋子文见谈话投机，便直接挑破实质，宋说：“国民党希望在政府中居于领导之地位，故不愿有联合政府，盖如为联合政府，一旦他党退出，则易于倾倒。”斯大林再次肯定道：“此实为国民党正当之愿望，自中国历史上观察，实至属明显。”^①

如何打消中共提出的联合政府要求，是约10个月来蒋介石最感棘手的问题，不料在中苏谈判的第一天，就与斯大林取得明确的一致。这就是说，联合政府口号在中苏谈判的头一天，便被斯大林与宋子文共同否定了。

有关中共的话题不长，斯大林说“不过顺便提及”，点到即止。斯大林完全懂得，这个漫不经心“顺便提及”的话题，足以吊起蒋介石的胃口，尔后再回过头来解决外蒙问题。斯大林撒开了网。

第二次会谈就具体条款而论，没有一项最终锁定，这是符合通常的谈判规律的。这次谈判中，苏联的主要意图已经表明，即外蒙的独立问题。为此，斯大林抛出两个诱饵：第一，旅顺不用租借名义；第二，不支持中共的联合政府。斯大林既已开出交易要价，现在，就看蒋介石的了。当日，宋致电蒋：“本日谈话时，对东三省比较满意，外蒙问题则成僵局”，“有何较好解决方法？乞钧夺，迅赐电示。”同时报告了在联合政府问题上，斯

^① 1945年7月2日宋子文与斯大林谈话记录。《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2），第577~590页。史大林即斯大林，下同。

大林对宋子文论点的理解。^①

由于外蒙独立一事将承担巨大的历史责任，7月4日，宋子文再电蒋：“万一史坚持外蒙必须由我国承认其独立，则只可中止交涉。钧意如何？”^②在这里，宋子文为中苏谈判中止与否，设定了一个最后界线，即外蒙独立与否。宋子文所提界线，是一个以历史责任为准则的界线。

外蒙问题的提出，把一个新的难题摆在蒋介石面前。7月6日，蒋介石就外蒙独立一事征询王世杰意见，王认为：“东三省等问题如确能得到不损领土主权之解决，则承认外蒙人民于战后投票自决亦尚合算，因外蒙实际上已脱离中国二十余年。尔后，蒋先生约孙哲生、邹鲁、戴季陶、于右任、吴稚晖、陈辞修诸先生商议，最后决定主张外蒙独立事可让步。”^③看来，王世杰此刻的着眼点是在东北，以东北主权作为外蒙独立条件。总之，外蒙独立一事既经国民党元老通过，剩下的就是交换条件了。

7月6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就外蒙独立问题提出以国内统一为条件，而国内统一包括三项：第一，“东三省之领土、主权及行政必须完整”，具体条件为：旅顺港之管理权属于中国，“与苏联共同使用而非共同管理”。大连为自由港，管理权属中国。中东路干线与苏联共同经营。第二，“新疆之伊犁以及全疆各地被陷区域完全恢复”。第三，“中共对军令、政令必须完全归中央统一……政府改组时，当可容纳其在行政院之内，但决不能称为联合政府。”表示在满足上述三个条件之后，外蒙可于战后由公民投票决定独立与否，如果表决结果为独立，中国政府将

①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2），第576、577页。

②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2），第593页。

③ 《王世杰日记》1945年7月6日。

正式批准其独立。最后，蒋强调：“如果中国无切实统一之保障，则牺牲无益，不惜停止交涉”。^①在这里，蒋介石为谈判中止与否重新划定了界线。

7月7日，蒋再电宋子文，更加明确指示道：“务望注意我之要求之主目的：一、为东三省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二、苏联今后不再支持中共与新疆匪乱，此乃为我方要求之交换条件也。惟苏联对支持中共及新疆匪乱，在普通外交谈判中决不肯自承者，我与之谈判，彼必躲闪谈之……故对苏不支持中共与新疆匪乱，必须剖切明白，毫无隐饰与之谈判，而得有具体之结果，否则应作断然中止谈判之准备也。”^②在这里，蒋介石明确提出了“交换条件”。此前，不论中苏谈判是在怎样的名义下酝酿的，自此，这一谈判性质已经“毫无隐饰”地表现出来，这是一次赤裸裸的利益的“交换”。与宋子文不同，蒋也提出了一个谈判中止与否的界线，此即以交换条件成立与否为界线，这是一个以现实利益为准则的界线，蒋对于历史责任的考虑，似乎不像宋子文那样胆怯。

第二次会谈结束之后，宋子文除与蒋紧张磋商外，亦试图取得美国对外蒙问题的协助。7月3日，宋约见了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通报了与斯大林的会谈情况。由于外蒙问题的关键在于雅尔塔协定“维持现状”的规定，宋子文希望美方就“维持现状”一语做出解释，希望通过有利的解释而阻止外蒙独立。哈里曼将这一情况迅速报告了美国政府。7月4日，新任国务卿贝尔纳斯复电哈里曼：“总统和我认为，在目前中苏双边会谈中，美国政府如试图充当雅尔塔协定任何有关条款的解释者，那将是不明智的。”该电表示哈里曼可以个人身份，非正式地向宋子文转告美

^①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2），第594页。

^②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2），第596页。

方对此问题的理解，即：“‘现状’是指：从‘法律’上而言，外蒙古的宗主权应属于中国，但‘事实’上不能实行这一宗主权。”这个解释与中方立场是较为接近的，但宋子文并未因此而得美方支持，该电同时指示哈里曼：“您的非正式的解释仅供他（按：指宋子文）本人得知，不得在同苏联官方的会谈中引用。”^①美方的用意，显然是避免卷入。宋子文得到一个较为满意的但却不起作用的解释。

7月7日晚，宋子文与斯大林举行第三次会谈。尽管蒋介石已向宋子文开出外蒙问题的交换条件，但宋子文仍对此做了最后一次努力。

宋子文首先表示，原拟不谈外蒙问题，现在中方表示接受雅尔塔协定，维持外蒙现状。接下来宋子文对“现状”一词这样解释，即“不牵动现状”，外蒙在军事、外交上有自决权，可与苏联商谈苏军进驻外蒙事宜，“但不能承认外蒙独立”。宋子文的意图是，将外蒙问题的争论引入雅尔塔协定有关条款的解释上来，通过对“现状”一词的解释，阻止外蒙独立。

斯大林表示，外蒙宪法已规定独立，“现状即为正式承认独立”。鉴于双方对“现状”解释不同，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打出一张牌，指出该条款为苏方在雅尔塔会议提出，意思是“维持现状”此一条款既然为苏方提出，那么，解释权便属于苏方。斯大林认为：“外蒙如不独立，苏联进兵外蒙，即系进兵中国领土，易为将来冲突之源。”^②因而外蒙必须独立。

此次会谈如果有什么结果的话，那就是宋子文实际上被剥夺

① 吴景平译《关于宋子文斯大林莫斯科会谈》，《民国档案》1991年第4期，第67、68页。

②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2），第598~603页。

了解释权；没有了解释权，在外蒙问题上中方也就无牌可出了。

在此次会谈中，尽管争论还在进行，而莫洛托夫则将苏方拟定的四项条约草案交与中方，其中包括一份中苏承认外蒙独立的宣言，摆出强硬的不容争辩的姿态。

7月8日，蒋经国以私人身份与彼得罗夫谈话。蒋经国说：“应当理解蒋介石对目前不可能承认外蒙古独立的看法，因为这种承认将大大削弱中国政府的地位，并激起中国社会舆论十分强烈的反响。”彼得罗夫说：“苏联关于承认外蒙古独立的建议，是惟一明智的建议，因为此项建议是以承认现状为基础的。”蒋经国说：“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将违背孙中山关于中国领土完整之原则。”彼得罗夫说：“恰恰相反，此举已考虑到蒙古人民自由表达的意志，完全符合孙中山关于民族问题学说之精神。”最后，彼得罗夫强调：“若中国代表团不同意此项建议，谈判未必能摆脱困境。”^①这样，外蒙问题已没有多少回旋余地了。

苏方提出由中苏两国发表宣言承认外蒙独立，此举显然有损中方国格，因此王世杰对此做了技术性修正。7月9日，王世杰日记载：“今午予代蒋先生拟一电致子文，谓外蒙战后独立问题，其宣告应由中国单独宣告（并须先划定外蒙疆界），但中国宣告后，苏联应照会中国，永远尊重外蒙独立。”^②这是在原则上同意外蒙独立后，就技术性问题略做修订，以保全体面。

7月9日，宋子文与斯大林举行第四次会谈，这是全部中苏谈判中最为关键的一次会谈。由于外蒙问题已经没有周旋余地，

① 陈春华译《苏联档案中有关 中苏同盟条约 谈判的文件选译》，《近代史资料》总102号，第45~4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② 《王世杰日记》1945年7月9日。

宋子文不再就此问题继续争辩，而是将蒋介石开列的外蒙独立交换条件，和盘托出，开价交易。

宋子文首先宣读蒋介石的来电，提出对苏联的三个条件：第一，“满洲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第二，“在最近一年间新疆发生叛乱……吾人切盼苏联能依照以前约定，协同消灭此种叛乱”；第三，“中国共产党有其单独之军事及行政组织，因之军令、政令未能全归中央统一，深盼苏联只对中央政府予以所有精神上与物质上之援助，苏联政府对中国之一切援助应以中央政府为限”。最后表示：中国“愿于击败日本及上述三项由苏联政府接受之后，准许外蒙之独立。”

对于上述开价，斯大林一一作答。他首先说：“关于中国之共产党，吾人并不予以支持，亦并无支持彼等之意向。吾人认为中国只有一个政府，如在中国国内有另一政府，自称为政府，此当应由中国自身解决之问题。关于援助一点，蒋委员长谓应给予中央政府，吾人以往即已如此”。尔后再次讨论中共问题时，宋子文提出了一个最为核心的问题，宋说：“吾人希望共党之军队应并入政府之军队”。斯大林爽快地表示：“此实为合法之要求，中国必须只有一个政府与一个军队。”

关于新疆问题，宋子文说：“伊犁已为叛军所占领”，“吾人希望恢复叛军所占领之土地”。斯大林说：“此为合法之愿望，最好之方法为予以权利，吾人有各种不同之民族，尚不承认其最低限度之权利，纠纷将永无底止，但此为中国本身之问题。”宋子文说：“吾人愿做若干让步，但如不继之以服从，吾人必须引用武力。”斯大林答：“此为当然之事”。

东北问题由于涉及的具体事项较多，此次谈判在具体问题上尚未取得一致。关于旅顺军港，斯大林坚持由苏联人管理，关于旅顺、大连、铁路的条约期限，蒋介石要求为20年，斯大林要求30年，等等，这些留待继续商讨。

外蒙独立问题，斯大林同意中方的程序安排。关于外蒙的疆界划分，蒋介石要求按中国旧地图为准，主要是阿尔泰山脉原属新疆，蒋要求该地区仍属新疆。由于宋子文此行原不拟谈外蒙问题，因而未带地图，该问题留待续商。^①

当晚，宋子文致电蒋：“查本晚与史会晤，史对谈话中共问题，表示甚为切实友好。东三省问题，亦较苏方原提条件，让步甚多。至旅顺军港，由苏人管理，及期限三十年，史似不肯再让。……目前大问题业已大致解决，其他如铁路及大连自由港之管理等项，不得已时，似宜酌量迁就，钧意如何？”^②看来，在中共等几个问题得到苏方“切实”承诺之后，宋子文已倾向签约。此次谈判之后，剩下的基本上是些技术性问题了。

7月10日，宋子文与莫洛托夫会谈，主要是苏军撤离东北的时限是否列入条约。宋子文要求将战争结束三个月内苏军撤离东北列入条约，莫洛托夫表示苏军不会驻扎东北，但反对将此列入条约，理由是“这里有不信任成分”。宋说：“问题并非中国方面不信任，而因东三省历来是外国军队角逐之地，在目前形势下，撤离苏军问题讲得清清楚楚，对中国社会舆论至关重要。”^③争论未取得结果。

7月11日，蒋致电宋子文，就下次会谈要点指示道：关于旅顺港军用部分，“委托苏联管理，但行政权则属于中国”。蒋以“委托”苏联管理的名义，取代“租借”，形式上略有不同。在大连和中东路问题上也提出了具体要求。另外，“关于中共问

① 以上均见1945年7月9日宋子文与斯大林谈判记录。《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2），第611~620页。

②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2），第610页。

③ 陈春华译《苏联档案中有关 中苏同盟条约 谈判的文件选译》，《近代史资料》总102号，第47~60页。

题，苏方所为之承诺，应商请其列入谈话记录，或其他书面中，并宜明白声明不仅不能供给武器，即在宣传、经济与交通各方面，苏方亦不得与中共以支援。”^① 蒋对中共问题不仅抓住不放，而且抓得实。

7月11日与12日，宋子文与斯大林连续举行第五次与第六次会谈，这两次会谈主要是就各项条约文本进行具体讨论。取得的主要结果有：“东北、新疆、中共三点，俟一切问题双方商妥后，史允以书面表示。”^② 旅顺军港管理权问题，宋子文转告了蒋介石来电意见，“中国可‘委托’苏联办理，以避免‘租借’字样，至民事行政应归中国”^③。尚未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中东铁路管理权问题，大连行政管理权问题，旅顺军港的区域范围问题。

此时斯大林即将启程前往德国参加波茨坦三巨头会议，斯大林要求在他启程前签署条约，而宋子文坚持必须回国就几个问题当面请示蒋，提议斯大林由德国返莫斯科后，双方继续商谈，斯大林表示同意。斯大林特别要求宋不能泄漏任何消息，宋表示：“余仅当报告蒋委员长一人。”

宋子文决定胡世泽留莫斯科，宋与蒋经国、彼得罗夫等于7月15日返抵重庆，结束了中苏谈判第一阶段。

四 中苏谈判第二阶段

在宋子文返国期间，蒋介石就谈判中的遗留问题，主要是两

^①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2），第621页。

^② 此为第五次谈话。《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2），第622页。

^③ 此为第六次谈话。《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2），第632页。

路（中东铁路、南满铁路）两港（旅顺、大连）问题，继续与彼得罗夫商谈。

7月17日，蒋约见彼得罗夫，蒋首先说：外蒙“保持现状就是以目前情状中国有宗主权之谓，而绝非独立之意。若外蒙独立，则于我国牺牲甚大”。接下来蒋表示为增进中苏友谊，他可以克服一切反对意见，“不过这样的决定，将使中国政府陷于困难的地位，所以同时必须苏联协助我东三省领土、主权与行政的完整，及解决国内共产党问题，使国家真正统一，和新疆变乱的解决。必须这三点做到，我才可排除一切，解决外蒙问题。”蒋之所言，就是重申外蒙独立的交换条件。

在三项条件中，蒋认为中共与新疆问题斯大林已有切实表示，剩下的就是东北问题。蒋要求中东、南满两铁路董事长由中方担任，苏方任中东路局长，而中方任南满路局长。

外蒙疆界划分问题，蒋表示：“应根据前清以来，民国初年所划定区域之地图为标准。因为这张地图是最公平的，后来的许多地图，都有变动，都不正确。”^①

彼得罗夫表示将把蒋的上述意见报告斯大林。

中苏谈判，苏联是背着中共进行的，中共对会谈内容全然不知，对苏联政治立场转变与否，亦全然未做防备。早在中共关于联合政府的要求提出后不久，苏联就表示支持，1945年2月11日，周恩来由重庆致电毛泽东：苏联倾向于扶持民主运动和组织联合政权。^②同年6月16日，中共中央在一份内部指示中又说：“苏联对华赞成《论联合政府》，主张声援民主运动”^③。

①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2），第636~639页。

② 《周恩来年谱》，第601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91页。

苏联对联合政府的支持，无疑是对中共的鼓舞，就当时中共的思维逻辑而论，很难有理由怀疑苏联立场的转变。因此，当蒋介石对苏联承诺不支持中共感到满意之际，毛泽东处在了被蒋介石和斯大林共同蒙蔽的地位。7月22日，毛泽东致电南下途中的王震等人道：“三巨头在柏林开会将决定欧亚两大问题。宋子文赴苏会谈十余天，尚未解决问题。三巨头会后，宋仍将赴苏，可能决定中苏共同作战。”^①事实上，宋子文赴苏已基本解决问题，中苏谈判也并非讨论共同对日作战事项，毛泽东对谈判内容判断完全失准，完全没有料到以中共做交易是此次谈判的主要内容之一。

如前所述，美国避免卷入中苏谈判，但对谈判的认识则是清楚的。7月26日，波茨坦公告发表，日本的覆灭愈加临近。7月28日，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在给国务卿的备忘录中称：“尽管目前我们已无须对苏联加入对日作战的问题示以关注，但是，苏联与中国重新建立起友好关系，尤其是达成苏联政府将支持中国国民政府统一中国的协定，看来仍有重大意义。”^②这表明，美国对于中苏谈判的着眼点，是国民党的统一问题，因为这也是美国利益所在。

中国的国际背景主要由美苏两国构成。蒋介石是在对苏联的国际环境做出基本判断的基础上，安排中苏谈判的方针的。同样，蒋也是在对美苏的远东利益做出基本判断的基础上，设立中国在其间的地位与利益的。7月28日，蒋做如下判断与设想：“对国际情势，俄国已视美国为其假想敌，故其不能不以我国为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809页，军事科学出版社等，1993。

^② 吴景平译《关于宋子文斯大林莫斯科会谈》，《民国档案》1991年第4期，第69页。

其外交政策重大之目标”。蒋接着判断：“我国实力虽未充足，但在东亚与太平洋上国际之地位，对苏俄与英、美实已居于举足轻重之势，故彼不能不厚交于我也。”彼指苏联，判断苏联必然“厚交于我”。在此认识上，蒋对其内外方针做如下设定：“彼欲要求我旅顺与外蒙以巩固其军略要点，而我则暂时放弃此二地以保全新疆与东北资源之重要。我欲于最短时间求国内之统一，如不能在此时放弃此二地，则决无时间允我统一。”统一指中共问题，这是放弃外蒙与旅顺二地的归结点。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蒋做出如下设定：“今后国际外交政策之方针为北疆与俄合作，内地与美合作，对俄重政治（中共关系），对美重经济（工业技术）。”^①

蒋关于中国在美、苏之间地位“举足轻重”，以及苏联必将“厚交于我”等等论点，显然是唐纵、邵毓麟论点的翻版；放弃若干主权以争取苏联助其统一，也是唐、邵二人对苏施以“实惠”论点的翻版。总之，在美、苏之间，蒋为自己制定一个左右逢源的如意算盘。

与蒋在打他的大算盘的同时，宋子文则在打他的小算盘。宋子文所以不在莫斯科签约而坚持回国磋商，原因是他打了一个小算盘。外蒙独立问题将承担极大的历史责任，宋的小算盘是回国辞去外交部长职务，由他人继任而完成签约，从而避免承担此一历史责任。

王世杰日记7月24日载：“今日午后宋子文院长向予言，彼欲解除其外交部部长兼职，盼予能改任或兼任之，并谓彼于月底

^① 秦孝仪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第771～774页。转引自西村成雄《雅尔塔“密约”对国民政府的冲击与接收东北》，《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3期，第112页。

或下月初赴莫斯科时，盼予以外交部长资格偕往，结束中苏谈判。予谓予殊不愿任外交部长，最后彼一再敦促，予谓俟考虑一二日再答复”^①。

7月25日，王世杰见蒋：“蒋先生亦促予兼任外交部长，蒋先生说，子文因中苏谈判涉及承认外蒙战后独立之事，颇畏负责，其所以先行返渝，亦正为此。由此可见子文之意在觅人与之共同负担此次对苏谈判结论之责任。”这段谈话，可以说把宋子文中断谈判、执意回国“磋商”的原因说清楚了。外蒙独立问题，确为当事者极感责任难当的问题。为鼓励王世杰接任，“蒋先生并说：外蒙早非我有，故此事不值顾虑。”王对外蒙责任的想法主要是能否确保东北，但是否就任外长一职，王的态度是“仍未应允，但允再考量。予细思此事殊令我十分为难，因为我如拒绝，便为畏惧负责之表示，值此中苏情势紧张，关系极大之时，本身之毁誉不宜在予考虑中也。”^②

此时，国际局势正在迅速变化。7月26日，中、美、英三国波茨坦公告发表。王世杰在日记中记载，公告发表之前，杜鲁门、丘吉尔将文告内容致电蒋，“要求蒋先生于二十四小时内电复是否赞同，如二十八小时内未接到复电，则以时机紧急，将由英、美二国发表。予请蒋先生一面表示赞同通告之内容，一面表示此类通告断非英、美两国所宜单独发布，以其涉及开罗会议之三国决定也。并要求以后关于对日问题之措置，必须给中国以充分时间考虑。”^③ 尽管波茨坦公告是以中美英三国名义发表的，但中国在其中的地位已无足轻重。因苏联尚未对日宣战，因此公告未列苏联之名。波茨坦公告发表之后，苏军对日参战在即，中

① 《王世杰日记》1945年7月24日。

② 《王世杰日记》1945年7月25日。

③ 《王世杰日记》1945年7月26日。

苏谈判不能再拖延了。

当国际局势骤变之际，宋子文则情绪低落，要求不再赴莫斯科。7月29日，赫尔利致电美国国务卿：“宋从莫斯科回来后曾对我说，他怀疑自己重赴莫斯科是否妥当。”“今日上午在我们同宋和蒋介石的会晤中，当着我们面提议任命王博士为外交部长，并派王赴莫斯科同斯大林完成谈判。我对此表示反对，称宋作为行政院长，是除蒋介石之外同斯大林会谈的惟一合适人选，如果宋拒绝去而派一位新外长前往，将对会谈带来有害的甚至可能是破坏性的后果。最后达成一致意见，即宋重赴莫斯科，但王博士出任外交部长并陪他前往。”至于宋子文所以不愿再赴莫斯科的原因，宋返国时即对赫尔利说过：“对中苏协定负责的人，在政治上将受到此协定之害。”^① 宋子文不愿再赴莫斯科，是为彻底摆脱此一责任。

王世杰于7月29日被内定为外长，有趣的是，当宋子文表示不愿再赴莫斯科之际，刚刚被内定为外长的王世杰也表示不愿前往莫斯科。当日，王世杰记载：“晚间予复与宋子文商谈外交部部长事。予询以我可否暂不任外交部部长，俟彼往莫斯科及伦敦（出席五国外长会议）后再行考虑外交部部长人选调整。彼谓倘如此办，须由予向蒋先生提议，且无论如何，彼谓予须偕往莫斯科。”^② 王要求莫斯科会谈之后再考虑外长人选，也是为避免担负签字的责任。

7月30日，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行政院改组决定，王世杰出任外交部长。这个决定等于表明，王世杰签字已成定局。在这种情况下，王世杰采取了一项分解责任的措施。7月31日，王

^① 吴景平译《关于宋子文斯大林莫斯科会谈》，《民国档案》1991年第4期，第69、70页。

^② 《王世杰日记》1945年7月29日。

记载：“晚间予向蒋先生陈述谓，中苏拟订协定时，不可有任何秘密协定，外蒙问题亦应于批准前，向立法院及参政会驻会委员会报告，否则于国家及负折冲之责者均不利。蒋先生以为然。”^①这就是说，宋子文将责任推给王世杰，而王则提议条约由立法院和参政会批准，意在由立法院和参政会分担责任。这表明，王世杰上任之始，首先是将“负折冲之责者”的退路安排好。

尽管王世杰已经安排了退路，但仍然心有余悸。8月1日，宋子文与王世杰两人有过一次有趣的谈话，王世杰记载：“今晨予与子文谈赴莫斯科事。彼谓将来中苏约文应由予签字，予谓可否由彼我共同签字，彼谓不可。但云如苏方由史坦林签字，则彼可签字。实际上苏方自将由其外长莫洛托夫签字。”^②王提议两人签字，意思是要宋分担责任。宋子文是政府首脑，按照外交对等原则，只能斯大林签字，中方才能安排宋子文签字，如果苏方仅由莫洛托夫签字，中方签字人只能是王世杰。

综上所述，由于此事肯定将留下历史的骂名，因此，由谁签字，怎样分担责任，成为两位当事者极为不安的问题。

王世杰接任外长后，除对责任分担做出安排外，也对下一阶段的谈判有所考虑。由于斯大林在上一阶段会谈中表示外蒙疆界暂不划定，王认为此议不妥。8月2日，王记载：“今晨向蒋先生提出意见，谓外蒙独立之承认，宋先此已应允史坦林，彼（按：指斯大林）意此时不提疆界问题。余意疆界划定必须在承认之前，否则将为未来留无尽之纠纷，蒋先生以为然。”^③具体讲，外蒙疆界问题，主要是阿尔泰地区属于新疆还是外蒙，疆界问题成为中苏谈判第二阶段主要争执点之一。

① 《王世杰日记》1945年7月31日。

② 《王世杰日记》1945年8月1日。史坦林即斯大林，下同。

③ 《王世杰日记》1945年8月2日。

8月5日，宋子文、王世杰、熊式辉、蒋经国、彼得罗夫等，启程经德黑兰再往莫斯科。当日，王世杰写下一篇心情颇不轻松的日记：“予一路反复思此行之使命，肩上真如背负有万斤之重担，予一生来从未有感觉责任之重有如此者。此行结果无论如何，在国人舆论及历史家评断，总不免有若干非议，但自思‘统一与和平’，为中国目前必须本着与八年抗战同等之勇气以求取，否则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后，我如事前未与取得有所协定，则（一）苏联军进东三省后，领土主权以及经济利益必更难收回；（二）中共与苏联或竟发生正式关系。凡此均使我无统一，亦且对内对外均无和平之可能。”^①

由王世杰这位国共谈判的代表，出任外交部长而完成签约，这个安排说明，蒋深知王世杰能够领会此项签约的内在含义。王世杰的这篇日记表明，他的确理解了 this 含义。至于“背负有万斤之重担”那些话，是为表示自己的清白，而留给“历史家评断”时看的。

8月7日，宋、王一行抵达莫斯科。当晚，宋、王即与斯大林会谈。据载：“谈话前几未做任何寒暄或酬应语，一切谈话几乎完全由宋、史对谈”；“宋、史争论有时颇露骨”。^② 斯大林要求由苏方担任大连港管理局长，宋、王坚拒，又成僵局。外蒙疆界问题，中方出示了中国旧地图和苏联1926年的旧地图，斯大林表示细看后再答复。此刻，一项重大事件即将发生，宋、王已没有时间从容谈下去了。

8月8日晚七点半，王世杰、傅秉常应邀来到莫洛托夫办公室，莫洛托夫宣读了苏联对日宣战书，“莫氏读毕，即热烈与予

^① 《王世杰日记》1945年8月5日。

^② 《王世杰日记》1945年8月7日。

握手，并催予将中苏协约各稿早日完全拟就提出。”^① 8月9日，苏军攻入东北。自此，宋、王在莫斯科的处境，真的是如坐针毡，度日如年了。

8月9日，王记载：“予与子文细商，觉苏联对日军事已发动，情势趋紧，应电蒋先生准许予等于必要时得为权宜之拒纳。”^② 当日，宋、王致电蒋：“苏方对于大连行政，似将坚持苏方必须参加管理，关于此问题，职等拟于必要时为权宜之拒纳，因苏已对日宣战，形势趋紧，不容过事牵延也。”^③

8月10日，又一预料外的消息传来，王世杰日记载：“午后四时许，予在寓所（中国使馆）突闻伦敦 BBC 广播，谓日本已声明愿投降”。“闻日本投降讯后，予与子文、天翼、经国等细商，关于对苏缔约事，今后我等究应采何态度。当经商定两点：一、对苏方表示仍愿缔约；二、不作任何重要让步。”^④

当晚9时，宋、王等与斯大林再次会谈。斯大林见面即问：“愿否续谈订约事？”宋、王表示愿意，“并希望从速结束”。据王世杰记载：“在商谈时，予对大连湾行政必须归还中国一事，剀切申述，并谓如苏联不让中国收回大连行政权，则九龙、香港之收回为不可能。斯大林沉吟一番，遂对此事作一重要之让步。”^⑤ 斯大林同意大连管理权完全归中方，但须以苏方人员管理港口。关于外蒙疆界问题，表示苏方不接受中方地图。中东、南满铁路，苏方坚持由中方任董事长，但苏方任两局局长。此外，苏军在东北的撤军问题、新疆问题、东北主权问题、中共问题，苏方同意按中方要求做文字表述。此次谈判仍未取得最终结果。

① 《王世杰日记》1945年8月8日。

② 《王世杰日记》1945年8月9日。

③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2），第644页。

④ 《王世杰日记》1945年8月10日。

⑤ 《王世杰日记》1945年8月10日。

当日，宋子文将谈判情况通报了哈里曼，哈里曼随即报告国务卿贝尔纳斯道：“对于苏联同意支持中国国民政府，不向中国持不同政见者提供道义、物质和军事援助的协定的文字，进行了长时间的争论。但最后同意使用的妥协文字并不如宋所希望的那样明确。然而这毕竟是一个良好的允诺，所以宋感到他应该接受这些文字。”^①

8月11日，贝尔纳斯复电哈里曼，表示：“对于苏联同意支持中国国民政府，不向中国持不同政见者提供道义、物资和军事援助的协定文字，尽管我们不能公开加以表态，但协定的文字应当十分明确……我们认为，中国政府做出让步所得到的回报，只是苏联政府明确答应不支持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② 美国将苏联不支持中共问题，视为国民党在此次谈判中获得的仅有的回报，再次反映了美方对于此次谈判的着眼点。美国对其他问题并无兴趣。

8月12日，蒋介石致电宋、王：“如南满路局长任华人，则管理大连港口船务人员可用苏籍人员……惟外蒙疆界必须此时有一图底，并在承认其独立以前勘定界线”。蒋表示，如不划定疆界，“则承认其独立不惟无益，而且有害，虽停止交涉，亦所不恤”。^③ 蒋似乎还要与苏方做进一步争论。

承认外蒙独立前必须划定疆界，这本来是王世杰向蒋的进言，但接到蒋的来电后，王感到“此事显然办不到。苏军已大规模攻入东三省，倘再拖延交涉，或生根本变化。子文及钱乙藜、蒋经国、傅大使等，均主张不顾蒋先生电示，径与史达林解

① 吴景平译《关于宋子文斯大林莫斯科会谈》，《民国档案》1991年第4期，第73、74页。

② 吴景平译《关于宋子文斯大林莫斯科会谈》，《民国档案》1991年第4期，第73、74页。

③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2），第647、648页。

决。予谓此甚不可，以此事如未经蒋先生充分主张，则未来国内意见分歧，即签字亦未必能批准。予主张今晚暂与史氏停止续商，一面仍电蒋先生说明一切，让其授权于予及子文权宜处理。予并主张在外蒙问题换文中，列入外蒙疆界应以现有疆界为限字句，如此，则在约文上我国显然不承认民八以前之旧疆界（民八以前，现时新疆阿尔太区属于外蒙，此为蒙边主要争点）。子文等遂勉徇予议，今晚暂不与史达林续商。”^① 钱乙黎即钱昌照。这段日记反映出中国代表团已经迫不及待地要与苏方签约，甚至考虑置蒋的电示于不顾。

8月12日，宋、王两度致电蒋，表示：“外蒙疆界，苏方不愿在换文中作何规定或声明”；路局局长等问题，“恐再难强苏方让步”。关于蒋再次威胁停止交涉一事，宋、王表示：“职等及同来诸人一致认为中苏条约必须缔立，倘再迁延，极易立即引起意外变化。兹特恳请钧座，对于外蒙及其他未决事项，授予职等权宜处理之权。”^②

外蒙疆界问题十分复杂，苏方一方面不同意按中国地图划界，另一方面又拒绝提出自己的地图。为此，8月13日王世杰致电蒋，谈了他个人对此事的看法。王认为苏方的态度，“窥其原因，不外二者：一则苏方预计彼之地图既包括新疆一部分领土……揆之实际，我确不能于放弃外蒙领土之外，复放弃任何新疆领土。二则唐努乌笃（梁）海等地方，原属外蒙，现则已成苏联另一属国。”王的意思是，外蒙疆界历史与现状极为复杂混乱，此即苏方拒绝提出地图、拒绝眼下划定疆界的原因，“似非蓄意与我为难”。

做出上述解释后，王就签约一事向蒋进言：“就我方利害

^① 《王世杰日记》1945年8月12日。史达林即斯大林，下同。

^②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2），第648、649页。

言，则此次缔约，可以明中苏之关系，减少中共之猖獗，保证苏军之撤退，限定苏方在东北之权益，凡此，皆为今后统一及建国所必需，倘再停止谈判，则形势必立变”。^① 王建议，以外蒙现疆界为限，并以这一文字列入条约换文，这个模糊的文字表述，等于废话。

8月13日，中国代表团焦急地等候蒋介石的授权电，宋子文沉不住气了，王世杰记载：“午后宋子文仍主张即与史氏续商，不主张等候蒋先生复电。予谓至少在正式接受外蒙问题解决方案，须在蒋先生复电到达并允许之后，宋以为可。遂续约史达林于晚十二时续谈。”^② 当日，宋、王终于等来蒋介石的授权电，电称：“对于外蒙及其他未决事项，准授权兄等权宜处置可也。”^③

8月14日，王世杰将会谈情况报告蒋：“昨奉钧座授权电令后，宋院长及职深夜与史太林续商一切，均经解决，定今日签字。外蒙以现有边疆为界，路局局长一人苏籍，副局长一人华籍，董事长一人华籍，且有两票权。……职预定十六日起程，经伊、印返渝，抵渝后，如国论统一，批准迅速，当可收钧座英断缔约之效。”^④

8月14日，莫洛托夫与宋子文就一些技术性问题做最后商定。关于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莫洛托夫说为方便起见，提议将两路并为一略，统称中国东北铁路，宋子文建议称中国长春铁路，此议获通过。莫洛托夫问：“中国方面由谁签署协定呢？”

①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2），第650页。

② 《王世杰日记》1945年8月13日。

③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2），第649页。

④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2），第651页。

宋说：“条约和协定由王世杰签署。”^①这就是说，由王签字是宋子文的安排。

中苏条约一般称8月14日签署，实际上8月15日才由王世杰与莫洛托夫签署，其原因，王世杰作如下记载：“中俄文约稿书写（至）零时，签字手续直至今晨六时始在克林姆宫举行，但苏联已于数小时前广播谓已签字，盖日本接受投降条件之答复，适于今晨二时到达此间也。”中苏条约是在对日作战的名义下制订的，日本于8月15日宣布投降，对日作战已失去依据，因此必须于日本投降之前宣布签约，此即8月15日签署的条约，为何宣布为8月14日签署的原因。

斯大林出席了签字仪式，并发表讲话。他说：“帝俄时代，俄国政策在分裂中国，与日本同一目的，苏联政府则在与中国为友，希望中国军力强盛，使日本不能再起。”^②这番话实在使人不知做如何感想。

14日晚，宋子文致电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各项协定已与苏维埃于今晚正式签订，因回答系莫外长签字，故我方由王部长签字。”^③宋的意思是，因苏方仅安排莫洛托夫签字，故中方亦仅由王世杰签字，这是宋对自己所以未签字所做的一个说明。如前所述，由王世杰签字是宋子文的提议，苏方是根据中方这一意见，安排了莫洛托夫签字。宋总算如愿以偿，没有在这个后来极遭非议的条约上留下自己的名字。

① 陈春华译《苏联档案中有关 中苏同盟条约 谈判的文件选译》，《近代史资料》总102号，第74~76页。

② 《王世杰日记》1945年8月15日。

③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2），第651页。

五 中苏条约的批准

中苏条约是一揽子协议的总称，包括五个大项：

(1)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附照会（一）（二）。

(2) 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

(3) 关于大连之协定，附议定书。

(4) 关于旅顺口之协定，附附件。

(5) 关于中苏此次共同对日作战苏联军队进入中国东三省后苏联军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之协定，附记录。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本身并无多少实际内容，具有实际内容的，主要是附于该条约的两份照会。第一个照会有三项条款：第一，“苏联政府同意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所谓“道义”援助，实际上就是拐了个弯的政治支持，该条款所针对的即中共。第二，苏方重申尊重中国在东北的主权完整。第三，新疆问题不干涉中国内政。第二个照会是关于外蒙的协议，规定外蒙于战后公民投票之后，中国承认其独立。外蒙以现边界为边界。

第一个照会与第二个照会，其实就是中苏双方的“交换条件”。

长春铁路旧称中东铁路，协定规定该铁路为中苏“共同所有并共同经营”，中方任理事长，苏方任副理事长，“理事长所投之票作两票计算”。苏方任铁路局局长，中方任副局长。

关于大连，规定大连为自由港，大连行政权属中国，苏方任港口主任，中方任副主任。

关于旅顺，规定“仅由中苏两国军舰及商船使用”，在旅顺设立中苏军事委员会管理该海军基地，苏方任委员长，中方任副

委员长。而旅顺海军基地的防卫，“中国政府委托苏联政府办理之”。所谓“委托”，即对雅尔塔协定“租借”一词的改动，实质仍然是租借。

关于苏军在东北与中国行政当局的关系协定，附有一项记录，既不称照会，亦不称附件，而称“记录”，原因是苏方不愿将其作为正式文件列入协定，但中方极为重视这个问题，于是以“记录”的名称列入协定，该记录即规定苏军于日本投降三个月内撤离东北。^①

中苏条约签署之后，宋子文与钱昌照由莫斯科赴美国，王世杰则于8月16日启程，经德黑兰于8月20日返回重庆。当日下午，王向蒋做了汇报。此刻，王最关心的，是使条约尽快获得通过，因为中苏双方约定，8月27日两国同时公布条约，因此条约必须于27日前获得批准。

8月20日，王世杰拜访立法院长孙科，孙“极力赞成订约，并谓将从速于一日内召集国防最高委员会及立法院，使之迅速通过。”^②8月21日，王又拜访赫尔利，“告以所签中苏条约之内容。彼亟称予等之收获，超过彼所预期。”^③

8月22日，蒋介石在重庆黄山官邸召集各院院长和其他政要10余人，听取王世杰做签约经过报告，并由王解释约文内容，

① 该记录全文如下：“史达林统帅与宋院长子文在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一日第五次会谈时，曾讨论苏联参加对日本作战后其军队由中国领土撤退之问题，史达林统帅不愿在苏联军队进入东三省之协定内，加入在日本战败后三个月内将苏联军队撤退一节。但史达林统帅声明，在日本投降以后，苏联军队当于三星期内开始撤退。宋院长询及撤退完毕需要若干时间，史达林统帅谓彼意撤军可于不超过两个月期间内完竣。宋院长继询是否确在三个月以内撤完，史达林统帅谓最多三个月足为完成撤退之期。”

② 《王世杰日记》1945年8月20日。

③ 《王世杰日记》1945年8月21日。

王世杰如释重负，颇为感慨地说：“三年以来，予所旦夕忧虑者，为抗战虽胜利，东三省仍不能收回。此约之订立，可以保全东三省。”王看到，“在座诸人均对此事无异议。”^①

然而会内无异议不等于会外无异议，王记载：“重庆市颇有散发传单反对中苏条约者。但约文现尚未宣布，反对者自尚不明其内容（或谓反对者为宋子文之政敌）。”^② 尚未看到条约即散发传单反对，因此估计为宋子文政敌所为。王作为当事者，故对“异议”极为敏感。

8月24日，王世杰渡过了紧张而繁忙的一天。上午，国防最高委员会与国民党中常会举行临时联席会议，审议由蒋介石提交的中苏条约，立法院委员列席。会议由蒋介石主持，蒋发表了讲话。外蒙问题本来是一个既损主权、又失颜面的问题，但蒋处理棘手问题有一个屡试不爽的法宝，此即国父遗教。蒋以孙中山关于民族主义的论述为根据，对外蒙问题这样说：“如果我们忽视民族平等自由的意志，抑制其独立自主的发展，不仅违背我国国民革命的精神，且足以增加我国各民族之间的纠纷”。“外蒙自北京政府时代民国十一年起，事实上已完成其独立的体制，如今已届二十五年。……我们必须秉承国民革命的原则，和本党一贯的方针，用断然的决心，经和平的程序，承认外蒙之独立”^③。蒋以国民革命的精神和原则，对外蒙独立做了一个自欺欺人的解释。

王世杰在联席会议上就中苏条约的签约经过和背景（雅尔塔协定）做了报告。王说：“此约之订立，虽使吾人对于实际上业已脱离中国统治二十余年之外蒙，不能不承认其独立，但战事结束后三个月内苏联依约不能不自东三省撤退，对于旅顺及中

① 《王世杰日记》1945年8月22日。

② 《王世杰日记》1945年8月23日。

③ 《蒋主席最近言论》，第5、6页，国际出版社编印，1946。

东、南满两路，予虽有所让步，但范围有限，东三省之主权可以收回。如国论统一，批准迅速，我可收缔约之效。”^①

最后，联席会议审议结果是：“通过。交立法院迅速完成立法程序”^②。

紧接着立法院开会审议，由孙科主持。该条约在立法院遇到麻烦，“讨论近三小时之久，议论颇分歧，吕复、卫挺生等均反对。但最后起立表决时，亦只数人不赞成。”立法院通过。

下午五点，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开会审议，仍由王世杰做报告，王记载：“亦有若干人表示不满，但多数人仍主批准。左舜生、傅斯年均赞成批准。辽宁钱公来尤热烈，至向予呼万岁，谓为东三省之救星。”^③ 参政会批准。

一日之内，中苏条约迅速完成全部批准程序。

王世杰说参政会有若干人不满，其中一位便是黄炎培。黄表示：“外蒙独立，我不反对，因为我以鞭长莫及，不能与外蒙民众以自由与幸福，而又不让他们自谋，未免不公道……但何以入中苏条约？”^④ 黄的意思是，外蒙独立是中蒙之间的问题，为何与第三国解决这一问题？这是一个令人尴尬的问题。

被斯大林和蒋介石共同排斥于谈判之外的顾维钧，对于谈判过程和结果甚为不满。外交部次长胡世泽于莫斯科谈判结束后随即到伦敦，向驻英大使顾维钧通报会谈情况。顾回忆道：“胡世泽描述了中国代表团的谈判策略之不高明。当一项中方建议

① 《王世杰日记》1945年8月24日。

② 《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会议记录》第7册，第476页，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6。

③ 《王世杰日记》1945年8月24日。

④ 黄炎培日记，1945年8月24日。

(如不讨论外蒙问题)被拒绝后,中方代表就吓得不敢再提了。通常是由斯大林或莫洛托夫讲几句话来打破随之而来的沉默和紧张局面。”此即不带职业外交官的结果。胡世泽深为顾维钧“没有按原来的安排去参加帮助谈判而感到遗憾。”^①

关于谈判的结果,顾这样认为:“作为一个为了收回失地和恢复中国的主权和独立的政策奋斗了四十多年的人来说,我对中国在莫斯科所采取的立场自然是极感失望的。……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公开当年我们的重庆政府为什么决定不惜任何代价与苏俄缔结这个条约的全部理由。”^②顾维钧到最后仍然是从外交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因而最终仍然困惑不解。

那位当年曾与顾维钧一同参加巴黎和会的老资格外交家颜惠庆,将苏联在东北的权益与当年日本在山东的权益做如下类比:“在满洲的让步是英、美、苏在雅尔塔决定的。这是一次大战时山东问题的重演。”颜称:“罗斯福是第二个威尔逊”。^③这个论点实际上就是将雅尔塔会议与巴黎和会相等同,将东北问题与山东问题相等同,将罗斯福与威尔逊相等同,按这个逻辑推论下去,其结论必然是将苏联与日本相等同。

另外,据钱昌照说,在外蒙问题上,“蒋经国对此不表示意见。后来他在所著《风雨中的宁静》一书中,说他极力反对,完全不是事实。”^④钱昌照之说应当是可信的,因为外蒙问题是由蒋介石决定的,蒋经国不可能反对。

8月27日,《大公报》为中苏条约发表社论,基本持赞成态度,认为得比失大,文中有这样几句话:“我们是中国国民,今

① 《顾维钧回忆录》第5册,第571页。

② 《顾维钧回忆录》第5册,第567页。

③ 《颜惠庆日记》1946年1月30、31日,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

④ 《钱昌照回忆录》,第97页。

日看见在一贯的知识上属于中国领域的外蒙古行将离开我们……在心理上在感情上总觉得是有所失。”^①

中苏条约公布之后，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予以祝贺，其中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历史上我国和外国签订的第一个友好同盟条约。……我们认为这个条约是苏联一贯地以平等待我的政策的又一表现”。^②

尔后，11月7日十月革命28周年纪念之际，《解放日报》再次发表社论盛赞中苏条约，表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又表明了苏联尊重我国人民的利益和意志，及其‘以平等待我’之一贯精神……这些原则的具体运用，见诸于两国关于中国长春铁路、关于大连、关于旅顺口等协定中。”当日，在延安举行的群众大会上，林伯渠发表讲话：中苏条约的签订，“中国人民在争取独立自主的道路上，有了强大的苏联作为同盟，就可以保证不再受外来的侵略”。^③

上述论点无非表明，政治是现实的。中共的论点基本强调远

① 《大公报》1945年8月27日。

② 《远东持久和平的基石》，《解放日报》1945年8月29日。

1949年1~2月，苏联领导人米高扬秘密访华，在与中共领导人谈及中苏条约时表示：“旅顺条约是不平等条约”。关于中长铁路条约，“我们则不认为是不平等条约，因为这条铁路主要是由俄罗斯出资建成的”（《米高扬就1949年1~2月的中国之行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提交的报告》，转引自A.M.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中国》，第82页，新华出版社，2001）。

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华，邓小平对他说：“美、英、苏三国在雅尔塔签订秘密协定，划分势力范围，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利益。那是斯大林时期。当时中国的国民党政府同苏联签订条约，承认了雅尔塔的安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同苏联签订了新约。中国同蒙古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达成了协议，划定了边界”（《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3、294页，人民出版社，1993）。

③ 《解放日报》1945年11月8日。

东和平问题，对外蒙问题只字不提，这是中共的一个基调。

按照中苏条约的规定，1945年10月20日，外蒙就独立问题举行公民投票，中国内政部长等十余人前往观察，结果为大多数赞成独立，国民政府于1946年1月5日发布公告，承认外蒙独立。

1946年2月8日，蒙古政府副主席苏龙甲布率代表团到重庆，商谈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2月12日，王世杰与苏龙甲布“商定将互派公使”^①。14日，苏龙甲布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两国于13日建交。

本章小结 外蒙、旅顺等等问题，本来是苏联向美、英提出的对日作战条件，最后，却演变为蒋介石换取苏联不支持中共的政治条件。事情以美方为避免美军大量伤亡而请苏联出兵东北为缘起，结果则以苏联不支持中共为归结。这是一个两度易手的交易。蒋介石把美、苏、英关于战后国际政治的安排——雅尔塔协定，蜕变为国民党关于战后中国政治的安排——中苏条约。

那么，中苏条约的交换结果具体体现在哪里呢？它将体现在接下来的重庆谈判中。

^① 《王世杰日记》1946年2月12日。

第五章 重庆谈判

——政治背景的转变与政治态势的转变

重庆谈判向以毛、蒋见面而成为一起著名的历史事件。北伐之前，毛、蒋在广州或许见过面，但两人作为两党最高领导人见面则仅此一次。毛、蒋难得的相见，使人们相当自然地对重庆谈判的意义给予高度的评价。这种侧重于研究意义的视角，长期以来束缚了人们观察整体的视野，一些基本问题或者被忽略，或者被回避。这些基本问题包括：重庆谈判的背景是什么，两党各自处于怎样的态势，谈判主要是针对哪一方进行的，争执的要点是什么，解决了什么，未解决什么。这些最基本的问题，其实是有关研究中最薄弱的问题。

重庆谈判的背景可以从近距离和远距离两个方面来观察。

首先要指出的是，重庆谈判的举行，并非是国共两党既定方针的延续，而是日本突然投降这一背景下猝发的事件。从日本传出投降消息到中共决定毛泽东赴渝谈判，大约是两周的时间。在此两周，国共为争夺日占区从而确立各自的战后地位，运用多种手段展开了空前的较量，从近距离看，重庆谈判即此一较量的结果。

从远距离看，国共自联合政府的谈判破裂后，国民党宣布召开国大实施宪政，中共则宣布召开解放区代表大会成立解联，谈判既然在这些问题上中断，恢复谈判也就是恢复这些中断的议题。那么，这些中国政治最为核心的问题恢复谈判之后又是怎样

谈的呢？在这里，最为本质地反映着国共态势的转换，最为本质地反映着重庆谈判的性质。

一 日本突然投降与中共最初的应变方针

由于原子弹这一非常规性武器此前人类从未使用过，因此国共对于抗战结束的时间预测，均是按常规战争的规律预测，因而均不甚准确。

1945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正在实施南下战略的王震、李先念等：“美军由欧东调须要时间，日美决战当在明年夏季以后，故你们尚有一年至一年半以上之时间可以利用”^①。直至美国投放原子弹前两天，8月4日毛泽东在致李先念等人的电报中仍判断：“估计日寇明冬可能失败，还有一年时间供你们做准备工作”^②。

上述估计表明，中共对日本的投降是缺乏准备的。

8月6日、9日，美国在广岛、长崎先后投下原子弹，9日苏联对日宣战，日本的崩溃指日可待。由于中共早已做出在日军崩溃之际抢占中心城市的部署，在这个背景下，中共的此一行动猛然提速。

具有决定意义的争夺主要是在京沪杭和华北两个地区。8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华中局，对新四军的军政部署指示如下：“一、六两师及苏南、苏中担任夺取南京、上海之线”，“五师集中全力进占信阳、武汉之线”；要求：“集中主力去占领大城市和要点”。同时指示新四军：“即日发表江苏、安徽、浙江三个省主席，上海、南京两个市长；五师师部即日发表武汉市长及湖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89、90页。

②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812页。

北省主席，人选你们拟定之”^①。

8月12日，中共发布如下命令：罗炳辉为安徽省主席，黄克诚为江苏省主席，叶飞为浙江省主席，刘长胜为上海市长^②，并任命粟裕为南京市长^③。

8月10日，聂荣臻电令所属部队：“全军区部队应立即部署，向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大同、阳泉、张家口、唐山、山海关前进，准备接收日伪军的投降”。同时命令：“立即以边区政府名义委任宋劭文兼北平市长，张苏兼天津市长，王昭任石家庄市长，刘秀峰任保定市长，朱其文任秦皇岛市长，张萝旭任张家口市长，张明远任唐山市长，刘达任大同市长”^④。

上述一系列任命，意在与国民党的争夺中先声夺人。

还在1944年9月讨论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时，刘少奇就表示八路军、新四军的名义已不适用，提议成立解放军。而今在与国民党争夺中心城市已经展开的情况下，“解放军”的名称也在考虑是否公开出来。

8月14日，《解放日报》在一篇社论中号召：“解放军的指战员们！在这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进军中，要坚决的、大胆的、迅速的进攻”^⑤。该社论没有明确说改八路军、新四军为解放军，但解放军的名称头一次公开出来。8月22日，新四军参谋长赖传珠记载：“改新四军为华东人民解放军”^⑥。解放军是

① 中共盱眙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新四军军部在黄花塘》，第514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

② 《赖传珠日记》1945年8月12日。人民出版社，1987。赖传珠时任新四军参谋长。

③ 《叶飞回忆录》，第343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

④ 聂荣臻关于全军区部队立即部署向大城市前进致分局电，1945年8月10日。

⑤ 《当前的紧急任务》，《解放日报》1945年8月14日。

⑥ 《赖传珠日记》1945年8月22日。

继红军之后，中共第二个独立的军队名称。这一点是与争夺中心城市任务互为配合的，都是力争成为“君”这一政治姿态的体现。

中共所以敢于放手与国民党争夺中心城市，主要是基于两个判断：第一，能够取得苏军的配合；第二，能够以直接受命于盟军的方式，绕过蒋介石，迫使日军向中共投降。

8月9日，即苏军参战当日，毛与朱德联名致电斯大林，表示：“中国解放区的一万万人民及其军队，将以全力配合红军及其他同盟国军队消灭万恶的日本侵略者”。表达了与苏军配合的愿望，一旦取得这种配合，中共的力量无疑将取得迅猛的扩展。当日，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毛说：“现在同苏联红军配合作战，是痛快的”^①。显然，与苏军配合是毛的主要着眼点之一。

与此同时，朱德于8月10日发表命令：“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均得依据波茨坦宣言规定，向其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之敌人及其指挥机关送出通牒，限其于一定时间向我作战部队缴出全部武装”^②。这个命令的要点在于，将中共的行动依据直接与波茨坦宣言挂钩，以波茨坦宣言的名义绕过蒋介石，从而使中共的行动不受蒋介石的约束。

8月11日，蒋致电朱德、彭德怀，要求：“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其在各战区作战地境内之部队并应接受各该战区司令长官之管辖”^③。该电的核心是要中共服从管辖。对此，毛于8月16日以朱德名义致电蒋，表示：“有权根据

①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617、618页。

②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24页注②。

③ 《中央日报》1945年8月13日。

波茨坦公告和同盟国规定的受降办法，接受我们所包围的日伪军队的投降”^①。重申中共的行动依据来自波茨坦公告，意即不受国民党“管辖”。

集中体现中共此时的政治姿态的代表性文件，是8月15日朱德以“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名义，向美、英、苏三国驻华大使发出的说帖。该说帖“代表中国解放区和沦陷区”二亿六千万人民向三国政府要求：“中国国民党政府及其统帅部，在接受日伪投降与缔结受降后的一切协定和条约时，不能代表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表示中共有权根据波茨坦宣言接受日伪投降，有权参加处理日本问题的联合国会议。^②

朱德使用了“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的名称，而不是八路军总司令名称，这是在发出一个信号，中共军队已不隶属于国民革命军序列；代表解放区和沦陷区的二亿六千万人民，以示代表了大半个中国；称“国民党政府”而不称国民政府，是要表示该政府只是某个范围的政府，而非全国性政府；中共有权参加联合国会议以及对日缔约，是要表明中共与国民党具有同等的地位。这份说帖，其实就是外交说帖，这是在向国际社会清晰地发出一个信号，中国还有另外一个代表二亿六千万人口的政府。这个政治姿态，与中共此时正在筹建的解放区联合委员会是相吻合的。发出这份外交说帖，显然是为争取国际社会的承认而采取的一个试探行动。

1944年6月中共在提出城市工作问题时，便提出抗战末期抢先进入中心城市的要求，从而造成“先到为君，后到为臣”的局面。现在，随着中共迅速任命南京、上海、北平等城市市长和省主席，这种“先到为君”的行动正在快速展开。作为这一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37页。

^② 《解放日报》1945年8月16日。

意图的配合，中共必然要在军事上和政治上撇开蒋介石的制约，以波茨坦宣言为行动根据，以及向盟国发出外交说帖，便是撇开蒋介石的两项基本措施。

中共的上述意图来自两个判断，即能够与苏军配合，能够直接依据盟军的有关命令，迫使日军向中共投降，从而绕过蒋介石。那么，如果这两个条件并不存在，中共的上述意图必然受阻。

二 蒋介石的两张牌

1945年5月18日，蒋在国民党六全大会做政治报告时说：“现在欧战已经结束，太平洋的战争，最多不过延长一年”^①。6月25日，何应钦在答记者问时说，距抗战结束“大约一年”^②。上述估计与中共基本相同。这表明，国民党对于日本的突然投降也是缺乏准备的。

当中共于1944年下半年开始实施南下战略，大力经营中南与东南两个战略方向之际，对于中共的这个战略意图，国民党的判断大致准确。

军令部长徐永昌在一则日记中写道，中共最近调集大军进入豫、鄂、湘，企图在这一带“成一走廊”，目的有四点：“（一）盟军登陆使其认识中共力量，使中央军无法与盟军会师；（二）阻止打击中央军北进，以便割据华北；（三）中央军如通过走廊势必冲突，则内战之责加之中央；（四）造成盟军对中央之不良印象。”^③ 这是对王震部意图的判断。蒋介石对粟裕部做如下判

① 《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1，第111页。

②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5年6月25日。

③ 《徐永昌日记》1945年5月23日。

断：中共“其有力匪部，且由江北向江南、浙西大量侵入，此其不仅为扰乱我军与盟军接应之计划，而另一目的，乃牵制我黄河以南各军不能向华北前进。”

对于中共向南的战略意图，蒋准备采取向北的对策。蒋认为：“此时我军必须准备有力部队向华北挺进，以直接打破共匪向南之各种企图也”^①。

与美军登陆相配合，是中共的意图之一。新四军军长陈毅5月1日在中共七大发言谈到这一问题时说：“华中、华南海岸线很长而且辽阔。十之六控制在我新四军手中，盟国如选择在这些地点登陆，新四军是早有配合作战的准备的。”^②

对于中共的这一意图，蒋只能直接与美方交涉。1945年7月31日，在一次研究美军登陆问题的中美联席会议上，魏德迈说：美军登陆部队“最好尽量设法避免与反对中央政府之军队合作或联系。”蒋介石说：“不好承认中央以外的部队，该登陆部队应等待中央军队到达接防后，其任务始为终了。美国政府不应承认其他队伍只可承认中央队伍。”魏德迈问：美军登陆后，中央部队不能尽快接防怎么办？蒋说：“此点必须坚持，我们既有预约，必须实践……只要美国态度坚决，共产党不敢有何举动，故我们必须坚持。”^③然而，当国共围绕这个问题的角逐正在展开之际，抗战突然结束。

日本传出投降消息后，国民党的行动同样骤然提速。8月13日，国防最高委员会第166次常务会议通过了蒋介石提出的如下人选：罗卓英为广东省主席，熊斌为北平市长，张廷谔为天津市

① 《蒋总统秘录》第14册，第16页。

② 《新四军军部在黄花塘》，第512页。

③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5年7月31日。

长，钱大钧为上海市长。^① 南京仍为原市长马超俊。这样，国共双方都抢在第一时间任命了各自的市长与省主席。

中共既然是以波茨坦宣言为依据，试图直接与盟军挂钩从而绕过蒋介石，因此，盟军方面一旦明确受降规定，中共便将失去此一依据。日本于8月10日传出投降消息后，美、苏、英、中四国随即决定设立远东盟军总部，以便统一处理对日事宜。8月12日，麦克阿瑟出任盟军最高统帅。同日，杜鲁门在致麦克阿瑟的第一号通令中命令：“在中国（满洲除外）、台湾，以及北纬十六度以北之法属越南境内之日本高级将领，及所有陆、海、空军及附属部队应向蒋委员长投降。”^② 满洲除外，是因为该地区为苏军区域。这道命令意味着中共绕过蒋的企图已失去依据，而蒋则取得合法的受降权。

为争取日军的配合，争取日军仅向国民党军交防，而拒绝向中共交防，8月15日，蒋亲至广播电台，发表了那篇“以德报怨”的讲话，要求国民对于在华日本人不念旧恶、与人为善。其实，蒋并非不念旧恶的人，蒋所以如此大度当然是政治的需要。因为，中国战场与太平洋战场、中国东北战场不同，中国战场的日军并未被击溃，蒋如果提出苛刻的条件，有可能遭到日军的抵抗。“不念旧恶”是为争取日军的配合，从而在与中共的争夺中占据优势。

蒋的这一策略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以山东为例，山东是中共抗战时期控制面积最大的一个省，全省三分之二以上面积为中共控制。国民党的山东省政府于1943年7月撤离鲁南，迁至安徽阜阳，1945年2月，何思源出任山东省主席，4月下旬，何率少量机关人员返回鲁西南曹县，由此拉开与中共争夺山东的序幕。

^① 《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会议记录》第7册，第450页。

^②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5年8月13日。

8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山东军区的罗荣桓、黎玉，指示：“山东军区有占领徐州、济南、德州、青岛、连云港及其他大小城市交通要道之任务”，“望将山东行政委员会宣布为正式省政府”。^①显然，中共的意图是占领山东全省。

何思源在益都（今青州）从广播中得知日本投降消息后，立即任命张金铭为济南市长，要他“严防奸匪侵入”。尔后，何率部由益都出发进军济南。由于山东基本为中共控制，何思源的少量人员本无力进入济南，就在此时，张店（今淄博）车站日军联队长滕田大佐来到何面前，滕田说：“闻主席入济，愿任沿途保护之责，并借给钢甲车作乘坐之用”。一位随行记者这样写道，当何思源在益都上车时，“滕田部队长早已率着二百多日本兵，押着一列钢甲车，在站东头等候着我们，钢甲车上两门大炮，都退去炮衣，向两边放列着，使我们无形中增加了不少安全感。”^②这样，在日军的护卫下，何思源于9月1日进入济南，中共抢占济南的计划未能实现。

美国在战后接收问题上的态度是明确的。8月12日，魏德迈致电马歇尔，报告他对中国局势的看法与建议。魏德迈有两点担心：“第一，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可能突然引发中国内战；第二，留在中国大陆的日本部队，大约有两百万之多，可能继续以整个部队或在孤立地区作战”。魏德迈对中共战略动向判断如下：“中国共产党在地理上的目标，无论在过去或在将来，都是一贯的，就是那些美国联合参谋首长认为最重要和战略的据点与地区……那些地区包括上海、南京、大沽口、天津、北平、青岛，和广州。”为此，魏德迈建议：派两个师去上海地区，两个

^① 中共中央致罗荣桓、黎玉电，1945年8月10日。

^② 李仲勋：《何主席入鲁随征记》，第46~48页，山东公报社印，1946。

师去大沽口地区，一个师去广州地区。魏德迈要求将这一派遣计划“列为第一优先”^①，帮助国民党抢占中心城市。

如果说盟军关于日军向蒋投降的命令是蒋的一张牌，那么蒋的另一张牌不用说，即中苏条约。蒋介石的两张牌从两个方向阻断了中共的行动意图，一张使中共不能采取与盟军直接挂钩的方式绕过蒋，从而不能实现使日军向中共交防的意图。另一张则使中共不能与苏军配合作战。更重要的是，这两张牌使蒋介石、国民党的政治地位再次获得国际社会的确认，中共力争成为“君”的意图已不可能实现。

三 两周较量的结果

根据延安8月10日关于夺取南京、上海的指示，8月11日，华中局就具体部署上报延安，其安排如下：由新四军苏浙军区部队占领南京。以新四军苏浙军区浙东部队主力控制上海、杭州段铁路线，阻止国民党顽军进占上海，并以浦东部队开入上海。^②

“浙东部队”即何克希、谭启龙领导下的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1945年1月编为苏浙军区第二纵队，当时约7千余人。“浦东部队”即浙东游击纵队所属浦东支队，1944年11月改称淞沪支队。^③管文蔚回忆：“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当晚，华中局决定粟裕主力进攻上海，淞沪支队三千余人作内应，我苏中陈伟达等已去上海组织上海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④

① 《魏德迈论战争与和平》，第206、207页，台北正中书局，1989。

②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5页注②。

③ 《谭启龙回忆录》，第188、189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

④ 《管文蔚回忆录续编》，第295页。

以这样的力量去进攻上海、南京，毛泽东犹豫起来，8月12日，毛复电华中局，指示：“江南各大城市不作占领打算……浙东力量仍在原地扩展”^①。同日，毛致电各中央分局：“依据国共两党实力对比，确定我党必须力争占领之交通线及沿线大小城市”，列入占领名单的有：太原和同浦路，郑州以及平汉路、陇海路、津浦路、胶济路等等。同时指示：“长江以南各要道及大城市，根本不作占领计划”^②。这个指示表明，毛对于国共力量对比的认识已与早先有所不同。

进攻上海的计划被否定，但紧接着华中局又拟出一个上海起义的计划，于是中共方针再度改为占领上海。8月18日，新四军决定：“同意上海对起义所拟的各种指示”^③。19日，华中局报告延安：“上海我可掌握控制的力量总共有二十万人，我能掌握大部分水电工人、邮政工人、电车工人、铁路工人。……沪西大部分巡捕我可控制。……根据目前主客观力量可以发动群众武装起义”。^④收到该电后，毛泽东于8月20日复电华中局：“你们发动上海起义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望坚决彻底执行此方针，并派我军有力部队入城援助。其他城市如有起义条件，照此办理”^⑤。同日，毛指示晋察冀等中央分局：“对于北平、天津、唐山、保定、石家庄，应迅速布置城内人民的武装起义，以便于不失时机配合攻城我军实行起义，夺取这些城市，主要是平津”^⑥。

毛在重新布置夺取大城市计划之后，猛然发现局势的发展已对中共不利，因此，仅仅时隔一天，毛再度改变决心。8月21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4页。

②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6页。

③ 《赖传珠日记》1945年8月18日。

④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8页注③。

⑤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9页。

⑥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9页。

日，毛致电华中局：“浙东主力到上海有被消灭危险，不如仍在浙东……日本投降条约即将签字，蒋介石已委任上海官吏，在此形势下上海起义变为反对蒋介石，必被镇压下去”^①。收到该指示后，新四军此一计划迅速停止，赖传珠8月21日记载：“中央要我们停止上海武装起义事，特令叶飞率领的一个团及谭启龙停止行动”^②。

中共行动之所以停止，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远东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命令中国战区日军只能向蒋介石投降，蒋具有了受降的惟一合法地位。8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蒋介石利用合法地位，接受敌军投降，敌伪只能将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交给蒋介石。在此种形势下，我军应改变方针，除个别地点仍可占领外，着重于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③

造成中共不利态势的另一个原因，即中苏条约。赖传珠记载：“接中央指示，苏联由于中苏条约所限，对我不可能有大的援助。中国革命整个形势可能变化，我们整个方针及思想均应变更”^④。中国革命的整个形势因中苏条约而变化，可见中苏条约对中共的冲击是很大的。

在此情况下，中共先前采取的一系列撇开蒋的行动亦急速改变。延安曾于8月20日致电华中局：“请考虑新四军改称华东人民解放军是否有利”。如前所述，新四军于8月22日决定改称华东人民解放军，8月26日，延安指示华中局：新四军名称“不改为有利”^⑤。

8月23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对迅速变化的局势做

①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9页。

② 《赖传珠日记》1945年8月21日。

③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10页注①。

④ 《赖传珠日记》1945年8月23日。

⑤ 中共中央致华中局电，1945年8月20、26日。

如下总结：“中国有两种可能进入和平情况，一种是我们可以得到一部分大城市，一种是得不到。现在是得不到，原因有二：一是苏联为了国际和平和受中苏条约的限制，不可能帮助我们；二是蒋利用其合法地位，使日本完全投降他。我们只能承认这个事实。”^①毛所说的两个原因，就是前述蒋介石的两张牌，毛说承认这个事实，就是承认局势的逆转，而逆转的事实，也就是在日本突然投降情况下，国共两周较量的结果。在这个背景下，中共最终决定，接受蒋介石的邀请，赴重庆谈判。

四 邀请与应邀：国共两党的决策经过

蒋介石电邀毛泽东赴渝谈判，是通过中苏条约取得苏联对其“道义”支持以及垄断日军受降权这两件事的直接结果。通过中苏条约，蒋从国际背景上完成了对中共的政治包抄，通过垄断日军受降权，变日军为守备队，阻止了中共进占大城市的计划。这两件事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1944年日军一号作战以来蒋的困境，中共与国民党正在拉近的实力对比被重新拉开，蒋在与中共的抗衡中重新处于有利地位。为此，蒋立即将国民党在国共谈判中的守势变为攻势，电邀毛泽东赴渝谈判，正是此一政治攻势的体现。

关于蒋发出电邀的经过，通常认为是吴鼎昌的建议。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使吴鼎昌提出了这一建议，也并非惟一的提议者。就目前所见材料，最早以书面报告正式向蒋提出此一建议者，是一位并不引人注目的人士，论地位此人较之吴鼎昌低许多，但论与蒋的关系，则较吴鼎昌靠近得多，此人即侍从室主管情报的

^①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10页。

第六组组长唐纵。

日本投降的消息于8月10日传出，8月11日唐纵即拟定一份“日本投降后我方处置之意见具申”，并于8月12日呈蒋。唐纵在该呈文的政治部分提出如下建议：“中央表示统一团结战后建设之殷望，并重申召集国民大会实施宪政之诺言，同时表示希望中共领袖来渝共商进行。如毛泽东果来则可使其就范；如其不来，则中央可以昭示宽大于天下，而中共将负破坏统一之责。”^①在这里，唐纵已将邀毛来渝的政治效果说清楚了，即毛来与不来对国民党中央均有利。

应该指出的是，唐纵的意见并非一时的突发奇想，而是早已有之。1944年2月，国共在商议恢复谈判时，唐便向陈布雷建议：“主张表示欢迎毛泽东来渝商谈，果来，于我有利，不来于我亦有利”^②。显然，邀请毛来渝谈判，毛来与不来均有利，是唐纵一贯的设想，因此唐于8月11日提出这一建议是有其思想基础的。

接下来的问题是，唐纵这个意见是否为蒋采纳？1945年底，唐纵在当年反省录中，就当年他本人向蒋提出的若干建议，并且为蒋“所采纳而显然有成就者”列出一份记录，其中一项即“敌人投降时之各项措施与电召毛泽东来渝”。^③看来，唐纵本人是把这件事记在自己的账上了。

总括而论，此事的促成不排除还有其他人建议的可能，但唐纵至少是其中之一，并且就目前所见材料，唐纵之说较为可靠。

8月14日，连陈布雷也不知晓，蒋向毛发出了邀请电，电

^① 《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668页。

^② 唐纵日记，1944年2月24日。《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415页。

^③ 《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569页。

文如下：“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①。该电采取公开发表的形式，因为只有公开发表，才能收到毛来与不来均为有利的效果。

该电本来就是为公开发表而作，故措辞诚恳，多少引起人们异样的感觉。徐永昌在日记中写道：“昨日蒋先生电毛泽东，请其惠临陪都共商国是，措词颇为谦虚”。^② 该电给人留下了“谦虚”的印象，这正是蒋要收取的政治效果，即“昭示宽大于天下”。

蒋的这一策略也收到了舆论效果。8月16日，《大公报》发表社论，表示：“蒋主席既掬诚相邀，期共商讨，毛先生自然也应该不吝一行，以定国是。……忠贞爱国的中国人，都在翘待毛先生的惠然肯来了！”^③ 翘待毛，即将球踢到中共一边。

此时，正是中共以二亿六千万人民代表的身份向美、英、苏发出外交说帖，并考虑公开改称解放军之际，蒋的邀请当然不会被接受。8月16日，毛以朱德的名义致电蒋，朱电首先以一种姿态表示：“我代表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及二万万六千万人民特向你提出下列的声明和要求”，也就是说，中共是以半个国土面积和半数人口的代表身份，与蒋对话的。朱电表示：“中国解放区人民及中国共产党曾经多次向你及你的政府提出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民主的举国一致的联合政府，以便停止内部的纷争……但均为你及你的政府所拒绝，凡此一切，我们是非常之不满意的。”朱电提出了6项要求，包括有

① 《中央日报》1945年8月16日。

② 《徐永昌日记》1945年8月16日。

③ 《大公报》1945年8月16日。

权参加受降，有权参加联合国会议等等，最后一项要求是：“请求你立即废止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①。

同日，毛另以本人名义致电蒋：“朱德总司令本日午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②。以答复并接受朱德要求为会见的先决条件。由于朱德要求实际上不可能被蒋接受，因此该电实际上是拒绝与蒋会见。

蒋既不为朱电之强硬而动怒，也不为毛电之冷漠而罢手。此时中苏条约已经签订，麦克阿瑟的命令已经下达，有两张牌在手，蒋更加底气十足，于是更加尽情地将这出戏演下去。

8月20日，蒋二电毛泽东：“来电诵悉，期待正殷，而行旌迟迟未发，不无歉然。朱总司令电称一节，似于现在受降程序未明了。查此次受降办法，系由盟军总部所规定，分行各战区，均予依照办理，中国战区亦然，自未便以朱总司令之一电破坏我对盟军共同之信守。朱总司令对于执行命令，往往未能贯彻，然事关对内妨碍犹小，今于盟军所规定者亦倡异议，则对我国家与军人之人格将置于何地。……抗战八年，全国同胞日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辑之而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误。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奉邀，务恳惠诺为感。”^③

朱电要求共6项，蒋电避开中共的政治要求，专复受降问

① 《大公报》1945年8月21日。

② 《大公报》1945年8月21日。

③ 《中央日报》1945年8月21日。

题，蒋打出盟军规定这张牌，称中共的要求是对盟军的规定“倡异议”，将中共置于盟军的对立面，从而使中共的要求输理。尔后，以维护与盟军“信守”的名义，将拒绝中共要求解释得冠冕堂皇。

拒绝朱德要求，也就是拒绝了毛提出的赴渝谈判的先决条件。按照通常逻辑，拒绝先决条件毛便不会赴渝，或许正因为如此，蒋电的邀请之情更加殷切。该电外表十分和善，内涵则十分强硬。

为配合蒋氏二电（贺电），《中央日报》于8月21日发表社论，称蒋前电发出后，“乃事有出人意料之外者，毛先生不特吝此一行，抑且以朱德总司令八月十六日的电报为要挟，而统观朱电，其辞意之慢悖，主张之谬妄，几令人不能置信”。大约料定毛“吝此一行”，社论的语气愈加强硬：“任令八年抗战之牺牲为徒劳乎？要唯毛朱两先生熟思慎择了！‘内争不容再有’！毛先生应无异议，我们要请毛先生惠然来渝，以事实来证明其无意于内争，以事实来慰藉热望和平幸福的全国人民！”^①这就是说，不来渝便是内争。

同日，《大公报》为蒋氏贺电再发社论，关于受降问题，社论认为应遵行盟军规定，“在受降之际，无论如何，应维持一致的步骤”。关于毛赴渝一事社论说：“日前得见蒋主席致毛先生的寒电，大家为之兴奋……现在又读到蒋主席致毛先生的贺电，更感到一片祥和之气”；称贺电“蔼然诚坦，溢于言表”。最后表示：“我们相信全国同胞的心情，都与蒋主席相同，殷切盼望毛先生不吝此一行”^②。

针对《大公报》的论点，《新华日报》发表社论予以反驳。

① 《内争不容再有》，《中央日报》1945年8月21日。

② 《读蒋主席再致延安电》，《大公报》1945年8月21日。

关于盟军的受降规定和国民党要求中共驻防待命的命令，社论说，盟军的规定“不知何款何条规定了一个国家的军队某部可以‘积极推进’，某部必须‘驻防待命’……‘在受降之际，无论如何，应维持一致的步骤’，我们以为乱了一致步骤的就是这一道错得厉害的命令”。关于谈判，社论说：“我们从不拒绝团结的手，我们从不关闭谈判之门，可是捏着刀的手是不好握的，堵住一块独裁的大石头的门是进不去的”^①。该文的核心是，坚持谈判的先决条件。

当《新华日报》还在坚持谈判的先决条件之际，延安的决策则在迅速生变。8月22日，毛复电蒋：“从中央社二十日新闻电中得读先生复电，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晋谒，到后希予接洽为慰。”^② 尽管毛仍未同意亲自赴渝，但该电的关键在于，将前电有条件谈判改为无条件谈判。该电使用了“晋谒”一词，这是下对上的用词，这是中共政治姿态的改变，即改变了以二亿六千万人民的代表与蒋平行对话的姿态，对蒋的称呼也由前电的“你”改称“先生”。

中共决策的迅速变化，是由国内外局势的变化决定的。

8月23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主题是研究毛泽东赴渝谈判一事。毛泽东为这次谈判确定的基调是：“我们要准备有所让步”。毛对中共所面临的国际与国内的环境做如下判断：“美国不帮助我们，赫尔利的政策胜利了，苏联为了中苏条约和国际和平，不可能也不适于帮助我们。”也就是说，在国际环境方面，中共得不到任何帮助和支持。关于国内方面，毛

① 《蒋介石先生寄电书后》。该文原为《新华日报》1945年8月22日社论，被扣发后，于8月23日另印单页随报附送。

② 《解放日报》1945年8月23日。

说：“蒋介石利用其合法地位，使日本完全向他投降；我们想争一部分而不可得……此外，我们的城市工作和军队工作没有做好。由于这几点，我们力争的那批果实就没有得到。我们只能承认这个事实”。关于中共自身的状况，毛说：“我们没有大城市，没有机械化的军队，没有合法地位”。上述几点大约就是“我们要准备有所让步”的根据。

毛对于美苏与国共的关系，这样说道：“美国不公开帮助蒋介石，决定苏联也不能公开帮我们。苏如助我，美必助蒋……在欧洲，苏联助保加利亚而不及希腊，是因希腊为英国所必争；在亚洲，中国则为美国所必争。主要由于美国的势力使我们的发展受到限制，我们如果占领了南京、上海那样的大城市，美国一定要干涉。……苏联现在虽然并不直接帮助我们，甚至不多讲话，但还是真正援助我们的，是不帮助的帮助。”这段话实际上是对中苏条约所做的一个解释。

毛的结论是：“我们现在在全国范围内大体要走法国的路，即资产阶级领导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这就是说，国共争执近一年的联合政府还是参加政府的问题，以中共走法国道路参加政府而暂告一段落。这标志着数月前中共七大所确立的联合政府的政治目标，至此发生重大挫折。当然，与法共参加政府不同，中共是不交枪的。毛强调：“只要把军队拿在手里就有办法”。另外，既然是参加政府，筹建解放区联合委员会一事当然随之停止。最后，毛的结论是：“七大时讲的长期迂回曲折，准备最大困难，现在就要实行了。”^① 这就是说，毛是以走曲折道路的思想准备，来应对重庆谈判的。

这次会议尚未决定毛是否赴渝，周恩来说：大家关心的是毛亲自出去的问题，这个今天还不能十分肯定，因为总要谈得拢才

^① 以上均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95~400页。

能出去，今天也不能做不出去的決定，看我出去談判如何再決定。^①

張聞天說：同國民黨談判還是要採取攻勢，討價還價總是要賺點錢，要拿出不怕決裂的姿態，寸土必爭。但某些必要的讓步還是要的。毛主席不必要馬上去，可以等談得差不多時去。而且成交是否一定要毛主席去，也不一定，要看談判如何再講。^②

這次會議擬定了對國民黨的六項要求，此即8月27日發表的“中共中央對目前時局的宣言”。第一項要求承認解放區和軍隊，第六項要求成立聯合政府。為什麼已決定參加政府而又提聯合政府？事後看，重提聯合政府只是談判上的一個策略，試圖以這個問題的讓步，換取國民黨對第一項要求的承認。

中共8月23日政治局擴大會議前後，斯大林曾兩次來電敦促毛赴渝。斯大林來電原文已不存，其內容均為當事人回憶的大意。8月22日來電大意为：中國不能打內戰，否則中華民族有被毀滅的危險，毛澤東應赴重慶和談。^③ 該電的目的是敦促毛赴渝，而理由是中華民族有毀滅的危險。據說這一點引起毛極大的不快。之後，斯大林又有一電，大意为：儘管蔣介石挑釁想打內戰消滅你們，但是蔣介石已再三邀請你去重慶協商國事，在此情況下，如果一味拒絕，國內、國際方面就不能理解了。如果打起內戰，戰爭的責任由誰承擔？^④ 該電的目的仍是促毛赴渝，但說理則充分得多，尤其是國內外的理解和內戰責任兩點，相當透徹。這兩點是毛在23日政治局會議上沒有講到的，足以引起毛

① 《周恩來傳》，第592頁。

②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張聞天傳記組編《張聞天年譜》下卷，第719頁，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

③ 《周恩來年譜》，第613頁。

④ 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第308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

从新的角度来认识赴渝问题。

多年后的1960年夏，在北戴河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就中苏两党关系做了一个系统报告，其中谈到重庆谈判时斯大林的这两份电报。周说：苏联当时要我们服从他的外交路线，生怕跟美国发生冲突，生怕中国内战打起来会引起又一次大战，所以斯大林用很严厉的口气要我们去重庆谈判。周又说：斯大林认为如果我们要对国民党进行自卫反击战争，美国就会用飞机、大炮、海军帮助国民党，苏联也得受中苏友好条约的束缚，在道义上支持国民党政府。他就是给我们这样大的要挟，硬是要压我们同意接受和平谈判。周说，中共当时主要考虑到抗战八年之后人心思和，我们如果拒绝谈判，很显然是不策略的，因而决定去谈，谈得成谈不成，责任在国民党。^① 周恩来用“要挟”这个词来描述斯大林的来电，可见来电是“很严厉的”。

另外美国国务院在1949年发表的白皮书中认为：“毛氏出人意料地接受邀请而到重庆，可能部分地由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由中苏条约的宣告所促成，该条约保证苏联援助作为中国惟一的政府的国民政府。”^② 而王世杰由莫斯科归国途中即预言：“中苏条约签订以后，中共愈觉无援”。之后王又写道：“蒋先生三电毛泽东，促其来渝商和平建国大计，毛氏突又应允来渝，盖中苏条约成立后，中共之势力益孤也（实际上苏联或已暗中促使中共与中央政府妥协）”^③。

看来，美、蒋两方是把毛所以赴渝一事记在苏联账上了。总之，中苏条约与斯大林的来电，对于毛赴渝的决定，究竟完全没

① 以上均见吴冷西《十年论战》（上），第32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吴冷西参加了这次北戴河会议。

②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169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

③ 《王世杰日记》1945年8月18、27日。

有作用还是有部分作用？尚待研究。

8月23日，蒋三电毛：“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兹已准备飞机迎迓”^①。看来蒋是咬定非毛来不可。

由于中共23日政治局会议的决定是周先去，因此毛于8月24日复电蒋：“鄙人亟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之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进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②。仍未同意立即赴渝。

但周先毛后这一安排第二天突然变化，8月25日，魏德迈电请毛赴渝，当日，毛复电魏德迈：“鄙人及周恩来将军可以偕赫尔利大使同机飞渝，往应蒋委员长之约”^③。为什么突然改变决定同意立即赴渝？因为蒋已经三邀，按中国通常的习惯，不会有第四次了。

8月26日，中共政治局再度研究毛赴渝一事，毛说：我去重庆的问题，昨晚政治局七同志与若飞同志商谈，决心答复魏德迈的电报，去，这样可以争得全部主动权。要充分估计到蒋介石逼我城下之盟的可能，但签字之手在我。必须做一定的让步……我们让步的第一批是广东至河南，第二批是江南，第三批是江北……如果这些还不行，那么城下就不盟，准备坐班房。^④

综上所述，在蒋、毛的几次往来电中，中共由有条件谈判到

① 《中央日报》1945年8月25日。

② 《大公报》1945年8月26日。不知何故，该电《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均未刊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4卷，是根据手稿收入该电，该电手稿与《大公报》所载电稿，文字略有出入。

③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13页。

④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14页。

无条件谈判，再到毛亲自赴渝谈判；中共由一半人口和一半国土面积的政治代表身份，向国际社会提出参加联合国会议等等要求，变为内定向蒋让出几批根据地；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都是一种政治的逆转，而这种逆转决定了在即将到来的谈判中，国共两党各自的态势。

五 谈判的主题与双方的策略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抵渝。毛在机场有一个简短的书面谈话，表示：“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①。这篇看似平淡的谈话，实际上包含了中共参加此次谈判的总体策略，这就是为“统一”设置了一个“民主”的前提。

这篇谈话避开了两个敏感问题，对此，记者们没有放过。当毛离开机场到张治中公馆稍做休息时，大公报记者问：“你这谈话里没有提到党派会议与联合政府，这次洽谈是否仍打算在这两件事上谈起呢？”显然，记者们很清楚，这两个问题是国共分歧的焦点。毛答：“这一切包括在民主政治里了，还要看蒋先生的意见怎么样。”接下来大公报记者又提出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在毛赴渝的前一天，中苏两国按事前约定，于8月27日同时公布了中苏条约，《解放日报》亦于27日刊载了该条约，记者问毛对该条约的感想，毛答：“昨天还只看到要点，全文来不及看呢”。^②毛究竟何时看到中苏条约尚待核实，但至少23日还未看到，在2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说：“中苏条约是日本投降后签

^① 《毛泽东同志谈话》，《新华日报》1945年8月29日。

^② 《毛泽东昨抵渝》，《大公报》1945年8月29日。

字的，内容现在还未公布，大概苏军进军区域限于东北三省”^①。用“大概”来推测条约内容，表明苏联方面至少到23日尚未将条约内容告知中共。

人们对该条约的兴趣，主要是基于该条约对国共两党的影响。9月5日，毛首次对报界公开评论该条约，毛说：“该条约为远东和平之保障物。有人认为对我国之民主运动不利，实则相反，可拭目待之。又有人因苏联以国民政府为对象而惊讶，实则除国民政府而外，自无可为对象者”。^②毛显然是力求淡化中苏条约对中共的影响，淡化苏联因素对重庆谈判的影响。

不过，斯大林并不小视苏联的作用。8月30日，宋子文由美国致电蒋，报告斯大林与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的谈话。关于重庆谈判，斯大林说：“此次中央与中共在渝会议，必可获得协议”^③。此时重庆谈判尚未正式开始，斯大林对谈判结果却如此自信，显然，他是从苏联因素对中共的影响这个角度来看问题的。相信蒋看到这份来电后，必会增添几分底数。

重庆谈判的大致过程如下：

8月29日至9月3日，为预备会议，主要是双方就会谈议题交换意见。9月4日至10月5日为正式会议，会谈共12次。

9月4日至9月21日为第一阶段，共谈8次，双方论点正面交锋，是国民党的高压阶段。

9月22日至26日为僵持阶段，双方策略有所调整。

9月27日至10月5日为第二阶段，共有4次会谈，为妥协阶段。

10月5日至10日为收尾阶段。

① 《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4页。

② 《大公报》1945年9月6日。

③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5年8月30日。

可以说，这是一种常规的谈判过程。

国民党的谈判代表原定4人：张群、张治中、王世杰、邵力子。王世杰因赴伦敦参加五国外长会议，没有参加正式会谈。中共代表为周恩来、王若飞。

此次谈判双方各有一位代表担任阵前搏斗，此二人为张治中与王若飞，各有一位代表担任阵中调度，此二人为张群和周恩来，双方主帅当然是蒋与毛。

8月29日，蒋为谈判拟定了三项原则：一、不得于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三、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①第一条是基础，即以现政府的法统为基础，在此基础上谈改组政府，问题又回到年前的“参加”政府问题上；第二条是解决问题的方式，一次性解决；第三条是目标。

为确保目的，蒋为谈判制定出一个总体策略，此即：“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②早在1944年3月林伯渠赴渝谈判之前，蒋即制定了“政治放宽，军事从严”的方针，看来，这是蒋与中共打交道所采取的一贯的方针。

蒋所提出的这个问题，其实就是那个年代的政治学。在中国，政治是以武力为基础的，没有武力的政治是脆弱的、无效的，因此，只要解决了武力，等于解决了政治。蒋深谙此道，故而提出以政治的“极度”宽容，来换取军事的“不稍”迁就。

然而，蒋介石的全部不幸在于，他的对手是毛泽东。毛早已

^① 《蒋总统秘录》第14册，第19页，台北《中央日报》出版部，1986。

^② 《蒋总统秘录》第14卷，第18页。

指出：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便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毛几乎直接针对蒋提出的这个问题做了回答，毛说：“这些人们向共产党人说：你交出军队，我给你自由。根据这个学说，没有军队的党派该有自由了。但是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只有很少一点军队，国民党政府的‘清党’政策和屠杀政策一来，自由也光了。现在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国民党的民主分子并没有军队，同时也没有自由”。^①正因为因此，毛在来渝之前在提出走法国道路的同时，就强调“只要把军队拿在手里就有办法”。基于这个认识，中共参加重庆谈判的基本策略，与蒋相同，同样是政治上可做若干让步，但在军事上则不做任何实质性的让步。

蒋、毛两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如此相似，这一点预示，重庆谈判尚未开始，但大致的结果已经产生，此即：双方可以在政治上达成若干协议，但在军事上则不能达成实质性的协议。

9月2日上午，毛泽东与王世杰做了一次较为系统的谈话，实际上将重庆谈判中将要涉及的主要问题都提了出来。据王世杰事后整理的一份谈话记录，共谈八个问题，关于中共军队问题：“毛氏谓中共军队须改编为四十八师。予拒绝讨论”。“毛氏表示谓宜以北平行营给予中共将领，俾秉承蒋委员长之命，指挥中共在山东、江苏、河北、热、察、绥等地方之军队。予谓此不可行。”^②

9月2日晚，“晚间蒋先生与毛泽东面谈，谓中共军队可改编为十二师。毛未答。”^③9月3日上午，王世杰记载，“午前予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6页，人民出版社，1953。

②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2），第39页。

③ 《王世杰日记》1945年9月2日。

续与毛泽东商谈，毛要求改编中共军队为四十八师，予谓不可能。”^①

看来，在预备会议阶段，问题集中在中共军队的数额问题上。此前，国共谈判表现为，中共向国民党提要求，谈判主要以国民党为问题的对象。这一回则相反，转换为国民党向中共提要求，谈判主要以中共为问题的对象。这种转换，反映了两党所处态势的转换，这一点正是重庆谈判的基本态势。

9月3日，周恩来、王若飞首先将中共方面的谈判方案，即《谈话要点》，交与国民党方面，共十一项大的条款，其中关键是九、十两项，全文如下：

“九、政治民主化之必要办法：

（一）政治会议即党派协商会议，以各党派代表及若干无党派人士组织之，由国民政府召集，其讨论事项如下：

1. 和平建国大计。
2. 民主实施纲领。
3. 各党派参加政府问题。
4. 重选国民大会。
5. 复员善后问题。

（二）确定省县自治，实行普选，其程序应由下而上。

（三）解放区解决办法：

1. 山西、山东、河北、热河、察哈尔五省主席及委员由中共推荐。

2. 绥远、河南、安徽、江苏、湖北、广东六省由中共推荐副主席。

3. 北平、天津、青岛、上海四直辖市由中共推荐副市长。

4. 参加东北行政组织。

^① 《王世杰日记》1945年9月3日。

(四) 实施善后紧急救济。

十、军队国家化之必要办法：

(一) 公平合理整编全国军队，分期实施，中共部队改编为十六军四十八个师。

(二) 重划军区，实施征补制度，中共军队集中淮河流域（苏北皖北）及陇海路以北地区（即中共现驻地区）。

(三) 保障整编后各级官佐。

(四) 参加军事委员会及其所属各部工作。

(五) 设北平行营及北平政治委员会，由中共推荐人员分任。

(六) 安置编余官佐。

(七) 解放区民兵由地方编作自卫队。

(八) 实行公平合理之补给制度。

(九) 确定政治教育计划。”

第九、十两项所涉及的就是解放区与军队问题，中共全部重大的让步与不让步都包括在这里面了。

作为让步，两条款不再提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正式表示“参加政府”和“参加军事委员会”，从而将1944年9月以来，国共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至少在文字上告一段落。

未做让步的即解放区与军队。由于解放区这一名称不便保留，中共提出了山西、山东、河北等十余省市的地方行政职务的要求，同时提出重划军区的要求，将中共军队驻区安排于上述区域之内，从而确保中共控制区行政与军队不分离。这样，可使国民党在形式上完成政令、军令的统一，而实质上仍然将解放区保留下来。

这个方案，实际上就是中共方面的“政治从宽、军事从严”的方针。

看到中共方案之后，蒋要求国民党的几位代表，根据他与毛

谈话的几个要点，制订国民党方面的会谈方案，并且“随时将两方谈话情形作成记录，通知美国与苏联大使”。这就是说，至少在蒋看来美、苏两方是他的后盾。蒋不仅在促成会谈问题上借助了美、苏两个背景，并且在会谈过程中仍力图借助美、苏的影响。

蒋自拟的与毛的谈话要点有四项：1. 中共军队最多编为12个师，军队驻地可双方协商。2. 解放区问题，“为事实所绝对行不通者”。表示在军令、政令统一的前提下，县、省行政人员包括省主席，可以“延引中共人士参加”。3. 政治问题。拟将国防最高委员会改为政治会议，由各党派人士参加。因国民大会即将召开，因此政府不做变动，待国大召开新政府产生之际，各党派均可依法参加。4. 国大问题。已当选的国大代表仍有效，中共方面如欲增加代表，可以增加代表名额。^①

这个要点具体体现了蒋的“政治从宽、军事从严”的方针。

根据蒋的四项要点，国民党制订了与中共方案相对应的十一项条款，针对中共的十一项，逐条做出同意或不同意的答复。题为《对于中共九月三日提案之答复案》，9月8日由张群交出。

综上所述，随着双方提案的提交，双方的着眼点与策略随之具体化，主题的正面交锋即将展开。

大约考虑到如此有利的态势，王世杰对于谈判的成功似乎颇为自信，于是决定不参加谈判，“予决定赴伦敦出席五外长会议。因中共问题大致可望成立协议，予纵不参加到底，亦似无妨也”^②。王于9月4日离渝赴英，他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昨日深晚，予以一函致毛泽东，告以如对具体问题要求过甚，则谈判又

①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2），第44～45页。

② 《王世杰日记》1945年8月31日。

或僵持。并告以彼与蒋先生在性格及信念上，似不难合作”^①。王的这一看法不知根据何在，毛与蒋在性格和信念上能否合作答案即将做出。

六 主题的交锋与两党政治理念的展示

重庆谈判的主题交锋，就是政令、军令的统一问题与解放区问题的交锋。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问题本身，既是双方现实利益的集中体现，同时又直接触及双方的政治理念。

通过具体的政治利益的争论，引出各自的政治理念的阐述，从而将具体与抽象融为一体，这在国共谈判史上是十分少见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重庆谈判既是双方现实利益的碰撞，也是一次国共政治理念的集中展示。

9月4日晚，重庆谈判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谈，几乎没有多余的铺垫，会谈直接切入主题。张群说：“兄等此次所提条件，距离实在太远，由此可知我等商谈之基础尚需加强”。张的意思是，中共的方案没有谈判的基础。周恩来接过话题说：“我等已作了尽可能之让步，第一，认为联合政府既不能做到，故此次并不提出，而只要求各党派参加政府。第二，召开党派会议产生联合政府之方式，国民党既认为有推翻政府之顾虑，故我等此次根本未提党派会议。第三，国民大会之代表，中共主张普选，但雪艇先生与毛先生谈话时既认为不可能，中共虽不能放弃主张，亦不反对参加，现亦未打算在北方另行召开会议。凡此让步，皆为此次谈话之政治基础……足可保证此次谈判之成功。”

至此，中共明确表示不提联合政府，不提党派会议，“未打

^① 《王世杰日记》1945年9月4日。

算在北方另行召开会议”，指不开解放区代表大会，当然，这个意思就是不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周的上述意思，就是说这些政治让步足以作为谈判的基础。

在中共宣示了政治让步之后，国民党开始陈述自己的让步。邵力子说：“我亦承认兄等此次商谈已有若干让步，但兄等须知中央之让步，亦已达最大之限度”。政府方面的让步主要有两点：第一，将国防最高委员会改组为各党派参加的政治会议，邵力子认为：“此不仅采纳中共之意见，亦系容纳多方面之意见”。第二，关于参加政府问题，邵力子说：“主席原望于国民大会召开以后，新政府成立之时，欢迎各党派参加，然此时中共如即欲参加亦无不可。此种方式，虽非联合政府，然与丘吉尔首相当年所领导的英国战时联立内阁，精神上并无差别。可知中央之让步，已达最大限度”。

不难看出，双方所表示的让步，都是政治方面的，都力图通过这些政治让步，换取实质性结果。接下来的交锋转入实质。张群说：“兄等昨日所提出之九、十两条，实为问题之症结所在”；“我们站在国家行政立场说，我们国家要求政令的统一”。这是针对中共对华北等地行政职务要求所言，实际上就是针对解放区。

对此，周恩来的解释是：中共在国大问题上已做让步，国大召开后，国民党将成为第一大党，中共将居于少数党地位，为维护中共的地位，故要求由中共担任若干省市的领导职务，“要求政府承认我党在现有地区的政治地位”。周的意思是，中共承认了国民党在中央的地位，国民党亦应承认中共在地方的地位，从而“使两党均可安心”。周认为中共这一要求并不违背政令统一原则。周说：“我党所争者，惟在人事与组织，即于政令统一的原则之下，我党只求人事与组织之调和配合，而决非于中央体制与法令规章之外，另外成立一种相反的体制与法令系统”。周的

意思是，中共对若干省市的要求，只是为了安排人事与组织，并且所行法规与中央相同，而所行法规相同，就是政令的统一。周的这个解释是否说得通，那是另一个问题，其核心意思，就是要维护中共在地方的地位。

周的这个解释是软的一手，接下来王若飞的发言便是硬的一手。王说：“我党所提建议案，其第一、二两项，即系承认国民党之政权，并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而我党今日所要求于政府者，亦无非在于事实之承认。此种既成事实，如不蒙政府合法承认，则客观上仍然存在。今日我党客观之事实为何？即拥有一百二十万军队，十九个解放区政权”。王若飞的意思与周恩来相同，即要求彼此相互承认，不过王是以中共的既成事实即实力来要求这一点的。张群说：“我的意见，所谓政治地位，不必与解放区相提并论”。力图将两个问题分离开。王若飞说：“承认中共之政治地位，必须承认中共解放区之事实，及其军队与人民所树立之政权等，否则恐难期问题之解决。”表明两个问题不能分离。

张治中接过话题说：“就中共立场而言，中共是否必须争地盘争军队，始保证其地位？余认为不然”。“若飞兄说要承认事实，我当然承认你们有文武人员的事实，但兄等亦须承认一事实，即国家已走上现代统一道路的事实，国家为酬庸将领，决不能学古代的裂土封侯！”^①

以上是第一次会谈的基本情况。

就通常的程序来讲，第一次会谈大致上都是提出问题，这次会议也是这样。会议一开始便把重庆谈判的核心问题提了出来，此即解放区的“统一”问题。中共方案的实质是：将解放区的

^① 以上均见重庆谈判 1945 年 9 月 4 日会谈记录。《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 7 编（2），第 44～45 页。

名称予以变更，以此表示统一，而将解放区的实体予以保留，以此维护中共的政治地位。国民党方面的意见简单明了，要求中共将政治地位问题与解放区问题脱钩。

这样，在解放区的统一这个总的题目之下，问题向前推进一步，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共应怎样维持其地位？这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命题，其特殊性在于：它既是一个现实的政治利益问题，又是一个民国政治理念问题。以后的谈判实质上以这个问题为中心。

9月8日，双方举行第二次正式会谈。

周首先说：报纸言论“说我们为‘割据’，似此理论之争，我方亦将强调结束党治，召开党派会议，组织联合政府，以相对抗”。“本来我方提案主张召开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如能通过，即可结束党治，实行普选，而一切军队之整编，省区问题之处置，皆可由联合政府办理……即不必再如今日要就个别问题来商谈。只以此项提案未曾获得政府之同意，所以这次毛同志来渝，即不再提，而改提日前之十一项建议。此次建议之精神，在承认国民党政府的法统，与蒋主席的领导地位”。

第一次会谈是在承认政令军令统一的前提下进行的，单纯地在这个题目下做文章，中共明显被动。第二次会谈总的说仍然以统一为前提，并且周首次明确表示承认国民党的法统，但周做了一个暗示：如不能获得彼此承认，中共可能重新回到联合政府的要求，由联合政府来解决统一问题。

张治中接着说：中共提出的省区要求，“犹如分割地盘，我们不敢赞同”；并表示中共军队十六个军四十八个师的要求，“数字太大，我们不能接受”。

王若飞说：“今要解决国共两党问题，必须承认现实——即两党皆有军队，皆有政权”；“此次我等来渝，乃正视现实，承

认国民党政府之法统，与军令政令统一之原则。但亦要求政府承认我党解放区政权与军队，彼此互相承认，正视现实，始能求得问题之解决”。

王若飞的话将问题挑明，此即双方军队与政权皆属“两党”，故须彼此承认。但既然对方在法统上据有正统地位，那么其军队便不认为是党军。张治中说：“兄谓两党皆有军队，殊有未当”，“现在中央军队并非国民党之军队，而乃是国家的军队，将来国民大会制颁宪法，实施宪政，本党还政于民，则军队即是人民的军队。既然国民党已无军队，则中共复何理由要保持其一党所私有之军队”。王若飞接着说：“国民党现在尚在党治时期，故所称中央军队尚是国民党之军队”。

邵力子变换一个说法，他说：“今中共要促成国家和平统一，而又要政府承认其所造成之既成事实，实不可能。反之，如中共放弃武力与地盘，诚意奉之国家，则以蒋主席之精诚谋国，天下为公之作法，不仅不致亏待中共，而且将敬重不置”^①。以蒋介石的“天下为公之作法”，来要求中共放弃武力与地盘，不能不说是一个笑话。

第二次会谈总的来讲，仍是在承认国民党的法统的前提下，在政令军令统一的前提下，作是否彼此承认的争论。这次会谈在实质上又深入一步，即国民党军是“国军”还是“党军”，这个问题的潜词，即国民党政权亦为一党之政权，因此，中共政权不能交给他党政权。对此，中共方面尚未将话说透，说透这一点，便是最后的摊牌，此时尚不是摊牌的时候。

9月13日，延安中共中央书记处向各中央局通报重庆谈判情况：“蒋表面上对毛、周、王招待很好，在社会上造成政府力

^① 以上均见重庆谈判9月8日会议记录。《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2），第56~60页。

求团结的气象，实际上对一切问题不放松削弱以致消灭我的方针。……使用强大压力，企图迫我就范。特别抓紧军队国家化问题。因此在谈话态度上只要求我们认识与承认他的法统及军令政令的统一，而对我方则取一概否认的态度。”^①这便是双方初步交锋的情况。

9月10日、11日、12日举行的三次谈判，主要议题为政治会议和国大问题。在张治中的建议下，政治会议改称政治协商会议。

9月15日举行第六会谈，议题重新回到解放区和中共军队数额问题。

张群开门见山表示：“兄等本月三日建议案内关于省区之拟议与国家政令之统一不符，碍难考虑。故此一问题，商谈至今已经挺住，我等亦想不出任何方法”。把难题放在中共面前。周恩来表示可以两个方式解决解放区问题，一是中共原提案所拟由中共推荐人员担任行政职务，二是由当地人民选举，再由政府任命。周说：“例如山东全省一一九县，何思源能治理者不过三数县，而中共解放区截至最近泰安收复为止，已有八十余县，皆有民选之县长……中央即可承认加委”。张群说：“山东已有中央任命之省政府，中共所占各县，自亦已有省府委任之县长”。王若飞说：“中央虽委有县长，然皆未进入县境，一如过去东四省主席远离省境，驻在重庆者然”。谈话至此，又一次“挺住”。

接下来张群问道：“是否你们军队所驻之地，即所谓‘解放区’”。周恩来说：“当然驻于现在之‘解放区’，不能驻在他处”。这是个很明白的问题，中共军队不驻解放区，便没有解放

^① 中共中央统战部等编《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12、13页，档案出版社，1988。

区了。

为表示让步，王若飞接着说，中共在海南、广东、湖南、湖北、江苏、浙江以及京、沪、杭等地军队，可以撤至淮北与黄河以北地区。

张群表示：“兄等所提军队问题，与中央规定相去如此之远，实无法再谈。又如解放区问题，余非不了解兄等之意见，然中央之主张，已不能再有变更，故此二者均未能获得协议”^①。

这次会议表明，在中共军队和解放区两个问题上，国民党方面均予“挺住”，张群表示“我等实不能再作任何主张”，建议由蒋、毛直接商谈，以向中共施加压力。

9月19日，举行第七次谈判。此刻中共已做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决策，与这个决策相配合，周恩来在这次会谈中一开始便提出中共的两项让步，以期打破僵局。军队数额问题，周表示可让步至与国民党军7:1的比例，将原来的48师要求改为43师，让步5个师。周同时表示：“如中央军队缩编为六十师，中共应为十师，中央军队如缩为一百二十师，中共应有二十个师”。

在解放区问题上，周表示撤离黄河以南八个地区，“而将中共所有之四十三个师集中驻防于山东、河北、察哈尔、热河与山西之大部分，绥远之小部分，与陕甘宁边区等七个地区。至于解放区亦随军队驻地之规定而合一，换言之，即山东、河北、察哈尔、热河四省与陕甘宁边区之主席，由中共推荐；山西、绥远两省之副主席，天津、北平、青岛三个特别市之副市长，亦由中共推荐人员充任”。

这个方案与中共9月3日的最初方案相比，由中共推荐省主

^① 以上均见重庆谈判9月15日会谈记录。《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2），第79~85页。

席人选的省份，山西改为中共推荐副主席。由于中共已考虑撤出黄河以南地区，因此原方案中黄河以南地区几个省副主席的要求也随之取消，对于特别市副市长的要求则除去了上海。

这个让步所反映的政治特点为：“解放区亦随军队驻地之规定而合一”。军队撤出地区，解放区即撤消，军队驻地即为解放区，两者不可分离。

对于中共这个新的让步方案，张治中这样评价：“关于军队问题，兄等要求太过，不必再讨价还价。余以为此一问题，非距离之大小问题，而为根本观点之不同的问题。中共之观点，总认为必有军队、有地盘，控制军政机关，始有保证。而中央则认为军令政令必须统一，于此原则之下始可解决问题。如依中共之办法，则非为谋军令政令之统一，而完全为分裂。所谓民主，乃分裂之民主，所谓统一，亦系分裂之统一。兄等试思：中共军队悉数撤退至黄河以北，而据有黄河以北之地区，是无异分疆而治，欲三分天下有其一。”^①

中共撤离南方数省的战略意图，正是要改变根据地过于分散的状况，而在黄河以北地区建立联系一片的战略根据地，这个意图看来张治中十分清楚。国民党方面不愿与中共做“讨价还价”式的谈判，而欲根本解决问题。为此，张治中提出了“根本观点”问题，所谓“根本观点”，也就是对国家的根本认识，这个问题一经提出，谈判也就接近最后的摊牌了。

9月21日，周、王与张、张、邵举行第八次会谈。由于前面“讨价还价”式的谈判不能解决问题，这次会谈双方围绕“根本观点”做了大量的阐述，这次会议实际上是重庆谈判最后

^① 以上均见重庆谈判9月19日会议记录。《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2），第86~88页。

的摊牌。

张群头一句话便宣布：“今天商谈关于军事问题”。接着，张治中就中共军队数额和解放区问题讲道：“须知军队扩充如此之多，决非良好现象，将来宪政实施时期，亦必不需藉武力作一党参与政治之保障”。“我前天讲话时业经说明我们的根本观念不相同，我今天深觉当前国家局势，急需迅速结束军事。……而要解决问题，又须首先培养信心，故兄等所提出之方案，不可使人怀疑，反至有碍信心之培养。即如兄等所提华北四省主席应由中共推荐，省政由中共主持，此何异乎割据地盘，是否中共欲由此四省以北联外蒙，东北联东三省，果如此，则兄等究系作何打算，作何准备”。

周恩来接着说：“殊不知我党所有军队政权，并非不愿交出，倘依去年我党之提案，召开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成立联合统帅部，则我党一切军队与政权皆可交与政府处理。……但现在政府尚在国民党党治时期，我们何能将军队政权交与一党之政府”。王若飞说：“军队要国家化，所谓‘国家’乃人民的国家，而非一党的国家。如能召开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与联合统帅部，则一切军事政治问题皆可解决。”

所谓“根本观点”就在这里，就是对“国家”的认识。国民党以国家代表的立场，要求统一，而中共则认为对方政权为一党之政权，故不能将自己的军队政权交与他党。

接下来张群谈到另一个“根本观点”，张说：“我以为问题之症结所在，还是军队，就党派合法承认，平等合作而论，如中共不以军队为一党私有，则各党派团结合作，原是平等的，也是容易实现的。政治亦然，倘不与军队牵连一起，亦极容易解决。……我们谈到军队问题，不可将军队驻地与省区和省之行政混连一起”。张群还说：“打破地盘观念”，“我们只能有国军，不能有省军，只能有国防，不能有省防”；“否则，如将军队与省区

及省地方行政混而为一，则对外间割据之讥，将何以自解”。

张群这段话又是一个“根本观点”，即军队与政治的关系，军队与驻地的关系问题。周恩来在9月19日会谈中提出解放区随军队驻地而合一，张群则要求军队与解放区分离，否则便是割据。张群所说与张治中一样，是以“国家”的名义提出问题，故而论点不能说不充分，然而问题又回到了始点：国民党政权是否代表国家？

王若飞接着说：“你们国民党作了些什么？”意思是国民党有什么资格以国家自居，而提出对中共的要求？对此，张治中从容答道：“国民党领导国民革命，推翻满清专制，创造中华民国，彼时中国共产党尚不知在何地方。一个国家必有政府，有了政府，必须承认政府与人民的关系，你们既承认国民政府，即须将一切问题，在政府法令规章所能允可的范围之内来求得解决”。张治中这段话是对国民党政权的来自与权力行使的根据所做的说明。中华民国为国民党所创造，那么国民党行使国家权力便是天经地义的，也就是说，国民党与国家、政府是一个整体，“人民”必须服从国家、政府、国民党。

邵力子接过话题进一步说：“政府是中华民国的政府，中华民国的人民，就是政府的人民，中华民国的土地就是政府的土地，政府职责所在，当然有权治理”^①。

张、邵之言，通常意义上讲是可以成立的，但对于从事社会革命的中共来讲，问题本来就不在同一个法理范畴之内。中共所信奉的，是社会革命这个另外的法理，因而国民党的法理对于中共并不具有约束性。但由于中共出于策略考虑已承认国民党的法统地位，因此对张、邵之言不便做正面反驳。然而问题在于，政

^① 以上均见重庆谈判9月21日谈判记录。《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2），第89～97页。

治是现实的，法理上成立与否，并不等于事实上成立与否。仅凭一句政府有权治理的话，并不能解除中共的 120 万军队。

这次会谈是双方的一次摊牌，自此，会谈陷入僵局。

七 僵持下的妥协——不了之局

在 9 月 19 日谈判中，周恩来提出中共军队数额，采取与国民党军 7: 1 的比例解决，这一建议当即被张治中拒绝。张说：“无论其为五分之一，或七分之一，皆不适当……故不如直截了当确定数额之为愈。”^① 当谈判陷入僵局后，赫尔利出面对国共双方均施加了压力，他一方面压蒋同意将中共军队数额增至 20 个师，另一方面压毛同意接受这一数额，要求中共不能按与国民党军的比例缩编。最后毛大致上接受了这一数额，但在解放区问题上仍未让步。

当谈判陷入僵局的困难时刻，作为调停人的赫尔利按预定计划返美述职。赫尔利临行之前，要蒋介石亲自写了一个保证毛泽东安全返回延安的保证书，赫尔利拿到这个保证之后，告知了周恩来。^②

9 月 22 日，赫尔利离华，同年 11 月在美辞去驻华大使职务，此后他再也没有来到中国大陆。

在谈判陷入僵局之际，中国政坛的另一政治力量民盟又是怎样认识此次谈判的呢？张澜于 9 月 18 日发表致蒋、毛的公开信，其中写道：“如谓‘民主必恃武力始能保障’，则民主之为民主，

① 重庆谈判 9 月 19 日会谈记录。《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 7 编（2），第 90 页。

②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第 323 页。此事为 1960 年夏中共北戴河会议上周恩来所说。

岂不令人寒心？如谓‘统一必赖武力始能维持’，则统一之为统一，岂不令人气短？”^①这是一个中间立场。民盟是一个由左中右几派人士组成的政团，其中有些人士对中共有所不满，主要有两点：（1）对中共在谈判中不提联合政府，侧重于解放区与军队问题不满；（2）对民盟被排斥于会谈之外不满。在这些人士看来，解放区与军队问题，是中共一党利益，而联合政府问题，才是在野党的共同利益。

9月22日，毛泽东会见了民社党领导人之一的蒋匀田（张君劭赴美参加联合国旧金山会议之后尚未归国），以加强与民盟人士的沟通。毛对蒋匀田说：“商谈了近二十日，时间白费，毫无结果，已面临僵局了。”“我们触及两个问题：一个是军队分配的比例问题，一个是我们管理的地区自治问题，现在没有一个问题得到协议，可说商谈已经失败了。”蒋匀田对上面两个问题的争论没有兴趣，蒋匀田对毛说：“你们所商谈的问题失败了，甚可惋惜！可是从人民的角度，即使如此商谈成功了，那乃真的是失败。”蒋匀田具体解释道：“假使军队的分配比例能得到协议，将来中央政府以某种借口，增加一团宪兵，你是否按比例扩充你的兵力呢？假若不立即扩充，你将失其比例，假若你随之而按比例扩充，这将演成国内军备竞争。”这是军队问题。关于解放区问题，蒋匀田说：“假使中央不同意省有自治权，省主席由人民选举，一旦中央政府明令调迁绥远省主席任浙江省主席，绥远省主席从命乎？抗拒命乎？假使绥远省主席遵命而行，则贵党将失去绥远省的管理权了，倘使绥远省主席拒绝不从命，其结果则将如何？据鄙见所及，这将是延缓今日之战争为明日之战争而已。故从人民的眼光看来，是否为大大的失败呢？”蒋匀田阐明上述两点意见后，建议：“毛先生，我认为最好确守在飞机场

^① 转引自《重庆谈判纪实》，第167页。

上的书面谈话：争取民主与自由。只有真正的民主政府，始可为人民的福利而努力；而在野党的安全亦始能有所保障。假使毛先生同国民党的领袖讨论此类问题，应让其他少数党派领袖参与会谈，不宜仅限于贵党及国民党”。蒋匀田上述讲话，可以说是第三方面的代表性意见。

蒋匀田所说的“人民”，其实就是第三方面自己，蒋匀田的核心意思是，中共仅就军队和解放区问题与国民党争论，不能代表第三方面的利益，即“人民”的利益，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只有从民主政府即联合政府问题上入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一切问题。也就是说，中共的方针是舍本求末，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与核心。

对于蒋匀田上述意见，毛答：“希望你的高见能够实现”。关于从民主政府入手解决问题的意见，毛未作正面答复。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中共当然懂得，只是因种种政治牵扯，毛不便和盘托出，故称之为“高见”。关于中共的武装与第三方面的关系，毛则做了相当精辟的说明。毛提到民社党领袖张君勱，毛说：“他给我的一封公开信，想你亦必阅过。在那封信里，他主张要我们将军队交给蒋先生，老实说，没有我们这几十万条破枪，我们固然不能生存，你们也无人理睬。”^①在这里，毛精辟地指出了中共武装的存在，与第三方面政治命运的关系，指出两者命运是相连的，以期最大限度地取得第三方面对中共谈判立场的理解。

一般说，民主党派是很难理解，也很难支持中共保留武装的要求的，将中共的武装与民主党派的利益联系起来，此即中共做民主党派工作的主要方针。胡厥文、李烛尘等人宴请毛泽东时，也对国民党强调军令、政令统一而中共要求承认中共所辖军队、

^① 蒋匀田：《中国近代史转折点》。转引自《重庆谈判纪实》，第447、448页，重庆出版社，1983。

政权“感到迷惑不解”，毛答：没有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各民主党派和产业界人士要想有争取和平民主的发言权也是很困难的。^①

9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重庆谈判的第二次党内通知。通知指出：“三星期来，我方调子低，让步大（允逐退出陇海路以南），表示委曲求全，彼方乘机高压，破坏联合公报。因此我方政治上处于有利地位，一切中间派均为我抱不平，以为我们已做到仁至义尽……谈判将坚持原定方针转入第二阶段。”^②

9月27日，停顿多日之后，重庆谈判恢复进行，举行第九次会议。鉴于双方在解放区问题上无法取得一致，周恩来提出中共方面的新建议，即暂维现状，或将问题交由政治会议解决。周对此解释道：“暂维现状，即现各省政府所能治理之地，由省府治理之，省府不能治理者，由解放区治理之。此一办法如兄等尚不能同意，则最后之途径，只有交由政治会议解决之矣。”

张群接过话题说：“现在兄等主张暂维现状，此亦非问题之真正的解决。余等今日之商谈，正因为现状不可暂维之故也。”不予接受。邵力子对暂维现状没有笼统拒绝，而是对此提出限制性意见。当时，河北、山东基本为中共控制，邵力子强调：中共“不能阻止中央在河北、山东一带驻军”，“中共在山东、河北虽占有广大之地区，然交通线向在日军控制之下，将来自亦归中央接收，中央必须运用。”也就是说，解放区的暂维现状，不能阻止国民党驻军，并掌握交通线。这两条要求如果成立，实际上便不是暂维现状了。周恩来表示，在国共未取得协议之前，反对国民党军向解放区推进，其推进部队，“我方不能不怀疑其有武力

^① 《胡厥文回忆录》，第79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

^② 《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13页。

解决解放区之企图”。

尽管张群不愿接受暂维现状，但也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于是张群改为在暂维现状上做文章。张说：“我以为在现存局势之下，不妨实行一暂时之办法，即解放区各县……省政府应承认之，同时县政府亦应承认省政府，彼此互相承认”。省政府指国民党任命的省政府，省、县互相承认，等于要中共承认国民党——省，对解放区——县的管辖权，解放区仅以县为单位。张群最后说：“在宪法颁布之前，暂维现状之办法，惟有如前述省与县互相承认，不使发生纠纷而已。”^①

此次会谈表明，“暂维现状”的原则大体上被接受了，但具体应怎样暂维现状，仍有分歧。

9月28日、10月2日两次会议，主要议题为政协会议问题。

10月5日，会谈再次集中为解放区问题。张治中提出一个新方案，将中共解放区称作“行政专员区”，张说：“凡中共统治地区如数县连成一片者，即可由中共推荐行政督察专员。”这个提议的实质是，将张群关于解放区仅以县为单位的意见稍加扩大，扩大为专员区，省政府官员仍由国民党人士担当。周恩来说：“在苏北、皖北等地可以用此办法解决问题，至于冀、鲁、热、察四省，大部分甚至整个省区均在我方治理之下，自不可与此相提并论。”“现在冀、鲁、察、热四省大部分均在我手，中央必欲置一省府，岂非等于虚设。”周明确表示反对孙连仲、何思源主持冀、鲁行政。邵力子说：“何思源等早在鲁境主政，这个事实中共亦应承认。”周恩来说：“冀察热三省之省府，抗战时期均不在省境，而何思源虽在鲁境，然其所能领导之地区极为有限，故我等遂有此主张。”坚持中共人员担任各该省省主席。

^① 以上均见重庆谈判1945年9月27日会谈记录。转引自张九如《和谈覆辙在中国》，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68。

张治中说：“兄等现在分省而治之要求，不论基于何种理由，均将怀疑为中国之分裂矣。”周恩来说：“我以为中央用人，不可以党派分界。何思源、孙舫鲁可用，则中共之人又何尝不可用？”^①

最后，此次谈判仍无结果。此次会谈结束时，周恩来通报毛泽东拟于下周返延安。

自周恩来9月27日提出暂维现状后，重庆谈判实际上便没有什么可谈的了，但为什么迟至10月10日才正式结束？这是一个不大为人注意的问题。

蒋在9月27日日记中写道：对中共“如欲不惩罚汉奸，处置叛逆则已，否则，非从惩治此害国殃民，勾敌构乱之第一罪魁祸首，实无以折服军民，澄清国本也。如此罪大恶极之祸首，犹不自忏悔，而反要求编组一百二十万军队，与割据陇海路以北七省市之地区，皆为其势力范围，所有政府一再劝导退让，而总不能履其无穷之欲壑，如不加惩治，何以对我为抗战而死亡军民在天之灵耶！”^②

看来，蒋对中共准备采取某种“惩治”行动，什么行动不得而知，但就9月底至10月初这段时间蒋的主要活动看，蒋的主要注意力并未放在重庆谈判上，而是放在武力解除龙云职务的昆明事变上。

9月30日，昆明防守司令杜聿明按蒋的指令，于凌晨突然包围龙云住所五华山，由于龙云的滇军已被抽调到越南担任受降任务，昆明仅剩少量卫队，经数日武力对峙，龙云被迫下台。10

^① 以上均见重庆谈判10月5日会谈记录。《重庆谈判纪实》，第225、226页。孙连仲字仿鲁，舫鲁为仿鲁之误。

^②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2），第102、103页。

月6日，龙云在宋子文、何应钦陪同下飞抵重庆，接替李济深出任军事参议院院长。自此，龙云离开经营多年的云南，处于蒋的监控之下。

以武力解除龙云职务，其理由是为了统一军令、政令，蒋于10月2日致函在越南主持受降工作的卢汉，解释道：“抗战胜利，国家急需统一军令政令。……特任志舟兄为军事参议院院长，调中枢供职，以全志舟兄晚节。”^① 龙云字志舟。唐纵也在日记中写道：“龙云负隅西南，为政令统一之障碍，今得解决，从此得无后顾之忧。”^②

龙云为桂系之外国民党第二大地方实力派，蒋选择重庆谈判期间，在对中共政令军令统一的要求受阻之后，以武力削除地方实力派，以武力求得统一，这是一种偶合，还是“惩治”中共的一种警告？恐怕只有蒋自己知道。

毛泽东在重庆的安全保障主要是赫尔利，蒋选择赫尔利9月22日离华之后以武力将龙云扣于重庆，是否有做给毛看的意思？总之，人们的第一个反应是，立即将龙云被扣一事与毛的安全联系起来。

由于龙云为张澜介绍加入民盟的秘密盟员，“张澜极为关怀龙云的安全。此刻蒋介石向龙云开刀，更使张澜对毛主席的安全忧心如焚，立即派人通知周副主席，敦促毛主席早日返回延安。”^③ 中共方面有关此事的直接记载，目前仅看到王炳南的几句话，据王炳南回忆，当从美军那里得知事变消息后，“我连忙深夜把主席叫醒，报告了这一消息。主席对此很重视，说

① 范承枢：《卢汉任云南省主席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86辑，第73页。

② 唐纵日记，1945年10月3日。《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545页。

③ 吕光光：《毛主席同张澜的会见》，《重庆谈判纪实》，第445页。

只要龙云能顶住就好了！要我们密切注意事态的发展，随时报告。”^①

迄今，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昆明事变对中共的直接影响。可以肯定的是，由于蒋的主要精力放在昆明事变上，这是导致重庆谈判延期结束的主要原因。

10月8日晚，张治中为毛举行招待会，张说：“大部分意见，我们已经一致了，就是和平、民主、统一、团结，在蒋主席领导之下，彻底实行三民主义。我们已经毫无差别的一致了。”毛的讲话强调“和为贵”，最后，毛高呼：“新中国万岁！”“蒋委员长万岁！”^②

10月10日双方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通常所说“双十协定”。其实，称“会谈纪要”更为准确，因为许多条款均为双方各自阐述不同意见，并不具有“协定”的性质。

会谈纪要共分12项，基本围绕中共提出的11项会谈方案，阐述双方的一致与不一致之处。由于双方在谈判中均采取了“政治从宽，军事从严”的方针，在此项方针引导下的谈判结果，在纪要中得到充分体现，双方的一致之处，多为政治方面，不一致之处多为军事方面。这是一个典型的政治上几分热烈，军事上几分冷淡的会谈纪要。

会谈纪要决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其议题为“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另外，解放区问题，“中共方面认为可将此项问题，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这就是说，会谈纪要所确定的政协会议议题为三项：和平建国方案、国大、解放区。显然，政协会议的性质，是延续重庆谈判的政治走向，

^① 王炳南：《回忆毛主席在重庆》，《重庆谈判纪实》，第431页。

^② 《大公报》1945年10月9日。

解决重庆谈判的遗留问题。

不知出于何方意见，也不知出于何种考虑，会谈纪要没有载明中共在此次谈判中最大的政治让步，即不提联合政府而提参加政府这个问题，但纪要却载明了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即“中共及地方军事人员应参加军事委员会及其各部的工作”，也就是否定了联合军事委员会的要求。

会谈纪要中所占篇幅最大的问题，即此次谈判的主题——解放区问题，其篇幅在纪要中接近一半。基本内容就是双方在谈判中主要的不同论点。中共军队数额问题，中共表示在若干条件下可编为 24 个师、至少 20 个师，国民党方面亦表示在若干条件下，可以考虑 20 个师。由于都提出了先决条件，这个问题等于没有解决。

纪要签字当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一同拜会了苏联大使彼得罗夫，此次拜访具有辞行的意思。据参加会见的苏联大使馆一等秘书 A. M. 列多夫斯基回忆：“毛泽东自己说得很少，主要由周恩来和王若飞讲。当提出政治性问题时，毛泽东缓缓向周恩来示意，于是由周作答。毛泽东只是不时以插话作补充。如果谈到军事问题，毛泽东就向王若飞示意。”^①显然，毛的情绪不高。

彼得罗夫提出一个问题：对蒋介石及其政策有何想法？毛答：“目前蒋介石在思想政治方面并没有深远的方针，或正如我们所说的，没有所有其他事物所环绕的中心环节。蒋介石本人也不知道该走哪条路，是走专政之路，还是走民主之路。蒋介石在对外政策方面不知道该依靠谁，是美国，还是苏联。

^① A. M. 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中国》，第 302 页，新华出版社，2001。毛、周、王 10 月 10 日拜访苏联大使馆一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周恩来年谱》均未记载。

由于苏联的国际影响，他不敢完全依赖美国；而依靠苏联，又感到担心。”^① 也就是说，蒋的内政和外交方针均未确定，而是处于观望、动摇状态。这是在告诉苏联，不可因中苏条约而信赖蒋。

10月11日，毛飞返延安。

八 重庆谈判留给历史的痕迹

从历史过程来看，重庆谈判表现为一次政治的反复，中共做出了重大的政治让步，此即对国民党法统的承认。对国民党法统的承认，必然导致几个具体问题的让步，此即：不提联合政府，不提党派会议，不召开解放区代表大会，并同意召开国大。从这个意义上讲，重庆谈判是中共联合政府的口号所遭遇的一次政治挫折。从政治态势上看，重庆谈判表现为国民党居于进攻的地位，而中共是防守。中共在内部通知中所说的“调子低”，就是此一态势的体现。

关于中共在重庆谈判中政治上的收获，毛泽东说：“这个会谈纪要，第一个好处是采取平等的方式双方正式签订，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② 也就是说，在政治上取得了与国民党平等的地位。毛泽东的这个评价，迄今，仍然是大陆学者对于重庆谈判的基本评价。单独从纪要文本来看，毛的说法可以成立，但与联合政府相较，此一平等与彼一平等毕竟不是一个意义上的平等。

另外，周恩来在1946年底的一次讲话中对中共在军事上的收获这样表述：“抗战初期只给我们三个师；林彪同志去时，我

① 《1945年10月10日苏联驻华大使 A. A. 彼得罗夫与毛泽东的会谈记录》，转引自 A. M. 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中国》，第46页。

②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33页。

们要九个师，蒋只给六个师；林伯渠主席去时，我们要十六个，蒋只给八个；毛主席去，一下就给了二十个师。”^①从这个叙述角度看，二十个师是一种收获，然而与联合统帅部的要求相比，二十个师则是极大的退让。

两年之后，1947年12月毛在一次会议上谈到重庆谈判时这样说：日本投降时，我们还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日本投降，抗战胜利了；惧的是优势问题未解决，蒋介石很强大，严重的内战危险临头……我到重庆那时候，蒋介石的事情好办，我们的事情不好办。^②所谓好办与不好办，此即国共两党当时的局面。

毛泽东有一个论断：“中国的政治力量是两头硬中间软。”^③两头指国共，中间指第三方面。这个论断就通常意义上讲是正确的，但具体而论，“中间”并非任何时候都绝对的软。

重庆谈判正式会议之前，民盟于8月30日发表“紧急呼吁”，要求：“我们主张由政府召集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的政治会议，解决当前一切紧急和重大的问题，包括产生在宪法政府成立以前的一个举国一致的民主政府。”^④这里所说的民主政府，就是联合政府，而此时中共已经内定不提联合政府。

重庆谈判结束之后，10月16日，民盟发表全国临时大会宣言，坚持道：“中国民主同盟始终相信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是当前国家和平、统一、团结的惟一途径”。这就是说，中共明确表示参加政府之后，民盟仍在坚持联合政府。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702~70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②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513页。

③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99页。

④ 《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新华日报》，1945年8月30日。

中共是在承认国民党的法统的前提下不提联合政府的，对此，民盟有不同看法。该宣言表示：“我们又认定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与当前党治的法统绝不冲突。在实际政治上，法统这名词应广泛地解释，灵活地运用，不可拘文牵义，因为一个名词失掉了国家和平、统一、团结的机会。”^①

将国民党的法统仅仅视为一个名词，并且是可做广泛解释的名词，实际上就是对法统的否定。民盟这个论点既是针对国民党的，也是针对共产党的让步而言的。这个宣言反映了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民盟的政治利益。尽管毛泽东在与民社党蒋匀田的谈话中，解释了中共的武力与第三方面根本利益的关系，然而，就现实利益而论，解放区问题的确很难直接体现第三方面的具体利益，而被认为仅仅是中共一党的利益。在第三方面看来，只有联合政府才能具体地体现他们的政治利益。由于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因此民盟对中共只谈解放区、不谈联合政府有所不满，这种情绪一直持续到政协会议。

毛在返回延安后当天的政治局会议上说：“民主同盟说我们调子低”，“我们是路线清楚而调子很低”。^② 这就是说，民盟这一回唱的是高调，“中间”派并非绝对的软。

其实，蒋也是一个失败者。从现象上看，国民党在谈判中并不侧重于军令的统一，并不要求中共取消全部军队，而是侧重于政令的统一，要求取消解放区，这就是说，蒋介石关于军事从军的方针并不直接体现于军队问题。对于这个多少有些不合常规的现象，中共至少与蒋保持着同样的清醒。周恩来后来说：“根据地比什么都重要。武装固然重要，但武装毕竟是保持根据地的工

^① 《中国民主同盟发表临代大会宣言》，《新华日报》，1945年10月19日。

^②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33页。

具，武装脱离了根据地就无法生存。蒋看清了这点，他也特别懂得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因此，他无论如何不承认。”^① 蒋是变换了一个手法，通过政令的统一而完成军令的统一。在解放区问题上，国民党强调“法统”，而中共则强调“事实”，结果，“事实”不能取得“法统”的承认，而“法统”亦不能取消“事实”。

本章小结 8月28日，毛在赴渝的飞机上对同行的胡乔木说：谈判“很可能是不了之局”^②。重庆谈判的最终结果是“暂维现状”，问题由现状提出，最后又回到现状，一个不是结果的结果，这正是一个不了之局。

重庆谈判留给历史的痕迹，主要是毛与蒋两位难得相见的对手，做最后的一次见面。

① 《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704页。

②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82页。

第六章 国共战略方向的确立与展开

重庆谈判的结果所以是“暂维现状”，根本原因在于日本突然投降后的短时间内，国共各自的战略地位均尚未最终确立，因此不可能在谈判桌上解决任何实质性问题。重庆谈判至政协会议之间的这段时间，是国共两党战略全面展开的时期，其意图，都是力图在军事推进上取得战略优势，在这个基础上，回过头来再做新一轮谈判。

重庆谈判期间，蒋下达一个密示：“目前与奸党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俾国军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待国军控制所有战略据点、交通线，将寇军受降后，再以有利之优越军事形势与奸党做具体谈判。彼如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则以土匪清剿之。”^①这个密示将国民党的战略意图说清楚了。

那么，中共的全盘考虑又是怎样的呢？毛泽东回到延安后，于1945年10月28日致电东北局：“我党决心动员全力，控制东北，保卫华北、华中，六个月内粉碎其进攻，然后同蒋开谈判，迫他承认华北、东北的自治地位”^②。也就是说，中共的方针同

①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28页。该电为张治中向胡宗南传达的总裁密示，见《近代史研究》1985年2期，第148页。

②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42、43页。

样是在扩展实力的基础上再来同蒋开谈判。

以上便是国共两党基本的战略意图。

一 中共战略方向的调整

毛泽东于上年在做南下部署之际，同时提出要注意东北。1944年10月7日，毛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说：“今后主要发展方向是南方，江南、湖南、河南。同时要注意东北，还要准备苏联打日本。”^①与国民党相同，中共所以提出注意东北，也是判断苏军的出兵方向是东北。基于这一认识，在中共七大期间，毛泽东更加强调东北的重要性。1945年5月31日，毛在七大上讲：“东北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域……如果东北能在我们领导之下，那对中国革命有什么意义呢？我看可以这样说，我们的胜利就有了基础，也就是说确定了我们的胜利。现在我们这样一点根据地，被敌人分割得相当分散，各个山头、各个根据地都是不巩固的，没有工业，有灭亡的危险。所以，我们要争城市，要争那么一个整块的地方。……如果我们有了东北，大城市和根据地打成一片，那么，我们在全国的胜利，就有了巩固的基础了。”6月10日，毛又一次讲道：“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②

毛泽东是从城市、工业以及“一个整块的地方”来认识东北的战略地位的。不过上述讲话还只是一种设想，问题提出来了，但当时并无实施的可能性，当时的总体方针仍然是南下。

王震部自1944年11月南下后，并未取得预期的进展，长时

^① 《彭真年谱》上卷，第249页。

^②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218、219、233页。

间滞留在鄂南为中心的湘鄂赣地区。王恩茂在一则日记中写道：“经过了八个月，我们的成绩很小，我们的消耗很大。”^①但毛并未放弃南下方针，1945年7月22日，毛指示王震等：“你们的惟一任务是争取目前一刻千金的时间，在粤北、湘南创立五岭根据地，并与广东我军连成一片，准备于内战时牵制南方一翼。”^②

在苏联出兵东北和日本准备投降后，1945年8月11日，朱德发布第二号命令：“为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并准备接受日‘满’敌伪军投降，我命令：一、原东北军吕正操所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二、原东北军张学思所部，由河北、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三、原东北军万毅所部，由山东、河北现地，向辽宁进发。四、现驻河北、热河、辽宁边境之李运昌所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③

上面这个命令表明了中共对东北的高度重视，但由于当时很多情况并不明了，中共并未采取鲁莽的行动。在公开发布上述命令的同时，又发出一个内部指示：“这个命令为对外宣传抢先取得国内外公开地位而发。除李运昌部外，并非要吕（正操）、张（学思）、万（毅）等部马上开往四省”^④。因此，最初开往东北的只有李运昌的五千人，主要任务是做战略侦察。

8月11日，毛以中央名义致电王震、王首道：“苏联参战，日本投降，内战迫近，你们任务仍是迅速到达湘粤边与广东部队会合，坚决创造根据地准备对付内战。”^⑤8月12日，毛泽东致电华中局，要求：“江南力量就现地向四周扩展”，“决不退回江

① 《王恩茂日记》1945年7月8日。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107页。

③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第274页，人民出版社，1986。

④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党史资料》第15辑，第194页。

⑤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2页。

北。”^① 江南力量指粟裕部。

以上两电表明，南下方针没有改变。

8月13日，毛在延安干部会议上讲话：“苏联出兵了，红军来援助中国人民驱逐侵略者，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这件事情所发生的影响，是不可估计的。”^② 不难看出，毛对苏军的到来是寄予极大希望的。为此，毛于8月20日，以军委名义致电几个分局，抽调万毅等兵力进军东北，毛要求对所调部队，“必须明确宣布去东三省之任务（乘红军占领东北期间和国民党争夺东北）。”^③ 显然，此刻毛对于中苏条约的内容仍然一无所知。

8月24日，中苏条约先后经国防最高委员会、立法院、国民参政会通过，尔后不久公布。在苏联与国民党合作的背景下，中共的东北方针不得不重新考虑。

8月26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与国民党谈判的通知，由毛泽东起草。通知首先指出：“由于红军顾虑远东和平（这是完全对的）及蒋介石垄断受降权利这两点，一般地决定了大城要道暂时（一个阶段内）不能属于我们。”也就是说，中苏条约是对中共占领大城要道的两点不利因素之一。通知最后说：“至于东北三省为中苏条约规定的范围，行政权在国民党手里，我党是否能派军队进去活动，现在还不能断定，但是派干部去工作是没有问题的。中央决定派千余干部由林枫同志率领去东北，万毅同志所率军队仍须进至热河边境待命，可去则去，不可去则在热河发展”^④。中苏条约的签订，使中共对能否进军东北产生疑问，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4页。

②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18页。

③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45页。

④ 《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7、8、9页。

但并未放弃。

8月28日，朱德对即将出发去东北的干部讲话：“我们要积极向东北发展。东北大有文章可做。蒋介石的部队大部分在南方，即使到了东北，顶多是他占城市，我占农村。我们要派五万军队，万把干部去……我们有很大的希望把东北变为民主的东北。”^①面对中苏条约的不利局面，中共表现出极为顽强而主动的精神。

8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我党我军在东三省之各种活动，只要他不直接影响苏联在外交条约上之义务，苏联将会采取放任的态度并寄予伟大之同情……晋察冀和山东准备派到东三省的干部和部队，应迅速出发。”^②该指示为刘少奇所发，刘对苏军态度的估计是准确的。

由于李运昌等部在东北的迅速发展，特别是苏军对中共基本采取默认态度，中共向东北进军的计划逐步加强。9月11日，中共中央致电山东分局：“为利用目前国民党及其军队尚未到达东北（估计短时间内不能到达）的时机，迅速发展我之力量，争取我在东北之巩固地位，中央决定从山东抽调四个师十二个团共二万五千至三万人，分散经海道进入东北活动，并派肖华前去统一指挥。”^③该电表明，中共派往东北的兵力在增加，派往东北统一指挥的干部人选也在加强。

真正认识到东北问题的可行性并随之做出决策，大体上是在9月13日至19日一周左右完成的。

9月14日，朱德在延安会见了东北苏军统帅马林诺夫斯基的代表贝鲁罗索中校，该中校转达了马林诺夫斯基的意见：蒋介

① 《朱德年谱》，第277页。

② 《中共党史资料》第16辑，第134页。

③ 《辽沈决战》上，第207页。

石军队与八路军之进入东北，应按照特别规定之时间；苏联红军退出东北之前，蒋军及八路军均不得进入东北；八路军之个别部队已到辽宁省沈阳市、大连市，吉林省长春市、热河省平泉县等地，请朱总司令命令各该部队退出苏联红军占领之地区。^①

对于苏军提出的上述要求，中共方面不难答复。当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致函马林诺夫斯基：在热河、辽宁，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爆发时即有八路军活动并创有根据地，请允许该地区八路军仍留原地。^②称中共军队本来就在原地，而非现时进入，因此无须撤出原地。

在听取了随苏军中校一同来延安的曾克林的汇报之后，9月14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把战略重点放在东北，力争在东北建立根据地，把原来准备南下的十万部队两万干部转而挺进东北。^③会议决定成立东北局，并将毛泽东赴渝谈判时提升的两位书记处候补书记彭真、陈云派往东北，彭真任东北局书记，陈云、程子华、伍修权、林枫为委员。彭、陈等人随苏军这架飞机飞往东北。

以上是中共在东北问题上，由设想、摸底到决策的过程，思路与行动逐渐统一起来。

问题在于：将战略重点放在东北这一决策做出之后，必然牵动中共全国的整体战略部署的调整，没有一个相应的调整，就没有战略重点。

9月14日，新四军第三师师长黄克诚写了一份由华中局转中央的电报，就整个战略调整提出了自己的意见。黄克诚首先分析了敌我态势，指出国民党的战略意图是抢占华北华东的城市和

① 《朱德年谱》，第278页。

② 《朱德年谱》，第278页。

③ 《朱德年谱》，第278页。

交通要道，“以分割孤立我军各战略区，使我军不能自由调动”，在时机成熟后，予以各个击破。而在中共方面，“我军数量虽大，但精干坚强之主力不多，占领地区大，我主力分散，各大战略根据地，除山东外，突击力量均欠强大，均很薄弱……且无一个根据地因人民地形粮食诸条件之结合上，比得上过去之中央苏区”。也就是说，中共最大的隐患在于根据地和主力分散。黄克诚建议，中共应“取得联系一片的大战略根据地”。为此，黄克诚具体建议：东北“派有威望的军队领导人去主持工作，迅速创造总根据地”。而在关内则集中力量创造两个战略根据地，即“以晋、绥、察三地关内第一战略根据地”，“以山东为关内第二战略根据地”，“其他各地区，则成为二大战略根据地之卫星”。为实现上述意图，黄建议主力部队应向上述地区集中，建议江南粟裕部调回江北。^①

黄克诚上述意见的核心是：“我党若没有联系一片的大战略根据地，就不会有大的胜利”。其中，关于没有一个根据地“比得上过去之中央苏区”的看法，十分尖锐。黄提出集中力量建立东北、华北、华中三个战略根据地的建议，提出将粟裕部调回江北的建议，也就把调整战略部署的问题提了出来。

把问题归结起来，中共中央于9月14日做出的把战略重点放在东北的决定，这个决定涉及问题的一个方面，即重点放在何处的的问题。而黄克诚的来电则涉及问题的两个方面，既提出了重点放在何处的的问题，又提出了围绕重点而做出相应的战略调整。没有这种相应的调整，也就没有重点。

正因为黄克诚的来电实际上是对中央9月14日决定的补充，

^① 《新四军军部在黄塘》，第527～529页。该电根据中央档案馆原件刊印，其中“比得上过去之中央苏区”一句，该件为“比不上”，不通，“黄克诚回忆录”改作“比得上”，意思就明白了，本书采用了回忆录的说法。

因此引起延安的高度重视。9月15日，延安将战略重点放在东北的决定与黄克诚来电，一并报告在重庆的毛泽东。^①

毛泽东赴渝谈判之前，延安已有让出江南地区的考虑，但这是作为谈判中的一个让步条件来考虑的，而不是作为战略部署的调整来考虑的。收到上述来电后，毛于9月15日复电延安，要浙东等江南地区部队立即控制北上通道。^②这表明，长时间以来，毛泽东关于建立“南方一翼”的设想，至此发生转变。

9月17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提出：“东北为我势所必争，热、察两省必须完全控制。”在这个前提下，刘提出“我之战略部署须立即加以考虑”。刘建议集结重兵于冀东、热河一带，“以备红军撤退时能抢先进入东北”。接下来建议：“为了实现这一计划，我们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否则我之主力分散，地区太大，处处陷于被动。”刘建议新四军主力立即转移到江北。^③刘电表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这一战略方针的提出，是由重点争夺东北而引出的结论。

9月18日，刘少奇再次致电毛泽东：“满洲四周连接苏联势力，南面旅大又系苏联军事管制地带，故我们如能控制热、察及冀东，在满洲沿海又配置数万兵力，即可阻止蒋军进入满洲，控制东北，此着关系极大……又饶漱石提议从新四军调数万兵力到山东，以便山东兵力能迅速进入东北。黄克诚提议陇海以南兵力北调，以热、察、东北为第一全国战略根据地，以山东、太行为第二战略根据地，其余为卫星，他认为如此可长期坚持，一切不怕。”^④

①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24页注④。

②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24、25页。

③ 《刘少奇年谱》上卷，第493页。

④ 《刘少奇年谱》上卷，第494页。

该电表明刘少奇对问题的考虑更加成熟，对于东北的苏军因素以及利用这一因素的考虑，更为充分。黄克诚关于建立多层次战略根据地的提议，显然引起刘少奇的高度重视。

9月19日，刘少奇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再次分析了控制东北的可能性，表示：要下决心，坚决行动，舍得把其他地方丢掉。当时，重庆谈判陷入僵局。刘表示，控制了东北，这时国共谈判就有希望，否则谈判的希望就少，和平希望也少。^①

经过以上反复磋商补充，中共战略方向与战略调整最终确立。1945年9月19日，刘少奇向党内发出指示电：目前全军全军的主要任务是：“完全控制热、察两省，发展东北我之力量并争取控制东北”。围绕这个中心任务，该电对全军战略部署做如下安排：以晋察冀、晋绥两地区的力量控制察哈尔全境、绥远大部、山西北部及河北一部，使上述地区成为以张家口为中心的战略根据地。抽调山东主力到冀、热、辽地区和东北。新四军抽调主力到山东，江南部队撤至江北。晋冀鲁豫军区竭力阻滞并打击敌军北上部队。该电最后指出：“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②

9月20日，中央书记处复电黄克诚：“你的提议中央同志都看过，并在原则上同意你的意见。中央关于目前战略部署电谅你已收阅。望你以后多提意见。”^③ 该电为刘少奇起草。^④ 也就是说这个重大的战略调整，“原则上”是采用了黄克诚的建议。

战略方针一旦决定，中共中央严令各地迅速而坚决地执行。

① 《刘少奇年谱》上卷，第495页。

② 《刘少奇选集》上集，第373、374页。

③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5），第3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

④ 《刘少奇年谱》上卷，第494页注①。

9月23日，刘少奇致电各中央局：“依中苏条约，红军将在十二月二日以前从东北撤退完毕，国民党正要求红军久驻东北、热察，以便国民党派队接收，但红军因战费太大未允。争取东北时机紧迫，迟则来不及。希望各地方勿失机，令所有向东北前进的部队和干部迅速前进，不再迟延。”^①

在中共中央的严令之下，各地迅速行动起来。中共山东军区所属万毅部，以2500余人组建为东北挺进纵队，9月24日，先头部队乘数十只渔船，由山东黄县启航渡海，于25日在辽宁兴城登陆。^②

9月23日黄克诚接到命令，率新四军三师开赴东北。黄部于9月28日由江苏淮阴出发，11月25日抵达锦州。黄部共3万2千人，占当时10万部队的三分之一。^③

中共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的形成过程，大体上有三个主要因素：（1）中央做出将战略重点放在东北的决定，派遣两位书记处候补书记前往东北，表明中共真正把战略重点放在了东北，而这种战略安排，必然引出全党全军战略部署的调整。（2）黄克诚的来电，深刻指出中共兵力分散的弱点，明确提议集中力量建立东北、华北、华东三个战略根据地，其他地区则成为战略根据地卫星，从而将战略如何调整具体地提了出来。（3）刘少奇在黄克诚建议的基础之上，使之进一步完善并迅速做出决断。

整个决策过程，流畅、迅速、果断，显示出中共领导层驾驭战略全局的魄力。

① 《刘少奇年谱》上卷，第501页。

② 《万毅将军回忆录》，第145、146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

③ 《中共党史资料》第16辑，第60、61、62页。

二 中共向北发展部署的展开

1945年10月28日，毛泽东致电东北局：“我党决心动员全力，控制东北，保卫华北、华中，六个月内粉碎其进攻，然后同蒋开谈判，迫他承认华北、东北的自治地位”。^①这既是一个总体的政治部署，又是一个总体的军事部署。从军事部署上讲，这是一个以东北为重心，以华北和华中支援并拱卫东北的安排。

围绕上述安排，中共部署了平绥、津浦、平汉三个战役。

10月15日，刘少奇致电各中央局：“我为争取我党我军的应有地位……争取东北工作的开展，争取全国和平局面的出现，对于经平汉、津浦、同蒲、正太和平绥等路前进之国民党军队，必须坚决加以打击和阻止。因此，目前华北、华中解放区作战的重心应放在铁路线上，作战的主要目的是消灭和阻止北进之顽军。”^②

10月16日，毛泽东致电晋察冀、晋绥等中央局：“即将开始的平绥战役，关系我党在北方的地位及争取全国和平局面，极为重大。”此役的目的在于打开与东北的交通联系，毛电指出：傅作义部“积极准备攻击张垣，企图切断我东北、华北、西北之通路。故此次平绥战役，系为恢复失地，打开交通路而战”^③。

10月18日，晋察冀和晋绥两军区对傅作义部展开攻击，傅部全线西撤，退守归绥（呼和浩特）和包头。

10月24日，第12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发表了一篇名噪一时的致毛泽东电，称中共军队10万之众，当月16日集中于晋

①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42、43页。

② 《刘少奇年谱》上卷，第514页。

③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57页。

北、绥东，并于17日向阳高等地进攻，傅表示：“余敢负责声明，余绝对未奉到蒋委员长攻击贵方军队之命令”，“一俟此次战事告一段落，余决辞去所有军职及绥远主席职务，以明此心。尔后贵方军队如再进迫，忍无可忍、让无可让之时，发生战事，则内战全部责任应由贵方担负，尚望先生慎以自处。”^①

傅作义的老友徐永昌得知该通电后称赞道：“足见宜生有识有为，数年来尽（竟）无一人敢明白宣布共党不是，此电发布于世，多数人心大快。”^②。

平绥战役持续战至11月仍处胶着状态，徐永昌日记载：“傅宜生来电，大致谓共匪前日攻入包头塞内，经董其武等之努力，昨得转危为安，入城匪千余悉歼俘。”^③

中共晋察冀、晋绥两军区围攻归绥、包头未克，于12月中旬结束战役。中共此役未能实现战略意图，因而最终未能创造以张家口为中心的战略根据地。

1945年10月，国民党军乘中共山东主力部队开赴东北，而新四军入鲁部队尚未到达之际，由徐州沿津浦铁路北上进占济南，企图控制津浦铁路南京至济南段，尔后向天津、北平推进。为截断津浦铁路，阻止国民党军北上，中共发起了津浦战役。10月19日，毛泽东致电陈毅、黎玉：“山东除竭尽全力组织渡海外，陈、黎组织津浦战役是一件关系全局的大事。”指示：“在徐州、济南间适当地区占领铁路一段并向南北扩大占领区，然后选择时机，歼灭蒋军一两个师，打一个开始的好胜仗。”^④

① 《中央日报》1945年10月26日。

② 《徐永昌日记》1945年10月25日。傅作义字宜生。

③ 《徐永昌日记》1945年11月16日。

④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65页。

津浦战役于10月18日发起，1946年1月7日结束，控制了津浦铁路二百余公里，歼敌二万八千余，截断了国民党军北上通道。

在部署平绥、津浦战役的同时，延安同时部署了平汉战役。关于晋冀鲁豫军区的战略地位，刘伯承说：“这里是华北解放区的大门，敌人要进攻首先就从这个口子来。”^①平汉战役的意图是阻滞国民党军沿平汉铁路北上，为东北等根据地的创建做战略掩护。

10月6日，刘少奇致电刘伯承、邓小平等，指示：“中央从山东、新四军及其他地区抽调共约十三万兵力和干部，正向东北、冀东前进中。为掩护这些兵力和干部进入东北、冀东并准备好战场，晋冀鲁豫必须阻止胡宗南、孙连仲北进。否则，顽军大队进入平津，必将影响我之整个部署，并可能隔断华北、华中与东北、热河之联系。”^②10月17日，平汉战役即将发动之际，毛泽东致电晋冀鲁豫中央局：“这个战役的胜负，关系全局极为重大。”要求：“由刘邓亲临指挥，精密组织各个战斗，取得第二个上党战役的胜利。”^③

10月24日，晋冀鲁豫军区主力在邯郸以南包围了国民党第30军、40军和新8军。军令部部长徐永昌10月28日记载：“四十军、三十军、新八军在马头镇（邯郸南）之战事日紧，今日得急电，催空运弹药（磁州到开封有庞更陈、孙殿英部及八十五军，而磁州竟为共军所夺占，且顺德以北有李文五师南下，益见共军之有计划与力量之雄厚也）。”^④10月30日，新8军军长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36页，人民出版社，1993。

② 《刘少奇年谱》上卷，第509、510页。

③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60页。

④ 《徐永昌日记》1945年10月28日。庞更陈应为庞更臣，庞炳勋字更臣。

高树勋起义，11月2日战役结束，俘40军军长马法五等。

徐永昌日记11月2日载：“十一时去林园，蒋先生约研讨平汉、平绥两路战事及其他军事。昨晨已悉，高树勋部队于作战中一部变乱，以致三十军、四十军亦相继由马头镇一带后撤漳河，以就三十二军。”^①

以上战役使国民党高层对中共战斗力有了新的认识。此时阎锡山正在重庆，11月4日晚徐永昌拜会阎，二人有如下谈话。阎问：“是否常研究共党军队之厉害处？”徐答：“甚少。”阎：“盛称日兵作战不回顾，将士不退却。”徐称：“何不请日将士为公训练五分一之军队，俾能出击。”阎称：“无用，以中国人已至不堪教训。”尔后，阎“又论及共军，乃极称道之”。徐称：“彼不亦为中国人耶。”^②阎锡山为自己设定了一个不能自圆其说的论点，不是中国人不堪教训，而是国民党及其军队不堪教训。

平绥、平汉、津浦三个战役，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这一战略方向确定一个月之后，围绕这一战略意图，在平津地区南北两条战线上展开的阻击与进攻，标志着中共的战略方针已经迅速而坚决地展开。

1945年11月1日，毛泽东致电各战略区负责人，就当前局势和下一步安排指示如下：“蒋军已决定在葫芦岛、营口登陆，其数约两个军六万人，按其计划是十一月十二日进至锦州、海城一线，十一月底进至沈阳，苏军则于十一月底从东北撤完。华北方面，蒋军主力由平绥、同蒲、平汉、津浦四路集中平津；经北宁、热河两路入东北之计划，基本上已被我打破。我聂、贺军已击破平绥路蒋军六万……我陈黎军及华中已切断津浦路南北中三

^① 《徐永昌日记》1945年11月2日。

^② 《徐永昌日记》1945年11月4日。

段”。在国民党军分四路集中平津的部署被打破之后，毛对 11 月的作战部署做如下安排：“我党任务是夺取东北，巩固华北、华中，而十一月开始之主要作战方向已转至东北方面，第二个作战方向则是华北、华中。”该指示催促各地区继续抽调部队进入东北，同时部署：“聂、贺军待绥远作战完毕，即以主力转至平津方面，策应东北作战。”“刘邓、陈黎及华中三处除开东北者外，仍服原任务，准备歼灭必然继续向北进攻之蒋军主力。”^①

也就是说，因苏军撤退在即，自 1945 年 11 月起，中共的主要作战方向是东北，而华北、华中两地区的作战，除巩固自身外，也具有配合东北的任务。

三 中共的东北战略部署

时任东北局书记的彭真曾在一篇文章中，将 1945 年 9 月至 1946 年 5 月这 9 个月时间，中共中央对东北的战略部署分为四个阶段。^②所谓四个阶段，实际上就是四次变动，具体讲，就是分散、集中、再分散、再集中。

1945 年 9 月 24 日，刘少奇指示东北局：“东北武装应因地制宜，分为两种：一种是散在各地的地方自卫武装，准备在将来不利时可成为武工队；另一种是较集中的武装，应布置在靠近热河、外蒙、苏联、朝鲜的地区，以便生存发展和保存多量武器。”^③刘所说的第二种武装，人员相对集中，但分布于靠近外蒙、苏联等地，因此总的部署仍然是分散的。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3 卷，第 107、108 页。

^② 彭真：《东北解放战争的头九个月》，《辽沈决战》续集，第 3～18 页，人民出版社，1992。

^③ 《刘少奇年谱》上卷，第 502 页。

10月2日，刘少奇再次指示东北局：东北军事部署的精神，“不是首先将主力部署在满洲门口，抵住蒋介石，而是首先将主力部署在背靠苏、蒙、朝鲜边境，以便立稳脚跟之后，再争取大城要道。”^① 满洲门口，即南满沿海地区。

10月9日，刘少奇进一步指示东北局：“部队必须迅速摆开分散，每县一连一排……在目前决不应集中部署，不要怕人家讥笑我未脱离游击概念。……只有在目前高度分散发展之后，下一时期才有大量部队集中作战。……我不能在沿海到处抵住蒋军。我只有吸引蒋军深入内地一二百里之后，才能进行主力决战歼灭之。”^②

以上部署是毛泽东还在重庆时，由刘少奇主持做出的。毛返延安后，分散的方针迅速改变；之所以迅速改变方针，与苏军态度的转变有很大的关系。

10月4日，东北局致电延安：苏方表示已下最后决心，大开前门，此间家务全部交我。因我力量微小，现只能接受一部分，允许在一个月內替我保存。总观全局，我们建议中央下最大决心，立即从各区抽调三十万主力于一个月內赶到，用尽一切办法控制此间。^③ 苏军提出一个月的时间要求，是因为苏军当时定于11月开始撤离东北，为此，东北局希望在苏军撤离之前，在苏军的协助下“控制此间”。

10月16日，刘少奇致电彭真等：“蒋军在东北登陆，及从任何方面进入东北之蒋军，须坚决全部消灭之。凡我到东北之曾克林、万毅、肖华等部，须迅速集中，加以补整，全力消

① 《刘少奇年谱》上卷，第507页。

② 《刘少奇年谱》上卷，第510页。

③ 《彭真年谱》上卷，第292页。

灭蒋军。除早已分散者外，不要再分散。此刻我军须集中作战，暂时不能分散。如能消灭蒋军前头部队，即可使蒋军后续部队有所畏惧，方可争取时间。”“战胜蒋军登陆，是目前中心一环。”^①

10月19日，中共中央进一步指示东北局：“我党方针是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坚决阻止蒋军登陆及歼灭其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放弃过去分散的方针”。“目前我在东北工作的部署，应该是全力加强辽宁、安东二省的工作，守住东北的大门，争取时间，以便开展全东北的工作。”^②由不要在满洲门口抵住蒋，转而要求守住东北大门，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部署改变，这个改变的目的是要独占东北。

10月23日，毛泽东明确指示东北局：竭尽全力独占全东北，万一不成亦造成对抗力量，以利将来谈判。^③

上述指示着眼于两点：独占东北。不能独占亦造成对抗局面，以利谈判。满洲门口主要是南满锦州地区，在此阻止国民党军从陆路或海路进入东北。独占东北的设想，说明中共此时对于中苏条约已没有顾虑了。

10月25日，东北局致电延安：苏方态度愈积极，关系皆好。一、他说，如果过去需要谨慎些，现在应该以主人自居，放手些干；二、下月十五日前，如顽方进攻，苏将协同我打击；三、除已搬走的约五分之一的工厂外，余均交我。^④“他说”指苏方意见。

^① 《刘少奇年谱》上卷，第515、516页。

^② 转引自彭真《东北解放战争的头九个月》，《辽沈决战》续集，第7页。

^③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38页。

^④ 《彭真年谱》上卷，第302、303页。

10月27日，陈云由长春致函彭真等：已与驻长春的苏联红军领导人见了面，转达了关于请苏军在撤退之前拒绝蒋军登陆等十二点要求。^①

10月28日，毛泽东致电东北局：二十五日电悉，友方态度如此，甚为欣慰。……我党决心动员全力，控制东北，保卫华北、华中，六个月内粉碎其进攻，然后同蒋谈判……东北方面一切问题的关键是在两个月内拒止蒋军登陆、着陆及接收政权，此点如无苏军协助则不能成功。29日，彭真复电毛：你的意见已郑重向友方提出。^②

综上所述，中共方针所以转变为动员全力控制东北，与苏军的态度令人“欣慰”有直接的关系。

10月30日，国民党军一部企图在葫芦岛登陆，遇中共阻止后退走。31日，毛致电彭真：“营口、葫芦岛登陆之蒋军必须抵抗，可能迫使蒋军缓进，我可争取时间。”^③关于葫芦岛此次小规模冲突的反应，毛于11月2日致电彭真：“葫芦岛打枪，重庆已有反映，王世杰请苏方令中共撤退，苏方说，这是中国自己的事，他们不与闻。似此如我在葫岛、营口、安东等地坚决抵抗，可能使蒋方有所顾虑。”^④

苏军“不与闻”的旁观立场，此即毛所摸到的苏军的底，于是对于中苏条约更加无所顾忌，判断可以放手与国民党争夺东北。作为此一思路的具体体现，延安布置了两个相应的计划。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上卷，第43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中共领导人在东北是否会见过苏军最高统帅马林诺夫斯基，目前仍不清楚。

② 《彭真年谱》上卷，第304页。

③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105页。

④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117页。

11月12日，东北局做出在苏军撤退后夺取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的部署，并上报延安。11月15日，延安复电：“一面照顾友方信用，同时准备坚决消灭蒋顽在沈、长、哈三处着陆部队，夺取三大城市，其中最具有决定意义的是沈阳城”^①。

此时，中共在东北的军事指挥机构已组建完毕。林彪、萧劲光原被任命为山东军区司令、副司令，接替派往东北的罗荣桓。途中接到延安“万万火急”的电报，要他们立即转赴东北，林彪一行于1945年10月上旬抵达山海关。^②10月31日，延安任命林彪为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吕正操为第一副司令，李运昌为第二副司令，萧劲光为第三副司令兼参谋长，彭真为第一政治委员，罗荣桓为第二政治委员，程子华为副政委。^③

延安做出夺取沈、长、哈三大城市的决定，并围绕这个决定进行相应的军事部署。11月15日，毛致电林彪、彭真，部署了一个锦州决战计划。此刻，山海关在杜聿明的攻击下即将失守，毛电一面指示驻守山海关的李运昌、杨国夫两部节节抵抗，消耗疲惫对方，另一方面部署黄克诚、梁兴初两部开至锦州、锦西、兴城三角地带休整，俟敌进至绥中或兴城地区业已相当疲劳之际，集中黄克诚、梁兴初、杨国夫、李运昌等部约7万人，“于最有利之时机地点，由林彪、荣桓亲去指挥，举行反攻，分作几个战斗，每次歼灭其二三个师，最后全部歼灭三个军，即能从战略上解决问题。”毛是从“战略上解决问题”来部署此役的，故毛称之为“决战”，并期望“决战时一战解决问题”^④。

锦州地区，南临营口、葫芦岛，西临山海关，进入东北的海

① 转引自彭真《东北解放战争的头九个月》，《辽沈决战》续集，第7页。

② 《萧劲光回忆录》，第326页，解放军出版社，1987。

③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43页。

④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143、144页。

上通道和陆路通道基本上要经过锦州地区。只要在锦州地区击败国民党军的海、陆进兵，便守住了满洲的门口，便可“独占”东北。因此，毛曾于11月14日指示：“以锦州为中心之地区为我主力集中作战之战略枢纽。”^①

以上是中共的军事部署。围绕独占东北这一中心任务，中共又做出相应的政治安排。

重庆谈判期间，刘少奇曾致电毛泽东，商议“是否可由人民代表会议组织东北人民自治临时行政委员会，以作总的领导机关和号召，如此方能与国民党竞争。……我如无公开的号召机关，十分吃亏。”^② 这个建议的意图是，抢在国民党之前公开建立政权机构，从而在政治上将东北纳入中共的范围。但在苏军滞留东北期间成立这种公开的政治机构显然有所不便，因为这将公开违背中苏条约，苏军将承担责任。

尔后，刘少奇于11月4日指示彭真、林彪：“苏军从东北撤退后，东北人民选举自己的自治政府，反对国民党中央政府违反地方自治原则委派东北地方行政官吏。”^③ 将成立政治机构的步骤改在苏军撤离之后，以使苏军避免承担责任。

以上军事与政治部署，都是围绕“独占”东北而做出的相应安排，而独占东北的设想，主要是基于苏军即将撤退，并且得到苏军的协助承诺。按中苏条约规定，苏军于日本投降三个月内撤离东北，日本于9月2日投降，因此苏军的最后撤退日期应在12月初，上述部署正是根据这个日期和苏军的承诺而安排的。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141页。

② 《刘少奇年谱》上卷，第506页。

③ 《刘少奇年谱》上卷，第524页。

中共的一系列布置既然以苏军的态度变化为依据，反过来，随着这一情况的变动，上述部署最终都未能实现。

四 国民党的战略考虑与展开

1945年9月9日，蒋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此时惟一政策，在接收国内各地区敌军之投降与缴械，其次为接收东北之失地，使俄国不能不履行其条约义务为首务；否则，敌械未缴，西陲起衅，反为俄共与共毛所利用，使中国纷乱不可收拾。”^① 蒋所说的国内指关内。这表明，蒋介石的总体战略考虑分为两点，第一，关内；第二，东北。西陲起衅指新疆问题。

国民党关内的战略推进重点是华北，因为华北是接收东北的基础。9月，戴季陶曾邀请白崇禧、何应钦等商讨出兵东北问题，戴季陶认为：从历史上看，占据东北，应先固华北，然后再出关，否则孤军深入，甚多可虑。白崇禧认为：欲保东北必须先固平津；欲固平津，必须先收热、察。万一必须大军出关，亦只宜先驻沈阳，俟包（头）、绥（远）围解，锦（州）、承（德）肃清，再收长（春）、哈（尔滨），否则军械补给，士兵寒衣，均生困难。^② 此即对华北与东北关系的认识。

蒋对于华北接收情况看来是比较满意的。10月31日，蒋在反省录中写道：“平津与胶济为我接收，重要据点之部署已妥，统一初基既定，惟政治协商会议未能如期召开，因之国民大会亦不能不延期，此固为对内政治上之一大损失，然无关大计也。”^③

^① 《蒋总统秘录》第13册，第197页。

^② 胡颂平：《朱家骅年谱》，第59页，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转引自梁敬铨《中美关系论文集》，第132、133页。

^③ 《蒋总统秘录》第14册，第27页。

这就是说，北平、天津、青岛、济南四个华北重镇占据之后，蒋认为统一的基础已经奠定，其余的问题已“无关大计”了。

蒋在战后的战略考虑中，最大的失算是东北。

8月10日，即日本传出投降消息的当日，蒋在重庆曾家岩官邸召集会议，议题：“除一般作战问题外，并及东北伪军如何不为苏军所坏。”由于国民党进军东北尚需时日，因此首先考虑将东北伪军收归“国用”，防止被苏军消灭。徐永昌说：“关于利用东北伪军问题，余以为如以中央大员往收抚，恐彼口而不信，且不易前往，如用伪方人员，有失政府威严，最好能起用东北未从伪之人望且在平津或东北者，电令前往收抚……如此二三十万伪军可以不坏，遂为国用，诚属善之善者。”对此，“蒋先生极表同意……蒋先生立言，如此即电令张辅臣负责办理可也。”^①

张辅臣即张作相。数日后中苏条约签订，国民党对接收东北的考虑主要就是指望从苏军手中接防，从而实现外交接收。

不过此时也有人东北局势感到担忧，此人便是白崇禧。8月24日，白上书蒋，就整个战略态势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白认为：“长江、珠江流域，有陆军总司令、各战区司令长官，就近督导国军，实力雄厚，党政力量亦能配合，尚不十分严重。惟黄河以北，我党政军力量均属微弱”。白崇禧尤其担忧的是东北，认为：“因苏军进入伪满境内，其撤退完毕有三个月以内之时间，倘此时，如任奸军渗入，苏军以不干涉内政为口实，恐不至拒止，我对奸军投鼠忌器，东北环境恐日趋困难矣。”当中共尚在对进军东北做试探之际，白即对中共此种可能性，尤其对苏军可能采取的“不干涉内政”的立场，做出了准确的判断。为此，

^① 《徐永昌日记》1945年8月10日。

白建议：由北平行营“指挥河北滦东一带之归顺之伪军，布防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之线，以防奸军东窜，渗入东北境内”^①。从后来的结果看，白崇禧的这个意见并未引起重视，国民党仍寄希望于苏军按约交防。

8月31日，国民党中常会与国防最高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特派熊式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主任”^②。东北行营下设政治委员会和经济委员会，9月4日，熊式辉被任命为政治委员会主任，委员有莫德惠、朱霁青、万福麟、马占山、邹作华等。同日任命张嘉璈为经济委员会主任。^③此外，蒋经国被任命为外交部驻东北特派员。同时，重庆政府将东北三省划分为九省和两个特别市，9月5日，重庆发表了九省两市主席、市长名单。

东北行营于9月初组建完毕后，因必须有苏军的通知才能前往东北，为此，行营在重庆坐等了一个月。

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张嘉璈，于9月14日才由国外回到重庆，当日，张即前往外交部，探询外交部有无与苏方具体讨论东北接收程序。张在当天日记中记载：“仅有对苏方撤兵及我军接收防问题有交换文件。而对于我军如何进入东北，行政人员如何接收政权，及经济事业如何移交，并无协议。良以我政府认为我军队一到东北，一切可以迎刃而解。”^④张嘉璈的感觉是准确的，这正是当时国民党政府内的普遍认识。

9月22日与28日，东北行营政治委员会和经济委员会在重庆举行两次联席会议。据张嘉璈记载：两次会议“均讨论接收

①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2），第318、319页。
② 《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会议记录》第7册，第497页，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影印，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6。
③ 《中央日报》1945年9月1、5日。
④ 张嘉璈日记，1945年9月14日。姚崧龄编著《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第513页，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

办法，而从未闻外交当局对于苏联如何交还政权，如何交还占领之经济事业，有何指示，大致我外交当局及熊主任均认为苏方撤兵，绝无问题。”^① 张嘉璈似乎预感到将有不祥之兆发生。

10月1日，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照会中方：“苏联主力将于本年十月下半月自东三省开始撤退，以便于本年十一月底撤退完毕。”同时表示苏军统帅马林诺夫斯基准备于10月10日至15日在长春会晤中国代表，就撤退问题与中方谈判。^② 此照会即前往接收东北的通知。苏方关于11月底撤离东北的时间安排，是与中苏条约的规定相吻合的。

国民党方面早有准备，因而迅速做出答复。外交部于10月1日当天照会苏联驻华使馆，通知：“中国方面之第十三军部队，现已定于本月十日前后，自九龙乘美国船只，由海道前往大连登陆”，希转告东北苏军。^③

由于平汉、津浦、北宁路均为中共切断，国民党军进入东北的最佳途径是走海路，而海运则必须依靠美国。9月11日，蒋介石致电在美访问的宋子文，嘱宋与美方接洽海运事宜。蒋称：“国军急待运往东北各省接防，如照目前运输计划，须待十二月初方能开始运输，如此则俄必借口我军届期未到，彼因急欲撤兵，对东北防务不能负责，因此可让共党占领东北，此为最险之事，希速即向美政府切实商洽，务于本月内先拨给若干船舶，以供东北军队运输之用为要。”^④ 这个要求为美方接受。

然而问题产生了。10月7日，苏联外交部官员约见中国驻苏大使傅秉常，表示：“按照中苏条约，大连为运输商品非运输

① 《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第516页。

② 《中国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1），第116页。

③ 《中国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1），第117页。

④ 《中国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1），第116页。

军队之港口，苏联政府坚决反对任何军队在大连登陆，因其违反中苏条约。”^①

对此，王世杰于10月9日约见彼得罗夫，表示中苏条约仅对大连做出若干商务方面的规定，“但大连主权属于中国，亦为条约所明定，除经条约明定之义务外，中国政府自不受其他限制。因此中国政府对于派兵由大连登陆到东三省，决不能认为系违反中苏条约。”^②

东北行营尚未启程，争论便开始了。

10月11日，熊式辉等离渝。行前，熊式辉鉴于苏军撤退期限将至，而中方又无军队前往接收，提议：“不如责成苏军缓撤”。王世杰反对，认为：“盖苏军如有意扶植共军，则彼多留一日，结果将更坏一日，且我方一度请其延撤之后，将来彼如长期不撤，彼可借口于出自我之请求也。”蒋介石肯定了王世杰的意见，最后决定：“在任何情形之下，不请其延撤。”^③

1945年10月12日，熊式辉、张嘉璈、蒋经国以及东北宣慰使莫德惠，率东北行营由北平飞抵长春，开始了漫漫的东北接收，没有谁能够预测今后的命运。安顿下来后，张嘉璈在当天日记中写道：“住宅内厨子、卫队，均系苏军司令部所派俄人，语言不通。……直同身处异国。”^④

10月13日，熊式辉、张嘉璈、蒋经国一同拜会苏军统帅马林诺夫斯基，并举行第一次会谈。熊式辉询问了苏军撤军程序，告知国民党军将由海上运兵到东北接收，拟在大连、营口、安

① 《中国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1），第119页。

② 《中国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1），第121页。

③ 《王世杰日记》1945年10月11日。

④ 张嘉璈日记，1945年10月12日。《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第518页。

东、葫芦岛登陆，请苏方协助。马林诺夫斯基表示，苏军于11月20日起由南满撤退，11月30日撤出中国境内。关于运兵一事，马林诺夫斯基表示，营口、葫芦岛没有问题，但提出国民党军应由铁路进入东北。对此，张嘉璈的看法是：“明知关内外铁路交通为共军在山海关方面阻断，而欲我方由铁路运输，含有不愿我方有大批军队进入东北之意。”^①

10月15日，彼得罗夫照会重庆外交部：“查大连港根据中苏条约，系一商港，为运输货物，而非运输军队之地，无论谁的军队在大连登陆，均系破坏中苏条约，故苏联政府，坚决反对。”^②大连为东北最大港口，拒绝国民党军在大连登陆，便极大地限制了登陆部队。

10月17日，熊、张、蒋与马林诺夫斯基进行第二次会谈。熊式辉表示国民党两个军将由海上运输，在大连登陆，另两个军由山海关开入东北，望苏军协助。马林诺夫斯基表示，海运部队可在葫芦岛、营口登陆。中国军队须俟苏军撤离后再接防，“不使两军相遇”。不使两军相遇，也就是两军不做直接的交接防。因为，苏军如直接交防，中共便不能占据交防区。苏军这个意见的核心是，将防区交中共，协助中共阻止国民党进兵东北。张嘉璈对此次谈话的看法是：苏方“其不容许我方在东北有强大武力，已十分明显”，“必须俟苏联军队撤退，中国方可接防，更含有不愿协助我军推进之意。”^③

10月16日，蒋介石致函熊式辉、张嘉璈，指示：“运兵计划应准备海运与陆运并进。……吾方认定海运部队必须在大连一

① 《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第520页。

②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1），第123页。

③ 《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第524页。

港入口也，此应坚持到底。”^①熊、张于19日收到该函，当日与马林诺夫斯基举行第三次会谈，转告了上述蒋介石的意见，即坚持大连登陆。对此，马林诺夫斯基表示可转告莫斯科。

10月21日，苏方答复道：大连在中苏条约中规定为自由港，如允许运兵，即为违反条约。仍予完全拒绝。

10月22日，熊式辉返回重庆，当即就东北情况和运兵问题做了汇报，要点为：“（一）苏方不愿美军到华北，如美在秦皇岛登陆，苏军亦可不撤。（二）苏在东北卵巢共党，中共军现有六七万，发展甚速。（三）苏撤兵问题现又改为十二月三日以前撤出境外。（四）大连决不容我登陆，长春允空降警宪，但必须在苏军撤走前二日方可开到。”^②

10月26日，熊式辉返回长春，带回重庆指示：“政府决定不再消耗时间于讨论大连登陆问题，以免耽误东北之接收，将先在营口、葫芦岛两地运兵登陆。”^③

根据不与苏方耗费时间的新决定，10月25日，王世杰在重庆约见彼得罗夫，告知中方将于10月29日起，海运军队在营口、葫芦岛登陆。^④

关于这一段的对苏交涉，蒋经国颇为感慨，他在10月27日日记中这样写道：“国家无实力，不得不动心忍性也。”^⑤

10月25日，蒋介石致函张嘉璈：“东北问题此时只可做一步算一步，以待时势变迁何如。吾人惟有尽其心力，不必以此着急或失望也。……第一要务还在使国军如何速入东北。故修复北

① 《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第526页。

② 《徐永昌日记》1945年10月22日。

③ 张嘉璈日记，1945年10月26日。《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第531页。

④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1），第125页。

⑤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1），第97页。

宁路，必须竭尽一切方法，期其完成也。”^①

该函表明，蒋在对苏交涉中，一开始便办法不多，几个回合下来便无计可施了，只能是“做一步算一步”，全部主导权完全操于苏方。开局不利，接下来的施展余地就更加窄小了。

10月29日，熊式辉、张嘉璈、蒋经国与马林诺夫斯基举行第四次会谈。马林诺夫斯基同意国民党军在营口、葫芦岛登陆，但表示苏军不做安全保证，理由是：“苏方对于八路军无力可以左右，因苏联早已声明对于中国内政不加干涉。”^②也就是说大连登陆被苏军阻止后，营口、葫芦岛的登陆，苏军也不予负责。

当日，蒋经国在日记中写道：“经过此次谈话，益信所谓顺利二字，已不复存在于东北接收中矣”。^③蒋经国做出了结论。

10月底，美国运送国民党军的舰船在营口、葫芦岛遇中共阻击，未能靠岸。

11月5日，熊式辉等与马林诺夫斯基举行第五次会谈。马林诺夫斯基表示，十八集团军已进入营口、葫芦岛，苏军已退出，因此国民党军在这两地登陆，苏军不能负责。他表示：“苏方并未阻碍中国军队进入东三省，至于十八集团军与中央军之纠纷，乃内政问题，不便干涉。”^④

熊式辉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重庆，无奈地说道：“苏军已自营口撤退，任令中共军占领营口，我从营口登陆之计划又将完全不能实现”。那么国民党军为何未采取强行登陆的方式呢？原因是：“因美国运输舰不愿在国军与中共军冲突之情形下驶入营口”。^⑤美方退缩了。

① 《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第531、532页。

② 《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第535页。

③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1），第98页。

④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1），第138页。

⑤ 《王世杰日记》1945年11月6日。

至此，海上运兵计划完全受阻。

本章小结 日本投降，空出了半个中国的国土面积，为此，国共展开了空前的战略推进，以填补此一空间。经过短暂而迅猛的进军之后，国共在战后的基本战略态势大体形成：以华北为中心形成大规模战略对峙，而华北对峙的着眼点则又在于其身后的东北。

蒋介石最大的失算是东北。中苏条约规定，苏联将其道义支持给予缔约方，而中共的判断则相反，认为苏联对中共将“寄予伟大之同情”。从苏联利益出发，苏军一度表示将东北“此间家务全部”交中共，以此为依据，毛泽东做出“独占全东北”的决定。

然而所有这些都不是东北问题的真实面目，真实面目的表露之日，也就是苏军的双重立场浮出水面之时。

第七章 苏军的双重性与 东北问题

中共向东北的进军，打破了中苏条约对东北战后秩序的安排，形成了国、共、苏三足鼎立的局面，由此而在战后中国政局中，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甚为特殊的东北问题。

所谓东北问题，总括而论，就是国、共、苏三个方面一并介入之下，东北的接收与交防问题。在这里，国民党与苏联由于有一个中苏条约，因此东北问题具有外交性质的一面。同时，由于中共的存在，中共与国民党之间又具有内政问题的一面。这样，东北问题构成了第一个双重性，即外交与内政的双重性。

东北地区的主导力量是苏军，苏军在东北的行动规范本来是中苏条约，条约规定东北交国民政府接收，并给予缔约方“道义”的支持，所谓道义支持，其实就是拐了个弯的政治支持。然而问题在于，维系道义支持的纽带，是共同的政治信念和现实利益，道义支持是不可能以一纸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的，因此，苏军将其道义支持几乎本能地给予了中共。

另一方面，苏联又与国民党政府保持着国家关系，苏联的一些国家利益，如外交、经济利益等等，只能与国民党政府合作，因此，苏联也不可能完全不顾中苏条约，无保留地将东北交与中共。

苏联国家利益的这种双重性，构成了东北问题的第二个双重性，这种双重性具体体现在东北苏军交防的立场上，必然表现为

双重立场、双重政策。不过，国共双方对于苏军的这种双重性，最初都是缺乏足够的认识的。

一 东北行营退出与再入长春

由于苏军不予配合，国民党海上运兵的计划完全失败，此时，距苏军12月初的撤离期限已经临近，显然，国民党已不可能在此时间内接收东北，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蒋展开了一次战术反击。蒋采取了三项行动：第一，令杜聿明由秦皇岛攻占山海关，打开东北大门，将一只脚伸进东北。第二，下令东北行营撤离长春，将违反中苏条约的责任推给苏方，以此试探苏方的反应。第三，将东北问题国际化，引动美国卷入。

海路进入东北受阻后，便只能由陆路进入，而陆路通道主要就是一条北宁铁路（由北平经山海关至辽宁沈阳）。因山海关为中共夺取，北宁路早已不通，能否由陆路出兵东北，关键在于夺取山海关。指挥进攻山海关的，是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

杜聿明原任昆明防守司令，关麟徵于10月8日被任命为东北保安司令。^①杜聿明按蒋的指令解决龙云之后，龙云的怒气不便直接对着蒋，故只能对着杜聿明，为让龙云出这口气，蒋采取了两项措施：第一，公开下令处分杜聿明。蒋对杜说：你解决龙云对国家是立了功，可是得罪了龙云，你应该为国家背过。^②10月26日，《中央日报》头版报道：“昆明防守司令杜聿明，对于昆明防守部队管束不严，防务处理颇多失当，最高军事当局，已

^① 《国民政府公报》1945年10月9日。

^② 杜聿明：《蒋介石解决龙云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51页。

有令予以免职之处分。”^① 第二，将杜聿明调离云南，与关麟徵对调。10月26日发表命令：“派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派关麟徵为云南省警备总司令”^②。此即杜聿明就任东北保安司令的由来。

杜聿明最初率领的接收东北的部队，为13、52两个军，该两军于11月上中旬集结于秦皇岛一带，杜聿明于11月14日下达向山海关的攻击命令，16日杜部攻占山海关。此后沿山海关至沈阳公路两侧向绥中方向追击前进，18日进占绥中，尔后相继进占兴城、锦西、葫芦岛，由于中共此时已放弃锦州决战计划，26日杜部进占锦州。

在杜聿明攻占山海关前后这段时间，蒋所采取的最为重大的一个行动，是下令撤退东北行营，以试探苏方的反应。

就目前所见材料，东北行营高层人士中，最早向蒋建议退出东北的是张嘉璈。张于11月5日致函蒋，建议蒋彻底了解斯大林的东北意图，“如果了解绝望，则惟有退出东北之一法。”^③ 11月8日，蒋召集宋子文、张群、白崇禧、王世杰等商议此事，蒋说：“只有将东北行营撤退至山海关（但声明不放弃东北），使苏联违约之真相大白于世界，我亦不因顾虑东北之收回而与苏联继续敷衍。”^④

11月13日晚，蒋介石在曾家岩官邸召集何应钦、熊式辉、程潜、白崇禧、陈诚、徐永昌、刘斐研究东北问题。熊式辉报告东北局势，熊说：“苏方马林诺夫对上月廿九日之诺言于本月三日完全取消，盖廿九日彼自言葫芦岛苏只有兵一排，不能保登陆

① 《中央日报》1945年10月16日。

② 《国民政府公报》1945年10月27日。

③ 《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第542页。

④ 《王世杰日记》1945年11月8日。

安全，营口则无问题，三日则谓悉不保。”另外，“美舰不愿在敌前登陆或靠岸”，也就是说，美国在东北问题上谨慎的，不愿直接陷入东北纠纷。这样，海上运兵计划完全受阻。熊式辉接着说：“日人有枪十万，人员称是，皆未向苏缴械，而逃集中中者之伪军十五六万（枪十一万），皆已取得联系，候令行动”。熊的意思是，在国民党军不能大举进入东北的情况下，可以借助日伪军的力量。

熊式辉报告之后，“东北问题，蒋先生说出两案：一、将行营撤出，以表暴苏联野心于世界，我仅及于山海关。二、与其妥协，留行营作傀儡”。程潜、刘斐赞成第一案。熊式辉似乎不赞成撤出行营，“以为东北无领导机构，东北力量恐因以涣散”。白崇禧和陈诚主张另派领导人员，蒋未作最终裁决。^①

11月14日上午，蒋在曾家岩官邸再度召集会议研讨这一问题，王世杰和张群加入这次会议，“蒋先生结论：行营在长无法行使职权而撤至山海关，派一代表组在苏军之总部，以取联络”。^②根据蒋的决定，11月15日，重庆外交部照会苏联驻华大使馆，通知中方决定将东北行营撤离长春，移驻山海关。

此次撤离东北行营，蒋介石的全盘考虑是什么呢？11月16日，蒋在军事委员会发表讲话，就此问题做了较为详尽的说明。蒋说：“关于东北的情形，刚才熊主任简单的报告，各位都已明了。统帅部原定派三个军接收东北，后来又加派两个军，一共五个军，现在苏联不负责任，借口登陆的地点为共匪占领，给我们以种种的阻碍，因此我们军队入境，事实上非常困难。而且我们即令将这五个军开入了东北，仍不能确实掌握地方，东北的主权仍然不得完整……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宁可东北问题暂时搁

^① 《徐永昌日记》1945年11月13日。

^② 《徐永昌日记》1945年11月14日。

置，留待将来解决。我决定将东北行营移驻山海关，而以原来准备开入东北的五个军，加入华北方面，首先来肃清华北方面的土匪，先安关内，再图关外。这种由近及远的政策，我想一定不会错误的。否则，如果我们舍近而图远，不先除腹心之患，以求华北的安定，而孤军深入东北，则东北名存而实亡，同时华北方面土匪的力量，必将一天天膨胀”。^①

蒋的上述讲话有两个意思：（1）搁置东北；（2）首先解决华北。搁置东北的原因有两点：（1）苏军不配合；（2）即使五个军均开入东北，仍不能解决问题。

蒋介石对于接收东北主要是基于政治的考虑，从军事上考虑，他深知在华北未稳固之前，不能孤军深入东北，因此，当杜聿明于11月26日进占锦州之后，蒋严令杜，非有他的手令不准继续前进。^②现在，蒋对于政治与军事的通盘考虑是，以苏军不予配合为名，让苏方来承担违反中苏条约的政治责任，乘此机会由东北脱身，集中力量解决华北。

搁置东北的计划能否成立，关键在于怎样“搁置”，对此，蒋这样说：“现在东北境内没有缴械的日本军队，还有十余万人，伪军也有十余万人。这二十余万部队，皆已向中央投诚……现在国军不能入境，他们自然要保持武器，为他们自身的生存而奋斗。所以共匪纵令受外面力量的培植，在东北发展，但是他一两年之内，决不能消灭这二十余万武装的部队，将东北平安占领下去”^③。也就是说，有这二十余万日伪军与中共纠缠，相互抵消，中共便发展不起来，因此东北便可搁置起来，待华北平定之

① 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册，第1787页，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84。

② 杜聿明：《蒋介石破坏和平进攻东北始末》，《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第24页。

③ 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册，第1787页。

后，再来解决东北。

蒋采取的第三项行动是将东北问题国际化，引动美国卷入。11月17日，蒋致电杜鲁门，介绍了东北局势和撤退东北行营等问题，表示：“此种局势，需待中美双方之积极的与协调的动作，以防止其继续恶化”^①。对此，杜鲁门迅速做出反应，11月27日，杜鲁门宣布马歇尔使华。对于杜鲁门的这一决定，王世杰在日记中写道：“杜鲁门总统决定派马歇尔将军为赴华特使。杜氏之此种决定，与蒋先生去电指述东北危机有关”^②。

综上所述，以蒋下令撤退东北行营为标志，东北问题出现了第一次政治危机。

重庆外交部于11月15日将撤退东北行营一事照会苏联大使馆，同日，张嘉璈在长春接到撤退命令，张对此判断：“推测蒋委员长用意，撤退行营是一种反攻苏方阻碍接收、暗助八路军之策略，且试探其真实态度”^③。这个判断是准确的。蒋介石此着立即见效，苏方迅速做出反应。自此，苏军的双重性彻底表现出来。

11月17日，苏联大使照会王世杰，表示：“苏军司令部严格遵守中苏条约，对于东三省之中国共产党部队，未曾予以任何帮助”。认为苏军撤退区出现中共活动，是因为中国政府未能控制这些地区，为此，照会提议：“倘中国政府现在希望苏军自东三省撤退延缓若干时间，则苏俄政府能将其军队延缓一个月”^④。做出协助接收的姿态。

①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1），第149页。

② 《王世杰日记》1945年11月29日。

③ 张嘉璈日记，1945年11月15日。《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第554页。

④ 朱汇森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5年11月17日。

苏方采取的另一个行动是与中共拉开距离，并对中共的活动予以限制。这种转变的征兆 11 月 11 日已经显现。当日，东北局致电延安：昨日友方突然通知陈云，苏方已允许在苏撤退前五天中国国民党空运部队到各大城市，并且不准我们在此五天中与国民党空运部队冲突。……如果五天中我们与国民党空运部队冲突，则苏方只能缴我们的械。友方一再提出莫斯科的利益应该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最高的利益。^① 莫斯科的利益为最高利益，也就是说，中共应服从莫斯科的利益。13 日，延安复电：如友人方针不能改变，我们应服从总的利益。^②

当蒋介石下令撤退东北行营之后，苏军的立场有了更大的转变。11 月 17 日，东北局致电延安：苏方今日又令自治军全部退出沈阳城，城内只留警察。长春亦有同样情况。当日，陈云由哈尔滨致电彭真、林彪：驻哈尔滨苏军奉其上级命令，要求我军于十一月二十二日全部退出哈尔滨市。^③

与此同时，苏军的撤军行动亦告暂停。这种情况使东北局对时局的判断一时间失去把握。11 月 18 日，东北局致电延安：友军何以忽又缓撤，政策是向积极方面转抑向软化方面，友人亦不知。^④ 所谓友人亦不知，表明东北苏军对于莫斯科的决策，也不甚理解。

东北局的疑惑刘少奇做出了解答，11 月 19 日，刘致电东北局：美蒋在满洲问题上已对苏联采取了外交攻势。国民党已声言拒绝接收，撤回熊式辉等行营人员……最近苏军态度变化，暂缓撤退，当亦为此种情况的反映。^⑤

① 《彭真年谱》上卷，第 315 页。

② 《彭真年谱》上卷，第 316 页。

③ 《彭真年谱》上卷，第 318 页。

④ 《彭真年谱》上卷，第 319 页。

⑤ 《彭真年谱》上卷，第 319 页。

当日，彭真、林彪致电延安，报告：接到苏军通知，长春路沿线及城市全部交给蒋军，有苏联红军之处，不准我军与蒋军作战，要我军退出铁路线若干里以外，以便蒋军能接收，他们能回国。20日，刘少奇复电：彼方既如此决定，我们只有服从，长春路沿线及大城市让给蒋军。^①

军事上的“服从”，必然牵涉到政治步骤的改变。因苏军原定11月中旬开始撤退，因此中共原定于此时成立公开的政权机构。11月20日，东北局致电延安：东北人民代表会议代表三百余人已至沈阳……定于明日开幕。我们拟由此次会议产生东北各省人民自治联合会。代表会议拟选张学良为正主席，张作相、林枫、李杜、张学思为副主席。22日，延安复电：同意由东北人民代表会议产生东北各省人民自治联合会的意见和张学良等人选。^②然而，11月25日，东北局撤出沈阳，尔后发出通知：人民代表会议，因外交关系中途休会。^③休会实际上就是停止了。

由东北问题引起的纠纷，使国民党在中苏谈判前后所拟定的亲苏方针动摇起来。蒋在11月8日提议撤退东北行营时说：“我亦不因顾虑东北之收回而与苏联继续敷衍”。也就是不惜与苏决裂。但王世杰不赞成，王所担心的似乎并不在于苏联的反应，而在于美国的反应。王认为，与苏破裂以及内战爆发，“友邦在目前亦不见能予我以有效之支援”。也就是说，王对美国届时是否可靠提出了质疑。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有其历史根据的，王说：“我于此时如对苏联采取不惜决裂之政策，其结果或与一二八之抗战无异，美国尽管有史汀生其人者反对侵略东三省之国

① 《彭真年谱》上卷，第320页。

② 《彭真年谱》上卷，第321页。

③ 《彭真年谱》上卷，第325页。

家，但恐非五年或更长时间以后，美国不能助我做有效之抵抗，一如一二八以后中日冲突之情形”。^①王所说的是，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后，美国尽管同情中国，但并无实际援助，因此中国在一个长时期内只能单独对日抗战。王的意思是，对苏决裂，美国很可能如同当年那样，口惠而实不至，从而导致中方单独与苏抗衡的不利局面。这个意见看来被接受了，直至退出大陆时止，国民党对苏大致保持克制。

苏方于11月17日提出延缓撤军以协助接收的意向后，18日，蒋召集会议商讨这一问题。王世杰报告了事情经过，王说：“十五日我方通知苏大使：（一）长春行营及机场受共党武力威胁；（二）即撤行营至山海关；（三）留董副参谋长代表驻苏军总部。昨晚苏大使转告：（一）机场等处实无共党；（二）苏方从未助共；（三）中国如希望苏军协助建立满洲政权时，可延续一个月再撤”。董副参谋长即东北行营副参谋长董彦平，行营撤离后，董仍留长春与苏军保持联络。王世杰报告之后，“蒋先生决定答其可缓一个月”。也就是说，蒋认为可以借助苏军的协助。而徐永昌则认为：“一、不必希望缓撤为善意或者有助于吾人；二、应将经过宣布中外”。^②徐的意思是仍觉苏军靠不住。结果，这次会议决定将苏军撤离的时间延至1946年1月3日。^③

同意苏军缓撤，说明蒋再度决定接收东北，这样，搁置东北、首先解决华北的方针再度改变。当苏方不予配合时，蒋之决心易下，而当苏方略示合作之意时，蒋便自乱阵脚了。

11月19日，重庆外交部照会苏联大使馆，表示东北接收问

① 《王世杰日记》1945年11月8日。

② 《徐永昌日记》1945年11月18日。

③ 《王世杰日记》1945年11月18日。

题应由中苏双方再订一个有效计划。中方提出的计划分为三点，其中第二点为：“中国政府如须利用北宁铁路及东北港口运输军队时，苏方允予以可能之便利。”11月24日，苏联大使彼得罗夫照会王世杰，对上述要求答复道：“因在营口与葫芦岛区域及沈阳以南，现无苏联军队……故东三省苏军司令部对于此事，实无可能协助”。26日，王世杰照会彼得罗夫，对苏军不能在沈阳以南协助接防表示谅解，同时通告近日内中方将派部队进入沈阳以南地区接防。^①事实上就在当日，杜聿明进占锦州。

此时，东北苏军也做出若干合作姿态，仍在长春组织行营撤离的张嘉璈以及联络代表董彦平，分别致电重庆报告近日情况：“董彦平梗电：（一）苏将共党行动略予规律，市面较前稳定；（二）长春市长苏方已令复职；（三）苏兵车续南开。”张嘉璈漾电报告与马林诺夫斯基谈话如下：“张问军队缓撤是何意义，马答沈阳以南均八路军，苏军一撤，将陷于混乱，故缓撤，以待中央军。张又谓，希望中苏间云雾早日打开，马则曰并无困难，望长春、沈阳空运早到，苏军将助贵方建立政权”。^②马林诺夫斯基明确回答了两个核心问题：第一，苏军缓撤目的是“以待中央军”；第二，苏军将协助国民党“建立政权”。

经过上述一番磋商接洽之后，11月30日，彼得罗夫照会王世杰：“苏联政府接受中国政府所表示之愿望，同意苏联军队自东三省延期一个月撤退，即延期至一九四六年一月三日为止”^③。

此时，美国方面对东北问题是什么态度呢？11月上旬，魏

^①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1），第153~156页。

^② 《徐永昌日记》1945年11月24日。梗、漾均为23日。

^③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1），第157页。

德迈由美述职返华后，向蒋递交了一份美国对华政策备忘录，其中表示：“援助接收东北，但不派美军进入，一切问题由中苏直接谈判。”^①也就是说，美方的态度是避免直接卷入。

12月5日，蒋就苏军缓撤以及接收沈阳、长春问题征求魏德迈的意见，魏德迈表示：“职意吾人须以稳定华北之军事的与政治的控制，为第一要着”；“职复相信，吾人须先稳固华北华南，乃能进而从事东北”。^②魏德迈这个意见与蒋11月16日在军委会的讲话是一致的，意思就是不主张将战略重点放在东北。

在此之前，魏德迈于11月20日致电美国陆军部，对国民党的整个态势做出四项判断：第一，“委员长将能够稳定华南的情势”；第二，“他将不能够在几个月之内，也许几年，使华北的情势稳定下来”；第三，“他将在许多年内不能收复东北，除非他能与中国共产党和苏俄政府达成满意的协定”；第四，“中国中央政府与中国共产党之间达成满意的谅解，显得遥远”。^③

在看到国民党既不能收复东北，又不能与中共达成满意协议的情况下，魏德迈于1945年9月、11月先后两次向蒋介石进言，建议将东北交由苏、美、英、中四国托管。11月20日，魏德迈在致美国陆军部的电报中建议：“立即建立对东北和朝鲜在苏俄、英国、美国和中国之下的托管。托管期限至四国同意认为中国已可担负控制东北的责任和朝鲜人民自己准备了完全自治为止”^④。

那么托管东北的意图是什么呢？魏德迈于1946年8月2日在致蒋介石的函件中谈及此事，他说：“在抗战胜利来临之初，

① 唐纵日记，1945年11月13日。《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553页。

②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1），第160页。

③ 《魏德迈论战争与和平》，第220页，台北正中书局，1989。

④ 《魏德迈论战争与和平》，第226页。

无疑地你会记得，我曾建议由五大强国立即对东北和朝鲜托管，如此，你可集中你大部分资源和努力于长城以南中国领域的稳定和重建”。^①腾出手来首先解决关内问题，这便是托管东北的意图。

然而魏德迈托管东北的建议并未被蒋接受，其原因，魏德迈于1946年3月11日在致美国陆军参谋长的电文中谈到这一问题。他说：“在去年九月我返回美国述职以前，我把东北托管构想向委员长提出，然而，那个时候他不关切苏俄的动机，似乎对三十年中苏协定有利的方面感到安慰。……在十一月间，我再度向他建议让东北托管。在这个时候，他断言这种安排将无疑地防止苏俄在东北片面的和任意的行动，但是，他觉得那时已太迟了。他说明他的看法，苏俄将不会接受朝鲜或东北之托管。此外，他自己在内部的政治地位是不稳固的，他不能表示软弱和显出他没有能力应付国家内部的问题，包括东北在内”。^②

蒋介石的判断是准确的，即苏联不会接受托管，托管意味着美国势力将进入东北，而苏方已将东北视为苏联的势力范围，绝不允许美国渗入，因而绝不会同意托管。魏德迈的判断也是准确的，即蒋出于内部原因不能接受托管。中苏条约的签订在国民党内本来争议就很大，托管，等于宣告中苏条约失败，蒋必将面临更大的争议和不满。因此，蒋必须拒绝托管，也必须继续进兵东北，以显示他在东北问题是能够应付一切危机的。由于上面两条原因，东北托管一事未能实施。魏德迈于1947年还曾提出对东北实行国际监护，但那时这项计划更加无人理睬了。

张嘉璈于11月24日率东北行营最后一批人员撤离长春，但

^① 《魏德迈论战争与和平》，第243页。

^② 《魏德迈论战争与和平》，第233页。

不及两周时间，即12月4日，张与蒋经国奉命率行营再返长春。至此，东北行营退出与再入长春这出戏落幕了。

由于与苏方达成一系列新的谅解，因此东北行营重返长春时是满怀希望的。12月5日，张嘉璈与蒋经国一同拜会马林诺夫斯基，马林诺夫斯基表示：如苏军1946年1月3日撤退完毕，现在便须由沈阳附近撤退，不知中方能否于短期内建立政权，否则可改为苏军于1946年1月3日起开始撤退。希中方答复。^①

由于东北大部分地区已为中共占据，国民党军不可能在不足一个月的时间内全部接收东北，因此，苏军提出的这个意见，似乎仍是一种善意的表示，国民党也实在没有更多的选择，因此，王世杰向蒋建议：“撤兵延期一事不妨接受，惟须迟至本月底再正式协定”^②。蒋表示同意。12月7日，王世杰向彼得罗夫表示：同意苏军于1946年2月1日前撤退完毕。^③这样，苏军撤退日期经两度延期后，最终定为1946年2月1日。^④

在东北行营退出与再入长春这段时间，国共双方对于苏军的

①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1），第158页。

② 《王世杰日记》1945年12月6日。

③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1），第166页。

④ 第二次延期撤军协定有一个小插曲。重庆外交部于1945年12月24日照会苏联大使馆，称：“依照贵我双方代表在长春会商之结果，中国政府赞同将苏军自中国东北诸省撤退完成之期，改定为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1），第168页）。这个照会没有说明延撤的要求由何方提出，笼统说是“贵我双方”的意见。12月29日，苏联大使复函王世杰，强调延撤的要求为中方提出，称张嘉璈、蒋经国于12月9日向马林诺夫斯基表示：“中国政府认为适宜将苏军撤退之期延至二月一日”。苏联大使表示，中国政府如能承认这一点，苏方可接受中方的延撤要求（同上，第170页）。12月31日，王世杰复函苏联大使，承认延撤要求为中方提出（同上，第171页）。苏方坚持延撤的要求为中方提出，是要向国际社会表明延撤的责任不在苏方。

双重性都有了新的认识，并做出各自的判断。11月5日，张嘉璈致函蒋，做出三点判断：第一，不使东北建成反苏政权；第二，不许美国染指东北；第三，“使中国不能在关外植一雄厚之武力，以夹击关内之八路军”。^①

12月5日，周恩来在写给中共中央的一份报告中认为：苏联的原则是坚持和平，“因此它不能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方，而坚守中苏条约。但在可能条件与许可情况之下，它没有不愿意援助中国人民和支持中共谈判的。只是这种援助必然是不公开的，这种支持必然是暗示式的”。“所以当着我们能以军事力量抵抗国民党的进攻以利谈判时，他们便欢呼。但是当我们要独霸东北、华北而只许国民党搭一股时，他们便惊呼这里边有火药气”。

张嘉璈率东北行营撤离长春后，曾于11月底在重庆约见董必武，周恩来大约从董必武处得知了张嘉璈上述对苏军意图的判断，周在报告中这样说：“张公权的窥测是对的：苏联不愿意在东北有军事纠纷，绝不愿美国军队开入东北，也不愿国民党派过多的兵驻扎长春铁路，而政治上更愿看到民主解决”。^②

将上述论点归纳起来，苏方的意图便清晰地浮出水面。一方面愿与国民党保持一定的国家关系，另一方面又不愿国民党在东北建立反苏政权，尤其反对将美国势力引入东北。既然不愿国民党建立反苏政权，因此，支持中共发展；既然要与国民党维持一定的关系，因此，又不愿中共独霸东北，担心由此引起内战。总括而论，苏方的总体意图是，支持国共谈判，以求在东北形成国共合作的局面，从而通过国共两方面，最大限度地获取苏联的双

^① 《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第542页。

^② 周恩来：《关于国共谈判》，《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6、7页。张嘉璈字公权。

重利益。

综上所述，经过东北行营退出与再入长春的波折，国共对于苏军的双重性都做出各自的结论。

二 中共东北战略的再调整

在苏方做出长春路沿线及城市全部交蒋的决定后，苏方严格限制与中共的接触。11月21日，时在苏军中任职的刘亚楼对陈云说：苏方已下令，不准其人员与我方接触。^① 陈云随后将此情况报告了延安。

在苏军改变立场的情况下，中共的东北方针第三次改变。11月20日，刘少奇指示东北局：“你们应迅速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基础……作长久打算”^②。延安甚至对东北局势做出相当严重的估计，并有相应的考虑。11月22日，刘少奇致电正在进行平绥战役的聂荣臻、贺龙等：“苏联由于条约限制，必须保证蒋介石接收满洲各大城市，我争取东北大城市暂时无望。因此，热河、察哈尔、绥远对我之全国战略意义更增加其重要性，必须求得控制绥远全省，才能有较巩固的后方，保障张家口侧翼，并建立将来必要时进入新疆的通路（如果东北不能建立巩固的战略基地，新疆或许有这种可能）”^③。由东北转入新疆的考虑表明，延安对东北局势的下一步发展，估计是相当不利的。

为掩护东北的全局性撤退，11月21日，刘少奇电令黄克诚：“应在林彪命令下，坚决打击由山海关向锦州前进之顽

① 《陈云年谱》上卷，第433页。

② 《刘少奇年谱》上卷，第529、530页。

③ 《刘少奇年谱》上卷，第532页。

军……以掩护我从沈阳、长春等大城市有秩序的撤退”^①。对于延安的这一要求，林彪提出了不同意见。11月22日，林彪致电延安和东北局，认为：“目前我军应避免被敌各个击破，应避免仓皇应战，应准备放弃锦州以北二三百里，让敌拉长分散后，再选弱点突击”^②。这个意见得到彭真、罗荣桓的认同。

林彪这个意见看来被延安接受，杜聿明于11月26日进占锦州后，刘少奇于28日致电东北局并林彪：“近两个月来我在东北虽有极大发展，但我主力初到，且甚疲劳，不能进行决战”。“苏联由于条约限制，长春铁路沿线各大城市将交蒋介石接收，我企图独占东北，无此可能”。指示：“应将一部分主力分散去控制各中小城市、次要铁路和广大乡村……作长期打算。”^③作长期打算的决定表明，因独霸东北的考虑而产生的锦州决战计划至此放弃。

此后不久，中共由内地调往东北的干部、军队大部分到达，因此，东北局主要负责人曾再度提议部署兵力夺取沈阳、长春。12月5日，彭真、罗荣桓致电延安：据渝电，蒋顽能空运到沈阳、长春的兵力各一万人，我军则可集中三万到四万主力争夺沈阳，集中一万主力威胁长春，“因此我们应积极准备参加争夺沈阳，以造成对和战都有利之局面”；“如蒋顽开到后，苏军即撤退，我即坚决争取消灭敌顽，先占沈阳，再夺长春”。^④

彭、罗这个意见未被延安接受，12月7日，刘少奇复电东北局：“第一由于目前的国际条件不够；第二由于我们在东北还有各种缺点，我们企图独占东北特别是独占东北一切大城市，已经是肯定的不可能。因此，我们目前不应以争夺沈阳、长春为目

① 《刘少奇年谱》上卷，第530页。

② 转引自彭真《东北解放战争的头九个月》，《辽沈决战》续集，第9页。

③ 《刘少奇年谱》上卷，第534、535页。

④ 转引自彭真《东北解放战争的头九个月》，《辽沈决战》续集，第12页。

标来布置一切工作”。“望你们迅速考虑成熟加以确定，否则，动摇不定，妨害工作”。^①

12月8日，东北局迅速就创造根据地的部署意见上报延安，12月21日，刘少奇复电同意，并提出：“建立后方，建立工业，组织与训练军队，开办学校，以便能够源源供给前线，有如汉高祖之汉中”^②。

经过以上一番争论之后，1945年12月28日，毛泽东向东北局发出一个全面转变方针的指示，此即后来收入“毛选”的《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一文。毛首先指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建立这种根据地的时间，需要三四年，但是在一九四六年一年内必须完成初步可靠的创建工作”。这是从总体上对任务和时间的要求。毛继而指出：“建立这种根据地的地区，现在应当确定不是在国民党已占或将占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是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③

在这里，毛对东北1946年的工作方针做了“确定”的安排。这是自1945年10月下旬以来，对“独占”东北方针的重大改变，也是中共东北方针的又一次重大调整。毛的指示中没有提到苏军的因素，但中共这一方针的调整，最根本的原因，显然是苏军转而与国民党合作所造成。问题在于：中共方针既然因苏军的转向而调整，那么，随着苏军的再度转向，中共方针必然再度调整。

三 国、苏关于东北经济合作的争论

所谓经济合作，简言之，就是苏方将日本在东北的产业，视

① 《刘少奇年谱》上卷，第539页。

② 《刘少奇年谱》上卷，第545页。

③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148～151页。

为苏军战利品，要求作为苏联产业与中方合作经营。而中方则认为，东北的日资产业，应作为日本对中国的战争赔偿，归中国所有。国、苏在经济合作问题上的争论，导致双方关系最终陷入僵局。

还在东北行营撤离长春之前，苏方已流露出经济合作的意向。11月7日，在苏方的一次招待会上，马林诺夫斯基对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张嘉璈说：“此后第一幕工作为阁下之工作”。对于此言，张颇为费解，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此段谈话，颇耐寻味，不知有何经济问题提出，更不知何以在其语气中，如此注重我之工作”。^①张预感到此中有一丝不祥之兆。

不久，问题的一角浮出水面。苏军要求东北日资企业向苏方移交资产，理由是日资企业都曾帮助日本关东军，以苏联为军事对象，因此日资企业应作为苏军战利品，向苏方自动移交。至此，张对于在东北接收问题上苏方为何不予合作有了新的认识。张在日记中写道：“乃知苏方注意满洲工矿业，必欲染指，实为排斥美国势力侵入，阻滞我方军队运输之一重大原因”。张的结论是：“故经济问题不先解决，即接收问题无法解决，已灼然可见。十一月七日，马元帅谓：‘此后第一幕工作为阁下之工作’之语，余得其端倪矣”。^②张大约是第一个认识到经济合作与东北接收互为关系的国民党高层人士。

接下来张嘉璈的预测得到证实。11月14日，苏军司令部经济顾问斯拉特阔夫斯基向张嘉璈提出：以战利品名义没收日本企业，尔后以此资产与中方建立经济合作。11月16日，在东北行

^① 张嘉璈日记，1945年11月7日。《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第545页。

^② 张嘉璈日记，1945年11月13日。《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第551页。

营已接到撤退命令之际，斯拉特阔夫斯基再次约见张嘉璈，表示苏方已派人管理前日本企业，希望中方派人参加，双方按平均原则合作经营。对此，张进一步认识到：“斯顾问将苏方希望透露，显见对方因吾方将行营撤退，极求将经济问题解决，进而解决我方接收问题。足征经济问题为重要关键”。^①

上述情况表明，东北行营撤退之前，苏军的意图已经清楚地表示出来，也就是以国民党方面接受经济合作，作为苏军协助其接收的先决条件。

张嘉璈率东北行营最后一批人员于11月24日撤离长春飞抵北平。25日张飞抵重庆，当日见蒋，随即向蒋建议：“经济合作方案，宜早决定，庶几省市接收，可望顺利进行”^②。但张的这个意见未能获得支持。26日，蒋在官邸召集会议研讨东北问题，徐永昌记载：“张公权主张先与苏方商讨经济合作云云，诚书生之见。公权云对共勿以武力，决无平息之望。余则谓专恃政治更无望。”^③

11月28日，蒋召集宋子文、王世杰、熊式辉、张嘉璈、蒋经国专商对苏经济合作问题。宋子文说：“以日人东北投资为苏方战利品，作为合作投资，出乎中苏条约范围之外，无论如何，不能同意”。王世杰说：“在未顺利接收以前，谈经济合作，无异甘受苏方之高压，必引起人民反感，是以必须政治问题解决之后，方可谈到经济合作”^④。王世杰在当天日记中写道：“张公

① 张嘉璈日记，1945年11月16日。《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第560页。

② 张嘉璈日记，1945年11月25日。《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第569页。

③ 《徐永昌日记》1945年11月26日。

④ 张嘉璈日记，1945年11月28日。《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第570页。

权及蒋经国谓，对苏交涉，关于经济合作，似不可不迁就。予力主张在东北接收问题未有成就前，不可成立中苏经济合作之协定”^①。

宋、王为什么持反对意见？张嘉璈这样认为：“在宋王两先生，则深恐苏方得到经济合作权，而仍不让我接收，致政府所负之责任太大”。但张仍坚持认为：“惟以我个人接触所得之印象，则经济解决，虽不敢谓可完全顺利接收，然可望解决问题之一大半”^②。

这样，在东北经济合作问题上，宋子文、王世杰与张嘉璈、蒋经国形成两派意见，蒋介石在这天会议上未做最终裁决，但宋、王的意见居于主导地位。

宋、王是中苏条约的谈判者和签约者。在中苏条约中，中方已经承认外蒙独立，承认苏方在东北铁路、港口等等优越权，在如此条件下仍未能按中苏条约接收东北，国民党内和中国知识阶层已经不满。现在，在中苏条约之外，如果再承认另加的接收条件，尤其是这个另加的经济合作协定成立之后如果还是不能接收东北，宋、王便“所负之责任太大”。因此，宋子文坚拒中苏条约之外的接收条件，而王世杰则坚持接收之后再谈经济合作。张嘉璈因对中苏条约不负责任，因而其考虑问题相对简单一些，就事论事，只论目的不论其他。

两派意见的产生，是因为两者所处地位不同，所负责任不同，从而导致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故而主张不同。

蒋介石在这个问题上大体倾向王世杰的方案，即先接收，再谈经济合作。无疑，王的方案是最为稳妥的，然而问题在于，最

① 《王世杰日记》1945年11月28日。

② 张嘉璈日记，1945年11月28日。《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第571页。

稳妥的方案往往也是最不具可行性的。

1945年12月4日，张嘉璈、蒋经国率东北行营重返长春，当天，张在日记中对中苏两国外交手段的运用，做如下评价：“十一月十五日，我方以行营撤退决定通知苏方，苏方即于十七日通告我方苏军缓撤，帮助我在东北建立政权。此通告，含有两种作用：一以表示遵守中苏条约之精神，一则可有从容时间，讨论经济问题。其外交手段之敏捷，令人钦佩。而吾方则行动迟缓，手段呆板。徒知主张原则，而不知运用方法以贯彻原则。尤以宋院长认为对于苏方交涉，不能有所成就，结果无非徒劳。王部长谨慎小心，处处从法理观点立论……深虑中苏交涉或将归于失败”^①。国民党高层人士中，大约只有张嘉璈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即苏军之所以延缓撤军，其目的在于：“可有从容时间，讨论经济问题”。

12月5日，张嘉璈与蒋经国一同拜会马林诺夫斯基。苏方此次将东北行营请了回来，当然不能不有所给予。在会晤中，东北的行政接收问题十分顺利，张嘉璈表示，大连、沈阳、长春、哈尔滨拟先行接收。马林诺夫斯基表示，中方市长尽可前往接收。尔后，马林诺夫斯基提出：“惟对于经济问题，切盼早日解决”。按照王世杰的意见，张嘉璈表示，接收完成之后可与苏方商讨经济合作问题。马林诺夫斯基则坚持道：“经济问题仍盼先开始商讨”。^② 双方要求恰恰相反。当日，蒋经国致电乃父，报告会谈情况，指出苏方谈话要点为东北经济合作问题。^③

① 张嘉璈日记，1945年12月4日。《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第576、577页。

② 张嘉璈日记，1945年12月5日。《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第576页。

③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1），第158页。

重庆方面接到报告后，蒋介石仍倾向于王世杰的意见，王记载：“蒋经国、张公权自长春来电，谓苏军对于我方要求解除非政府军队之武装，及派员赴东北各省市组织警察，以及沿北宁铁路向沈阳推进，均表同意。并希望将撤兵期展至一月底，以便我方军队能如期接收各地。惟希望在此时商谈经济合作问题。予向蒋先生陈述，谓撤兵延期一事不妨接受，惟须迟至本月底再正式协定，经济合作之商谈，仍宜主张迟至东北接收完竣以后。蒋先生亦赞同此意。”^①

不论怎样，东北行营重返长春后，迅速展开对东北的行政接收。12月22日接收长春，12月27日接收沈阳，1946年元旦接收哈尔滨，同时也接收了其他一些省份。^②这样，国民党在名义上接收了东北大部分地区。与此同时，经济合作问题仍然僵持，王世杰记载：“我军之入东北者，已由锦州向沈阳推进。苏方欲与张公权、蒋经国等谈东北工矿问题，我仍未予置答”^③。由于经济合作问题未能解决，很快，杜聿明部便不能向沈阳推进了。12月13日，杜聿明致电军令部：“马林诺夫斯基已令知黑山、阜新苏军，言华军在双方协议前，不宜向该两地前进，对沈阳、彰武、赤峰、多伦各地亦然，故我军在政府未与苏方商洽前不可再进等因，现职部最先头仍在沟帮子附近”^④。

杜聿明部滞留南满不能向北推进展开军事接收，因此，单纯的行政接收实际上是无效的。所谓行政接收，实际上就是挂出了几块行政机构的招牌。

由于拒绝经济合作，东北接收实际再度陷于停顿。12月20

① 《王世杰日记》1945年12月6日。

②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1），第220页。

③ 《王世杰日记》1945年12月11日。

④ 《徐永昌日记》1945年12月13日。

日，张嘉璈、蒋经国由长春飞抵南京，此时蒋介石与王世杰正在南京迎候即将使华的马歇尔。张嘉璈向蒋“报告东北接收情形及苏军要求合办重工业事”，但王世杰仍然坚持“对苏之经济合作，必须在东北接收完成后，始能有所协定”。^①

为再度打开东北问题僵局，蒋介石决定派蒋经国作为其私人代表，前往莫斯科直接会见斯大林。

自东北接收以来，国民党在与苏方的交涉中麻烦不断，究竟苏联对国民党的政策是什么？国民党高层人士希望切实了解这一点。

还在东北行营进驻长春后不久，张嘉璈即于11月5日致函蒋，建议：“向史太林割切商量，先求彻底之精神了解”^②。张的意思是，没有一个总体的政治精神上的沟通，具体问题上的麻烦必然层出不穷，因此提议直接与斯大林解决这一问题。张群也向蒋提出过这一建议，王世杰11月9日记载：“午后蒋先生与予续商东北问题及中共问题。张岳军曾建议蒋先生与史达林晤见，或予赴莫斯科一行。予谓问题的症结在苏俄与中共关系，此事□不便成立任何正式的协定”。王世杰的意思是，苏联不会在中共问题上与国民党成立正式协定，因此他赴莫斯科不能解决问题。“于是蒋先生决定先派蒋经国为私人代表，赴莫斯科见史达林”。^③尔后，王世杰派卜道明将此事通知了彼得罗夫大使。

11月15日，张嘉璈日记载：“蒋特派员经国兄出示蒋委员长致渠信，拟令其赴莫斯科一行。余极为赞成，认为与苏方须得

① 《王世杰日记》1945年12月22日。

② 姚崧龄：《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第542页。

③ 《王世杰日记》1945年11月9日。

一精神上之谅解，否则种种交涉，均是枝节”^①。

12月3日，苏方就此事答复重庆外交部，王世杰记载：“苏联大使来外交部，谓史达林对蒋先生派私人代表赴莫斯科一事表示同意，且谓其时间以在十二月下半月为合适”。12月7日，王世杰通知彼得罗夫，蒋经国于12月25日左右赴莫斯科。^②

蒋经国与张嘉璈12月20日抵南京后，24日，王世杰代蒋拟定了给蒋经国的赴苏指示，“规定其任务在疏通感情、减少苏联对国民党疑虑，不做具体谈判。对于中共问题，说明蒋先生之政策与态度”。^③这个指示表明，蒋经国此行主要在于就中共问题与苏方求得政治上的疏通，而不做具体问题谈判。显然，如果没有一个总体上的精神谅解，具体谈判即使有结果也是无效的，中苏条约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蒋经国此次访苏的时间是1945年底至1946年初，与斯大林有两次交谈，莫洛托夫参加。

1945年12月30日晚9时，蒋经国与斯大林进行第一次谈话，主题是就中共问题听取斯大林的意见，以求疏通感情。蒋经国转达了蒋介石的意见：“请斯大林大元帅劝告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斯大林答：“中国共产党并不隶属于俄国共产党人。共产国际已不复存在，俄国共产党人很难进行调停。”蒋经国说：“斯大林大元帅的威信可能对中共产生影响。”斯大林答：“苏中条约已经公布，但看来中共并不重视这一文件”。

见斯大林将其与中共的关系推得一干二净，这个问题难与苏方“疏通”，蒋经国遂将话题转入具体问题，即东北的经济合作

① 姚崧龄：《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第546页。

② 《王世杰日记》1945年12月3、7日。

③ 《王世杰日记》1945年12月24日。

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东北接收不能展开的关键问题。蒋经国说：“苏军司令部认为：东北的所有企业均为战利品”。斯大林说：“只有那些为日本关东军服务的企业属战利品。按照战争的法则，此种企业属战利品。所以，苏联政府并不想得到所有这些企业”。蒋经国说：“为避免将属于战利品的企业转给苏联可能给居民留下不好的印象，蒋介石建议以别的根据作为把企业转给苏联的理由”。蒋介石的这个建议是：“鉴于苏军消灭了东北的日军，同时也遭受了损失……中国政府将把半数的企业转给苏联”。莫洛托夫说：“可见，蒋介石不愿把这些企业作为战利品转给苏联”。蒋经国转达了中方在这个问题上先前的立场，表示：“蒋介石同意建立苏中联合公司，不过希望在苏军撤走后再签订条约”。斯大林表示：“现在可以继续谈判，协定晚些时候再签署”。

关于驻华美军问题，斯大林明确表示：“苏联政府不希望美军进入东北。这是苏联的地区。……无论美军、英军和其他外国军队均不应当允许进入东北”。蒋经国表示：“美军不会进入东北”。^①

从第一次谈话看，蒋经国希望斯大林劝告中共的要求等于落空，而在东北势力范围问题上，斯大林则表示了严正的立场，即“这是苏联的地区”。

1946年1月3日晚11时，蒋经国与斯大林进行第二次谈话。关于东北日资企业所属问题，斯大林说：“他已打电话给苏联军人，同他们进行了交谈。他们不同意不宣布为日本关东军服务的日本企业为缴获的财产。苏联军人对不想把这些财产看做战

^① 《斯大林同志同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蒋经国的会谈记录》，1945年12月30日。转引自A. M. 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中国》，第14~28页，新华出版社，2001。

利品感到气愤。他们希望像对待德国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被红军解放的欧洲国家的财产那样对待这些财产”。“苏联军人说：他们流血牺牲，因此，应当把为关东军服务的日本企业视为红军的战利品”。斯大林严正表明上述意见之后，这个问题也就不可能继续商谈了。

接下来的话题转入泛泛的交谈。斯大林说：“毛泽东是独特的人，独特的共产党人。他在农村活动，避开城市，对城市没有兴趣”。对此，斯大林表示“不理解这一点”。这是实话，斯大林对于中国革命的方式与道路的确是不理解的。问题在于，斯大林对毛泽东这个略带贬义的评价，与国民党所期待的“疏通”，并非一个问题。

关于中国的政体，斯大林说：“苏联没有敌对阶级，因此，苏联可以实行一党制。在中国，除国民党和共产党外，其他党也应当存在”。此言的意思是劝告国民党不要搞一党制。

最后，蒋经国仍然指望在国共问题上与斯大林“疏通”，“他认为斯大林同志应当关心国民党，因为国民党是在列宁协助下建立起来的”。关心国民党，其潜词就是支持国民党。斯大林说：“国民党当然是比共产党更广泛、更有影响的党”。^①这个在“关心国民党”的要求下所做的答复，等于什么也未答复，仍不能视为“疏通”。

谈话结束时，斯大林托蒋经国带回一封致蒋介石的信，表示：“我希望我们两国关系将按照苏中条约发展”。这些纯属外交辞令的话，毫无实际意义。

综上所述，蒋经国此次访苏，实际上一无所获。按照王世杰的指示，蒋经国的主要任务是与苏方做政治“疏通”，然而以斯

^① 《斯大林同志同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蒋经国的会谈记录》，1946年1月3日。转引自 A. M. 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中国》，第29~40页。

大林的阅历，怎么可能仅凭一二次谈话，便能够与一个长期敌视苏联的政权“疏通”？于是三言两语便把这位当年的留苏学生打发回国了。

蒋经国此行，是国民党要员最后一次访苏。

本章小结 经过东北行营退出与再入长春，苏军的双重性彻底表露出来。这种双重性的结果是，在东北形成了国、共、苏三足鼎立的格局。问题在于：三足格局并非是稳定的、最终的格局。苏军的立场所以具有双重性，是由苏联国家利益的双重性决定的，力图通过国共双方获取苏联的双重利益。那么，如果某一方不能满足并危及苏联利益时，苏军的立场必将转而支持另一方。国民党与苏联关于经济合作的争论，为苏军立场的再度转换埋下伏笔。

1945年底，随着马歇尔使华，拖延多时的政协会议一事再度提上议程。与此同时，美、苏、英三国外长发表莫斯科会议公报，重申外国军队退出中国。在这样一个内外环境下，王世杰又乐观起来，王致电东北行营，认为：“美、苏僵局已于莫斯科三外长会议打开，今后苏方当不易作独立自由之行动。国际全局好转，国共商谈重开……其他问题，似可望妥协”。也就是说，王认为国际全局将能够制约苏联在东北这一局部地区的行动，因此东北问题可望解决。对此，张嘉璈在日记中写道：“读此电后，知王外长始终不明瞭苏方对于东北，有其局部之策略。任何国际局势之变动，不能动摇其既定之局部策略”。^①张与王的看法恰恰相反，认为苏联在东北这个局部地区的政策，不会被全局所动摇。事后看，张对问题的看法较王更深。

^① 张嘉璈日记，1946年1月1日。《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第610、611页。

第八章 政治协商会议

——政治背景与政治态势的再转换

重庆谈判结束之后，国共的重点均转入军事推进，力争取得战略优势之后，回过头来再做政治谈判，从而取得政治优势。因此，重庆谈判到政协会议之间的这段时间，是一个过渡阶段。

毛泽东由重庆返回延安后，于1945年10月20日致电各中央局：“目前开始的六个月左右期间，是为抗日阶段转变至和平建设阶段的过渡期间。今后六个月的斗争，是我们在将来整个和平阶段中的政治地位的决定关键”。毛指出：“国民党力图在最近几个月内控制更多地方，力求他们在华北、东北占优势，力图削弱我党我军，以便在利于他们的条件下实现和平妥协”。为此，毛要求：“毫不动摇地争取目前的胜利，以便有利地转到和平发展的新阶段”。^①

不难看出，毛对于这个争取战略优势的过渡阶段，时间安排是六个月左右，然而政协会议召开时，距重庆谈判仅三个月，并且更重要的是，此时双方并未形成预期的战略优势。

政协会议之所以在预期的战略优势尚未形成的情况下召开，主要是国内与国际两个因素所促成。

^①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38、39页。

一 政协会议的国内背景

政协会议就是中共最初提出的党派会议。林伯渠于1944年9月15日提出联合政府口号，同时提出召开一个党派会议，具体商讨联合政府，因此，党派会议是与联合政府相联系的。

1945年2月国共谈判期间，王世杰将党派会议更名为“政治咨询会议”，理由是便于无党派人士参加，这个会议的任务是：“统一军事及容纳国民党以外之人于政府”，因此，政治咨询会议是与参加政府相联系的。

1945年7月六位参政员访问延安时，对会议的名称做了第三次更动，称政治会议，会议主题尚未做最后确定，但第三方面主要关注的是由这个会议解决国民大会的问题。

毛泽东重庆谈判期间，中共表示“不提”联合政府，与之相联系，同时表示不提党派会议。但为解决许多必须由各党派参加才能够解决的问题，如国大问题等等，中共遂将党派会议与第三方面提出的政治会议相结合，提出召开一个由各党派参加的政治会议。在重庆谈判9月10日的会谈中，张治中建议：“此次会议可称为政治协商会议，不必称为党派会议”^①。这样，会议名称几度更动之后最终确定下来。根据重庆谈判会谈纪要，政协会议的议题为三项：和平建国方案、国民大会和解放区问题。

以上表明，会议名称的几度更动，是与会议内容、性质的更动相联系的。

由于政协会议主要是延续重庆谈判的政治走向，主要解决遗留下的中共解放区问题，因此国民党方面较为积极。10月10日，蒋介石在与毛泽东话别时表示：“如政治协商会议能在本月

^①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2），第63页。

底开会协商，则国大会议，政府可迁就其意，改期召开”。^① 根据重庆谈判会谈纪要，国大之前必须召开政协会议，因国民党六大已宣布 11 月 12 日召开国大，因此希望尽快召开政协会议。

重庆谈判结束之后，王世杰向周恩来转达了蒋介石的意见，蒋提出于 11 月初召开政协，同时，第三方面也希望尽早召开。10 月 26 日，周恩来致电延安，认为：“政治会议早对我们不便，倡议不开或缓开，又给国民党造口实”。“关于政治会议，各方属望其早日开成。我方表示无兴，则将给人以我方消极的印象”。^② 对于周的意见，延安复电表示：“避免戍文前在政府胁迫下开政治会议，拖过戍文（而又不露形迹）则事情好办”。^③ 戍文即 11 月 12 日，拖过戍文，意思是使国民党不能于这一天召开国大。

以上表明，由于政协是延续重庆谈判的走向，因此对中共是不利的，中共的方针是“拖”，以避免国民党的政治“胁迫”。

如前所述，毛泽东由渝返延后制订的计划是，以六个月左右的时间，控制东北，保卫华北和华中，“然后同蒋开谈判”，也就是争取在一个有利的背景下召开政协。

此后，随着国民党东北行营撤离长春，国民党与苏军的矛盾尖锐化，在这一背景下，中共将政协一事提上议程。1945 年 12 月 1 日，延安指示董必武、王若飞：“苏方在东北态度已甚为明显，目前所取步骤，即便严拒美军入满，又便我方谈判和发展”，“我方宜就此种时机，再开谈判之门，并开政治协商会议”。^④ 此时正是东北行营撤出长春期间，中苏条约露出破绽，

① 《蒋总统秘录》第 14 册，第 26 页。

② 《从延安到北京》，第 31、32 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③ 《从延安到北京》，第 33 页。

④ 《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 33 页。

国民党已不能如同重庆谈判那样充分利用苏联这一背景，这样，中共的谈判态势有所回升。此即中共决定再开谈判之门的背景之一。

重庆谈判结束之后，第三方面急切地敦促早日召开政协。1945年10月30日，黄炎培分别致函张群、张治中和周恩来、王若飞，提议：双方停止冲突，早日召集政治会议^①。11月2日，民盟发言人发表谈话，要求：“政府应该在十天以内正式召集政治协商会议”^②。

11月11日，民盟出面邀请国民党方面张群、王世杰、邵力子，中共方面周恩来、王若飞到特园会商政协问题，民盟方面出席者有张澜、沈钧儒、左舜生、罗隆基、章伯钧、张申府等。三方与会者就三个问题进行了商讨：“一、政治协商会议日期主张本月二十日左右召开，希望中共速复。二、国民大会日期，政府主张明年五月五日，不加可否。三、双方先电令停止军事冲突”。^③显然，三个问题并未取得一致协议，但民盟对于早开政协的殷切希望则表露无遗。11月20日，得知周恩来将返延安，黄炎培托周恩来转告毛泽东两句话：“善审时机，适可且止”^④。劝告中共的立场不可过于生硬。

11月25日，周恩来飞返延安。

第三方面为什么一再敦促召开政协？12月5日，周恩来在给中央的一份书面报告中，就第三方面的立场做如下分析：“各党派（国民党民主派在内）一般地倾向于开政治协商会议……

① 黄炎培日记，1945年10月30日。

②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101页。

③ 黄炎培日记，1945年11月11日。

④ 黄炎培日记，1945年11月20日。

而不热心于为解放区争几个省和几师军队，因为除去进步分子外，一般的均认为这是中共本身的利益，只有民主才于他们有益”。周又说：“一般人对谈判秘密进行，总是不耐的，尤其是磨延于解放区和内战的争论上，而未提全国性的民主自由，他们是不满的，故必须转入政治攻势”。^①

由于重庆谈判时中共未提联合政府，争论集中于解放区和军队数额，对此，第三方面表示不满；在第三方面看来，这些仅仅是中共自身的利益，而不是他们的利益。而政协可以商讨民主政治问题，从而代表了他们的利益，因此一再敦促召开政协。另外，重庆谈判采取国共两党秘密谈判方式，第三方面被排斥在外，因而也表示不满。第三方面对中共的意见可归结为一点，此即毛泽东在延安所说：“民主同盟说我们调子低”。

由于上述情况，周提出：“转入政治攻势”。这种攻势是，同意召开政协，更重要的是，将政协议题重做调整。周建议：“应以政治问题尤其是施政纲领、改组政府、民选国大及宪草原则为主题，才能合于我们的政治攻势”。重庆谈判以中共的军事问题为主题，周提出以政治问题为政协主题，就是要将国民党置于会议对象的地位，从而体现中共的政治攻势。

周在报告中对政协做如下展望：“在目前，应以政治协商会议为我方进行政治攻势的主要讲坛，辅之国共的幕后商谈。不要希望这次商谈有什么大结果，要准备在‘政协’中以政治攻势和国民党厮杀一场，也可能在厮杀中得到一些结果”^②。

周的报告反映了三个问题：第一，中共已由重庆谈判时“调子低”的状态摆脱出来；第二，周为政协确定的四项议题，正是后来政协会议的主要议题，这个议题摆脱了重庆谈判会谈纪

^① 周恩来：《关于国共谈判》，《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9、10页。

^② 周恩来：《关于国共谈判》，《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11、13页。

要的框架，将政协实际上变为各党派的国是会议；第三，中共本身的力量并不足以指望政协取得完满结果，因此中共的目的主要在于“厮杀”，而厮杀的结果则是次要的。

二 政协会议的国际背景

赫尔利于重庆谈判期间返美述职，11月26日提出辞去驻华大使职务的报告，27日，杜鲁门接受其辞呈，同日宣布马歇尔为赴华特使。马歇尔使华主要任务是制止中国内战。在美国看来，中国内战的原因，主要是未能实行西式民主政体，因此，在中国推行若干西式民主制，成为马歇尔解决中国问题的入手之处。

1945年12月7日，美国国务卿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说：“蒋介石委员长的政府在发展民主政治方面提供了最令人满意的基础。但是我们也认为，它还必须扩大，以便包揽那些现在在中国政府中还没有任何人参加的和组织得很好的团体的代表”。这位国务卿认为：“光靠中国领袖们自己还不能解决问题。在这方面，我们的影响是一个因素。……运用我们的影响，促成中央政府、所谓共产党以及其他党派，彼此让步”。^①

杜鲁门明确地说：“我派马歇尔将军到中国去是为了设法制止战争，以帮助国民党和共产党签订协定，组织一个联合政府”^②。马歇尔后来曾多次说，他使华时是希望“建立一个两党政府体制，以共产党为少数派成为处于合法地位的反对派”^③。也就是在中国推行类似于美国式的两党制。

① 《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第82页，三联书店，1974。

② 《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第101页。

③ 《顾维钧回忆录》第7册，第194页。

在宣布马歇尔使华后，国共都做出各自的反应。

陈立夫得知消息后，向蒋表示了反对意见。陈讲了三点意见：第一，“国、共间的问题，宜直接商诸苏联，反易解决”；第二，“美方对于共党问题，见解不深，易受其欺”；第三，“国共问题，据余推测，调解成功之机会极小，马歇尔将军英雄人物，为世所称，此番出任调人，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一旦失败，如何下场？其咎若诿之于我方，我又将何以自处？”^①陈立夫说蒋介石听了这个意见后，似有悔意，但为时已晚。陈立夫这段话大体可靠，1950年底，陈在美国对顾维钧说过大致相同的话。^②

不论怎样，马歇尔被接受下来，国民党方面立即展开宣传。《中央日报》在《欢迎马歇尔元帅使华》的社论中，对马歇尔大肆恭维，称马歇尔所任美军总参谋长一职，是美国“曾任此一职务者中最伟大杰出并且勋业极昭著的一个”，称美国在二次大战的胜利，“在政治上是罗斯福的胜利，在军事上是马歇尔的胜利”；称马歇尔是“美国陆军之母，傑克逊以后最伟大的军事天才，华盛顿以后最负人望的军人”。^③事后看，这种东方式的恭维对于马歇尔并无效果。

此时，中共对于国、共、美、苏四方关系的认识，中共在11月28日的一份内部指示中指出：“目前世界的中心问题是美、苏之争，反映在中国便是蒋、共之争。美国政府对华政策是尽力扶蒋、打共、反苏，而蒋之政策则在打共时企图中立苏……故苏联目前对华政策在形式上乃不得不与中共隔离，在对美斗争时有

①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3），第277、278页。

② 《顾维钧回忆录》第8册，第253页。

③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3），第43、44页。

时中立蒋……我们目前在以对蒋斗争为中心时，一方面固应表示与苏联无关，另方面有时（甚至只是形式上的）也可中立美国，以减少我们一时或某种程度的困难”^①。也就是说，国民党的打击目标是中共，中立目标是苏联；而中共的打击目标是国民党，中立目标是美国。这种中立都是从属于打击的。此即国共对美苏的基本政策。

12月9日，周恩来致电董必武等，指出：“赫尔利政策失败，马歇尔来华在方法上有改变可能，故我宜严整阵容，在政治上取攻势，在军事上取守势，但同时又应使其在军事上知难而退”^②。使马歇尔在中共问题上“知难而退”，这是中共对马歇尔的基本策略。

1945年12月15日，马歇尔即将启程赴华之际，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主要内容有如下几点：“美国及其他联合国国家承认现时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为中国之合法政府”。

“美国深知现时中国国民政府为一党政府，并相信假如国民政府之基础如能更加扩大，容纳国内其他主要政治分子，则中国和平、统一、民主的革新，必能更进一步”。

“中国国父孙逸仙博士所以培养在中国走向民主过程中建立一个一党训政之暂时施策，必须加以修改”。

“自立军队之存在，如共产党军之所为，不惟与中国政治之统一不合，且将使统一不可能”。^③

一党训政制与西方民主制是截然对立的，杜鲁门声明的核

^① 《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32页。

^② 《周恩来年谱》，第630页。

^③ 《大公报》1945年12月17日，杜鲁门声明当时有多种不同译文，本书采用大公报译文。

心，就是要求国民党实行西式民主。国民党执政以来，将孙中山的国父地位神圣化，随之也将孙中山的训政学说神圣化，从而以孙中山的名义抵制各党派的民主要求。杜鲁门声明的最大作用在于，直接点了孙中山的名，直接指出孙中山的训政施策必须修改。这个中国各党派从来不便正面提出的问题，由美国总统公开的、正面的提了出来，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的训政依据，孙中山的名字不再是训政制的保护伞。

杜鲁门声明使政协会议的背景和性质发生了根本转换。

12月17日，中共发言人发表谈话：“中国共产党欢迎杜鲁门总统十五日对华政策声明中关于国民党、共产党及其他意见不同的武装部队间停止敌对行动，召开各党派代表会议，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改组国民政府为各党派获有公平而有效的代表权的广泛代议制政府，借以实现中国之民主统一的建议”。在这里，中共实际上是将一年前关于联合政府的一系列要求，以融入杜鲁门对华声明中某些原话的方式，再度提出于国民党面前，使国民党无法正面反驳。

该谈话同时表示：“要求即将在重庆召集的政治协商会议，执行各党派代表会议的职权，结束一党专政与改组国民政府。”^①这就将政协会议的性质重新确定为改组政府的党派会议。

12月19日，刘少奇以中央名义致电中共中央局：“美国总统杜鲁门在本月十五日发表对华政策的声明，宣布中国内战要停止，国民党一党专政要结束，并约束在华美军的行动……这就是说，美国已决定不直接参加中国内战，不援助蒋介石武力统一中国，而援助中国的和平统一。所有美国政策的这些变动，对中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当前斗争是有利的。……马歇尔即将来华，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开幕……我们准备利用杜鲁门的声明，在

^① 《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35页。

政治协商会议上向国民党展开和平政治攻势。”^① 该电表明中共通过杜鲁门声明，摸到了美不直接支持蒋武力统一的底，中共的“政治攻势”即将展开。

12月16日，周恩来飞抵重庆。18日，周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国民党一部分人所提的方案，是先将军队交给政府，再由政府给一点民主。我们认为现在的政府还是一个一党专政的政府，把抗日的军队交给这个一党专政的政府，也就使人民抗日的军队，变为国民党的党军了，于是政府再用请客方式，请几个人去参加政府。这个办法是行不通的”。周主张：“把政府改组为各党各派、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民主合作的政府，再由这个政府去统一全国的军队”。^②

周的意思是，首先政治民主化，然后军队国家化，至于“合作的政府”一词，显然是为恢复联合政府这一口号而做准备。总之，杜鲁门声明发表后，中共的政治态势明显地得到改善。

杜鲁门声明在国民党方面也必然引起反应。12月17日，《中央日报》发表社论《读杜鲁门总统声明》，国民党对这个声明所采取态度与中共大致相同，也就是将该声明中对国民党有利的词句抽出，以示美国支持国民党，凡不利之处则一概回避。

社论强调两点：第一，独立武装问题，“杜鲁门总统声明说道：‘独立军队之存在，如共产党军队之存在，实与中国团结背道而驰，而实际上使中国政治团结不能实现。’我们认为他洞见此一问题的症结。”第二，政府地位问题，社论称：“中国大多数国民对于杜鲁门总统声明所说‘中华民国惟一合法政府’之

^① 《刘少奇年谱》上卷，第542、543页。

^② 重庆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编《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上卷，第53页，重庆出版社，1989。

国民政府，‘为完成统一的中国之目的之适宜机构’，持有坚定的信心……他们对于杜鲁门总统关于这一点的指出，必皆表示钦佩。”^① 国民党作为执政党，对杜鲁门声明所采取的这种引经据典的态度，实际上将杜鲁门及其美国政府，放到了中国政治的裁判者的地位。

杜鲁门声明发表不久，12月27日，莫斯科美、苏、英三国外长会议发表公报，其中有关中国部分这样说道：“三国外长曾就中国局势交换意见，他们一致认为必须在国民政府之下建立一个团结而民主的中国，必须由民主分子广泛参加国民政府的所有一切部门，并且必须停止内争。”^② 同时，美苏重申其军队将撤离中国。

这个公报的要点就是两项：第一，国民政府为合法政府；第二，国民政府必须改组。这两点与杜鲁门声明是一致的，但由于加入苏、英两方，因而形成美、苏、英三国联合干预中国政局的态势。

中共对于三国联合干预是欢迎的。中共对于美国一方在华调处本有顾虑，一度设想争取英、苏驻华大使一同参加调处。刘少奇曾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致电重庆中共代表团，刘说：“中国从来就是依靠几个国家相互牵制来保持独立的，所谓以夷制夷政策，如果中国只被一个强国把持则早已灭亡。”^③ 这段话是对美国而言的，希望英、苏加入调处形成相互牵制局面，既可使中共的回旋余地进一步扩展，也可进一步削弱国民党的地位，但这个设想最终未能实现。

① 《中央日报》1945年12月17日。

② 《中央日报》1945年12月30日。

③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427页。

国民党内部对于三国外长会议公报是有分歧的。王世杰致电张嘉璈，认为：“美苏僵局已于莫斯科三外长会议打开……国际全局好转，国共商谈重开……其他问题，似可望妥协”。^①也就是说，美、苏僵局的打开，能够帮助国、共僵局的打开。

但蒋介石对此是不满的，蒋后来曾对马歇尔说：“他认为1945年12月莫斯科外长会议就中国问题所采取的行动是对中华民族尊严和主权的侵犯。……只要他还是中国政府的首脑，他就不会接受涉及苏联政府或英国政府插手于中国内部事务的行动”。^②

总而言之，杜鲁门对华声明和三国外长会议公报，将中国政治尤其是中共的国际背景，从原来的中苏条约的背景下再度转换过来。

1945年12月20日，马歇尔飞抵上海，21日飞抵南京，当晚，蒋在中央军校官邸宴请马歇尔，王世杰作陪。据载：“餐后马氏语蒋先生略云：杜鲁门愿予中国战后复兴之一切援助，惟只能于美国舆论赞援之情形下为之”。^③这就是说：美国援华的程度取决于美国舆论，而美国舆论怎样才能赞成援华呢？显然，主要取决于国民党对一党训政制的改革，以符合美国的民主观念。马歇尔的到来，对于即将召开的政协会议，实际上起到了一个政治监护人的作用。

总之，随着政协会议的即将召开，对于国民党来说，国际与国内背景都发生了转换。唐纵这年底在反省录中写的一段话，可以视为国民党对局势的较有代表性的看法。唐写道：“年初还在战事的黑暗时期，年末乃是胜利的黑暗时期，政府始终在艰难

① 张嘉璈日记，1946年1月1日。

② 《马歇尔使华》，第450页，中华书局，1981。

③ 《王世杰日记》1945年12月21日。

困苦中”^①。

三 政协会议的组成、议题与性质

政协会议的代表名额，最初由周恩来在重庆谈判9月10日会议上提出，周建议国、共、民盟、无党派四个方面各为9名，外加蒋介石，共37人。^②后因青年党从民盟中分裂出来，单独组成一个方面，这样形成五方。10月21日，周恩来、王若飞在与张群、王世杰的会谈中商议：国民党8人，中共7人，民盟6人，青年党5人，无党派人士9人。^③

政协代表最终名单如下：

国民党8名：孙科、张群、吴铁城、陈布雷、陈立夫、张厉生、王世杰、邵力子。

共产党7名：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

青年党5名：曾琦、陈启天、杨永浚、余家菊、常乃惠。

民盟9名：张澜、罗隆基、张君勱、张东荪、沈钧儒、张申府、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

无党派9名：莫德惠、邵从恩、王云五、傅斯年、胡霖、郭沫若、钱永铭、缪嘉铭、李烛尘。

国民党代表中原有张治中，后换为吴铁城。

关于这份名单，1945年12月，周恩来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

① 《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569页。

②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2），第62页。

③ 《周恩来年谱》，第625页。

中做过一个具体的政治分析和政治归类。周说：“观此阵容，国民党并不能得到压倒的优势。以青年党作为国方与党算，国方得确定的十三人。我方加上郭、章、沈、张（申府）亦得确定的十一人。但青年党在民主问题上不能完全同意国方，而国方内部在省制上亦有分歧（孙、张、张、王、邵均赞成均权，只有 CC 三人主集权），故国方不及我整齐。至其他十四人，目前居右者四人（胡、傅、莫、钱），居左者四人（罗、东荪、缪、李烛尘），余六人则居中（黄、梁、表方、王、邵、君劭）。若以赞成民主与否来分，则君主派不如新旧民主派占优势”^①。

这是中共代表之外，周恩来对全部政协代表所做的政治分析。政协代表虽然单位上由五个方面组成，但从政治上讲，实际上由三个方面组成，即国、共、第三方面。国共两方的立场大体上是确定的，因此，这份名单中最值得研究的是第三方面代表。

周恩来是按两个标准来为第三方面代表做政治归类的：第一，通常的政治立场，也就是对待国共的政治立场；第二，超国共的立场，即赞成民主与否。

按第一个标准，青年党的五位代表，以及胡霖、傅斯年、莫德惠、钱新之，划为国民党一方。而郭沫若、章伯钧、沈钧儒、张申府，以及罗隆基、张东荪、缪云台、李烛尘，划为中共一方。居中者为黄炎培、梁漱溟、张澜、王云五、邵从恩、张君劭。按照这个标准，国共力量对比相差不多。

然而按第二个标准看问题，上述阵营便起分化了。首先青年党不能与国民党保持一致，同时国民党内部也有多人赞成均权，均权指省自治问题，即省宪问题。其他人士也是赞成民主的。因此，从第二个标准看，周认为“国方不及我整齐”，“君主派不

^① 周恩来：《关于国共谈判》，《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 12 页。周说国方的“张、张”，指张群和张治中，但张治中后来没有参加政协。

如新旧民主派占优势”。

从政协的组成单位看，青年党已被国民党从民盟中整体地分化出来，成为国民党的“与党”，但周恩来并不笼统地看问题，判断在民主问题上，青年党有可能局部性的再分化，也就是在局部范围内有可能与中共形成局部性的统一战线。后来证明，周的上述分析是准确的。这种某个具体问题上的统一战线，就范围上讲一方面是局部的，但从另一方面讲却又是最广泛的。周恩来对政协阵容的全部分析和判断，将毛泽东的统一战线理论具体、生动地体现出来。

各代表团除正式代表外，还设有若干顾问，中共代表团有顾问四人：华岗、章汉夫、张友渔、许涤新。^①

民盟代表团顾问阵容颇为强大，政治：邓初民、彭一湖、杜斌丞等。经济：马寅初、章乃器、周谷城、施复亮等。宪法：张志让等。法律：史良等。教育文化：潘光旦、陶行知、侯外庐、闻一多等。

关于政协会议的议题，国民党原本坚持重庆谈判会谈纪要所规定的三项议题，《中央日报》在12月12日的社论中坚持道：“属于政治协商会议讨论范围者有三：一为和平建国方案，一为召开国民大会问题，一为所谓解放区之地方政府问题。”^②但时过境迁，这三项议题已经不适合年底的政治形势了。

最后，政协议题定为五项，并成立五个小组分别讨论，关于这五个议题的确立，以及五个议题之间的关系，梁漱溟有一个说

① 许涤新：《风狂霜峭录》，第286页，三联书店，1989。另一说中共顾问为8人：李澄之、何思敬、王世英、沈其震、许涤新、张友渔、华岗、王炳南（《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第349页）。

② 《中央日报》1945年12月12日。

明，梁说：“政治协商会议的目标与任务既在实行宪政，那就必须先起草宪法，然后提交国民大会通过，所以设宪草小组和国民大会小组。而国民大会之召集不能由国民党一党包办，须由各方面共同召集，因此就须改组国民政府，容纳各党派参加政府，这样就设立了政府组织小组，协商政府改组事宜。政府改组后，宪政实施前，这一段时间如何施政，须要有一个共同纲领，所以又设立了施政纲领小组。此外，由停战会议而产生的停战执行小组，只管调处停战，而两党军队如何变成国家的军队，如何实现军队国家化，如何裁军整军，还需要协商解决，所以又设立了军事小组。”^①

所有五项议案均须五个方面一致同意方能通过，而不取决于多数，五个小组由五方面各派两人参加。

五个小组名单如下：

改组政府组

召集人：王世杰、罗隆基。

参加人：王世杰、陈立夫、王若飞、陆定一、曾琦、余家菊、罗隆基、沈钧儒、王云五、傅斯年（10人）。

施政纲领组

召集人：张厉生、董必武。

参加人：陈布雷、张厉生、董必武、王若飞、常乃惠、杨永浚、张申府、黄炎培、李烛尘、郭沫若、傅斯年（11人）。

军事组

召集人：胡霖、张东荪。

^① 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897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

参加人：张群、邵力子、周恩来、陆定一、陈启天、杨永浚、张东荪、梁漱溟、缪嘉铭、胡霖（10人）。

国民大会组

召集人：曾琦、邓颖超。

参加人：吴铁城、张厉生、董必武、邓颖超、曾琦、余家菊、章伯钧、梁漱溟、邵从恩、钱永铭（10人）。

宪法草案组

召集人：傅斯年、陈启天。

参加人：孙科、邵力子、吴玉章、周恩来、陈启天、常乃惠、罗隆基、章伯钧、傅斯年、郭沫若（10人）。

五个小组之外，还设有一个综合委员会，由10人组成。

国民党：王世杰、吴铁城。

共产党：周恩来、董必武。

民盟：章伯钧、张东荪。

青年党：陈启天、曾琦。

无党派：王云五、傅斯年。

关于综合小组，梁漱溟这样说：“综合小组的协议，等于政治协商会议全体大会的决定，所以在综合小组会上是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讨论商决的。”^①

政协的五项议题都有着各自的议事范围，但实际上都是围绕一个中心问题而展开，此即废除国民党一党训政制国家政体。从原来的三项议题转换为后来的五项议题，这是背景与态势再度转

^① 《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897页。

换的反映。国共互换位置，国民党转换为问题的对象。

政协会议是在原有的国家秩序不能继续运转的情况下，朝野各党派就未来的国家政体进行协商的一个会议。这个会议的召开本身就是一个特殊的事件，因而其性质也是特殊的。

中共与第三方面力求通过这个会议根本改变旧有的法律秩序，因此，力求赋予这个会议一定的国会职权。然而按照通常原则讲，国会的代表是要由普选产生的，而政协代表则不是由普选产生。对于这个问题，《新华日报》在一篇社论中这样认为：“固然政治协商会议是党派会议的性质，其中的代表并不是由于普选而产生，但是这些代表中的一部分是由中国各政党所自行推选出来的，而另一部分无党派人士也是经过事前协商而后产生的，大体都具有代表社会某一方面的资格。所以我们不能不认为，这个政治协商会议就是‘中国各主要政治力量的代表会议’。由十年前在一党专政下产生的‘代表’所构成的所谓‘国民大会’，决不能冒充代表全国人民的会议。在中国还没有经过全民普选而产生的民主国会前，这个政治协商会议在现在是最适宜于代表全国人民来决定国家大事的”。^①

召开一个中国各主要政治力量的代表会议，是杜鲁门对华声明所提要求，称政协就是杜鲁门所要求的这个会议，以此强化政协的职能。一方面通过政协削弱国大的职能，使国民党不能利用国大的制宪立法权继续维持旧有的法律秩序。另一方面赋予政协一定的国会性质，使之具有一定的制宪立法权，从而破坏旧有的法律秩序。不仅中共如此提议，施复亮也撰文要求道：“扩大政治协商会议的职权，在真正的国民大会未开以前，使其代行国会

^① 《新华日报》1945年12月20日。

职权”。^①

在野党方面不仅希望政协能够代行国会的职权，而且希望政协具有行政上的“支配”权。中共领导下的《群众》周刊在一篇社论中写道：“政治协商会议虽然不是一个最高权力机关，但也不是一个政府咨询机关，它是站在政府之旁，透过政府党去支配政府的机关。它的一切决议，虽然不能在法律上拘束政府，但在实质上是拘束政府的”。^②中国民主促进会在这个问题上的表态更为明确，要求：“正式最高权力机构未成立前，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其职权，中央政府应对政治协商会议负责”^③。

此外，为使政协能够发挥经常性作用，周恩来表示：“这次二周会议只是第一次会议，今后仍要举行”^④。言下之意是，力求变政协为常设机构。

与上述舆论相反，国民党则强调政协不能取代国大。《中央日报》发表社论强调：“政治协商会议乃是国民政府在国民大会召开之前的一种权宜的重大措施”。强调政协“不是国民选举的代表机关”，“不能变更国家根本大法”，“不是常设的决定政策的国会式的机关”。^⑤

《中央日报》这篇社论，是对前述舆论的否定。强调政协不能取代国大，是表示政协不具有制宪会议性质；强调政协代表不是普选产生，是表示政协不具有民意机关性质；强调政协不能改变国家根本大法，是表示政协仍在旧有法律之内；强调政协不是常设国会，是表示政协只是一个临时性会议。总之，政协只是政府的一种“权宜”措施。

① 施复亮：《我的答案》，《新华日报》1946年1月1日。

② 转引自重庆政协等编《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上卷，第106页。

③ 《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上卷，第293页。

④ 《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上卷，第238页。

⑤ 《中央日报》1946年1月10日。

那么政协究竟是什么性质呢？1945 的 12 月 5 日，周恩来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政协’被规定为政府以外的机构，实质上便是党派会议，各党派均保有否决权，一致通过的议案，政府须负责实施。这样，‘政协’本身并不能约束各党派，只有在各党派自己同意的决议上，方得约束自己。所以‘政协’较之在政府以下（如国民参政会），或在政府以内（如过去拟议之政务会议）的机构要好得多，但也还不是政府以上的机构，因为它本身并非党治的代替物，而是可以讨论和决定取消党治和改组政府问题”。^① 总之，既不在政府之下，又不在政府之上，既不能替代政府，又可决定改组政府，政协就是这样一个很难确定其准确定义的特殊的党派会议。

四 政协会议前奏曲

政协会议召开之际，由于国内外背景的转变，舆论界空前地活跃起来，除去蒋介石的地位这条界线人们不予跨越外，便没有什么不能议论的问题了。政府、军队、立法机构的改组问题，执政党不应由国库开支费用问题，学校应取消党化教育问题，以及贸易垄断等等问题，无不成为议论的话题。

这些议论的基本特征是，以西方政治原则作为政协会议设计未来国家秩序的准则。在这样的政治准则衡量之下，国民党一党训政制的法统当然是处处不符合准则，基本上被舆论否定，国民党处在了空前的被裁判的地位。

这段时间最为活跃的无疑是第三方面。第三方面一无所有，因而其言论最无顾忌，其对西式政体的要求也最为彻底。第三方面理论家施复亮在《我的答案》一文中这样写道：“现在国民党

^① 周恩来：《关于国共谈判》，《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 11 页。

的军队虽然号称国家的军队，共产党的军队虽然号称人民的军队，但在我们第三者看来，双方都是党军，即党所控制的军队。共产党的军队不能交给国民党，等于国民党的军队不能交给共产党。……所谓军队国家化，必须国共两党的军队一律同时交给国家”。施复亮提出几个制止内战的条件，其中之一是：“必须在国共两党以外形成一个进步的民主的中间派的政治力量，其强大达到举足轻重的地位”。^① 不过，这种强大的力量怎样达到，便不得而知了。

由于杜鲁门声明直接点了孙中山的名，因此国父遗教也不再具有从前那样的神圣地位，也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施复亮撰文写道：“如果孙中山先生的遗教和建国程序，绝对不能变更，那就无异把他当做皇帝看待，把他的话当做圣旨看待了。”“三民主义及孙中山的一切遗教，只有经过人民的研究、讨论……才能变成国家的意志和法律，才能使全体人民遵守，究竟孙中山先生的遗教中，哪一部分符合今日人民的需要，为今日人民所愿意接受？哪一部分已经过了时效……这必须经过人民自由意志的选择，任何人都没有权力加以强迫。”^② 公开称孙中山的话可以研究，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这是中国人多年来未公开提出的问题。

毛泽东重庆谈判时，第三方面认为中共“调子低”，有所不满，这主要指中共放弃联合政府。因此，重庆谈判结束不及一周，民盟在10月16日发表的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坚持道：“中国民主同盟始终相信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是当前国家和平、统一、团结的惟一途径”，“希望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能

^① 《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上卷，第105、106页。

^② 施复亮：《要克服经济危机必须实行民主政治》，《新华日报》1946年2月7日。

够早日成为事实”^①。

第三方面为什么如此坚持联合政府？周恩来曾分析道，重庆谈判期间中共所争论的解放区和军队数额，在第三方面看来，“一般的均认为这是中共本身的利益，只有民主才于他们有益。……联合政府可使他们有份”^②。周这个分析相当准确。政协开幕前夕，第三方面在这个问题上再次旧话重提。《新民报》记者浦熙修在采访青年党政协代表曾琦时，曾琦说：“在毛泽东来重庆之前，他们要求成立联合政府，这是对的。但自毛氏来渝，开始谈判后，变为争军事不争政治，争地方不争中枢，这是错误的”。曾琦表示：“他对于国共双方发表的《会谈纪要》颇不满意。他希望在政治协商中，共产党能纠正这种错误，大家还是商量联合政府问题”。^③

曾琦这篇谈话，较为典型地代表了第三方面对国共重庆谈判的看法，典型地反映了他们的政治心态。“争军事”，“争地方”，指军队和解放区问题，而第三方面在这个问题上无利益可“争”。“争政治”，“争中枢”，即联合政府，只有这个问题，第三方面才有利益可“争”。曾琦所以在政协开幕前又提及此事，是希望中共这一回不要再犯“争地方不争中枢”的“错误”。

与活跃的舆论相比较，国民党方面是低调的、消极的。浦熙修在采访国民党政协代表邵力子、陈立夫时，邵说：政协会议“政府中很多人认为没有举行之必要，但我认为举行总比不举行好”。陈立夫则说，“对于当政治协商会议代表，根本不感兴趣，因为他非外交家，不善于办交涉”。

对于此刻再度成为国人关注的联合政府问题，邵力子说：

① 《新华日报》1945年10月19日。

② 《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9页。

③ 《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上卷，第147页。

“联合政府万万行不通，英法的联合政权，是先有中心而后成立的”。陈立夫干脆说：“至于联合政府，决不适合于中国的国情”。邵、陈二人从西方方式和中国国情两方面来否定联合政府，其论点能否成立姑且不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此一论点是难以顶住联合政府的呼声的。

张群是一位智囊，张在对浦熙修的谈话中这样说：“联合政府是谈不到的，《会谈纪要》上早就写着参与政府，至于参与的程度如何，尚需商量”。^①张群搬出中共在重庆谈判中表示不提联合政府而改提参加政府的记录，来堵人们重提联合政府的嘴，这一招从最后结果来看，并未能阻止实质性的联合政府方案的产生，但确把联合政府这一名词堵了回去。

无疑，国民党在舆论面前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在这种局面下，国民党高层人士倾向于采取妥协政策。12月14日，孙科、陈布雷、邵力子、王世杰等在吴铁城寓所讨论政协问题，王世杰提议：“本党此次下大决心，作一妥协之尝试”^②。王世杰提出的这一基调看来被接受了。

12月23日，蒋介石回到重庆。当日，蒋在日记中写道：“晚约政治干部研讨对内对外形势。至于对共方针，若准其成立地方政权，不如准其参加中央政府”^③。允许中共参加中央政府，以此促使中共取消解放区政权，这是蒋对政府改组问题的基本考虑。

1943年3月，蒋介石借废除不平等条约这一背景，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宣称：“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于中国国

^① 以上均见《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上卷，第136、137、141页。

^② 《王世杰日记》1945年12月14日。

^③ 《蒋总统秘录》第14册，第32页。

民党。如果中国国民党的革命，今日不幸而失败了，那中国的国家亦就无所寄托”。蒋的结论是：“没有了中国国民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现在，随着政协的即将召开，再也听不到将中国的命运寄托于国民党的声音，相反，国民党成为众矢之的。

尽管蒋介石的个人地位舆论普遍仍予以维持，但实际上人们的眼光更多的投向了另一位人士，此即马歇尔。马歇尔是近代以来，来华干预中国内政的外国人当中，地位和声望最为显赫的一位国际“钦差”，他于12月22日飞抵重庆，宋子文、王宠惠、吴鼎昌，以及中共方面的周恩来、王若飞、叶剑英等到机场迎接。马寅初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举国人民的眼光都注视到他，寄以无穷的希望，好像中国之命运已经握在他的手中。最高领袖的地位，好像已移转给他”^①。由一个外国人来帮助解决中国问题，人们的看法是多侧面的，《大公报》在一篇社论中说：“劳动马歇尔将军来华，促成中国之民主团结，其事本身，实足令知耻的中国国民汗颜无地”^②。

由于人们的眼光投向了马歇尔，因而人们也将大量问题投诉于马歇尔。徐永昌在一则日记中写道：“此次马歇尔来华，我人之上书控诉政府失败者三千余件，此辈皆属各党各派人物。既可上书政府，亦可申之舆论，极其所至，亦可起而革命，乃厚颜以为假此可取媚于外人。一国之民多无人格，其国亦必无国格”^③。

徐永昌关于人格、国格的议论姑且不论，总之，马歇尔挟杜鲁门声明和个人声望使华，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蒋介石原有

① 《新华日报》1946年1月11日。

② 《欢迎马歇尔将军》，《大公报》1945年12月24日。

③ 《徐永昌日记》1946年1月24日。

的“天无二日”的地位，实际上对政协会议的召开与成功，起到了一个监护人的作用。

五 政协会议五项议题的争论与结论

1946年1月10日，蒋介石与毛泽东同时下达停战令，同日，政协会议在重庆开幕。

1月12日，在政协第三次大会上，由国共双方报告两党会谈经过。周恩来说：“是不是中共放弃联合政府的主张？不是的。在抗战胜利后的商谈中，为求得有效的解决问题，应有步骤与程序，所以在《双十会谈纪要》中，把如何实行政治改革，留在政治协商会议来讨论”^①。周恩来以步骤和程序来解释为什么重庆谈判时中共不谈联合政府而主张留在政协来谈，以示中共从未放弃联合政府。这一解释是否圆满姑且不论，总之，联合政府问题再次提了出来。

接下来邵力子代表国民党发言。邵采取赞扬的方式来封堵周恩来提出的问题。邵说：重庆谈判开始时，“周恩来先生即说明此次中共准备让步，不坚持前年十二月和去年一月间所提条件，如党派会议，联合政府，联合统帅部等问题。”^②称赞中共在这方面表现出的“诚意”。邵给中共在重庆谈判时的让步予以“诚意”的美称，其潜词是，如果中共再提联合政府，其从前的表态便非“诚意”了。

国共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其最终结果是，联合政府的名词被打消，但联合政府的实质则被政协接受。

① 《新华日报》1946年1月13日。

② 《中央日报》1946年1月13日。

1月14日起，政协会议就五项议题全面展开实质性讨论，当时最为人们关注的是政府改组问题。

1月14日，国民党8名代表联名提出扩大政府组织方案，其要点是：国民政府委员会为政治之最高指导机关；国民政府委员就原有名额增加三分之一；国民政府委员得由主席提请选任党外人士充任之。王世杰对这个提案做了说明，王说：“现有国民政府委员三十六名，再增加十二名，共为四十八名。”“在座各位都承认国民党是立于领导地位的大党，如果国民党委员的名额，仅仅是比较任何他党的名额多，而不具某特定程度的多数，国民党便不能履行领导的责任。”王又对政府委员由主席提请选任说明道：“所谓选任，就是由国民政府主席提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这种手续，国民大会未召集前，不能不保持，否则法律的系统也就变了。”^①

以上表明，在政府委员中，国民党将占四分之三的多数。并且，政府委员须经国民党中央通过，表明国民党是高于政府的，这个党治法统仍然维持。

针对国民党这一提案，董必武说：“我们既承认国民党是第一大党，当然也同意可以多一些，至于多到什么程度？……最好是政府主要职员大党所占的地位不要超过三分之一。”关于政府委员要经国民党中央通过一事，董说：“如此则还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形式”^②。

罗隆基代表民盟发言说：国府委员须经国民党通过，“这些人是否要向国民党的机关负责？”国民党提案还提出，三分之一以上的政府委员连署才能提出议案，对此，罗隆基说：“参加府

① 《中央日报》1946年1月15日。

② 《新华日报》1946年1月15日。

委的党外人士永远难有建议权，更谈不上否决。”^①关于这个问题，无党派人士郭沫若说：国民党方案使党外人士“不仅没有决定权，连建议权也没有，恐成伴食大臣，参政会即是一例。”^②

上述发言表明，国民党的扩大政府提案，仅是形式上的扩大，实际上仍由国民党把持一切，因而遭到党外人士一致反对。

1月16日，延安指示重庆中共代表团：“国民党改组政府方案，仍是露骨的要保持一党专政，我们不能接受。改组政府必须坚持不低于杜鲁门声明与三国公报的水平（一切民主分子参加一切机构，公平有效的代表权），必须坚持破坏独裁，不许多数党在政府中超过三分之一”。该指示还说：“国方不接受我之要求不要紧，不会破裂，他惟一的内战法宝已受约束，而我则有三国公报与杜声明的合法根据（对此应大力宣传）。”^③这就是说，杜声明不仅是衡量政府改组“水平”的标准，而且是中共不怕破裂的“合法根据”。在这个“合法根据”的基础上，中共在政协发起了全面反攻。

1月16日，中共在向政协提出的“和平建国纲领”中要求：“多数党在政府主要职位中所占的名额不得超过三分之一”；“改组后的政府，应脱离国民党的直接领导，任何一党经费不得由国库开支。”^④

鉴于一党训政制遭到各党派的抨击，1月18日，陈立夫发言说：“国民党以党治国是效法苏联，今天大家以多党制的理论来批评一党制，那是什么也不能解决的。”意思是以苏联的名义来封堵中共的抨击。陆定一反驳道：“苏联并不是一切事情都由

① 《新华日报》1946年1月15日。

② 《新华日报》1946年1月15日。

③ 《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43页。

④ 《新华日报》1946年1月17日。

党包办，而是由党领导人民工作。在中国则一党专政是办不通的，中国只应实行多党政治。”^①

陈立夫从来主张在政体上学苏联，1944年，在讨论是否承认各党派法律地位时，陈立夫说：“与其学英美，毋宁学苏联。”^②这一回陈立夫再次搬出苏联模式，把国民党的一党制解释为“效法苏联”。这样，苏联的一党制成为国民党的“合法根据”。

然而问题在于，政协会议是以杜声明为主要背景的，因此，苏式“合法根据”不可能压过美式“合法根据”，国民党被批判的地位未能扭转。

国民党在政府委员中占多少名额的问题，是该小组争论的核心。周恩来说：“过半数绝对多数，这样什么都可以由国民党决定，我们还参加做什么？”孙科则说：如果国民党只占三分之一，“那么国民党是绝对少数了”。一向平和的孙科也强硬地说：“国民党非要过半数”^③。结果是，双方均做出让步，均不过半数。

1月25日，延安指示周恩来等：“国民政府委员会国方已让步到只占半数人员，我方亦应让步接受国方此一方案。”同时指示：“国民党人员在行政院各部会中，在军事委员会中，在各省市政府及地方政府中均不得超过三分之一，以便逼迫国民党在这些机关中也同样让步到不超过半数。”^④

最后，在这个问题上达成的协议是：国民政府委员共40名，国民党20名，其余20名由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担任。协议

① 《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上卷，第413、414、415页。

② 《王世杰日记》1944年8月24日。

③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2），第214页。

④ 《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51、52页。

未规定国府委员须经国民党中央通过。

协议同时规定，普通议案由半数以上委员通过，重要议案须经三分之二以上委员通过。在讨论中商定，票数相等时，政府主席参加投票。^①这样，国民党在一般性议案中获得了过半数的保证，实际上可得 21 票。

当国共为政府委员的组成激烈争论之际，处于幕后的马歇尔曾向蒋介石提交了一份“临时政府组织法”，其核心是由一个国务委员会组成临时政府，“在立宪政府成立之前，非经国务委员会十六人之同意，国民政府不得发布影响各县各行政区纯地方性质事务之法令”。这等于是取消了国民党政府。蒋介石收到后于 1946 年 1 月 22 日日记中写道：“此为共党所不敢提者，可知客卿对他国政治之隔阂。”^②

这件事当时没有公开，并未构成实际影响，它反映出马歇尔的着眼点是如果尽快向立宪政府过渡，而蒋介石的着眼点则是有利于哪个“党”。

和平建国纲领，又称施政纲领、共同纲领，这项议案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宪法颁布之前的过渡时期如何施政的问题，具有“准宪法”的性质。

1 月 15 日，民盟代表张申府发言说：“共同纲领正是所谓剧本，是要共同遵守的。过去就是政府爱怎么办就怎么办。由寡头一党变成各党共同，在过渡期间要有一个根本临时的法，必须有这样一个法，才能共同遵守。”在这里，张申府将共同纲领赋予了“临时的法”的性质，也就是要取消原有的约法。关于纲领的条款，张申府说：“我以为既是临时的，而且是纲领，条文不

①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 7 编（2），第 214 页。

②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 7 编（3），第 71 页。

可太多，要是荦荦大端的原则而不是具体事项”。

国民党代表吴铁城发表了两点意见：一是纲领的性质；二是制定纲领的根据。吴说：“今天出席的主要是各党派代表，既然并不代表全体人民的呼声，何妨作为政党的政治协定。”关于制定纲领根据，吴提议：“纲领之根据为：（一）建国大纲；（二）国民党六全大会通过的施政纲领；（三）国民参政会通过的三十五年度施政方针；（四）尤要的是抗战建国纲领。”

吴铁城的意思是，政协委员不是选举产生的国民代表，而是党派代表，因此共同纲领便不具有“法”的性质，而是个党派协定。这样，原有的约法便继续有效。至于制定纲领的根据，如果按吴提四项根据，那只能是一个新版的训政纲领。

董必武发言认为，纲领条文不能太过简略，随即提出一个32项条款的初步方案。民盟代表章伯钧发言，大致赞成董必武所提条文。青年党代表常乃惠发言赞成吴铁城所提，以抗战建国纲领为蓝本。民盟代表罗隆基表示，纲领的性质，“应承认其性质等于现阶段之宪章”。又表示：“以抗战建国为蓝本，似非必要，因不够完备。”^①

在1月15日的讨论中，被称作第四方面的无党派工业界代表李烛尘提出：国共两党都不要在工厂中设立工会，不要发展工人党员，不要搞罢工。国民党代表张厉生反对，坚持国民党在工厂中设立工会，发展党员。董必武发言说：工人设立工会，那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只要资本家采取开明态度，工人是愿意合作的。黄炎培说：国共双方的工会，都不退出工厂，工厂就不太平

^① 以上均为陈布雷记录的1月15日会议发言。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2），第158~164页。

了，怎么办呢？^① 这个问题没有结果。

1月16日，中共代表团提出“和平建国纲领草案”，要求：“必须立即扩大现在的国民政府的基础，改组为能够容纳全国各抗日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的、举国一致的、临时的、联合的国民政府”。与之相应，同时提出：“改组军事委员会及其一切附属机关，使之成为各抗日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士共同领导的机构。”这个要求，实际上恢复了1944年的联合政府与联合统帅部的口号，将重庆谈判时参加政府和参加军事委员会的提法做了更动。^②

总的来看，由于建国纲领所涉及的一些主要的具体问题，就是其他几个专门小组讨论的问题，因此纲领小组不做具体讨论，其他小组有了结果之后，便可收入共同纲领。比较而言，在政协的五个小组中，纲领小组的争论大约是最平静的。

军事小组的讨论，核心是军队国家化，而军队国家化的核心则是军党分离。因此，怎样实现军党分离，成为该小组讨论的焦点。

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产生了一种有趣的现象，即民盟与青年党在原则上较为一致，而国、共则在某些问题上较为一致。

由于第三方面在军队问题上没有直接的、具体的利益，因而关于军党分离的要求最为彻底。

青年党在其提案中提出：“实行军党分立，以免政争变为兵争。全部国防军应独立于一切党派之外，任何党派均不得以军队

① 许涤新：《风狂霜峭录》，第286、287页。许涤新以中共代表团顾问身份参加了当天的会议。中共在提交的和平建国纲领中明确提出，工人有罢工的自由。

② 中共的纲领草案，由周恩来领导，博古、华岗、张友渔、许涤新协助起草。见许涤新《风狂霜峭录》，第284页。

为政争之工具。”为实现这原则，青年党提出釜底抽薪的三点建议：“第一，须禁止现役军人参加任何党派，其已有党派关系之现役军人，应一律宣布退党，始可继续担任军职。第二，须禁止一切党派在军队内部有公开的或秘密的党派组织及活动。第三，须禁止一切军队实施含有党派性之政治教育”。^①

1月16日，民盟9名代表联名提出军事问题提案，内容较为简要，核心是：“全国所有军队应立即脱离任何党派关系，而归属于国家”。为此，该提案要求“现役军人脱离党籍”。

梁漱溟对民盟提案的说明是：“民主同盟的提案与青年党的提案大体上相同，只有详略不同”^②。青年党和民盟都把脱离党籍问题，看做军党分离的核心。

1月16日，周恩来代表中共做军队国家化报告。周着重于军队国家化与政治民主化的关系，主张两者同时进行。关于军队的改革方向，周说：“政府军队制度，可说一方面起源于黄埔练兵，另一方面不少从日本德国学来。……中国今日的军队制度，应该以民主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军队制度为改革的榜样。”关于军党分离问题，周说：“我们非常同意军党分开。军队不应属于党，应属于国家，因此对于党与军队的界限，必须划分清楚。现在无论国民党，或共产党，在这方面都还没有划清。”^③周表示军党关系必须划清，而怎样划清，周没有提出具体方案。

陆定一是中共参加军事小组的代表之一，陆定一的发言较为简单，主要是强调军队国家化与政治民主化的关系。陆说：“中共之所以有军队，可比诸‘迫上梁山’之故事，倘此后政治民

① 《新华日报》1946年1月17日。

② 《新华日报》1946年1月17日。

③ 《新华日报》1946年1月17日。

主化，即不致再上梁山。”^①意思是政治民主化是军队国家化的前提。

邵力子在发言中说：“大家强调军队要脱离党，我们已把军队党部取消，当然也有人会说，国民党中委里将领很多，这点似未做到。我认为做事情总要慢慢一步步来。而且他们虽有党籍而不做党的活动。我们对整编中共军队，第一步也并非要中共党员都脱党”^②。邵将军人的党籍问题与中共联系起来，邵力子看出国共将取得一致意见。

现役军人脱离党籍问题，第三方面将其视为军队国家化的核心，然而在这个问题上，第三方面遇到了国共两党的联合抵制。梁漱溟在政协五个小组中只参加军事小组，他说：“这是因为我最热心于军队国家化，即使军队脱开党派而统一于国家。”关于军人脱党的讨论，梁漱溟有如下记载：“在军事小组会上，我要求现役军人都要脱离党派，不论任何党派不应有军人党员。我费了很大力量来讲明所以这样作的必要性，1月21日的小组会上居然把这一点通过了。在通过的时候，邵力子先生就说：‘梁先生意思很好，事实上是做不到的。’我拍桌子说：‘做不到也得做。’想不到第二天，1月22日竟推翻了。21日通过的时候，是因为中共代表只陆定一在场，而陆并未坚持反对。那天政府释放廖承志，周恩来代表共产党去接他，所以周临时未在场。第二天，周恩来一入会场就说：‘昨天通过的统统不算，让我们的军人脱党是做不到的，所以昨天通过的根本不能算。’陆定一这时面红耳赤，一句话也说不上来。邵力子对我说：‘你看怎样？还是我说得对吧。’周、邵一唱一和，我看无法坚持，也就只好听

① 政协1946年1月16日会议记录。《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2），第191页。

② 《新华日报》1946年1月17日。

凭他们的，结果我的话就被推翻了。”^①

以上是一段有趣的记述。坚持现役军人可以保留党籍，是政协期间国、共两党难得的一次合作，并且是“一唱一和”。

最后，军事小组通过两项原则：军党分离和军政分离。军党分离，就是在军队内，军人可以有党籍，但不得有党团组织，也不得有党派活动，此即军党分离。军政分离，就是军队在驻地不与当地政治发生任何关系，只能进行训练，不负责地方防务，军队供给由中央统一筹划。

关于国民代表大会的讨论，核心问题是原有的国大代表资格是否继续有效。

国民党原拟于1937年召开国大，为此，于1936年搞了一个国大代表选举。当时规定，国大代表大体由三部分构成：第一，区域和职业代表，名额为1200人，由各省、直辖市、各行业选举产生；第二，由政府遴选的代表，也就是由政府指定的代表，名额为240人；第三，国民党中央委员为当然代表，当时国民党中央委员大约240人。后来，由于抗战爆发，国大未能召开，国大代表也未全部选出。在区域和职业代表中，选出900余名，尚缺240余名，而遴选代表和国民党中央委员代表则完全未产生。

当蒋介石于1945年宣布召开国大后，国大代表资格问题随即引起争议。重庆谈判时，国共两党曾就这一问题磋商。国民党方面的意见是，已选出的900余名代表均依法选出，其代表资格仍有效。此外，原区域和职业代表名额中，尚有240余名未选出，政府遴选代表240名也未选出，共为480名，国民党建议，

^① 《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918页。梁说周恩来1月21日接廖承志出狱，未参加当天会议，据《周恩来年谱》记载，周接廖出狱是1月22日。

将这 480 名代表名额提供于中共和其他党派。

中共和民盟的意见是全部代表应重选，理由是：当初国大代表选举时，中共与其他党派均处于非法状态，未能参选，选举为国民党一党包办。另外，五五宪草规定，国大代表任期为 6 年，而今已近 10 年，其代表资格早已失效。王若飞在重庆谈判时就说：“过去所选出之代表，乃国民党一党执政时所产生者，不足以代表各方面。且代表之任期只有六年，至今任期已满，自不能再代表国民。”^①

国大代表问题在重庆谈判时未能解决，留给了政协会议。

1 月 17 日，张厉生代表国民党在政协发言，主张旧代表资格仍有效，认为政协的目的在求团结安定，如否定旧代表资格，那么旧代表“假定例如组织一个国民大会党，同样像其他党派向政府表示他的意见和愿望，再来开一个甚至几个协商会议，政府将何以处置？”^②以旧代表可能采取不满行动为理由，是张厉生一贯的说法，重庆谈判时张厉生就说：“另行选举，不但有失政府之威信，而且已当选之代表将自行组织，如印度国民大会一样，另行集会，如此，则更增国家之困难矣。”^③意思是如否定旧代表，旧代表可能自行召开另一个国民大会。

针对张厉生的发言，中共代表吴玉章当即发言：“有人说，国大代表不能重选是由于法统不能改变。……今天开政治协商会议，就必须以政治解决问题，而不能以法律解决问题，因此法统之说是不能成立的。”^④

1 月 18 日，政协会议继续就此问题辩论。民盟代表罗隆基

①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 7 编（2），第 71 页。

② 《中央日报》1946 年 1 月 18 日。

③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 7 编（2），第 69 页。

④ 《新华日报》1946 年 1 月 18 日。

表示：“如维持旧代表，则须举行民意测验，由工商文化学生等知识分子举行”。另外，罗隆基反对由原代表名额中让出若干给各党派的办法，认为这种代表不是选举产生，不能取得人民的尊重。无党派代表王云五反对罗隆基的意见，认为：如果由党派协商产生的代表不能代表民意，“至于民意测验办法，仅由知识分子参加，则是否可代表全体民意，亦属疑问。”

陈立夫就旧代表的任期问题谈了两点意见。陈说：“有人谓十年以前所选代表，依宪草任期六年之规定，早已届满，殊不知任期应从就任日起算，今国大尚未召开，渠等亦未就任，则任期不但未届满，且实未开始。”此外，陈立夫亦不赞成以五五宪草作为判断代表任期的依据，其理由是：因国大尚未召开，“宪草尚未依法通过，更不能据以限止代表任期。”^①意即不能以一部尚未通过的宪法草案作为立论的依据。

在此前的1月17日的会议上，邵力子曾再次使出法宝，即以中共在重庆谈判时的承诺来封堵中共的要求。邵说，重庆谈判时中共在国大问题上曾表示让步，毛泽东对王世杰说过：中共坚持旧代表无效，惟不会因得不到协议而不出席国大。对此，周恩来在1月18日的发言中说：“国大旧代表选在十年以前，那时一党统治，中共处在地下……我们当然不能承认他们为合法代表。但如果一切问题都已解决了，只剩下这个问题未得解决，是否为了这一个问题我们就要与政府党分裂呢？当然不能。那天毛先生与王雪艇先生谈话的意思，也就是这样。”^②周恩来将其他问题的解决，作为中共在旧国大代表资格问题上的让步前提，以此作为对毛泽东重庆谈话的解释。这样，如同联合政府一样，周恩来

① 以上均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2），第201、202页。

② 《新华日报》1946年1月19日。

对中共从前的承诺与后来的要求，均做出了圆满解释。

旧国大代表资格问题所以成为争论的焦点，是因为这些代表是由国民党包办产生的，以他们为主体召开国大，便可通过一系列有利于国民党的法规。正如舆论所说，如果由旧代表召开国大来实现“还政于民”，“那就等于国民党‘从左手还给右手’”^①。

为打破僵局，王云五提出一项折中方案，一方面赞成维持旧代表资格，另一方面提议，从前的代表名额中有 240 名规定由政府遴选，并规定国民党中央委员为当然代表，此时国民党中央委人数已由从前的 200 多名增至 460 名，两者相加为 700 名，王云五建议将此无需选举、可由政府和国民党支配的 700 个名额拿出来，公平分配给各方面，这样新旧代表比例大致相当。^② 王云五这个意见后来被接受。

最后，国大代表问题达成的协议是，原区域与职业代表 1200 名仍有效，如前所述，这部分代表原只选出 900 余名，剩下的 200 余名，由原来未选出的地区如新疆、西藏等地区继续选出。此外，台湾、东北地区原无代表，此次新增 150 名。这样，区域和职业代表共 1350 名。另外，党派和社会贤达代表 700 名。这样，代表名额总共为 2050 名。

上述名额中，最被关注的是党派和社会贤达这 700 名，当时达成的分配协议是：国民党 230 名，共产党 200 名，青年党 100 名，民盟 100 名，社会贤达 70 名。同时还达成协议，国、共两党由各自名额中，各让出 10 名给民盟。^③ 这个分配方案当时商定不予发表。

① 《新民报》1946 年 1 月 18 日。转引自《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上卷，第 454 页。

② 王云五：《岫庐八十自述》，第 360 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

③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 7 编（2），第 242、243 页。

关于宪草修改原则问题，如前所述，国民党原拟于 1937 年召开国大，而召开国大的主要事项就是颁布宪法，为此，1936 年 5 月 5 日，公布了一个宪法草案，即“五五宪草”，后因抗战爆发，国大未开，宪法也未颁布。

此次政协会议仍以“五五宪草”为蓝本，但必须对其进行修改。由于修改宪草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不可能于政协会议期间完成，因此政协只制订一个“宪草修改原则”，政协闭幕之后，设立一个专门机构“宪草审议委员会”，由该委员会根据政协的宪草修改原则，对“五五宪草”做具体修改，最后制定《五五宪草修正案》，提交国大审议采纳。

宪草审议委员会的成员，由政协五方面各派 5 人参加，另加专家 10 人，共 35 人。蒋介石指定孙科为召集人。

关于宪草修改原则的讨论，核心是建立议会制问题。

1 月 19 日，孙科对五五宪草做说明，着重解释孙中山的人民行使政权，政府行使治权的制宪学说，即人民有权，政府有能的学说。所谓人民行使政权，即人民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权力，这四项权力由国民大会具体实施。所谓政府行使治权，即政府有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五项权力，即五权制度。孙科强调的主要是政府的“能”，孙说：“政府是为人民所产生，官吏是人民之公仆，亦为人民所信任而选出，由此所组织之政府，应该给他相当的权，俾有充分能力执行职务，使政治效能充分表现，这点比议会政治国家常因国会党派不能团结，发生政治纠纷，改组内阁，政治不得安定，确为进步。”

关于国民大会，孙科主张“国民大会不宜经常开会，牵制政府的工作”。

关于国家元首，孙科主张采用美国式的总统制，对外代表国家，对内为行政首长。

关于省制，孙科表示省的地位需要重新规定，实现“国家

与地方的均权制度”。^①

孙科这个说明的核心是，坚持原来的五权制，反对西式三权分立制，尤其是制约政府的议会制。

但是，政协会议既然以杜鲁门声明为主要背景，因此，效法西式政体成为政协追求的目标，尤其是西式政体中对政府行政权力具有相当制衡作用的议会制，更是得到饱受训政之苦的在野各党派所推崇。

在1月19日的会议上，中共代表吴玉章发言说：“中央政府五五宪草中规定了五院制，但由过去历史证明，五院事权分散，实际上都没有权，而大权独落于元首一身，这容易流于个人专制之弊……我们认为英美等先进民主国家所行的国会制度，其经验很可采取”。关于地方制度，吴玉章表示：“我们主张省为自治单位……依据中山先生遗教省长民选。省自制省宪。”^②

当日，曾琦代表青年党发言说：“中国采取总统制呢？还是采取内阁制呢？我们的意见，以为采取总统制有两种危险：（一）是容易走到反民主的方面；（二）是容易引起革命，招致混乱的局面。”“反之而行内阁制，则有两种好处：（一）可使元首居于超然的地位，不负直接行政责任；（二）可使政府随时有新陈代谢的作用，内阁的更迭容易，便不至引起革命”。

曾琦对五院制提出疑义，曾说：“中山先生主张五权宪法，其用意是好的，但是实行起来，却未收到预期的效果。大家试一检讨，自从民国十七年成立五院制以来，至今已有十八年的历史，其中如考试院，曾否行使考试权而收大效？监察院曾否行使监察权而收大效？”

青年党对宪草原则提出四项主张：（1）内阁制；（2）国会

^① 《中央日报》1946年1月20日。

^② 《新华日报》1946年1月20日。

实行上下两院制；(3)“五院制只可保有其精神，不必拘泥于形式”；(4)“省制应该采均权主义，确定省之自治地位。”^①青年党在上述问题上的主张，证实了周恩来早先的判断，即“青年党在民主问题上不能完全同意国方”。

围绕五权制与内阁制、国会制的争论，无党派代表傅斯年在1月19日的发言中提出一个折中方案，傅说：“如仍采五院制，可以立法院作为下院，监察院作为上院，运用各国两院制之国会职权，两院名称可仍旧，惟职权扩大，不必有国会之名，但有国会之实。……如此则一面接受五权宪法之原则，一面实行两院制之议会制度，两者可兼顾。”^②

以上争论表现为：在野一方主张国会制，内阁制，地方自治；在朝一方主张五权制，总统制。问题的难点在于，五权制为孙中山著名的制宪学说，正面推倒这一学说难度较大，因而傅斯年提出了保留五权制之名，而行国会制之实的折中方案。但是在五权制的名义之下，行政与议会的关系如何处理，在这个关键的具体问题上，在野一方尚未提出具体的意见。

在宪草小组中有一位重要人士，此即民社党的张君勱。张是一位热心于将英国政制搬到中国来的人士，并且对宪法学素有研究。张设计了一个以孙中山的五权制为外壳，而以英国制为实体的宪草方案。梁漱溟称之为“偷梁换柱”；罗隆基称之为“偷天换日”。

头一个“偷天换日”是国大。由国民大会行使“四权”，为孙中山在《建国大纲》中的规定，对此，张君勱是这样“偷梁换柱”的。张君勱搬出孙中山的直接民权学说为依据，认为国民大会制为间接民权，而非直接民权，主张由公民直接投票行使

^① 《中央日报》1946年1月20日。

^②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2），第207页。

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项权力，而公民的这种直接投票，便称作国民大会。这样，既保留了国大这一名称，又解决了直接民权问题。张的这一主张被称为将有形国大变为无形国大，所谓无形国大，即国大既无具体机构，也不选举代表举行会议，仅剩下一个名称，一句话，就是废除国大制，实行西式大选制。

张君勱最重要的“偷梁换柱”，是在保留五院制的名义下，注入英国式的内阁制和国会制。张君勱的具体设计是，将监察院赋予英式上院地位，将立法院赋予英式下院地位，而将行政院赋予英式内阁地位。这个设计的核心是行政院与立法院的关系，也就是把两者变为内阁与国会的关系。张君勱的设计是：行政院（内阁）对立法院（国会）负责，立法院对行政院不信任时，可以推翻内阁，而行政院如有自信，也可要求总统解散立法院，实行大选，产生新的立法院。这个设计对蒋介石的地位极为不利，蒋如欲做总统，地位较稳，但无实权，如欲做行政院长，较有实权，但地位不稳，有倒阁的危险。

据梁漱溟回忆，张君勱这个设计出来后，“在野各方面莫不欣然色喜，一致赞成；尤其是周恩来简直是佩服之至，如获至宝。”有趣的是，这个方案在国民党方面几乎未遇麻烦，该小组的国民党代表为孙科和邵力子，梁漱溟说：“孙科竟放弃他父亲一生奔走号召的五权宪法实质而点头承认了张君勱的设计”。^①

这样，宪草小组仅开四次会议，便顺利通过了宪草修改原则。

政协宪草修改原则有以下几项重要条款：“全国选民行使四权，名之曰国民大会。”

“立法院为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其职权相当于各民主国家之议会。”

^① 《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900页。

“行政院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

“如立法院对行政院全体不信任时，行政院或辞职或提请总统解散立法院”。

“省得制定省宪”。

上述条款的核心是两个：第一，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第二，省得制定省宪。前者的实质是分权，而后者的实质，李维汉说，是以省宪的名义来保障解放区。^①

对于宪草修改原则的这两条核心，王世杰事过之后才明白过来，他在日记中写道：“该协议认定国民大会为选民团体，不必集会，采用英国式之责任内阁制，并主张省得制省宪。前二者为张君勱等所提议，中共所赞同，后者则为中共自为地步之主张。”^②

1月31日下午6时，政协会议以起立表决的方式，全体代表逐项通过了五个议案，蒋介石致闭幕词，最后，“于全场极度和谐兴奋中散会”^③。

六 政协余论

政协闭幕之后，一时间好评如潮。孙科将政协称之为“和平革命”。

政协的五项成果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政府改组，也就是联合政府问题。《大公报》在社论中这样说：“以后的国民政府，

①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636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

② 《王世杰日记》1946年2月10日。

③ 黄炎培日记，1946年1月31日。

是以蒋主席以国民党为中心的混合政府。”^① 换了一个名词，但其意思人们都明白。

2月8日，张治中在重庆举行盛大招待会，庆祝政协成功，五百多人出席了招待会。

冯玉祥说：“国家民族已经有了最好的希望，我来为大家拜一个晚年。”

孙科说：“政协的成功有人不公平地说，是共产党的成功，民主同盟的成功，青年党的成功，是国民党的失败。但是我听这些是很不高兴，我想第一应该是国民党的成功。有人以为国民政府委员位置让出一半，好像就是失掉一半地盘，但是我说这是不对，我们换来的是很多的，换来是中国的和平、民主和统一”。

郭沫若说：“从前我们写不出东西还有借口，现在检查老爷的大剪刀已经取消，以后我们不再有借口，就应该有更多的贡献。”

周恩来说：“这次政协的成功，是中国人民的成功，是国民党和其他一切党派的成功，也是蒋主席继承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成功。”

曾琦说：“政协是成功了，国大就要召开，孙中山先生遗嘱说要‘最短期间促其实现’，可是‘最短’就是二十年了。现在可真短了，半年就要选举。”^②

2月9日，毛泽东对美联社记者发表谈话。关于政协成功的原因，毛这样评论道：“推动的力量，最初出于美总统杜鲁门，继之以莫斯科美苏英三国外长会议，最后则是马歇尔特使及国内民主分子，其间国民党本身的民主分子，也不在少数。”^③ 这篇

① 《大公报》1946年2月1日。

② 《时事新报》1946年2月9日。

③ 《新华日报》1946年2月13日。

谈话当然不会收入后来的“毛选”，但毛对于促成政协成功的几个内外要素的阐述，无疑是正确的。

会议期间，参加政协的右翼人士逐渐流露不满情绪。傅斯年是一位无党派人士，但在政治上倾向于国民党，傅曾于会议期间致函王世杰，认为：“此次协商结果将使国民党与蒋先生于半年内崩溃”，敦促王世杰退出政协，并辞去外长职务。王世杰复函拒绝辞职，认为：“国民党及蒋先生之力量，决非如傅所估计，予熟审国家利害，不能以予之行动，毁此计议中之新尝试。”^①王还是倾向于做一些改革上的新尝试。

政协临近闭幕之际，国民党的不满集中到宪草修改原则。

孙科之所以未坚持五权宪法的实质而接受了张君勱的“偷梁换柱”，据梁漱溟说，孙是希望以此让步换取各党派支持他出任行政院长。^②而王世杰这位最负盛名的法学家当时也未参与意见，王说：“该项宪草意见之商定，余以事多不及参加。”王也认为：“宪草案确多不妥之处，予觉哲生、力子两君当时确不免轻忽将事”。^③

几乎是在1月31日政协即将举行闭幕式之前，国民党方面才发现宪草修改原则极为不利。此刻，闭幕式即将举行，对该案再做讨论修改已来不及，而通过该案又将引发党内不满，王世杰感到事态严重，为此，王建议：“将协议结果提请常会核定后，始能由本党代表于政治协商会议最末次大会中正式表示接受。”也就是将政协的五项协议先交国民党中常会通过，然后再由国民党代表在政协接受，由中常会替国民党代表分担责任。

① 《王世杰日记》1946年2月1日。

② 《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900页。

③ 《王世杰日记》1946年1月31日，2月4日。

1月31日下午3时，国民党中常会为此开会。据王世杰记载：“常会开会时，谷正纲反对宪草协议甚烈，至于流泪。最后仍由常会通过。晚六时，政治协商会议召集末次大会，各案均系一致通过。惟傅斯年对于宪草之协议曾表示不满，但投票时仍投赞同票。”^①

可见国民党中常会是在一种仓促和不满的气氛中勉强通过宪草修改原则的。该案虽获通过，但问题并未解决，最终，该案成为国民党攻击政协协议的一个焦点，并被国民党单方面修改。那么，国民党的不满为什么集中于宪草原则？这个问题后面将会叙述。

政协会议所争论的问题十分广泛、十分复杂，然而看似复杂的问题实质上可全部归结为一点，此即多党制与一党制的对立。

陈立夫曾就这个问题发表看法，在1月18日的大会上，陈说：“由一党政治制度到多党政治制度之过渡期间，不能抹煞现有一党的政治制度。有的人以一党治国的政治制度，为过渡到多党政治制度的批评对象，于是乎一切事情认为是错误，终至一切问题都不能得到解决了。对中国国民党自十三年改组迄今所领导政府建国的方法，事实上告诉我们的确是取法苏联制度，如果一定要在多党制度的立场上来批评这一点，当然一切不对的，也就一切问题不易解决了。因为这两种制度根本不同，今天我们要一党走向多党，如果绝对否认过去一党制度的事实，也就不必协商了。在多党的立场看，一切建国事情是权利；在一党制度的立场看，一切建国工作是义务。”^②

陈立夫将一党制与多党制的区别，解释为两种建国方法上的

^① 《王世杰日记》1946年1月31日。

^② 《大公报》1946年1月19日。

权利与义务的区别，试图淡化两者的政治对立，从而淡化对一党制的批判。

陈一再声称国民党的一党制效法于苏联，通过与苏联作类比，为国民党找出“合法根据”。但斯大林似乎并不承认两者具有同一性。斯大林在同蒋经国的谈话中这样说：“苏联没有敌对阶级，因此，苏联可以实行一党制。”这个解释能否说得通，那是另一个问题，不过，这个解释肯定不能成为国民党推行一党制的“合法根据。”

陈立夫屡屡试图以苏联的名义压制对国民党的批判，但并无收效。唐纵在一则日记中这样写道：“在政治协商会，政府好似在受裁判，其屈辱难堪，令人难受已极”^①。的确，在政协五项议题的讨论中，国民党全面处于被“裁判”的地位。

张申府在政协发言说：“中国近年来给党害苦了”。这个党当然是指国民党。邵力子起而申辩：“中国如无同盟会，则不能推翻清政府；如无十三年国民党改组，则不能推翻北洋军阀；又如无八年来国民党领导抗战，中国今日已不知成何局面。……目前国家苦难，吾人自当反省，然若谓今为党所害，则绝不公道。”^②邵力子以国民党的历史功绩来为国民党讨回“公道”，这种申辩本身就是被“裁判”的表现。

面对政协蒋介石做何感想？蒋在1月21日日记中这样写道：“近日心神痛悔交集，乃知往日对共党宽容之误事也。”^③蒋的这种切肤之痛，缘自国共态势的变迁。问题在于：一个执政党一旦被推上被批判的地位，也就是其政治衰落的开始。自此，国民党蒋介石的政治声望从抗战胜利之初的鼎盛时期猛然跌落下来，直

① 唐纵日记，1946年1月15日。《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580页。

②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日期》第7编（2），第182页。

③ 《蒋总统秘录》第14册，第34页。

至退出大陆时止，国民党再也未能摆脱被批判的地位。

本章小结 政协的各项协议后来实际上均未真正实施，因此，政协真正的成果实际上只有一个，此即一党训政制在政治上被彻底批判，在理论上被彻底清算。

自1944年9月中共提出联合政府口号以来，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的对立，成为全部中国政治的核心。围绕这一对立，国共先后展开了三次正面交锋。

第一次交锋，以日军的一号作战为主要背景，在赫尔利的斡旋下，联合政府被正面地摆上国共谈判议程。赫尔利先是赞同，后又否定，最后，以国共互不妥协而告结束。

第二次交锋，以中苏条约和蒋介石垄断日军受降权为主要背景，中共在重庆谈判中承认国民党的法统，表示不提联合政府，最后以参加政府这一妥协而告结束。

第三次交锋，以杜鲁门声明和马歇尔使华为主要背景，一党训政制遭到西式民主制的猛烈批判，通过英美民主制这一“合法根据”，联合政府再度提上议程。最后，以去除联合政府之名而接受联合政府之实这一妥协方式，为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的对立，再一次做出一个理论上的结论。

三次交锋的主要特点表现为，国共都是通过背景的转换提出问题，都不是通过实力的正面较量而取得结论，问题在于：任何未经实力的较量而取得的结论，都不是最终的结论。

第九章 中国政局的多向发展

政协协议的达成，是一次政治利益的再分配，预示着旧有的国家秩序行将发生剧烈变革，而这种变革必将对旧有的既得利益群带来剧烈的利益冲击。为此，政协会议之后，中国政局呈现出复杂的、多向发展的现象。所谓多向发展，具体表现为三条线索：第一，按照政协的方向，落实政协各项协议；第二，固有的民国政治的逻辑开始反弹，反政协的政治逆流开始涌现；第三，中苏两国在东北经济合作问题上民族利益的争执尖锐化，而这种民族利益的争执，最终，还是归结到国内的政治斗争上。

一 中共对政协会议之后的时局判断

中共对于政协协议无疑是满意的，因而也是准备执行的。

1946年2月1日，即政协闭幕第二天，中共中央指示全党：“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虽然一定还要经过许多曲折的道路，但是这一新阶段是已经到来了”。这是一个总体的估计。

在这个总体估计之下，中共中央向全党做出如下指示：“我们的军队即将整编为正式国军及地方保安队、自卫队等。在整编后的军队中，政治委员、党的支部、党务委员会等即将取消，党将停止对于军队的直接领导（在几个月之后开始实行），不再向军队发出直接的指令，我党与军队的关系，将依照国民党与其军

队的关系。”

对此，该指示解释道：“全党同志必须认识这种改变是完全必要的。……在今天只有采取这种形式才能取得合法地位，被国内各党派及各国政府所承认而保存起来，并且换得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与国家的民主化，换得国民党军队脱离国民党所有、个人私有与派系所有。”

最后，该指示强调：“必须指出党内目前主要危险倾向是一部分同志中的狭隘的关门主义。……党内党外均有许多人不相信内战真能停止，和平真能实现，不相信蒋介石国民党在各方面逼迫下，也能实行民主改革，并能继续与我党合作建国，不相信和平民主新阶段已经到来，因而采取怀疑态度。”该指示要求：“很好的克服这些偏向”。^① 该指示为刘少奇起草。

2月6日，中共政治局会议决定：毛泽东、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周恩来、刘少奇、范明枢（或彭真）、张闻天8人，参加改组后的政府委员会。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参加行政院，力争周恩来出任行政院副院长。^②

与之相应，中共中央机关准备迁至江苏淮阴地区，以靠近南京，当地解放区负责人已着手安排中央机关的住房。^③

此后，根据整军协议，中共军队有所裁减。耿飏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我军区于一九四六年上半年较多地缩减部队，精减、复员了大批营以下干部和战斗骨干，使野战部队由原来的二十六个旅缩减成九个旅，大大削弱了野战军这个‘拳头’。”^④ 据载，此次减员，中共军队总数由138万减至127万。^⑤

① 《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71~73页。

② 《周恩来年谱》，第640页。范明枢为解放区山东省临时参议会议长。

③ 《管文蔚回忆录续编》，第292、293页。

④ 《耿飏回忆录》，第42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1。

⑤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59页。

政协会议之后，中共对于国民党有一个基本估计，2月7日，中共中央在一份指示中做如下分析判断：“政协会议以后国民党内部已起分化，一派主张与各党派合作……邵力子、王世杰、张治中，以及政学系的张群和于右任等，最近都转到这一派，他们愿意支持政协决议；另一派则反对政协决议，他们认为政协是国民党失败，国民党从此完事，大哭大闹，要弹劾国民党出席政协代表，并对蒋威胁，西西、复兴的领导成分，若干元老如吴稚晖等及何应钦等将领属于这一派。”针对国民党的分化，中共做如下决定：“我们的方针是争取蒋介石国民党继续向民主方面转变，以实现国家民主化，孤立国民党内部的反动派，我们现在应谨慎的与蒋介石、孙科、王世杰、邵力子及政学系等人合作”。^①

上述方针表明，蒋介石以及政学系被中共列为合作对象。还在重庆谈判时，毛泽东对蒋的印象之一便是：“说他坚决反革命，不见得。”^② 中共内部把蒋介石视为国民党内的“中间派”^③，以上表明，中共对于蒋介石的看法其实是有弹性的，蒋介石其人也是可以分析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此时，中共对于马歇尔这位国际钦差的立场、身份和作用也有了一个基本判断。2月12日，中共中央致电东北局，认为：“马歇尔在中国的地位，似不只单独代表美国，而必须执行三国莫斯科会议协定并向三国报告，故其态度公平，在形式上绝未偏袒国民党……一般说美人在本质上是偏蒋

① 《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76页。

②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422页。

③ 1946年1月11日，中共中央讨论政协问题，认为和平局面下党内会有两种危险性，其中之一是：“可能会出现对蒋介石中间派发生幻想”（《任弼时年谱》1946年1月11日）。

的，但他们鉴于赫尔利的失败，他们必须站在国共矛盾之上以便操纵国共两方，而不能站在国共矛盾之中，使他们丧失调人资格，故我们很可利用美人此种态度来争取自己地位替人民办事。”^① 其实，马歇尔并非三国代表，也不对三国负责，但中共对于马歇尔站在国共之上以便操纵这一立场的判断，则是正确的。

综合上述一系列判断，中共确有理由认为，和平民主新阶段已经到来。

二 国共关于整军方案的谈判

作为政协方针的延续，国共于1946年2月进行了整军方案的谈判。政协会议关于军队问题的讨论，只涉及整军原则，具体事项由国、共、美三人小组负责磋商。三人小组由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组成。

整军谈判的原则根据，就是政协制订的“军事问题案”。该决议规定的建军原则，主要是军党分离，军政分离，以政治军，这几点就是整军谈判具体事项的参照。这些原则无疑是一把双刃的剑，对于国共双方来讲，都是利害参半。

与政协会议不同，整军谈判是在马歇尔直接主持下进行的。马歇尔反复向国共双方强调：中国必须遵循西方军事传统，建立一支国家的、不干预政治的军队，用以作为一支民主的军队，而不是争实权的工具。所达成的协议就建立在军队与政治分离这种总原则的基础上。^②

为此，马歇尔提出一整套具体方案，如在全国建立数个军事

^① 《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77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马歇尔使华》，第60页，中华书局，1981。

补给区，全国军队集中驻扎于补给区内，补给由国防部或军事委员会直接解决，补给区与本区驻军不发生隶属关系。这个方案的核心在于，取消了中国的军区制，使军队与地方防务彻底脱钩，从而与内政彻底分离。此外，禁止使用国军镇压国内骚乱，如需动用军队，需经政府委员会同意，这就限制了政府主席对军队的调动权。

国、共、美三方面在关于整军的总的期限上，意见较一致，时间为18个月，其中分为两期进行，前12个月为第一期，后6个月为第二期。

各自军队所占数额问题，是此项谈判的头一个分歧。国民党在政协军事协议中承诺其军队编为90个师，为此，张治中提出按7:1的比例，中共应编为15个师。周恩来则坚持重庆谈判时所达成的协议，中共应有20个师。周要求在整编的第一期，各自分别整编，不按比例进行。

2月5日，周恩来致电延安：马歇尔主张按西方民主制度改变中国军队制度及军人思想。张治中不同意共产党军队整编为二十个师，主张按七分之一比例整编共产党军队。我们的意见是可以原则同意马歇尔的建议，因他是限制统帅权的。关于整军程序，我们主张第一步平行整编，各编各的，坚持解放区军队整编为二十个师。

2月6日，延安复电：马歇尔所提办法，对于破坏国民党及许多军队的原系统是彻底的，但事实上今天行不通，可在原则上赞成他的意见。军队问题最为重要，必须谨慎处理。^①这就是说，延安已料定马歇尔那一套是行不通的，原则赞成实际上是个策略。

2月11日，周恩来首先与张治中会谈，双方一致和不一致

^① 以上均见《周恩来年谱》，第642、643页。

的意见弄清之后，二人与马歇尔一同举行了预备性会谈。

张治中提出国共军队按比例整编，其实质是将双方数额作为一个相联系的问题。对此，周恩来在预备会议上说：“中央军之改编为九十个师和中共军之改编为二十个师是两件独立的事，不相联系”。“我主张第一期双方军队整编仍照九十个师和二十个师的数目进行”，然后，“愿由三人小组来商定第二期整编时国共军队的比例数”。

所谓“整编”，是笼统指军队缩编与制度，具体而论，此外还有一个“统编”，即国共军队合编，或称混编，以消除两军界线从而彻底实现军队国家化。关于这个问题，周恩来在预备会议上说：“政协会所决定的是整编分为两期，第一期分别整编，第二期再统一整编。但马歇尔将军在过去的谈话中曾特别着重统一整编的问题。”周的意思是主张统编放在第二期进行，不同意马歇尔立即统编的意见。

周还对马歇尔说：“我们（按：指周、张）均同意军队的最高编制将是军……军以上则无更高的指挥机构”。但表示目前存在的绥靖公署之类机构，在整编第一期可暂不取消。绥靖公署是高于军的指挥机关，其性质就是防区制；周恩来所以同意暂保留绥靖公署，是因为不赞成取消军区制。周说：“我们双方不同意取消军区制”，但同意“防区划定之后，即不移动。如拟做大的调动，须经国务委员会通过”。周所以不同意取消军区制，显然是与解放区问题联系起来的。

关于地方部队问题，周说：“地方部队包括民团、保安队等，系属于地方，其职责是维持地方治安，不属于国防军。此原则双方同意。”^①

最后，马歇尔表示将考虑双方意见，拟出具体方案，并定于

^① 以上均见《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103～105页。

14日开始正式会谈。蒋介石此时已离重庆前往沪宁杭视察，当日，张治中致电蒋，简略汇报会谈情况。关于周恩来提出的第一期整编国共各为90与20个师的意见，张治中汇报道：“职表示不能同意仍望其再行考虑”^①。

此后，整军谈判转入正式谈判，2月14、15、16、18、21、22日，共进行6次谈判。

2月14日，周恩来先向马歇尔转达了延安的意见，关于军队数额，周说：“我们希望已规定的二十师不变更……但在第二期整编中，我们愿意维持五与一的比例，即中央军为五十个师，我方为十个师。”关于统编问题，周说：“你所提的在第二阶段中进行统编一事，延安方面同意我的解释和你的办法，但说明要在第二阶段中进行。”^② 中共的意见与此前相同，强调统编放在第二期。

当日下午4点，三人小组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议。在马歇尔的推动下，国共双方各做让步，达成妥协方案。当日，张治中致电蒋，称会谈“进行尚称顺利。关于中共军队之数目，双方同意现编为十八个师，以后当全国军队编为六十个师时，中央军编为五十个师，共军则编为十个师，合并编成。”^③ 这次会议达成协议：整军第一期，国民党军90个师，中共18个师，共108个师；第二期全国军队总数为60个师，国共各为50与10个师。第二期进行统编。

整个谈判从现象上看，国共争论的焦点先是双方军队数额比例问题，后来是整军方案的名称问题，其实双方关注的核心问题

①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3），第74页。

② 《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107页。

③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3），第75页。

并不在这里，整军谈判的全部实质在于：双方军队的统编与集中分别驻扎问题，即合编分驻。这个问题真正涉及解除政党对军队和地盘的控制。但是，双方在这个问题上恰恰并未发生公开的激烈争论，因为这种争论显然不符合政协原则，双方的较量主要是在幕后展开。

2月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研讨这个问题，会议认为：在国共谈判中对整军问题要慎重，目前国家民主化的前途还不明朗，如果我们把军队交给国民党，失去对军队的控制权，“我们的发言权即降低，即成为民主同盟”^①。也就是说，如何避免变为民盟，是中共对军队问题考虑的核心。

2月8日，刘少奇致电重庆中共代表团，就整个谈判方针指示如下：“军队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必须谨慎处理。为取得经验并看清美国的意图及当前形势来决定对军队的政策”。刘指示：“现在只决定第一期整编计划，第二期的整编计划待第一期整编完毕时，再行决定。国共军队互相插入合编，其目的是企图消灭或控制中共军队，故绝不能答应”。刘少奇要求：要注意地方部队，因地方部队尚能保持某种独立性，我之武装将大部分保持在其中。刘少奇还指出：“美蒋的目的仍在政治上让步，军事上取攻势，即最后夺取我之军队，此种阴谋必须严重注意。”^②

这个指示表明，中共将对付合编、保持军队独立性的主要措施，放在了地方部队上面。地方部队即维持地方治安的保安队，而保安队在整军谈判中并不引人关注。

2月12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就此问题发表讲话，毛说：美国和蒋介石要以全国军队统一来消灭我们，我们要统一而不被消灭。军党分立还不是最危险的，合编分驻才是最危险的。

^① 《任弼时年谱》，第508页。

^② 《刘少奇年谱》下卷，第19页。

杂牌军还没有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合编的，连杂牌的集团军都没有与蒋介石嫡系部队掺杂合编。我们现在只有对付好，才能摆脱危险。全国军队统一，原则上我们只好赞成，实行步骤要看具体情况，这是我们与法国不同的。^①毛又一次强调中共与法国不同，即参加政府但不交军队，这是重庆谈判之前毛即决定的方针。

综上所述，合编分驻问题是整军谈判真正的核心。这个问题能否解决、怎样解决，具体看，这是衡量整军谈判效果的一个标尺；抽象看，则是衡量西方原则被接受程度的一个标尺。

2月15日，三人小组举行第二次会议。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即合编问题。正如中共高度重视这个问题一样，张治中也是抓住这一点不放，张治中首先表示：“‘军队国家化’为当前之急务，本会议之任务亦即如何使全国军队达到真正国家化之标的”。为此，张治中主张整军第一期“在十二个月内应实行混合编组，即每军由政府军二师共党军一师，及政府军一师共党军二师混合编成。”而在第二期的6个月内，“则应实行彻底的混合编组，使六十个师内不再有政府师与共党师界限之分，成为真正国家化之国军。”张治中是以军队国家化这一政协原则，敦促中共同意尽快合编。

中共既然已经看出合编分驻是“最危险的”，是要“消灭我们”，因此张治中的主张未被周恩来接受。周仍坚持在整军第一期，国共军队“各自编成，不相混合”；在第二期时，“始可为初步混合编组（即以师为单位混合编军）。至于彻底的混合编组，则须视以后局势进展情形如何再议”。也就是说，周一方面推迟合编的时间，并且对于彻底的合编也未给予肯定的答复。

^①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57页。

鉴于张治中主张第一期合编，周恩来主张第二期合编，最后，马歇尔表示该问题留待下次会议再议，但马歇尔认为：“初步的混合编组不宜太迟”，主张在第一期的6个月之后开始合编。^①马歇尔这个意见是在国共双方意见的基础上，提出的折中方案。

当中共对合编问题高度警觉之际，国民党内部也不甚安心。2月10日，陈诚致电军政部次长林蔚，认为：“混合编军办法最值得研究，因国共军队今后虽均属国军，在理自无问题，惟以种种思想问题，以及各军历史性，尤其所处之环境及将领之生活等等，决非短期所能融合”。林蔚也认为：在一年之内，中央军与共军只可合驻一地区，但若混合编军，则实有不宜。

张治中本人于15日会议之后，对于合编一事也产生顾虑。张在当天致蒋的密电中表示：“职于散会后经再详加研究，深觉在一年内混合编军办法实属利害参半”。为此，张治中建议接受马歇尔的折中意见，“职拟相机向马歇尔顾问表示政府愿尊重其意见，如共党代表能接受其主张，政府方面亦必予以接受，是否有当？”^②

当日，张治中派其助手郭汝瑰前往南京向蒋当面汇报。郭汝瑰于16日抵宁，向蒋面呈张治中亲函，蒋看后表示：“马歇尔主张国共军队六个月后混编，可即同意其主张”^③。

此后，16、18两日的会议主要是讨论宪兵与护路队问题。

2月19日，马歇尔就合编问题提出方案：在第一期的6个月之后，以军为单位实施统编。由国共各指定4个军12个师，

① 以上均为1946年2月15日张治中致蒋介石的密电，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3），第76页。

②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3），第76页。

③ 敦汝瑰日记，1946年2月16日，未刊稿。

合编为4个集团军，12个月之后，取消集团军，再以师为单位，统编为军。这个方案一方面将合编的时间定在第一期的中期实施，另一方面提高合编的单位，以安慰中共担心被对方吃掉的心理。这个方案仅要求国共各出四个军参加统编，也就是说，统编先在一个局部范围内进行，而不是全面统编。

对此方案，周恩来表示要回延安磋商。当日，张治中致电蒋，认为：“总之，整编共军最主要的为统编及驻地问题，但如能于六个月后，即以军为单位开始统编，则驻地问题亦可随之解决，似属于我有利。”^①

在这里，张治中一语道破全部问题的实质。国民党一向把中共军队与解放区的分离视为解决中共问题的关键，因为军队一旦脱离解放区，解放区也就不存在了，重庆谈判就是围绕这个问题进行的。统编问题从现象上看，只是一个时间先后、单位高低、范围大小等问题，而全部问题的实质则在于：统编一旦实施，参加统编的部队便必然进驻指定地点，这样，中共军队便从解放区分离出来。张治中的着眼点就在这里，即统编之后，“则驻地问题亦可随之解决”。因此，张认为此一方案“似属于我有利”。

2月21日，周恩来由延安返回重庆。当日，在与马歇尔的会谈中，周说：“关于你分两步来进行统编的建议，他们（按：指延安）也愿意在原则上接受，即七个月后采用集团军的办法，十二月后开始军的统编。”^②这样，马歇尔的方案被国共双方接受。

2月22日，整军谈判举行最后一次正式会议，全部条款均告达成。其要点为：整军第一期前12个月之内，全国陆军编为

^①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3），第77页。

^② 《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111页。

108 个师，中共 18 个师，政府军 90 个师；第二期的 6 个月之内，全国陆军编为 60 个师，国共各为 50 与 10 个师。

关于合编问题，在前 12 个月期间，由双方组成 4 个集团军，每一集团军由国共各一个军组成，国共分任其中两个集团军总司令。在后 6 个月内，取消集团军，合编部队以师为单位组成 6 个军，其中 4 个军由中共两个师、政府军一个师组成，另两个军由政府军两个师、中共一个师组成。这就是说，中共参加第一期合编的，为 18 个师中的 12 个师。参加第二期合编的，虽为全部 10 个师，但仍以师为单位。全部整军于 18 个月完成之后，双方军队是否彻底打散合编，该协定未提及。

关于驻地问题，规定：前 12 个月期间，东北地区共驻 6 个军，其中中共一个军，政府 5 个军。西北 5 个军全部为政府军。华北共驻 11 个军，其中包括国共合编的 4 个集团军即 8 个军，另有政府军 3 个军。华中共驻 10 个军，其中中共为一个军。华南共 4 个军，均为政府军。

简言之，前 12 个月的整军第一期，中共的 18 个师分别为，华北 12 个师，东北、华中各为 3 个师。而在后 6 个月的整军第二期，中共的 10 个师分别为，华北 7 个师，东北 1 个师，华中 2 个师。

此外，整军方案还规定各省有权维持一支保安部队，以维持地方治安。

整军方案于 2 月 25 日由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签署。

整军方案从字面上看，中共军队被缩小、分解，尽管中共最后还有 10 个师，但因集中分驻，必将与解放区脱离，因此，从协议文字上看，中共军队最终将被“化”掉。毛泽东早已看出合编分驻最危险，强调我们要统一而不被消灭，与法国不同等等，那么，这个最危险的合编分驻方案为何又被中共接受了呢？

显然，这并不符合中国政治的规律。

1946年12月，国共和谈已完全破裂之后，周恩来在延安的一次讲话中道出其中的奥妙，周说：“整军方案是使中国人民的武装受束缚的，但也受保障的，这有它的两面性。”关于受束缚，周说：“主要的规定要经过美国装备，我们的十个师也包括在内。装备虽好，但可把你集中起来，不给你汽油弹药，那你就没有办法……如果打起来是废铁一堆。”周又说：“整军方案还有它好的一面，这就是地方自治。人民的武装是地方自治的东西……这样就保障了我们解放区人民自己的武装不受国家军队的干涉。”

刘少奇还在会谈正式开始之前即指示周：要注意地方部队，我之武装将大部分保持在其中。也就是说，中共一开始便把文章做在了地方部队上，而地方部队的奥妙则在于：既可保留军队，又可将军队留在解放区，从而使军队与解放区不分离。既然如此，拿出去参加合编分驻的10个师也就不重要了。周恩来说：“我们就准备着把那十个师变为废铁好了”^①。这样，中共实现了最初的意图，避免了“成为民主同盟”。

当然，整军问题在中共内部也是有不同意见的。中共中央在1946年3月13日的一份电报中提到：“在整军问题上各地不同意见已有很多”^②。有些什么不同意见，尚待材料的进一步公开。

那么，国民党对整军方案采取了什么应对措施呢？周恩来说：“整军方案对我们虽不利，但蒋亦不能接受，故马上即以成立国防部、军改师等办法偷天换日。”^③

① 《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707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90页。

③ 《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696页。

整军方案是继停战协定、政协协定之后，国共达成的第三个协定。马歇尔使华仅两个月时间，一连促成三个协定，对此，有两位美国人多少有些困惑。1946年3月，魏德迈致电美国陆军参谋长，对马歇尔做如下评价：“他处理问题的步骤合于逻辑，首先实现了停止敌对，现在他正推进一项计划，要将中央政府和共产党的部队予以统一。所有这些是在阴谋、不信任、自私和东方的狡诈背景下完成的。真是一种惊人的成就，我真正怀疑在世界上是否有任何其他的人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做到如此之多。”^① 魏德迈的这些话，与其说是对马歇尔的恭维，不如说是他的困惑。

另一位感到困惑的美国人，正是马歇尔自己。1946年3月4日，马歇尔与周恩来、张治中飞抵延安，在欢迎晚会上，马歇尔说：国共“十八年的对立，很短时间得妥协，战争全面停了，出我预料。”^②

两个美国人的困惑表明，他们对于问题能否真正解决，多少有些底气不足。

整军方案是延续政协会议走向的最后一个成果。如同政协协议一样，整军方案后来并未实施，因此它本身并不具有实际意义。整军方案的谈判与签署如果说有什么意义的话，主要体现为这样一个问题：当西方的政治原则在理论上将中国的政治原则扫荡殆尽之际，问题已经悄然异化，中国在将西方原则以正面方式迎进来的同时，却在西方原则的外壳之下，将自己的原则顽强地保存下来。表面看，是西方原则改变了中国原则，实际上中国原则使西方原则成为一个空壳。

① 《魏德迈论战争与和平》，第233页，台北正中书局，1989。

② 《谢觉哉日记》1946年3月4日，人民出版社，1984。

三 国民党对政协协议的不满及其焦点

为适应政协会议之后的政治形势，国民党也陆续实行了若干改革，比较重大的措施有如下几项。

撤销军事委员会，改设国防部，使军队在形式上纳入行政院系统。

撤销带有若干前清军机处性质的侍从室，归并到国防部军务局。

撤销军统、中统，改为国防部保密局。

裁军，并且改军为师（这项工作起步不久便停止）。

释放政治犯。

蒋介石在政协开幕词中宣布，人民有言论、出版等自由，由于这个问题是民主政治最直接的体现，因而被国民党当局最早提上议程。1月28日，在国民党中常会和国防最高委员会联席会议上，蒋提出一项议案：“现行法令中与人民享有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各项自由相抵触者，应分别予以废止或修正。”^①会议通过了该案。

以上表明，政协所带来的西方政治原则，对于国民党施政方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几乎与政协会议同步，国民党内的不满情绪也在滋长。政协会议期间，陈诚致电蒋，主张：“须先军队国家化，然后始能政治民主化，否则，中央政权公开了，而共党军队仍不交出，将为国家无穷之害。”^②国、共在这两个问题的先后顺序上曾长期争

^① 《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会议记录》第8册，第34页。

^② 唐纵日记，1946年1月26日。《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582页。

论，重庆谈判即如此。1月10日政协开幕当日，周恩来对陈布雷说：“中央认为解放区是‘割据’，而中共又以为中央‘不民主’……因此我们认为‘军队国家化’与‘政治民主化’应该是平行的进行。”^①从政协的议事程序看，两者可以说是平行进行的，因此蒋对陈诚的答复是：“会议有我负责主持，不必过虑”。^②

陈诚的意见还只是个顺序问题，其他人的意见则是全盘否定。胡宗南致电蒋，表示：“政治协商会议揭幕，适予匪军以喘息调整补充占领之机会……务请钧座乾纲独断，贯彻决策，调整部署，实施申讨”^③。

1月22日，侍从室第三处主任陈果夫致函蒋，函称：“政治协商会议必无好结果。且无论如何，共党已得到好处，本党已受害。……中国如行多党政治，照现在党、政、军均未健全之际，颇有蹈覆辙之可能。请临崖勒马，另行途径。”^④

以上表明，还在政协会议期间，国民党内右翼势力已经形成危机感。政协会议之后，这种不满情绪迅速扩展，而这种情绪的代表即CC集团，他们向政协发起反扑的目标，集中为政协宪草修改原则。

在政协的五项议题中，由于宪草问题不像其他问题那样具有急迫的现实性，因此宪草问题本来是国民党最不重视的问题。周恩来说：“宪法问题蒋最不重视，看都未看”^⑤。政协秘书长雷震

①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2），第132页。

② 唐纵日记，1946年1月26日。《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582页。

③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5编（4），第384、385页。

④ 陈果夫日记，1946年1月22日。徐詠平：《陈果夫传》，第935页，台北正中书局，1980。

⑤ 《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696页。

也曾对梁漱溟说：孙科“只把宪草小组会议记录送蒋过目，而蒋却未看。我们屡次请他看，他却始终未看。”^①那么，国民党为什么在这个原本最不重视的问题上向政协发起反扑呢？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国民党抓住了“把柄”。

政协协议尽管引入了一系列西方政治原则，但中国旧有的政治原则也有所保留，政协通过的和平建国纲领，第一条即遵奉三民主义为建国之最高指导原则。而国民党抓住的“把柄”也就在这里。

政协宪草修改原则中，关于立法院与行政院关系的规定，显然与孙中山的五权宪法学说不相符。据此，国民党声称五权宪法与三民主义是一个整体，违反五权宪法便是违反三民主义，于是以三民主义卫道士自居，以捍卫国父遗教的名义，向政协宪草原则发起了反扑。

2月4日，王世杰日记载：“午后中央党部开中央委员谈话会，出席发言之委员大都为党中某一系统之人，均反对政治协商会议之结果，而尤攻击宪草案（宪草案确多不妥之处，予觉哲生、力子两君当时确不免轻忽将事）。”某一系统即CC。

政协宪草问题也引起旧国大代表不满。2月12日，旧国大代表发表一个意见书，称国民大会“为惟一制定宪法之机关”，表示重视各方面对宪草的意见，“然其制宪职权，有其神圣性，有其完整性，亦绝对不受任何机关、任何团体、任何党派派意旨之束缚”^②。这是针对政协而言的，意思是制宪权在国大而不在政协。这一点为国民党后来修改政协宪草原则，提供了依据。

蒋介石本人对于政协协议肯定是不满的，但蒋所处地位与

^① 《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901页。

^② 《中央日报》1946年2月14日。

他人不同，因为政协会议是在蒋主持下召开的，政协协议也是在蒋主持下通过的，因此蒋不能完全推翻协议。另一方面，鉴于党内的强烈不满，以及宪草原则确给蒋以后的施政带来许多不便，因此蒋也愿意向右翼做出一定让步。蒋的总体态度是，同意对宪草原则做数项修改，而对政协其他协议则主张维持不变。

2月10日，蒋在重庆“曾约集五院院长及党内前辈谈话，对于宪草意见，坚决表示三点：（一）国民大会必须为有形之组织；（二）中央政制，应照国父遗教，保持五权宪法精神（或参照美国制）；（三）地方政制，应照建国大纲，以县为自治单位。”^①孙中山在其晚年的重要著作《建国大纲》中规定：“县为自治单位，省立于中央与县之间，以收联络之效。”^②根据此一遗教，蒋介石表示，省不是自治单位，故而政协宪草原则中关于省得制定省宪的条款不能成立。蒋所说的美国制，是指美国的总统制，在蒋看来，美式总统制较之英式内阁制较为有利，其实美式总统制与孙中山的五权制也是有区别的，可见国民党所捍卫的并非国父遗教，而是既得利益。

以上三点是蒋介石对政协宪草原则的三条主要修改意见。

2月11日至24日，蒋前往沪、宁、杭一带视察，其间，多次发表讲演，向党内解释他对政协的态度。

2月14日至17日，蒋介石先后在上海、南京内部会议上发表讲话，就为什么在政协会议上对中共让步做出解释，蒋所解释的原因分为国内和国外两个部分。

关于国内原因，蒋说主要是抗战结束后，“劳者思息”，厌

^① 唐纵日记，1946年3月4日。《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596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28页。

倦战争，另外，“共产党背叛国家民族的阴谋，全国人民还不十分明了，我们在这个时候如果决心以武力来勘定内乱，战事延长下去，则共产党一定到处造谣惑众，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来破坏社会的秩序，引起民众对于政府的反感。如此，则社会必将崩溃，社会崩溃则军队就不能维持，军队不能维持，则政府就不能存在了。”为此，必须有一个“休养生息”的时期，“然后我们政府的基础，才能稳固”。

关于国际的原因，主要就是美国。蒋介石认为，由于美国左派舆论的宣传，“因此在美国人民的脑筋中间，造成了一个牢不可破的观念，以为现在中国的政治，是国民党一党专政，将来要走上独裁的道路”。“美国人民固然希望中国强盛，但决不希望中国政府成为德、义或苏联式的政府，而希望中国政府能采取英美民主的形式。如果中国不改变政府的形式，继续一党训政，则美国左翼报纸对于美国政府贷款中国，接济中国的军械，派遣军事顾问团协助中国训练军队的计划，一定会大肆攻击……美国是一个舆论支配着议会而议会决定政策的国家，所以美国政府不能不顺应舆情，希望我们中国结束一党训政，改变政府的形式”。

以上是不能对中共用兵戡乱和必须做政治改革的两个原因。

对于政协会议本身，蒋介石这样评价：“我以为我们此次对政协会的协议只是让步，最多亦只可说是损失而绝不是失败。与其说是协商的失败，毋宁谓是政策的成功。因为我们成立协议，是有政策的，而不是无目的的退让”。

最后，蒋要求党团员：“政策是我们实现主义的手段”，“如果政策上决定我们应该退守，那就应该决心退守……至于目前的得失，根本无关宏旨，不足计较。”^①就总体上讲，蒋在政治上

^① 《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1，第240~243页。

是主张“退守”政策的，故而基本主张维持政协协议。

那么蒋介石为什么主张退守呢？2月16日，蒋在一次会议上这样说：“因为军事上之弱点，所以政治协商会议有此失败，所以我们不得不忍耐，不得不避战！”蒋接着说：“共党原欲呼应美军在上海附近登陆，因美军改变计划而失败了。其后欲占领华北，因毛泽东来渝，失败了。但是我们何以有此次政治协商会议之失败，都因为军队无力量”^①。

蒋介石的这段话有三层意思：1. 政协是失败；2. 失败的原因是军队无力量；3. 结论是不得不忍耐。在这里，“忍耐”显然是一种策略，目的是以待军队恢复力量。

在蒋介石的政治性格中，的确有其能“忍”的一面。关于这个性格的形成，1945年5月19日，蒋对出席国民党六大的代表说过这样一段话：“各位同志或许还不知道我的个性，我是一个从孤儿寡母家庭中出身的人，九岁的时候就死了父亲，我的母亲忍痛抚孤。一般土豪劣绅都要凯觐我家的产业，都要欺侮我们，压迫我们；甚至于亲戚朋友，也冷淡我们。对于我的家庭，只有漠视，没有扶助；我的母亲一方面要抚养孤子、扶其成年，一方面要对抗土豪劣绅，应付亲戚邻里，真是万分的辛劳，万分的痛苦！在这种凄凉孤苦的环境之下，受尽了种种委曲，无可申诉，惟一的希望就是把我抚养成人！所以我母亲的忍耐力是不可想像的！我幼年的时候，受着母亲的影响，我的个性，就在这种压迫环境之中锻炼成坚忍不拔的忍耐力。”^②

蒋关于他幼年环境与其性格的养成，一生中多次提及。这种性格有其能够忍耐的一面，也有其狭隘的一面。这种忍耐体现在政治上，并不体现为宽容。

^① 唐纵日记，1946年2月16日。《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591页。

^②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5年5月19日。

四 中、苏在东北经济合作问题上的继续争执

蒋经国访苏之后，国民党与苏联的关系未能改善，尤其在东北经济合作问题上苏军的立场丝毫未见松动，这样，杜聿明所部仍滞留南满，不能展开军事接收。

为打开这一僵局，1946年1月中旬，蒋采取了一项折中方案，即选择部分企业与苏方合作经营，但拒绝全面合作，蒋称之为“缩紧”政策。1月中旬蒋致函张嘉璈，表示：“关于经济合作方针，此时只可缩紧，不宜太宽。此事已考虑再三，不能不如此。……总要使我主权与法理不发生恶影响，不为他人引以为例则得矣。”^①

完全接受苏方要求，既损国家主权，又超出中苏条约范围，将遭到广泛的批评；完全拒绝苏方要求，则又无法展开接收东北的行动。这个折中方案的意图，就是企图局部满足苏方要求，从而换取苏方同意国民党军接收。

1月21日，蒋介石致电蒋经国并转张嘉璈，对“缩紧”方针具体指示如下：“一、苏联所提东北日本事业资产皆为红军战利品归苏联所有一节，吾国不便承认，应不予提及，仅与商谈合办事业”；“二、前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之附属事业以及抚顺煤矿，决不在合办之列”；“三、前南满铁路践西事业皆不合办”；“四、东北航空及松花江航运并非工矿事业，不应列入合办案内”；“五、各种工矿合办公司，吾国股份应占百分之五十以上，董事长及经理皆由中国人担任”。最后指示：“商谈结果应俟东北接收完竣，始能成立正式协议”。^②

^① 《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第630页。

^② 唐纵1946年1月26日反省录，《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583页。

就在中苏双方为东北日资产业所属问题争执不下之际，作为这种争执背景的具体反映，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张莘夫事件。

张莘夫当年 47 岁，毕业于北京大学、美国密西根大学，曾任煤矿矿长、资源委员会汞业管理处处长、钨业管理处处长等职，此次在东北的职务为经济部东北接收委员。1946 年 1 月 14 日，受张嘉璈指派，张莘夫偕随员 7 人，由沈阳乘火车前往抚顺，与苏方接洽抚顺煤矿接收事宜。1 月 16 日晚，张莘夫一行由抚顺返回沈阳，途经李石寨车站时，张莘夫及数名随员被不明身份的武装人员杀害。

张莘夫案于 1 月底披露后，在中国知识阶层引起极大愤慨。国民党方面认为是苏军与中共所为，而苏联大使彼得罗夫于 2 月 27 日就此事答复重庆外交部时称：“张莘夫被害系暴徒所为”^①。另外，中共中央在 2 月 25 日一份内部指示中认为：国民党“勾结日本人制造张莘夫惨案，以为反苏反共的借口。”^②

张莘夫事件究竟是一起偶然事件，还是当时中苏在日资企业归属问题上的争执所产生的一种相关反映？总之，这件事的直接当事者张嘉璈，是将此一事件与中苏此一争执联系起来的，张的看法是：“此事显然表明苏方不愿我方在经济合作问题未解决以前，接收抚顺煤矿”^③。也就是说，张认为此事为苏军所为，而苏军所以如此，是为拒绝向中方移交抚顺煤矿。因此，至少在张嘉璈看来，张莘夫事件的发生，其背景是中苏经济合作的争执。

为缓和与苏军的关系，政协会议期间，选择此一国共合作的背景，宋美龄于 1 月 22 日飞赴长春，代表中国政府向苏军有功将士授勋。苏方称马林诺夫斯基因事回国，宋未见到马林诺夫斯

① 《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第 673 页。

② 《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 84 页。

③ 张嘉璈日记，1946 年 1 月 28 日。《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第 642 页。

基，当然任何实际问题不能解决，宋美龄无功而返。

在接到蒋关于“缩紧”的指示后，张嘉璈对于此项政策的出台做如下判断：“在中央辅助蒋主席作东北问题之决策者，为行政院长宋子文、外交部长王雪艇及经济部长翁詠霓。宋王二人，因当签订中苏友好条约之冲，惟恐再受攻击，宋则取极端冷淡态度，王则取极端谨慎态度，翁则以宋王态度为转移……使蒋主席为主权与法理两理论所拘束，因有只可缩紧，不宜太宽之指示。”^①翁詠霓即翁文灏。所谓主权，指经济合作有损中国主权；所谓法理，指经济合作超出中苏条约范围，因而这项要求没有依据。张嘉璈认为宋、王的这两点意见，束缚了蒋，妨碍了蒋对东北问题的决断。

相反，王世杰则认为东北接收无进展的责任在东北的两位主要当事者，认为：“公权态度颇嫌软弱，对苏军过于迁就；熊天翼厌恶苏军，却又不肯负责应付。目前东北接收之障碍于以日增。”^②

总之，东北的局面一筹莫展。

1946年2月1日，是苏军撤离东北的最后期限，但苏军毫无撤退迹象。是日，马林诺夫斯基约见张嘉璈，直截了当地表示：“愿与阁下交换关于中苏经济合作问题之意见。”张嘉璈根据重庆的“缩紧”指示，表示可就部分项目与苏方合作。对此，一同参加谈话的苏方经济顾问斯拉特阔夫斯基断然拒绝道：“华方提议，不能作为可使谈判成功之基础。”

张嘉璈转移话题说：“鄙人愿乘机会，与阁下一谈政治问题，实因政治与经济有密切关系。中国政府现陷于极困难之地位，因一般人士责难政府，数月内在东北，仅接收数市，至接收

^① 张嘉璈日记，1946年1月18日。《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第630页。

^② 《王世杰日记》1946年2月5日。熊式辉字天翼。

之省份，则名存实无。……故今如订立经济合作办法，恐仍是只有义务，而他人享其权利。”张的意思，实际上就是表达了对苏方的不信任。面对张嘉璈此番言论，终于，马林诺夫斯基也将苏方为什么坚持经济合作的真实意图和盘托出，他说：“满洲地形与苏境衔接，插入苏境极深，故必须借经济合作，使满洲不再对苏联有所威胁。”也就是说，要以经济合作这一形式，将东北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以此保障其远东的国家安全。最后，他表示：经济合作“希望早日解决，使鄙人及军队可即离此。”^① 仍然坚持经济合作的成立，是苏军撤军的先决条件。

2月4日，张嘉璈铩羽而归，返回重庆。此刻，蒋也实在无计可施了，蒋对张说：“如苏方不撤兵，吾方即不前进，亦不谈经济合作问题，任其搁置再说。”^② 由于熊式辉早已离开长春而驻锦州，张此次返渝后奉蒋之命留渝不归。这样，东北行营在长春名存实亡。

由于经济合作无结果，苏军开始将工矿企业的机械设备大批拆卸搬运回国，东北的经济利益还是未能保住。

因经济合作问题而产生的僵局，其最大的政治后果是，中苏条约谈判期间略有改善的两国关系，至此完全被抵消。关于这件事处置上的失策，张治中曾于1948年5月致函蒋，对此做如下结论：“今日东北局面之演成，实由于对苏外交之失败，当时外交当局，不知收回东北为政治利益，保全工矿为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当然重于经济利益，乃竟着重经济利益忽略政治利益，前提一误，全局皆输。”^③ 张的意见当时能否真正解决问题，姑且不论，不过就结果而论，在东北问题上，最终，国民党是政治利

① 张嘉璈日记，1946年2月1日。《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第650~655页。

② 张嘉璈日记，1946年2月4日。《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第656页。

③ 《张治中回忆录》下册，第769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

益、经济利益“全局皆输”。

中苏经济合作久拖不决，其另一个后果是东北问题逐渐国际化，美国开始插手这一问题，从而使问题更加复杂化。

1946年2月9日，美国分别照会中苏两国，认为：中苏协商管理满洲之工矿企业，违反门户开放原则，此一问题之解决，须有美国参加。^①2月11日，美国驻华大使馆参事向王世杰转交了一份美国国务卿的照会，表示：“美国政府认为，日本的国外财产（如满洲的工业）之处置，系有关曾荷负击败日本任务的各主要同盟国家共同利益”。也就是说，东北的日资企业为盟国的“共同利益”，而非中苏两国所有。“因此美国政府于接获中苏双方已在进行商讨，其结果或将使满洲工业成为绝对的中苏共管之报告后，甚为烦虑。”美国所以对中苏经济合作问题不满，其主要原因是：“美国及其他同盟国人民之未能获得参加满洲经济发展之均等机会”^②。

2月13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通告王世杰：“苏联关于东北之权利，只限于中苏友好条约范围以内。现闻中苏两国商谈东北经济与工业之管制，若违背门户开放原则，美政府不能承认。”^③

美国在东北日资企业问题上的立场，显然延续了上个世纪以来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的对华政策。

那么，美国的门户开放的要求，对于已经陷入僵局的东北问题又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作为这件事的直接当事人，张嘉璈立即判断将产生两个负面影响：一方面“使外交当局对于战利品之要求，更受一种束缚。同时使主张对苏采取强硬态度者，觉得

① 《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第658页。

②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1），第453、454页。

③ 《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第661页。

吾方可借美国助力，以抗苏联。以后谈判将益增困难矣。”^①

归纳起来，苏方将东北日资产业视为苏军战利品，认为应归苏方所有，而中方则认为应作为日本对华战争赔偿归中方所有。现在，美国又提出这些产业应作为击败日本的各主要盟国的“共同利益”，即美国也应有一份。这样，中方的立场不仅未得到支持，反而多了一层“束缚”。另一方面，主张对苏持强硬立场的人，认为美国的这一表态，可以将美国引入东北纠纷，借助美国对抗苏联。这两种后果在张嘉璈看来，只会使交涉“益增困难”。

由于苏军已开始从东北将大批企业的设备搬运回国，为此，2月26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举行记者招待会，“否认任何三国协定规定苏联可取走中国东北境内之机械或工厂设备”^②。三国指美苏英，贝尔纳斯的意思是，苏军此举是没有依据的。

美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与马歇尔是一致的。2月8日，在与王世杰商讨东北问题时，马歇尔“不主张对苏让步”^③。

与此同时，其他西方国家也在注视东北问题。2月17日，加拿大驻华大使对张嘉璈说：“目前对付苏联，一面须避免正面冲突，一面须不承认无理要求，宁任其霸占，不能情让”。^④

然而美国与其他国家对东北问题的立场，除去一些谈话和照会外，便没有其他动作了，正如张嘉璈所说：“美国空言仗义”。这种空言仗义对于中国的后果又是什么呢？作为当事人，张嘉璈的体会无疑是最深切的，张说：“友邦之仗义执言，不特不能帮助解决，且增加弱国之进退两难。东北本案，益趋黑暗矣。”^⑤

① 张嘉璈日记，1946年2月4日。《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第661页。

② 《中央日报》1946年2月28日。

③ 《王世杰日记》1946年2月8日。

④ 张嘉璈日记，1946年2月17日。《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第664页。

⑤ 张嘉璈日记，1946年3月1日。《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第675页。

五 国、共在东北问题上的继续争执

国、共关于东北问题的争执，当然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在政协会议上，国、共就一系列根本性国家制度问题达成了协定，但东北问题不在谈判之列。由于有中苏条约这样一个外交协议，东北问题具有外交性质的一面。一般说，国共谈判只涉及内政问题。那么，国、共能否就这个具有外交性质的问题，尤其是这个涉及中苏条约的问题举行谈判，显然，这是摆在中共面前的一个十分特殊的问题。总之，国、共在东北问题上的核心问题，就是国、共能否就该问题举行谈判。

1945年11月23日，张嘉璈率东北行营撤离长春前一天，向马林诺夫斯基话别。此时苏方已迅速做出协助国民党接收东北的姿态，因此在谈话中马林诺夫斯基也做出了许多善意的表示。他说：“沈阳以南，因中央军未到，故有十八集团军。如苏军撤退一地，而中央军不予接防，十八集团军势必乘虚而入。故苏军只好暂不撤退，一俟中央军队开到后，认为足以维持秩序后，苏军再行引退。”^①

当时，国民党由海上向东北运兵计划受阻后，主要的陆上通道便是北平经山海关至沈阳的北宁铁路，而北宁路也已被中共切断。鉴于马林诺夫斯基上述友好表示，张嘉璈乘机提出，希望八路军退出北宁路山海关至沈阳沿线，以便国民党运兵接防。对此要求，马林诺夫斯基的答复含糊不清，但张嘉璈得到的印象是：苏军“似亦不致帮助八路军久占铁路线”^②。

^① 《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第567页。

^② 张嘉璈日记，1945年11月23日。《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第568页。

如同中共视国民党为美国走卒一样，国民党也视中共为苏联附庸，在从苏方获得这些并不可靠的承诺后，张嘉璈把问题演绎为中共必然以苏军的意志为转移，让出北宁路。返渝后，未经上报蒋，张于11月30日私下约见董必武，“告以马元帅认为榆沈铁路打通，有其必要。苏军正待中央军到后，可自锦州向北撤退，请其劝八路军在沈阳锦州间，退出铁路线以外。”张嘉璈的盘算是：“余觉苏方既已默许我方打通沈榆铁路，八路军闻之，自必变更态度，不致阻碍吾军前进，庶几中央军可早日开到”。^①

此时正是苏军表示愿与国民党合作，下令中共退出长春路沿线，甚至表示不惜以武力驱散中共之际，中共对于国、苏之间的合作究竟可到何种程度，苏方是否将全力维护中苏条约，一时间也失去了把握。张嘉璈的出现，顿时使中共摸到了苏军的底，此即苏方不会无保留的按中苏条约与国方合作。事情很明白：如果国、苏全力合作，张嘉璈便不会找董必武，张找董恰恰说明，在东北问题上，国、苏双方不能撇开中共。

东北问题因其外交性质的一面，一直未能提上国共谈判议程。由于张嘉璈具有东北行营二号人物的身份，中共方面遂将此次本来是私下性质的约见，演绎为政府方面有意谈判，故迅速做出反应。12月1日，延安致电董必武等，判断：“苏方在东北态度已甚为明显，目前所取步骤，即便严拒美军入满，又使我方谈判和发展，故张公权找董老商谈是必然结果。”

判断张“必然”找董，也就是判断国民党“必然”与中共谈判，为此，延安指示董：“我方宜就此种时机，再开谈判之门……望复张公权并告王、邵，长春沈阳驻兵二万，以一万经北宁路开入沈阳，可以商量，但必须先实行双方停攻、停占（暂

^① 张嘉璈日记，1945年11月30日。《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第573页。榆指榆关，山海关旧称，沈榆铁路指北宁路沈阳至山海关段。

不退出侵占区)、停运,以便我方代表团来渝重开谈判。”“代表五人及随员准备六、七号赴渝,望告邵于五号派大飞机来。”^①可见中共对于这个“时机”是相当重视的。中共的意图是,同意国民党经北宁路运送一定兵力,以此问题的谈判为开端,将东北问题的谈判开展起来。

12月5日,周恩来在向中共中央提交的报告中表示:“我认为东北问题是可以谈的,而且也有局部解决的可能,因为国民党也知道东北是不能独霸的。”^②

周恩来这个意见被中共中央接受,12月7日,延安致电东北局:东北问题或许有和平解决可能,国民党已知他接收东北的困难,表示愿与我谈判东北问题。中央准备在重庆与国民党试谈,但最后还须由你们在东北与国民党行营谈(如能有苏联居间折中就很好)。翌日,延安指示彭真:如有苏方介绍,似乎你即可与行营谈判。蒋方已表示愿谈之意。^③

然而,张嘉璈此举并非政府行为,张自己也未料到他偶然的一次私下谈话,引起了中共如此高度重视,因此,当中共急切地等候飞机赴渝谈判之际,张却于12月2日由重庆飞北平,12月4日,率东北行营重返长春。此事的由来中共方面始终未弄清楚,以至后来周恩来在与马歇尔的谈话中多次提及此事。^④

张嘉璈于12月4日重返长春,5日在与马林诺夫斯基的谈

① 《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33页。王、邵指王世杰、邵力子。

② 《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6、7页。

③ 《彭真年谱》上卷,第332、333页。

④ 1946年4月22日,周恩来对马歇尔说:“政府东北经济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张嘉璈曾来访问中共代表董必武先生,表示政府要商谈长春路的接收问题。董当即表示愿见政府接收沈阳,并愿商谈此事。不幸,次日张即离渝去东北”(《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259页)。

话中，告以在渝曾与董必武谈话，劝告八路军退出北宁路沿线，希望苏军对中共做同样劝告。6日，董必武致电张嘉璈，表示：“中央派遣沈阳队伍，拟经北宁路开去，已得延安复电，可以商量。”当日，张复电董，请董“再电延安，即日通告锦州奉天线队伍移撤日期，以便电告中央，实行停止战争”。至此，张嘉璈以为大功告成，这才于当日致电蒋，报告事情经过，表示：“取向不愿于政治有所论列，只以体念钧座关怀东北日夜焦思，故不惮出位之嫌，尚祈鉴宥。”^①

东北问题是一个涉及国、共、苏三个方面的问题，一般说，当国、苏两方不能双边协商解决的情况下，事实上就为国共谈判提供了契机。然而这一回蒋介石没有按一般的游戏规则就此与中共谈判。12月8日，蒋致电张嘉璈，断然制止道：“在东北，尤其对苏方切不可再提董必武与共党有关事宜。”^②这件事就此停止。

张嘉璈是一位资深的银行家，从无办理国共交涉的经验，他偶然的一次“不惮出位”，在国共之间惹出一连串是非。问题在于，因他的此一孟浪之举，把国共双方长时间均未提出的东北问题谈判一事提了出来，又因为这一问题的提出，促使国共双方本来都不甚明朗的立场态度，骤然间都明朗起来。

自联合政府提出以来，中共已具有相当的政治地位，迫使蒋在一系列较之东北问题远为重要的问题上举行了谈判，甚至可以在政协会议上就政府改组、军队整编等问题达成协议。只有东北问题是一个例外，在苏军开始撤退之前，这是惟一被国民党断然拒绝谈判的问题。

蒋为什么惟独在东北问题上坚拒谈判？问题仍然出自东北那个特殊的三角关系。东北问题，由于有中苏条约这样一个外交协

①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1），第567页。

② 《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第586页。

议，因此具有外交性质的一面。根据这个条约，国民党获得了接收东北的惟一合法地位，而国共谈判一旦举行，等于承认东北问题也具有内政性质的一面，据此，中共亦可取得一席合法地位。问题的关键便在于：中共一旦取得合法地位，苏军便可以从中苏条约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合法地向国共两军交防，并可合法地与中共在东北建立合作关系。因此，为制止这个连锁反应，蒋介石必然要堵住问题的源头，以外交问题的名义，坚拒与中共谈判。坚持外交问题，就是坚持国民党的惟一合法地位，从而将苏军套牢于中苏条约，以期从苏军的交防中获取最大利益。蒋所以制止张嘉璈的活动，所以坚拒与中共谈判，就是要制止外交问题转移为内政问题。

这样，在东北问题上，因国民党拒绝经济合作，从而与苏方构成了第一个僵局；又因拒绝谈判，从而与中共构成了第二个僵局。而更为复杂的是，两个僵局之间又构成了相互制约的关系。中共判断，国民党为东北僵局的打开设置了一个先后程序，即首先打开国、苏僵局，在从苏军那里取得优势地位之后，回过头来再与中共解决内政问题。

1946年3月5日，刘少奇致电东北局，判断：“因为苏联要求在东北的经济合作，美蒋尚不答应此种合作，并在全国煽动反苏运动，苏军亦推迟撤兵，故东北外交问题一时还难于解决。……因此，东北的内政问题，我们与国民党在东北的妥协，暂时亦将不能解决。只有在东北外交问题解决之后，我们与国民党的妥协才会有可能。”刘判断蒋的意图是：“想在外交上利用苏联将东北更多城市移交给蒋接收，以便将来在国共谈判中有更多的法律依据来压迫我方让步。”^① 以上判断是准确的。

^① 《刘少奇年谱》下卷，第24页。

马歇尔使华后，其调处活动颇见成效，但由于东北属于苏军的势力范围，马歇尔不能插手东北。为此，中共一度设想，请苏方出面调处，“作东北之马歇尔”，但这一设想最终未能实现。

1946年2月12日，延安致电东北局：“在停战谈判时，关于东北热河问题曾数次请苏联派人参加，但苏联坚不出面。”中共认为：“苏联出来作东北之马歇尔对我在根本上是有利的，但他们将和马歇尔一样，在形式上决不能偏袒我方，并可能要我党对国民党作更多的让步……故苏联暂不出面，亦有好处。”^①苏方所以不愿出面，是因为苏方所处地位与马歇尔不同，作为中苏条约的缔约方，尤其作为东北争执的当事者之一（经济合作），苏方是很难调处的。

此后，中共又曾提议仿照重庆三人会议，在东北设置一个三人会议，张嘉璈2月初返渝后，周恩来向张提出过这一建议，张本人表示赞成。2月18日，周恩来又向张治中提出：“在东北行营设一三人会议，由苏联参加，即由政府代表、中共代表及苏联代表组成之。”^②但中共同时也认识到，“蒋在军事上未打败仗前，不会接受此议。”^③

由于上述设想均未实现，这样，东北问题不仅形成两个互为牵制的僵局，而且处于无人出面调停的局面。

2月8日，周恩来、董必武约见张嘉璈，提出东北问题政治解决的方式，要求东北政治委员会应加入各党各派，也就是在东北组成一个地区性的联合政府。对于这次会面的印象，张在当天日记中写道：“观其气概，与去年11月30日晤面时迥异，谅彼

① 《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77、78页。

②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3），第79页。

③ 《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78页。

方已估计其在东北之武力，足以抵抗吾方”^①。张将其上年 11 月 30 日在渝与董必武的会面做了一个比较，印象是中共较前“迥异”，这是国共所处态势发生变化的反映。

其实，周、董此次约见张嘉璈，主要是就中共即将发表的东北政策，向对方做一预先通报。由于东北问题的外交性质的一面，中共对东北问题长时间没有发表公开的、正式的主张。2 月 13 日，延安中共中央发言人正式提出中共对东北问题的四项主张：第一，改组东北行营，“从行营及其政治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到各省政府都应该改组，尽量吸收东北民主人士与国内各党派无党派人士参加，使一切民主分子享有公平有效的代表权”。这直接引用了杜鲁门对华声明中的话。第二，要求承认中共在东北的军队，“对于东北现有抗日民主部队应予承认并整编，使与国民政府派去的军队共维地方治安”。第三，“对于东北各县民主自治政权应予承认”。第四，“国民政府为恢复主权而开入东北的军队，应限制在一定数量之内”。

此一要求的核心是：“政治协商会议对于有争执的地方政权问题也已成立了以民主方法合理解决的协议，相信也应首先适用于东北。”^②以政协精神解决东北问题，这就将东北问题作为内政问题提了出来，以期将东北问题从外交问题的缠绕中剥离出来，从而促使国民党与中共进行政治谈判。

针对中共上述主张，《中央日报》于 2 月 17 日发表题为《东北问题的本质》的社论，表示：“在这些新要求的提出上，我们感到国家支解民族分裂的危机。”社论说，中共的武装是在战后才出现于东北，因此，“决不在政治解决军事调处的范围之内。今日东北问题是接收或不能接收的问题，无所谓政治协商的

① 张嘉璈日记，1946 年 2 月 8 日。《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第 657 页。

② 《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 80、81 页。

问题。如果国人对于这一点不加分别，那么今后任何军阀豪劣土匪都可以先起一支队伍，再与政府‘政治解决’，其结果将使中国化为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的局面。”社论的要点是，强调“东北问题是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各种附件怎样实行的问题”。也就是说，坚持不与中共做政治解决，坚持只与苏方做外交解决。

2月18日，延安致电东北局并林彪：“《中央日报》关于东北问题社论，系国民党仍不想停战不想承认我在东北地位之表示，即仍想武力解决。”^①

东北问题的难点在于：国民党不承认东北存在内政问题，但外交途径显然不能解决中共问题。中共承认中苏条约，但实际上不能承认国民党有权依据中苏条约接收全东北。

总括而论，尽管政协会议在全局性问题上达成了协议，然而这些全局性协议对于东北这一局部性问题并无作用，最终，这个局部问题反过来，毁掉了那些全局协议。

六 反苏反共游行的爆发

1946年2月22日起至3月初，在重庆和全国主要城市，相继发生以学生为主体的大规模的反苏反共游行示威活动，同时，一大批社会文化名流卷进来，结果是，政协会议期间的政治气氛为之一变，迅速恶化。

促成此一事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东北问题。具体讲，有以下几点直接原因。

2月1日苏军逾期末撤军。

2月11日，雅尔塔会议周年之际，美、苏、英三国于同日

^① 《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82页。

公布雅尔塔密约，引起中国知识阶层对苏联极为不满。

对苏军将东北工矿设备拆卸搬运回国不满。

对苏军提出超越中苏条约范围的经济合作要求不满。

由于要求尽早收回东北主权，因而对以接收主权名义进军东北的国民党军遭到中共阻击不满。

对中共2月13日提出的关于东北的四项要求不满，右翼舆论将此与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的特殊化相提并论。

对张莘夫事件极为愤慨。

对苏联支持新疆的民族起义不满。

在以上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此一事件一触即发。

2月16日，重庆一批东北籍人士举行了反苏游行。此事本身影响并不大，但直接诱发了重庆学生举行反苏游行。

王世杰于2月18日回到重庆，得知此事后，感到事态严重，曾试图阻止。王在日记中写道：“予日昨返渝，始悉十六日东北人士曾在渝游行，对苏军不撤退及苏军在东北恶行，大肆攻击，散发宣言及传单。于是沙坪坝各学校学生亦有对苏游行示威之酝酿。中共方面于前日发表宣言，谓国军入东北应有限制，中共在东北之武力三十万人应予承认，此亦刺激群众之一大因。本党同志之反对政治协商会议者，亦颇思利用群众此种心理以打击中共，并推翻党派之妥协。政局几走入极严重状态。予电告蒋先生，谓情形严重，盼其急电党中同志，阻止扩大此种政潮，但恐无济于事，予心中十分忧虑。”^①这篇日记对于事情的起因，应该说是讲清楚了。

身为外交部长，王世杰预感此事将严重影响中苏关系，颇为焦急。2月20日，王在外交部约见苏联大使彼得罗夫，意在了

^① 《王世杰日记》1946年2月19日。

解苏方对 16 日反苏游行的反应。王世杰由东北经济合作话题谈起，表示将嘱咐张嘉璈、蒋经国返回长春，继续就经济合作交换意见，意思是中方不会因这件事情断绝与苏方的谈判，同时表示：“非在苏军全撤及东北接收完成后，将不能成立任何最后协议。”谈话中，“苏使对于东北人士十六日之游行，表示抗议”。对此，王世杰表示：“此类事实须从消除此事发生之原因方面去努力。”^①意思是苏方也有责任。

此时，重庆学生即将举行反苏游行的情况已为国民党高层掌握，2月20日，在陈立夫主持下，国民党中央党部就此事召开了一次专门会议，会议决定的原则是：“遵照总裁指示设法劝阻，若不能劝止时，尽量避免发生意外事件。”^②可见蒋已得知此事，并有“劝阻”的指示。

2月21日，在游行即将发生的前一天，由吴铁城主持，中央党部再次会商这一问题。会议决定：“各首长于明日上午八时半齐集中央党部，以便应付一切”^③。当日，吴铁城、张治中、陈立夫联名致电时在杭州的蒋，电称：“沙坪坝学生酝酿对东北问题罢课游行事，党政小组曾两次详加商讨，设法劝止……惟观察现势，劝阻已不可能，因此次运动，为青年民族意识国家观念之自动自发，学校中反共空气之浓厚，出于自然，故只能使其减少反苏成分，及防止不生意外。”^④这表明，国民党对于这场即将发生的游行，对其中的反苏成分略有顾虑，而对其中的反共成分则是放任的。

王世杰在当天日记中再次谈到对此事的看法：“沙坪坝学生

① 《王世杰日记》1946年2月20日。

②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1），第639页。

③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1），第642页。

④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1），第642、643页。

决定明日游行，对苏联及中共示威。予深以今后中苏关系之恶化及政治协商会议工作之推翻为虑。此事之发生，半由青年自然之愤慨，半由于本党某一部分人之支援。予对是否继续担任外交部一事，不能不细加考量。”^①

2月22日，以中央大学、重庆大学为首，重庆20余所大中学校2万余学生举行了反苏反共游行。主要口号有：苏军必须立即退出东北，彻查张莘夫惨案，中共应即爱护祖国，我们不能再蒙受第二次“九一八”的耻辱，所谓“民主联军”不容存在，新疆是中华民国的新疆，苏联应尊重中国领土主权之完整，拥护政府采取强硬外交，打倒新帝国主义，等等，^②并在游行过程中捣毁了《新华日报》营业部。当时在渝的梅贻琦记载：“在道旁立观约三刻始全过去，约有二万余人。”^③

当日，吴铁城、张治中、陈立夫再次联名致电蒋，报告游行情况，电称：“本日沙磁区学生万余人游行，未到国府及苏使馆，但情绪激昂，秩序良好，发表文告尚平正，有质中共书一项，义正辞严，所呼口号除打倒新帝国主义欠妥外，尚无语病。”电称捣毁新华日报营业部一事为普通市民所为。^④

当日，王世杰记载如下：“今日午前，沙坪坝学生一二万人在渝大游行，其口号为要求苏联撤兵，反对中共割裂中国等等。……余于事前曾力请蒋先生电陈立夫等劝止，但党部团部一部分人，不惟未劝止，且或不免暗中鼓励之，故无法阻止学生等出行。此事之影响如何，使人十分焦虑。”当晚，王再次致电蒋，请蒋“即日返渝主持”^⑤。

① 《王世杰日记》1946年2月21日。

② 《中央日报》、《大公报》1946年2月23日，并参见其他材料。

③ 《梅贻琦日记》1946年2月22日。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④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1），第643页。

⑤ 《王世杰日记》1946年2月22日。

反苏反共游行发生后，《中央日报》连续发表社论呐喊助威，称学生的行动“对全世界显示了中国青年纯真的心灵充满着纯真的祖国爱”，“亡国运动者的心灵已经被广大青年群众纯真祖国爱慑服了”^①。

重庆的游行迅速波及全国。2月23日，上海圣约翰等72所大中学校万余学生举行游行，在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前呼喊下列口号：立即撤退东北苏军，我们要求完整接收东北，打倒出卖祖国的任何政党，打倒赤色汉奸，等等。游行队伍尔后来到上海市政府请愿，要求政府采取强硬外交。^②

此后，北平、南京、昆明、郑州等地学生，相继发生游行示威。

继学生游行之后，一大批文化名人卷入此一事件。2月23日，西南联大110位教授联名发表关于东北问题的宣言，要求：“苏联应尽速撤退在我东北驻军，归还一切工厂设备与资源，不得有超出中苏条约范围以外之任何行动或措施。”^③在这份宣言上签名的有：王力、向达、朱自清、吴大猷、余冠英、唐兰、冯友兰、汤用彤、游国恩等。

2月24日，《大公报》发表傅斯年、王云五、宗白华、储安平等20人署名文章，《我们对雅尔达秘密协定的抗议》，称该协议“实为近代外交史上最失道义的一个记录”。文章认为：“苏联在雅尔达会议的要求，完全违反对侵略的法西斯国家共同作战的目的，违反列宁先生与中山先生共同建设的中苏友爱新基础。”“苏联所标揭的是打倒帝国主义，然则今日苏联要求恢复其俄罗斯帝国之权利，又何以自解？”

当日，成都华西、金陵、燕京、齐鲁等大学校长联名致电

① 《中央日报》1946年2月23日。

② 《中央日报》1946年2月24日。

③ 《中央日报》1946年2月27日。

蒋，表示：“希中苏友好条约外不作任何其他让步，敦促苏联早日撤兵……以保我领土主权之完整。”^①

2月25日，《大公报》发表社论《热情与理智》，认为：“近来国人的视线集中在东北问题上，爱国的热情陡然昂扬，这绝对是好现象。”同时认为：“但有捣毁新华日报营业部的事，便大大的不应该。”

3月7日，北平一批文化名人联名发表意见书，表示：“而今苏联在东北之行动与撤兵一再延期，我们不独认为违反中苏条约之规定，且违反自开罗宣言以来种种宣言与宪章，不独违反此次同盟国反侵略战争之目的，而且违反列宁先生放弃帝俄时代对华不平等条约的声明。”“我们不能容忍除中国国民政府以外，在东北与察热及任何地点有任何特殊政权的存在，我们也不能容忍中国政府于相互的履行中苏条约以外再有任何辱国的让步”。^②在这份意见书上签名的有40余位，其中有陈岱孙、顾颉刚、齐思和、翁独健、侯仁之、郑天挺、成舍我、萧一山等。

与此同时，民盟一些人士也卷了进来。2月23日，黄炎培、沈钧儒、张君勱、彭一湖四人，在上海联名发表对东北问题的主张，共四点：“（一）我人主张用全力保护我国一切主权，不能超过中苏友好协约之规定，使权益上有所损害。（二）我人主张应继续要求苏联依照约定撤兵。（三）我人主张东北一切内部纠纷，应依政治方式协商解决。（四）我人对任何方面，反对以中国人打中国人。”^③

反对超过中苏条约，是指经济合作问题，在对苏问题上该主张与当时的舆论是一致的。内部纠纷指国共冲突，在这个问题上

① 《中央日报》1946年2月25日。

②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1），第629页。

③ 黄炎培日记，1946年2月23日。

主张协商解决。表明他们对于民族问题和政治问题是区别对待的。

作为此次游行示威的对立面，苏方与中共亦做出各自的反应。

2月26日，东北苏军参谋长发表声明，解释了苏军延期撤退的原因，表示：“苏军撤出满洲结束的期限，将早于，无论如何也不会迟于美军司令部将美军撤出中国的期限。”^①将苏军的撤退与美军联系起来，是要告诉游行示威者，中国还有其他国家驻军，应与苏军同样撤离中国。

2月27日，苏联大使彼得罗夫向重庆外交部提出抗议，要点为：学生游行系有组织举动，且侮辱苏联最高领导者，中国政府应负责；苏联迟延撤兵，原因不在苏方，乃基于技术上的原因；张莘夫被害系暴徒所为。^②

中共方面对此迅速做出反应，2月23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严重的抗议》，认为：“这是国民党内反动分子有计划的蓄意和阴谋……用排外主义的口号，利用政府尚未宣布对苏交涉真相的时机，煽惑一部分东北同乡进行反苏游行”。^③

2月26日，毛泽东为新华社一篇文稿加写了一段话，认为：“法西斯反动派之所以能够煽动一部分群众参加示威，一半依靠威胁，一半依靠欺骗”；认为是“反革命示威”，“完全是反民族的”。^④

2月25日，中共中央就此事向各中央局做如下指示：“不要一般的反对群众，但应严正的与善意的指出其政治错误，并注意在批评其行动错误时，不要一般的反对请愿示威”。同时指示：

① 薛衔天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 1945~1949》，第66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

② 《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第673页。

③ 《新华日报》1946年2月23日。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90、91页，人民出版社，1996。

“对苏联与东北问题的解释要特别慎重，我们要站在真正的爱国立场上，主张维护中苏两大民族的友谊”。关于张莘夫事件，该指示说是国民党勾结日本人所为。^①

该指示对于反苏游行所涉及的几个具体问题未做正面回答，1949年7月，刘少奇在致苏共中央和斯大林的一份报告中谈及这些，使我们能够得知中共在这些问题上的明确看法。刘说：“在民主党派及学生和工人中，有人提出苏联在旅顺驻兵，蒙古独立及苏联运走东北机器的问题。……我们曾向这些人解释：当我们自己还不能防守自己的海岸时，如果不赞成苏联在旅顺驻兵，那就是对帝国主义的帮助。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问题，我们说：蒙古人民要求独立，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我们应该承认蒙古独立，但蒙古人民共和国如果愿意与中国联合，我们自然欢迎。……关于苏联从东北运走机器设备的问题，我们说：这些机器是日本人的，苏联把这些东西当做胜利品运走，去建设社会主义，免得落在反动派手中以此反对中国人民是完全正确的。”^②

上述论点再次表明，政治是现实的。

反苏游行发生之际，马歇尔适在重庆主持国共整军谈判，这件事看来给马歇尔留下了不良印象。1947年1月，马歇尔发表离华声明，其中说道：“去岁二三月间发生之群众运动，此种运动显系为人煽动者，发生地点距余从事完成谈判工作之地点甚迩”。^③马歇尔的意思是，在整军谈判地点附近煽动游行，是企图破坏谈判。看来，马歇尔对这件事是不赞成的。

① 《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83、84页。

② 中共中央代表团的报告，1949年7月4日。转引自A. M. 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中国》，第114页，新华出版社，2001。

③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3），第264页。

2月24日下午蒋回到重庆。当日，周恩来报告延安：“蒋今日回渝。闻先召见党政要人，令速去掉墙壁上反苏标语、图画。次见张治中，得张报告后，即令张于明（二十五）日签字于整军方案之上，无任何变动。观此，在表面上蒋尚不能撕毁停战协定、政协决议及整军方案”。周还判断：“东北问题仍将为斗争焦点”。^①这就是说，蒋在对苏和对共的态度上，均采取了控制事态发展的态度。

2月25日，蒋在总理纪念周发表讲话，表示：“中苏必须长期合作，吾人必须坚守既定之政策，政治必须忍耐，不可全凭骄矜之气，暴虎冯河之勇。学生游行固属自由，但应有限制”。反苏游行使东北经济合作问题更加尖锐化，因此蒋在这个问题上也更加没有回旋余地。蒋表示：“关于东北经济合作事，正在交涉……在苏军未正式退出东北前，决不有任何决定也。”^②

3月上旬，此一游行示威活动逐渐平息。

全国范围的反苏反共游行示威，这在国民党执政以来是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国民党曾试图借助此一运动，将广大学生导入反共阵营。当年5月4日，五四运动27周年之际，《中央日报》发表社论《“五四”精神之发扬》，将此次游行与五四运动相提并论，并将中共指为曹、陆、章。社论称：“民八的五四运动，是中国青年学生爱国的热烈表现”，“在这运动的二十七年之后，复有今年二月二十二日的学生爱国大游行。两个运动时间距离虽甚长，精神上却是一脉相承，而且可说后者是发扬前者的精神的”。社论称中共“尤甚于曹陆章”，“二二二的青年爱国大运动，正以二十七年前五四时代同样的精神，同样的伟力，对中

^① 《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119页。

^② 唐纵日记，1946年2月25日。《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593页。

国共产党的亡国阴谋……痛加打击”。从后来历史的发展看，国民党的这个企图显然未成功。

反苏反共游行是一次以中国知识阶层为主体的政治事件。如前所述，这个运动的发生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因此，它的直接后果也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它使政协期间全国注目的政治焦点即政府改组问题，转移为东北问题，并使整个政治气氛为之一变。第二，增强了国民党右翼势力的地位。第三，国民党与苏联的关系激剧恶化，从而使蒋介石外交接收东北的计划彻底破灭。

反苏反共游行既是民族问题，又是政治问题，当这两种性质的问题搅和在一起时，是很难截然分开的。一些在多年以后看来属于民族感情的问题，在当时事实上表现为一种政治倾向，此一事件的复杂性就在这里。

本章小结 综上所述，政协会议之后，中国政局骤然呈现相当无序的多向发展的局面。所谓多向发展，就是在国家政体行将剧烈变革的背景下，多种力量、多种矛盾、多种思潮，重新分化，重新组合，通过多种方式表达多种立场。其中，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形成明确的主流，故而产生出这种不确定的多向发展态势。反苏反共游行的爆发与整军方案的签字同时举行，正是多向发展的具体体现。

但是，经过此番短暂而无序的多向发展，问题没有解决但却集中起来，此即两个焦点：第一，政协宪草原则问题；第二，东北问题。在这里，两个焦点问题如何处理，其结果将使不明朗的政局最终明朗起来。

所谓多向发展的另一个意思是，政局的下一步发展具有多种可能。那么，无序的政局将在哪里得到最后澄清呢？两个焦点是得到化解还是形成僵局呢？这一点取决于即将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

第十章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与两个僵局的形成

1月28日，政协会议临近闭幕之际，国民党中央常会与国防最高委员会举行了一次联席会议，议题之一是：“总裁交议召开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第二次全体会议日期”。联席会议决定：“定本年三月一日召集”。^①这就是说，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的日程安排，具有与政协会议相衔接的意思。因为政协会议涉及整个国家政体的改变，因此国民党必须召开一次中央全会，以对政协协议做出回答。

在前述多种矛盾迅速激化的背景下，1946年3月1日至17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六届二中全会。二中全会既然在这个背景下召开，那么，必然将此一时期全部政治、社会、民族矛盾承接过来，集中体现于党内争论之中，最终，导致国民党、蒋介石的内外政策全面后退。由于这段时间蒋的内外政策主要由政学系参与制订并执行，因此从现象上看，二中全会主要表现为CC集团对政学系的攻击，而从实质上讲，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对蒋的不满。

一 二中全会开幕与主题辩论

出席二中全会的中央执行委员194人，监察委员75人，共

^① 《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会议记录》第8册，第35页。

269人。全会主席团委员11人，他们是于右任、居正、戴传贤、陈果夫、孙科、陈诚、何应钦、邹鲁、陈立夫、白崇禧、张道藩。

二中全会共安排了10余个大会报告，内容涉及党务、军事、财政、外交、救济、政协、交通、粮食、新疆问题、东北问题等等，然而与会者对这些面面俱到的报告似乎没有兴趣。2月27日晚，吴铁城、张治中、陈立夫三人，约请党内二三十人商讨二中全会会议事日程，与会者“僉主废除各部官样报告书，而提出几个重要问题彻底检讨，切实解决。”^①事后看，官样报告并未取消，但全会的主题实际上集中为三个：政协会议、中苏条约、东北问题，并在三个问题的讨论中，掀起三次浪潮。

3月5日，王世杰做外交报告，历时一个半小时。这个报告确为一“官样报告”，内容松散，没有重点，从联合国到越南撤军，无所不包，而对于人们关注的焦点，即中苏条约和苏军撤离东北问题，只是简略地交待了事情的经过，未做任何实质性检讨。最后，王表示：“本人深望双方同本亲善友好精神，使苏军撤退问题迅速解决。”^②王还表示：“对于维护国家权益与维护中苏亲善两事具有同等之决心。”^③

王世杰的报告与当时的党内情绪显然不合拍。在接下来的大会发言中，邹鲁、白崇禧、王正廷、宋宜山、胡秋原、谷正鼎等人，“均指陈秘密外交之错误”，“全场情绪悲愤激昂，邹鲁、白崇禧、王正廷等发言时，屡为热烈之掌声所中断。”^④这里所说的“秘密外交”，是指雅尔塔密约。

张嘉璈日记载：“报告毕后，起立质问、指摘者甚多。甚至

① 唐纵日记，1946年2月27日。《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593、594页。

② 《中央日报》1946年3月6日。

③ 《王世杰日记》1946年3月5日。

④ 《中央日报》1946年3月6日。

有人主张修改中苏协定。”^①王世杰日记记载：“予今日午后在二中全会作外交报告。……报告后，邹海滨、白崇禧、王正廷、齐世英、张道藩、黄宇人、任卓宣（即叶青）、胡秋原、胡健中等，均以激烈攻击之语调，指责予之外交软弱，或主张将中苏争执（东北问题）提付国际会议。萧铮在会场发言，主张罢免外交部长。”^②

3月6日上午，二中全会继续辩论外交报告。据报道：“各委员发言极为踊跃，情绪热烈激昂，为历次大会所鲜见。”^③这天上午共有16人口头发言，4人书面发言。发言者“对于中苏条约，纷纷反对。有人主张应提交安全理事会。亦有谓应要求苏联修改。……刘健群谓，我方应抱定主权与领土完整立场，对苏上天讨价，落地还钱。谷正纲谓，应发动民众运动。萧铮谓应请求总裁罢免外交部长，或劝告辞职。”^④这是萧铮第二次要求罢免王世杰。

在3月6日的发言中，有人向王世杰提出一个问题：“旅顺、大连二港，莫洛托夫谓为增加新领土之语，外交部为何不抗议？”^⑤

这件事的由来是这样的：1945年11月中旬，《大公报》、《新华日报》等，连载由苏联塔斯社转发的莫洛托夫在十月革命节所做长篇外交报告，其中强调“必须注意到已经成为苏联的一部分的新的领土”，在这段讲话中，莫洛托夫首先谈到欧洲地区的新领土，最后谈到远东地区，他把“满洲南部旅顺港区

① 张嘉璈日记，1946年3月5日。《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第677页。

② 《王世杰日记》1946年3月5日。

③ 《中央日报》1946年3月7日。

④ 张嘉璈日记，1946年3月6日。《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第677、678页。

⑤ 唐纵日记，1946年3月6日。《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596页。

域和大连区域”与其他一些地区一概称做“这些都是新的苏维埃领土”^①。

黄炎培阅报后认为此言有违中苏条约，随即致函王世杰、宋子文，认为对此应有所表示。尔后，1945年12月7日，黄炎培在国民参政会就此事向王世杰提出质询，王答：“已由《大公报》向苏联大使馆问译文有无错误。”^②或许王世杰并不看重此事，但黄炎培却紧追不放，1946年1月21日，黄炎培偕傅斯年在参政会联名提出议案，要求政府查询此事。^③

看来，此事最终还是没有结果，因此在二中全会上有人再次提出这一问题。

3月7日，外交报告审查会议开会时，王正廷、任卓宣等提出外交责任问题，也就是要追究王世杰的外交责任。王表示：“自去岁八月予就任外交部长至今，一切外交政策与措施，其责任均属于我，因为予所执行之政策，均为予所提议或赞同之政策，至于成败得失则此时尚非定论之时。”最后，王表示：“如果国家利益需要予辞职，予决不多留一日。”其实，3月6日晚，王已向蒋提出辞职，但“蒋先生不允”^④。

中苏条约于1945年8月24日由国民党中常会、国防最高委员会、立法院、国民参政会通过，并在签约之前也征求过邹鲁等元老的意见。这个条约的签署是以“交换”为基础的，即以外蒙的独立交换苏联不支持中共并将东北交给国民党，然而交换的结果却是既失外蒙，又未得到东北，有失无得，因而引起国民党对该条约大为不满。

① 《大公报》1945年11月15日。

② 黄炎培日记，1945年12月7日。

③ 黄炎培日记，1946年1月21日。

④ 《王世杰日记》1946年3月8、6日。

另一方面，中苏条约是在苏军已经进入东北的情况下仓促签署的，一些细节问题未及考虑。唐纵在3月6日的发言中说：“当中苏友好条约签订时，为何不同时签订中苏保障外蒙独立与双方不准驻军之条约？现则我无权驻兵而苏联则可驻兵外蒙了。”^①在这些问题上的不满，说到底，都是由东北问题引出的连锁反应。

对于苏联问题也有部分人士持不同见解。张群对顾维钧说：“由于美国对我国半心半意态度，他赞同对莫斯科采取一项稳妥的政策。”顾维钧的意见与张群相同，他们都认为美国是靠不住的，因而不能指望依恃美国而抗衡苏联。顾对王世杰说：“我们必须首先考虑我们自己的安全，并不应追随美国的坚决反苏政策。美苏两国之间，可以直言不讳，或者以牙还牙，打击报复直至战争的边缘，但是中国所处地位，不允许这样做。这样做的话，首先遭殃的将是我们。”^②抗战初期美国也曾声称同情中国，但口惠而实不至，结果是中国只能单独抗击日本。这一点给人们留下了较深的教训。顾维钧就任驻美大使后，在与美国人谈到中国的对苏外交时认为：“我国必须审慎从事，否则难免重蹈抗日战争孤立抗拒强邻的覆辙。”^③如前所述，这个看法与王世杰是一致的。

总之，在中苏关系和中苏条约问题上，形成两派尖锐对立的意见。3月8日，外交报告审查委员会在讨论中苏条约时，“王正廷、刘文岛、任卓宣等反对中苏协定，邵力子等拥护中苏协定，各抒所见，辩论至深夜一时。”^④

① 唐纵日记，1946年3月6日。《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596页。

② 《顾维钧回忆录》第5册，第665、695页。

③ 《顾维钧回忆录》第6册，第23页。

④ 唐纵日记，1946年3月8日。《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597页。

中苏条约问题，是一个极易引起人们的民族情绪的问题，然而问题是国民党在对苏外交上几乎无牌可出。因此，二中全会就此问题的辩论，主要是一种情绪的宣泄，并不能采取任何实际措施。

3月7日，孙科在二中全会第8次大会上做政协会议报告，历时1小时45分。政协问题主要是宪草原则问题。此刻孙科在党内处境十分困难，孙科曾考虑到政协协议是经全体通过的，一度不愿修改。二中全会之前，在蒋介石召集五院院长及党内前辈的一次会议上，当蒋介石做出国民大会必须为有形组织、中央政制应保持五权制、地方政制以县为单位的修改意见之后，与会各专家又根据国父遗教发表了意见，而孙科未予附和，而是“不欲作结论”，仅表示：“协商决议，彼此曾郑重起立表决。”^①意即国民党不应食言。

在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孙科对几个关键问题的意见仍是含糊的。孙在报告中说：“国民大会应否为有形之国民大会，立法院对行政院不信任，及地方制度上之省宪等问题，各党派方面虽有表示仍愿维持协商决定之修正原则，但并非认为绝对不能讨论。”^②孙科采用了与各党派商讨修改的语气，而未做单方面强行修改的决定。

然而在孙科报告之后的辩论便不同了，众多发言者表示：“五权宪法为国父遗教，不容率予变更，‘宪草修改原则’必须设法纠正”；“国民大会应发挥民主精神，不应约束其权力”；“鉴于三权分立之缺点及多党内阁制之流弊，今后我国应采用五

^① 唐纵日记，1946年2月23日。《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593页。

^② 《中央日报》1946年3月8日。

院制、总统制”。^①其口气是不容商讨的。谷正纲在政协闭幕之际便强烈反对宪草原则，并已为此有过一次“流泪”，在当天的发言中，谷正纲再一次“慷慨陈词，垂泣而道”^②。

此外，国民党出席政协会议的代表也成为攻击目标，“且有主张惩处国民党出席政协会议代表者。”^③对政协代表不满的原因是，“此次政治协商，本党中央并未作任何决策，本党八个代表，也没有一个共同的方案。某些代表不惜牺牲本党的立场以谋与共产党达成妥协，借此维持其既得的权位。此种‘走私’勾当，再不能这样继续发展下去了。”^④

尽管国民党一再声称其总统制采自美国制，但司徒雷登后来在给美国国务院的一份报告中认为，国民党的总统制，“总统被赋予至高权力，并无类似美国政府有关监察和制衡权力的约束”。^⑤这就是说，美国人并不认为国民党的总统制与美国的总统制是一回事。

东北问题既是国共军事冲突的焦点，又是国、苏矛盾的焦点，因此东北问题在二中全会上是一个极为棘手的问题。

东北问题报告本应由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做，但熊未出席二中全会，于是蒋指定张嘉璈做东北经济报告，军令部次长刘斐做东北军事报告。

二中全会开幕之日，张嘉璈即预感到东北问题将引起党内政潮，他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晨九时，二中全会开幕，于是东北

① 《中央日报》1946年3月8日。

② 唐纵日记，1946年3月7日。《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597页。

③ 张嘉璈日记，1946年3月7日。《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第679页。

④ 程思远：《政坛回忆》，第173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

⑤ 肯尼斯·雷等编《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第2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

问题自中苏纠缠，美国空言仗义，中共无理要求，国家主义派之反苏反共，将进而入于党内政争。完全表露弱国外交无不引起国内政潮。”^①

大约考虑到东北问题将引起极大争论而难以控制，蒋曾考虑取消东北报告。张嘉璈日记3月6日载：“晚蒋主席约晚饭，商议余应否作东北报告。岳军主张不必报告，主席亦同意。”也就是说，张群和蒋试图将东北问题绕过二中全会。

然而东北问题此刻正处于矛盾的中心，因此蒋的这一企图不可能被接受。3月12日，齐世英等一批东北籍委员找到张嘉璈，表示：“反对熊主任已达表面化之程度，原拟俟熊到会予以难堪，今熊未来出席，但非大会报告不可。”^②这样，东北问题是绕不过去了。

3月14日，刘斐与张嘉璈先后在二中全会做东北军事与经济报告，一台闹剧也随之开场。张嘉璈记载：“报告时，即有请愿团在场外叫喊。主席团推陈诚、陈立夫两委员出去应付。余报告毕时，陈诚上台报告请愿团对于东北问题之要求，以及对熊主任之种种攻击。其中有熊曾由长春运出行李一百五十件……显示对人作用，且有组织之动作。”^③王世杰翌日记载：“日昨外间有人向二中全会请愿罢免熊式辉，亦为党中一部分人所指使。此种作法显示党中纪律之恶化。”^④张、王均认为此事为有人指使的、有组织的行动，不过更为严重的事情还在后面。

顾维钧是东北报告审查委员会召集人之一，据顾记载，该

① 张嘉璈日记，1946年3月1日。《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第675页。

② 张嘉璈日记，1946年3月12日。《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第683页。

③ 张嘉璈日记，1946年3月14日。《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第685页。

④ 《王世杰日记》1946年3月15日。

委员会对熊式辉“作了猛烈抨击”，指责熊遇事不与东北地方人士磋商，压制国民党和三青团在东北的活动，等等。该委员会还要求将中共在东北活动的责任正式诿诸苏联政府。发言人主要是一批元老，有钮永建、于学忠、沈鸿烈、张继、孙越崎等。^①最后，在该委员会的审查报告中，正式提出撤换熊式辉等等要求。

张嘉璈也记载了此事，他写道：“东北问题审查会，决议应撤换熊主任，取消政务、经济两委员会，停止地方交涉。一篇对人攻击，对事高调而已。”^②

二中全会在三个主题上的争论，表明国民党内的不满情绪相当普遍、相当严重。这种对于中枢决策的严重的意见分歧，自抗战后期蒋的独裁地位稳固以来，还是第一次。一党训政的大权行将旁落，必然给国民党带来政治危机感；东北接收受阻，必然迁怒于苏联和中共。因此，以上局面的产生也是必然的。问题在于，上述焦点问题能否得到化解。

二 国共就两个焦点问题的磋商

3月15日，宪草审议委员会与政协综合小组举行联席会议，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国民党代表孙科、邵力子，民盟代表张君勱、罗隆基等出席会议。

鉴于国民党二中全会对政协宪草案的强烈不满，联席会议对政协宪草原则做出三点修改：第一，国民大会仍为有形之国民大会；第二，立法院对行政院的不信任权，以及行政院对立法院的

^① 《顾维钧回忆录》第5册，第666、667页。

^② 张嘉璈日记，1946年3月15日。《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第687页。

解散之权，予以取消；第三，省得制定省宪改为省得制定省自治法。^①

联席会议开会时，民盟人士曾对周恩来表示：宪草审议会只能根据宪草原则起草宪法条文，根本无权讨论宪草原则问题，最好堵住国民党，不让它开口。周恩来表示还是让他们说。参加此次会议的国民党代表孙科、邵力子等在二中全会正遭猛烈攻击，孙、邵二人的处境十分困难，因而希望中共能在宪草问题上做出一定的让步。会议休息时，周恩来将宪草案的导演者张君勱拉到一旁商量，张说：不能让步，要及早堵住才好。周说：政治是现实的事情，走不通就得设法转寰，不能因此牵动大局。张最终表示同意让步。^②

另据当时参加该会议的民盟代表罗隆基回忆，上述修改“由共产党代表团周恩来建议”。^③

周恩来此次让步的原因大约有三点：

3月18日，周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为了减少国民党内主张民主和平团结统一的人士在其党内所遇到的困难”。^④也就是考虑到孙科、邵力子等人的困难处境，给孙、邵等减少困难。

4月22日，周对马歇尔说：“在你走后的三月十五日，为了使国民党二中全会可以比较顺利地接受政协的观点，我们同意对政协的决议在形式上做三点修改，我们对国民党的提议做了某些让步，其目的便是为了使政协的决定可以实施，使二中全会不致提出许多麻烦。”^⑤这表明，周是把二中全会的强烈情绪考虑进来的，希望通过局部的让步减轻阻力，避免更多的政协协议被推翻。

① 《新华日报》1946年3月16日。

② 《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904页。

③ 《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上卷，第724页。

④ 《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148页。

⑤ 《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252页。

当年11月21日，周恩来在延安的一次会议上谈及此事时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作了一个错误，以为是形式问题而鲁莽地让步。”^①这就是说，周认为此举仅是一个形式问题，而非实质性问题。

归结起来，减少国民党内民主派的困难，减少二中全会的麻烦，仅为一个形式问题，此即周恩来做出让步的三点考虑。

国民党在政协会议之后的政治倾向，特别是六届二中全会的倾向，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3月15日，毛在政治局会议上说：“蒋介石的主张有两条：第一条，对一切革命党全部消灭之；第二条，即如一时不能消灭，则暂时保留，以待将来消灭之。”“蒋介石的两条，第一条很清楚，第二条是人们容易忘记的，稍为平静一点就忘了。二月一日到九日就忘了，较场口事件以后就不忘记了。马歇尔能放长线，蒋介石也较何应钦不同。假如有一个放长线的，放半年我们就会忘了，那就危险得很。”^②

2月1日至9日，正是中共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之时，毛所指的主要是这件事。这表明，延安对于国民党再度警觉起来。为此，延安反对修改政协宪草原则。

3月16日，延安致电重庆中共代表团，指出：“国民党内反动派，以至蒋介石，都不喜欢政协决议，企图推翻。但正面推翻丧失信用过大，想采用迂回办法来推翻，即首先推翻宪草原则，只要宪草原则推翻，成立独裁政府，则国大改组政府纲领、整军等决议，势必成为具文，全部推翻。因此你们必须十分警惕。”为此，延安指示：“你们应即强调政协决议每一条每一句均必须实现，反对修改，特别对于宪草原则反对作任何修改。国民党方

^① 《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696页。

^②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61页。

面提出修改宪草原则及其他决议的任何主张，均必须予以痛驳”。^①该电为刘少奇起草。^②

该电发出之后，延安方面仍觉意犹未尽，3月18日，延安再电中共重庆代表团：“十五日所决定的修正宪草原则三点，我们仍深感不妥，因为这动摇了议会制、内阁制及省之自治地位”，要求“必须迅速加以挽救”。^③

根据延安指示，3月18日，周恩来在重庆举行记者招待会，表示：“我觉得政协的一切决议不能动摇或修改，这是由五方面代表起立通过的，应成为中国的民主契约。”^④

综上所述，围绕政协宪草原则的修改与反修改，国共两党形成新一轮政治对抗。

二中全会期间国共进行的另一磋商即东北问题。此前，国民党一直以外交问题为名，拒绝就此问题与中共谈判。为此，中共一再提议将东北问题分作外交与内政两个问题，以期分别解决。

3月4日，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一同飞抵延安。在当天与马歇尔的会谈中，关于东北问题，毛泽东说：内政和外交应分开，外交目前应由政府与苏联直接商办；内政应停止冲突后整军。^⑤

此时，为结束东北的国共冲突，国、共、美三方同意向东北派出军调部执行小组，就地监督停战。3月10日，马歇尔向周恩来转达了蒋的五项条件：第一，执行小组只管军事不管政治；第二，执行小组随政府军行动；第三，凡中共与政府军有冲突的地区，执行小组都可以去；第四，政府军可占领一切为恢复主权

① 《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86、87页。

② 《刘少奇年谱》下卷，第27页。

③ 《刘少奇年谱》下卷，第29页。

④ 《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152页。

⑤ 《周恩来年谱》，第649页。

所必须的地方，有权接收沿长春路两侧三十公里内的主权，这些地区的中共军应撤出；第五，中共军撤出矿区、铁路。对此，周恩来表示：蒋的五条，实质是其军队可以接受一切地区，要中共军队从任何地方都撤出。^①

蒋同意执行小组前往东北，等于承认了东北问题内政性质的一面。要求执行小组只管军事不管政治，实质是拒绝中共关于东北的政治要求。执行小组只随政府军行动，实质是否认中共的地位。

当晚，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重庆代表团会议，会议认为：东北问题必须军事与政治一道解决。因执行小组有美方人员参加，而东北又是苏军的势力范围，会后周恩来致电延安，认为：“我们估计蒋企图以此挑起美苏冲突，不愿现在解决东北问题。”^②也就是说，蒋的意图是以此名义将美国引入东北，从而引起美苏冲突。

正当东北问题的磋商继续进行之际，3月8日，马歇尔忽接杜鲁门来电，命其立即返美，马歇尔遂于3月11日返美，而在马歇尔走后第二天，东北局势骤然发生剧烈变动。

自2月1日苏军撤离东北的限期届满之后，重庆外交部并未向苏方提出撤军的正式照会，甚至反苏游行发生之后仍未提出正式照会。2月25日，王世杰在国防最高委员会做外交报告时称：“我方已三次询问苏军撤兵情形，苏联大使均无答复。”^③可见只是询问而无照会。

3月6日，王世杰忽以外交部长名义正式照会苏联大使，要

^① 《周恩来年谱》，第650页。

^② 《周恩来年谱》，第650页。

^③ 《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会议记录》第8册，第80页。

求苏联立即撤军。从王世杰日记看，此举并非迫于二中全会压力，而是基于一个国际动向。王在当天日记中这样写道：“今日午后予以外交部部长名义，致正式照会于苏联大使，促苏联即行撤兵。蒋先生尚拟缓发此照会，予因恐未来局势或使我政府不能诉诸国际会议，故断然决定发出，但仍未在报纸发表。”^①

王世杰所说国际会议，指联合国安理会即将开会讨论伊朗提出的苏军在伊不撤军问题。为此，王世杰决定在安理会会议之前向苏方提出此一正式照会，其意图是准备于必要时与伊朗共同向安理会提出此一问题。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东北苏军忽然出现新动向。3月9日，王世杰接获情报：“苏军之在沈阳者突然奉令撤退。”^② 3月12日，苏军退出沈阳，但整个撤军行动“事前未通知我方，仅于撤退将完之时，口头与我方接洽。”由于对苏军的行动安排一无所知，王判断：“其撤退之队伍，大部分似乎仍将暂留长春、哈尔滨等地。”^③

苏军此次撤退，通常认为是迫于反苏游行的压力，但王世杰的看法是这样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行将集会，伊朗亦将以苏军不自伊境撤退之事实提出控诉，苏方似惧我方提出相似之控诉。”^④

由于国民党军早已推进至沈阳附近，因此于3月13日迅速进占沈阳。

苏军的撤离，改变了东北原有的国、共、苏三角格局，国共

① 《王世杰日记》1946年3月6日。

② 《王世杰日记》1946年3月9日。

③ 《王世杰日记》1946年3月12日。

④ 《王世杰日记》1946年3月23日。

两军均从苏军的背影下走出来，处在了直接对峙的局面。3月15日，中共政治局会议指出：“苏军已从沈阳及其附近撤退，国共两军在东北的冲突即将展开。”^① 东北局势骤然紧张起来。

由于对苏军的撤退安排一无所知，并且已不可能得到苏军的协助，国民党方面顿时紧张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只得改变长期不与中共谈判的惯例，转而要求与中共谈判。对此，刘少奇判断：苏军不告诉国民党是否全撤，如全撤国民党接不赢，所以急于要谈判。^② 这个判断是准确的。

3月13日（元日），刘少奇指示重庆中共代表团：“在谈判中，你们现在可以承认在停战条件下国军可以接收沈阳至哈尔滨之长春路上各城市（路两旁不在内）。至于政府军以后再进驻哪些地区和我军须从哪些地区撤退，须待政治问题解决及我军驻防区确定”。“但我们内心的盘子，长春路的主要部分（即沈阳至哈尔滨）及抚顺、鞍山、本溪、营口、辽阳等数地，是要让给国民党的。但此种让步须有交换条件”。刘少奇还提议：周恩来回延安一次，住四五天然后返渝，蒋介石急欲解决东北问题，我倒可以不急，迟几天无不利之处。^③ 刘少奇的这份元电表明，中共本来是打算将长春路让给国民党的，但必须有交换条件。

张治中最初没有出席二中全会，而是与周恩来、马歇尔一同到华北、西北视察停战情况。3月11日，张治中向二中全会做了新疆问题报告，尔后奉蒋之命，与周恩来磋商东北问题。

3月16日，周恩来致电延安：“今晚以中央元午电示与张治中作长谈，说明我军在东北所占地方，目前决不能让，而且要等待政治解决。张治中谅解情况，承认我军地位……经多次磋商

① 《刘少奇年谱》下卷，第26页。

② 《刘少奇年谱》下卷，第26、27页。

③ 《刘少奇年谱》下卷，第26页。

后，提出下列三项：（甲、乙、丙三项上次电告，不改）

丁．政府接收东北主权，有权派兵进驻苏军现时撤退之地区，包括长春铁路线两侧各三十里在内。

戊．现时中共部队驻在地区，政府军队如须进驻，应经过商定行之。

己．以后东北驻军地区，以整军方案另订之。”

周恩来对上述几条做了解释：“根据丁项，政府只能进驻现时苏军撤退地区，即沈阳、长春以及抚顺地区。”“张治中要求不提现时二字，我说如无此二字，即无时限，不可能有妥协。”现时二字的意思是，非苏军现时撤退区，即中共从前占领区，国民党军便无权进占。周对蒋的判断是：“对于东北目前只想占多少算多少。”^①

从周电看，周与张的这个初步协议共有6条，前3条甲乙丙内容不详。

然而就在周、张初步协议达成之际，二中全会在东北问题的辩论上爆发强烈不满情绪，显然是受到这一态势的牵制，周、张的这个初步协议最后并未签署。

综上所述，二中全会期间，国共在两个焦点问题上的磋商没有取得任何结果。

三 二中全会期间的蒋介石

蒋介石本人在二中全会的处境是十分被动的。二中全会关于三个主题的辩论，其矛头实际上是指向蒋的政策的，怎样解决严重的党内分歧，此即蒋在二中全会期间面临的主要问题。

蒋在二中全会上共有6次讲话，除去首尾的开、闭幕词，其

^① 《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137、138页。

余4次都是重申他的既定政策，并力图控制会议秩序。

3月4日，蒋在二中全会纪念周发表讲话，针对会议的不满情绪，蒋这样说：“现在本党一般同志，有两种很普通的心理，一种心理认为本党领导全国，经过八年的抗战，已经成为四强之一，但到现在还要受外国人的支配和操纵……另一种心理认为自从总理领导本党革命已经五十二年，本党同志前仆后继，牺牲奋斗，为我国取消了不平等条约，获得了抗战最后的胜利，但现在还要受各党各派来处分”。

外国人指美国，因为政协会议是以美国为背景召开的，由于对政协不满，因而对美国的“支配”亦不满。蒋所说的这种普遍心理，实际上就是国民党打下的天下，不容他人“支配”和“处分”。

蒋对以上两种情绪分别做了说明，蒋认为二次大战之后，国际社会的影响，“不仅影响到每一个国家的外交，而且可以影响到每一个国家的内政”，因此，中国“自然也要受到国际的影响”。这是蒋对于外国人“支配”的说明。关于各党派的“处分”，蒋说：“我们召集政治协商会议，乃是鉴于国家不堪纷扰，人民渴望和平与安定，更为了实践我们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的夙愿。所以这个措施完全是出于自动的，不是被动的；是根据我们的政策和目的，而不是任人处分的。”

把政协的召开解释为“自动”的措施，当然是自欺欺人了；不过蒋的上述解释，其用意是遏制右翼的不满情绪。

在对右翼情绪做出一定的遏制之后，蒋也做出一定让步。关于政协宪草原则，蒋说：“政治协商会议所决定的修改宪草原则，有若干点实在与五权宪法的精神相违背，这不仅各位已经感觉到，我个人也有同样的感觉。”推倒政协宪草原则的主要根据是五权宪法，而要使五权宪法具有神圣的不可更动的地位，便必须与三民主义联系起来。因此，蒋接下来着重阐述三民主义与五

权宪法的关系，蒋说：“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绝对不能分离，我们总理一说到三民主义时，就常常提到五权宪法。有些人说：只要大家承认了三民主义，对于五权宪法，不妨变通一点……这个说法实在是错误的”。“要是三民主义离开了五权宪法，三民主义怎么还能具体实现呢？离开了五权宪法而谈三民主义，那就不是真正的三民主义了。”

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的关系应做怎样的解释，那是另一个问题，而蒋的上述解释其逻辑是这样的：坚持三民主义，便必须坚持五权宪法；而坚持五权宪法，则必须修改政协宪草原则。总之，三民主义成为国民党修改政协宪草原则的“合法根据”。

对右翼情绪的一压一让，无非是一种政治的平衡术。最后，鉴于二中全会对国民党的政协代表攻击甚烈，蒋出面分担了责任。他说：“政治协商会议是本席负责召集的……这必须由我负责，而不必责备本党的代表”。^①

然而，在蒋3月4日讲话之后，二中全会的情绪不仅未得到控制，反而更加激动起来，于是3月11日、12日，蒋连续两度出面讲话，以求控制秩序。

在3月11日讲话中，蒋再次为国民党政协代表辩护。蒋说：“这一次政治协商会议的召集，原是我根据目前国内外的形势而决定的政策，我们党内的八位代表不过是根据既定的政策，折冲奋斗而已。而现在全会就加以种种的责难，甚至于指为‘容共’‘掬共’！试问我们将这种罪名加于自己的同志，是不是令人寒心？”

蒋对批评者做了反批评，他说：“一见到自己的同志在和各党各派谈判联络，就发生误会，叫出过激的口号……那以后还有什么人肯来担负这个谈判联络的责任？古人说：‘怠者不能修，

^① 以上均见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1，第262~267页。

忌者畏人修’，我们革命党员，决不能流于这种恶习。”

蒋最后说：“这次政治协商会议的召集，完全由我负责，你们不能责备负责政协的八位代表。你们如果一定要责备他们，就不如直接来责备我。至于政治协商会议对‘五五’宪草修正的原则，违反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与党纲的地方，我们自然不能接受”。^①

蒋的讲话效果如何呢？王世杰在日记中写道：“蒋先生鉴于党中一部分幼稚自私之分子，在二中全会肆意攻击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之人，于今晨二中全会纪念周中指责彼等缺乏党德，并以互信自信之语责其改过。但蒋先生之言似不能使彼等改变其态度。”^②王世杰已看出蒋不能控制会议情绪了。

3月12日，蒋又在总理逝世21周年纪念会上发表讲话。蒋说：“半年以来，许多同志对国事愤愤不平，多主张用武力扫除革命的障碍……然而我们试一考察国际形势的变化，社会经济的穷困，与人民生活的痛苦，便不能不承认武力压倒一切的计划，决不能采用。”蒋对这一点展开论述道：“有些同志的脑筋中，总以为政权和武力既然操于我们的手中，我们何妨用宪兵警察来做后盾……完全依赖既得的政权和武力来解决一切问题，是最卑劣的手段。一个伟大的革命政党，决不愿采取这种手段的。”“比方去年昆明的学潮，有几位同志，忠实勇敢，工作努力，固然可嘉。但不讲技术，不讲方法，只知用武力对付，一味蛮干，真是连十二岁的小孩都不如！”^③去年昆明学潮指一二一运动。

蒋对会议的控制，使政协协议总体上未被二中全会推翻，但宪草原则不在此列。3月14日，《中央日报》发表社论《宪法的最低原则》，其中写道：“我们宪法的最低原则是什么？我们的

① 《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1，第268~272页。

② 《王世杰日记》1946年3月11日。

③ 《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1，第274~276页。

宪法断断不该化一个中国为多数外国！因此我们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联省自治论。我们的宪法如果采取中国共产党的联省自治论，我们敢百分之百的断定，宪法颁行之日，就是中国解散之时。”^① 这些论点所针对的即宪草原则的省宪问题。

3月16日，二中全会举行全体大会，各项报告将在这次大会上表决通报，因此是二中全会开幕以来最为紧张的一天。蒋出席了这天的会议，蒋与对立意见之间几乎形成摊牌的局面。

张嘉璈记载：“今日蒋主席自己出席全会。先讨论政协议案，结果对于该案无异议通过。宪法审查案，交常会。外交审查案，亦无修改，通过。”可以看出，二中全会三大主题中的政协与外交两案，较为顺利地通过。

最为关键的是东北问题报告，对此，蒋“亲自加以说明，谓：对于苏联只有遵守中苏条约，经外交途径解决。为世界、为中国，均应求得和平。至熊主任等办事，一切均遵守中央指示办理，应由彼（按：指蒋）个人负责。此案应交常会，由彼个人领导处理。”^②

如前所述，东北问题审查委员会曾形成一个审查报告，其中包括对苏联提出抗议并撤换熊式辉等等。考虑到如将该报告提交全会表决，很有可能被通过，于是蒋采取了一项非常措施，直接宣布该案交中常会和蒋个人负责处理，也就是不由二中全会表决，等于剥夺了二中全会的表决权。

最后，蒋对全体与会者严厉地问道：“你们信任不信任我？”“你们对我是否有信心？”“对我有信心的人请站起来”^③。结果

① 《中央日报》1946年3月14日。

② 张嘉璈日记，1946年3月16日。《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第688页。

③ 《顾维钧回忆录》第5册，第669页。

是全体起立对蒋表示信任，而邹鲁等 20 余人为了避免表决，退出会场。

蒋要求二中全会对其做信任表决，等于表明他遇到了一次信任危机，这个表决实际上是蒋与对立意见之间的摊牌。

蒋的个人权威尽管对全会的不满情绪有所压制，但全会的这种情绪也必然对蒋形成政治牵制。正是在这种情绪的牵制下，周恩来与张治中当天达成的东北问题的初步协议，最终未能签署。

四 二中全会与国民党内部力量的变化

1945 年 3 月，邹鲁曾对顾维钧说：“孙中山在世时，党员在会议上有同他辩论的自由。孙从善如流……但现在党内开会时很少讨论或者根本就不讨论，参加会议的人只是对委员长的决定或行动一概通过如仪。”^① 这就是说，国民党内早已有人对蒋的独裁作风不满，当蒋的内外政策被认为是失败的情况下，这种情绪便会进一步发展，二中全会体现了这一点。

此时，国民党内一批少壮派对党内旧有作风不满，形成了一个“革新派”^②，主要口号是要求党内民主，全会期间还成立了一个“革新运动座谈会”。3 月 2 日，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在二中全会头一个做党务报告，尔后在讨论这一报告时，“发言者多系愤激语，痛骂官僚主义，并强调党政革新，党内民主要求。”^③ 要求党内民主，此一矛头当然是指向蒋介石的独裁作风的。唐纵当即明白：“大家的心理是不满意总裁而向总裁要

① 《顾维钧回忆录》第 5 册，第 479 页。

② 革新派是一个松散群体，其活跃人物有刘健群、倪文亚等。他们一方面要求党内民主，反对官僚主义；另一方面坚决反苏反共。

③ 唐纵日记，1946 年 3 月 2 日。《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 595 页。

民主的。”为维护蒋，3日晚，陈诚出面约刘健群、倪文亚等谈话，“劝大家不可动摇领袖的威信”^①。

革新派当然不能动摇蒋的地位，但革新派的言论与活动，却使二中全会的气氛更加紧张，屡屡出现相当激烈的场面。

唐纵倾向革新派，他对二中全会的描述是这样的：“全场中打倒官僚主义的口号压倒了一切，要求民主，要求革新的空气，笼罩了一切。”“要求清算责任，要求辞职，这是党开新纪录壮烈的检讨！”^②唐纵将二中全会中上述要求称做“开新纪录”。是否是“新纪录”姑且不论，但至少很长一段时间未出现过这种情况了。

由于上述情况的出现，二中全会从始至终火药味十足，充斥着政治攻击和人身攻击。被攻击者主要是主持与中共谈判、主持对苏联交涉和主持东北事务的一批当事人，有宋子文、孙科、张治中、张群等，而以王世杰、熊式辉为主要攻击对象。

3月8日下午，二中全会第10次大会安排宋子文做政治报告，或许为躲避攻击，“下午宋子文未至，为全会所不满，电话召其至会，聆取批评，责难备至！”宋在答辩时，“甚愤慨，其手发抖！”因对财政经济状况不满，也有人要求宋子文和经济部长翁文灏辞职。

陈布雷主持起草的全会宣言，因提及和平建国的主张，“黄宇人于大会指宣言文字不妥，布雷先生至为愤慨！”^③

与众多的当事者备受攻击相反，CC及右翼分子则嬉笑怒骂十分活跃。刘健群在会上说：“有办法拿出来，没有办法说出

① 唐纵日记，1946年3月3日。《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595、596页。

② 唐纵1946年3月16日反省录。《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599页。

③ 以上均见唐纵日记，1946年3月8、5、17日。《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597、596、600页。

来，干得了挑起来，干不了放下来。”颇有几分幸灾乐祸。

二中全会上的这种人身攻击现象，引起一些人不安。3月10日，何应钦、吴铁城、陈诚、陈立夫、张治中等，“在中央党部宴请党内中级干部数十人，劝大家不要责难太过。”^①

在经过以上一番攻击、诋毁之后，二中全会进行最后一项议程，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常会。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的选举，向由总裁提名，大会通过如仪，然而这一回二中全会既然要求革新，“向总裁要民主”，因此，惯例不能继续下去了。

3月13日晚，蒋介石约集二中全会主席团成员，以及参加政协会议的国民党代表，共同商讨中常会选举问题。在这个会议上，“张道藩等坚持中央常会必须以选举方法产生，不由总裁提出候选人。”张道藩为CC重要分子，这个意见可以说代表了CC的意见。CC派之所以提出这种选举方式，因为CC长期掌握党务，此一方式便于他们控制选举。正如王世杰所说：“盖陈立夫等有组织，他人则无组织也。”由于蒋介石的内外政策在全会上已遭全面攻击，蒋的地位与权威已有削弱。这种削弱也必然反映在选举方式上，加之在民主革新的要求下，蒋也不能不有所表示，最后，对于张道藩这个意见，“蒋先生亦勉强应允之”^②。

王世杰对陈立夫操纵党务的作风一向不满。国民党六大时，时任中宣部长的王世杰，在六大代表问题上与陈立夫有过激烈冲突。王氏记载：“予语陈立夫（组织部长），此次六全大会之选举，组织部处长、秘书无一不被选出或指定为代表，中央宣传部之秘书、处长无一被选或被指定之人，予实不胜愤慨，彼云彼亦

^① 唐纵日记，1946年3月5、10日。《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596、598页。

^② 《王世杰日记》1946年3月13日。

抱歉！”^① 往事不远，这一回眼见 CC 又将控制中常会的选举，王世杰坐不住了，当即提议：选举“用无记名投票法”。其意图显然是要削弱 CC 对选举的控制。王这一建议立即遭到陈果夫的反。最后，大约是出于平衡的考虑，王世杰这一提议被采纳，陈果夫的反对“未生效果”。^②

3月16日，二中全会举行中常会选举，既不由总裁提名，也不用记名投票，选举结果王世杰这样评价：“有众多资望能力薄弱之委员，趋附党中所谓 C. C. 派者，均当选。党内党外均不免失望。”^③ 选举仍被 CC 控制。

蒋对选举结果亦甚不满。3月18日，在纪念周的讲话中，“蒋先生指斥此次党中所谓革新派（即陈立夫、梁寒操、刘健群），其目的只在攫取中央常务委员。言下甚为愤慨。”^④

3月19日，周恩来致电延安，对二中全会做如下概述：蒋介石国民党“退回到两面派的本来面目。二中全会对政协决议，一方面赞成……另一方面却又通过许多决议，企图推翻政协决议；对东北问题，一方面承认能接收多少便接收多少，承认我军地位，另一方面又不愿政治与军事同时解决，不愿放弃它的接收苏军撤退区的权利，以便有利时好大打；对革新派，一方面放纵，另一方面辱骂（说他们只想当常委）；对主和派，一方面让革新派痛

① 《王世杰日记》1945年4月27日。

② 《王世杰日记》1946年3月13日。

③ 《王世杰日记》1946年3月17日。二中全会所选中常会委员共36名：于右任、孙科、戴传贤、居正、陈果夫、陈诚、白崇禧、邹鲁、何应钦、梁寒操、宋庆龄、陈立夫、吴铁城、朱家骅、贺衷寒、谷正纲、张道藩、张治中、张厉生、李文范、宋子文、段锡朋、刘健群、丁惟汾、潘公展、朱霁青、萧同兹、赖琏、陈布雷、田振山、萧铮、白云梯、王启江、麦斯武德、邓文仪、柳克述。另外，宋美龄得票与邓文仪、柳克述二人相等，宋美龄自动放弃。

④ 《王世杰日记》1946年3月18日。

骂，另一方面又为他们解释。这一切都说明蒋想在吓唬与欺骗中把问题拖延下去，好达到他们小变不大变的目的。”^①

周所说的这种两面现象，主要是蒋在强烈的不满情绪面前，采取的平衡术，实际上是蒋的回旋余地收窄的反映。

1946年7月，周恩来在与哥伦比亚大学一位教授的谈话中，对国民党的权力结构做这样的归纳：“这权力是分割的，如党务操在CC的手中，财务操在宋、孔的手中，军事操在黄埔系的手中，行政方面则政学系的势力较大。这样各集团都是只有一部分权力，而在他们的全体之上则是蒋，造成蒋的政权。”^②

这种四派分割掌权，蒋则凌驾于四派之上的权力架构，从总体上看，二中全会并未改变这种旧有的架构，但经过二中全会的猛烈冲击，政学系已是伤痕累累，此后开始衰落。

中共在政协之后曾确立与政学系合作的方针，政学系的衰落必将对国共关系的走向产生影响。

3月17日，二中全会闭幕。

五 二中全会的政治后果——两个死结

二中全会通过的一系列决议中，后来最为引起争议的是政协宪草案。该案认为：“三民主义为建国最高原则……而五权宪法乃三民主义之具体实行方法，实有不可分离之关系。”在做了这样一番表述之后，该案对政协宪草原则做出如下几点更改：“一、制定宪法，应以建国大纲为最基本之依据。二、国民大会应为有形之组织。三、立法院对行政院不应有同意权及不信任

^① 《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155、156页。

^② 《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535页。

权，行政院亦不应有提请解散立法院之权。四、监察院不应有同意权。五、省无须制定省宪。”^①

针对二中全会这一决议案，3月18日，周恩来在重庆举行记者招待会，对此进行了反驳。由于国民党推倒政协宪草原则的主要依据是五权宪法，周对五权宪法做这样的解释：“五权宪法，第一是主张五权分立，孙先生是反对中央集权于一人或一院的。第二是地方均权，某些权应归中央，某些权应归地方，故孙先生主张实行省自治并得制定省宪。可见政协的修改原则是与孙先生的五权宪法原则完全符合的。”^②这就是说，周认为五权宪法的精神是均权而非集权，因此，政协宪草原则有关分权的决议，以及省得制定省宪的决议是可以成立的。

同日，蒋亦在纪念周发表讲话，阐述这个问题上“总理之遗意”。蒋说：“均权即有中央集权之意，因当时地方分权之说甚盛，均权所以反分权。反分权即是有限制之中央集权也。”^③在二中全会上蒋就讲过这个问题，认为：“总理五权宪法精神，是中央集权，而非地方分权，共党要求分权，是欲造成割据局势。”^④

国、共两党对于五权宪法精神的解释恰恰相反，这些解释当然不是纯粹的理论之争，实质上都是利益之争。

孙中山作为一个政治家，其言行必然以时间、地点为转移，一生在不同的时期，根据不同的情况，分别有过不同的言论，后人不难从中引出多种诠释。问题在于，三民主义毕竟不是中共自己的旗帜，在三民主义前提下做遗教之争，显然，作为总理信徒

① 《中央日报》1946年3月17日。

② 《新华日报》1946年3月19日。

③ 唐纵日记，1946年3月18日。《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600页。

④ 唐纵日记，1946年3月16日。《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598、599页。

的国民党，其诠释天然具有“正统”的地位。因此，中共如果立足于遗教之争，是难以驳倒对方的。

3月19日，《解放日报》发表胡乔木撰写的社论《评国民党二中全会》，逐条反驳二中全会对政协宪草原则的修改，指出：“制定宪法应依建国大纲为最基本之依据，这一规定本身就充满了一党专政的臭味。参加政协会议的各党派从未也永不可能同意国家的宪法应以某一党的某个什么文件为最基本之依据”。^①

将孙中山的言论归之为共产党的文件，而不能作为他党的制宪依据，这个论点的提出，等于将国父遗教剔除，从而将中共彻底地解脱出来。不做诠释之争，而做政治争论，这样，中共的立论更加主动。

对于重庆代表团这段时间的工作，中共中央表示认可。4月1日，延安致电重庆代表团：“敬日以来，我党代表在综合小组会议上所取坚决斗争立场是很对的，只有如此，才能保卫政协决议，而对于过去所取不适当的让步态度，因而使自己处于很不利的被动地位这一情况，有求得解脱与恢复主动之可能。”^②

4月21日，中共中央致电重庆代表团，就此次政协宪草原则修订一事，做了一个原则性总结。电文指出：“最基本的原则立场，就是对于任何便利反动派独裁、反对人民的条文和制度，一律不能表示同意和赞成。”“共产党员为了坚持这种原则立场，常常是不计暂时的得失和成败的，即使因此招致很大不利，也必须明白表示我们共产党人坚决反对某些法律条文和制度，而坚决拥护某些法律条文和制度，不能有丝毫的让步和模糊。只有坚持这种立场，共产党才能教育人民，并在长期斗争中树立起自己的政治威信。”“关于宪法问题，望你们根据这个总的原则去进行

^① 《胡乔木文集》第1卷，第232页。

^② 《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94页。

商讨和斗争，自然就不会有大的失脚。而这种原则立场对于我们今天的议会斗争，是无论如何要使一切党员弄明白的。”^① 该电为刘少奇起草。^② 这是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对于此次宪草修改原则问题，所做的一个政治总结。

关于这个问题，周恩来在 1946 年 11 月的一次讲话中说：“三月间，开二中全会，在宪法问题上提出总统制与取消省自治。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作了一个错误，以为是形式问题而鲁莽地让步，经中央指示后已继续斗争。”^③

由于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已对政协宪草原则做出修订，而中共则坚决反对修订，这样，以宪草原则为核心，国、共两党又一次形成政治僵局。

当宪草原则问题形成僵局之际，另一个僵局也在形成，此即东北问题。

3 月 16 日，毛泽东就东北问题指示周恩来：“若无政治上、军事上、地盘上之交换条件并同时解决，我决不能让出地方。”17 日，毛致电彭真、林彪：“国民党还不停战，沈阳以北长春路沿线之苏军撤退区同意你们派兵进驻，以为将来谈判之条件，时间愈快愈好。”^④ 3 月 18 日，中共西满军区黄克诚部，于苏军撤离后迅速进占四平，切断了沈阳至长春的通道。

3 月 19 日，周恩来致电延安，判断：“美国需要中国安定才能借大款，这是美蒋之矛盾所在，而最后蒋也非随着美国旨走不可。”“估计目前蒋在马歇尔回美借款期间，必不敢表示破

① 《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 98 页。

② 《刘少奇年谱》下卷，第 38 页。

③ 《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 696 页。

④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 62 页。

裂……故我实行反攻颇为有利”。^①意思是美国要求中国安定避免内战，而蒋为了借款必定不敢与中共破裂，因此中共此时反攻颇为有利。

早些时候，3月10日周恩来与马歇尔磋商东北问题时，马歇尔转达了蒋介石的五点意见，其中包括派往东北的执行小组随政府军行动。3月17日，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我们决不能承认小组只随政府军，这是侮辱中共的规定。^②经过进一步磋商，3月27日，周恩来、张治中以及马歇尔的代表吉伦中将，签订了《调处东北停战的协议》，协议共3条：（1）执行小组到东北的任务仅限于军事调处工作；（2）小组应在国共双方军队驻地工作；（3）小组应前往冲突地点或双方军队密接地点，作公平之调处。^③

该协议第一条显然是对蒋介石的让步，但协议的签订本身就说明东北存在内政问题。这一点正是中共一向强调的，执行小组一旦开始调停活动便可将东北问题纳入国共谈判范围之内。然而此时局势进一步动荡起来，这个协议未能执行。

4月1日，蒋在国民参政会发表长篇演讲，代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的意志，对几个核心问题做出最后答复。蒋所讲的问题核心是三个，中苏关系，东北问题和政协协议。

关于中苏关系，蒋重申：“中苏两国和平合作的根据，就是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附件，我们惟有遵守条约及其附件的精神，并期望苏联共同践履条约及其附件的精神”。意思是苏方不能提出条约之外的条件，这是针对经济合作问题而言的。

① 《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155、156页。

②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62页。

③ 《周恩来年谱》，第653、654页。

关于东北问题，尽管国、共、美三方刚于3月27日签署了《调处东北停战的协议》，但蒋仍不承认内政问题。在东北问题上，蒋的态度几乎完全倒向了二中全会的立场。

蒋说：“东北问题在本质上是一个外交问题”，“我们可以说东北九省在主权的接收没有完成以前，没有什么内政问题可言。”没有内政问题可言，也就是完全否定了与中共谈判的可能性。蒋接着说：“对于共产党所谓‘民主联军’这样阻碍接收主权的行动和他所谓‘民主政府’的非法组织，我们政府和人民决不能承认的。”将中共在东北的政权宣布为非法，是要表明这个问题不在军事调处的范围。蒋提到了3月27日签订的《调处东北停战的协议》，同时表示：“政府对于东北九省只有接收主权，推行国家的行政权力，军事冲突的调处，只在不影响政府接收主权，行使国家权力的前提下进行。”这就是说，以接收国家主权的名义，排除了军事调处协议对其行动的约束力。

最后是关于政协宪草原则问题。对于六届二中全会修改政协宪草原则一事，蒋首先为这一做法抬出“国父遗教”这一屡试不爽的法宝，蒋说：“全会根据国父遗教，对于宪法原则提出意见，态度是极为谨慎”。蒋接着谈到这一修改的经过，“事先既由本党代表提出宪草审议委员会与综合小组得到协议，事后复授权中央常会处理……不料中共代表团发表声明，指责二中全会造成违反政协决议之混淆情形。”意思是二中全会这一修改事先征得联席会议和中共的同意，并非二中全会擅自修改，而是中共出尔反尔。

数日前，中共代表在政协综合组提出一项议案：“由训政到宪政过渡时期，训政时期约法应即废止。由各党派依平等合法原则共同参加的国民政府，其组织法应依照政治协商会议关于政府

组织的协议制订。”^①

针对中共这个提案，蒋说：训政时期的约法，“只有国民大会制定的宪法才能够代替。在宪法尚未颁行之时，训政时期约法是根本有效的。”蒋认为政协无权推倒约法，蒋说：“我们要说明政治协商会议的性质。政治协商会议在本质上不是制宪会议，政治协商会议关于政府组织的协议案，在本质上更不能代替约法。”蒋表示政协关于改组政府的议案，是在现政府的基础上，由各党派共同参加，扩大政府组织，“而绝不是推翻现在国民政府的基础，另外来组织一个政府。”^②

针对蒋4月1日讲话，周恩来于4月4日在重庆举行记者招待会，就两个焦点问题阐明中共立场。周说：“为着不使问题永远僵持，我们曾在形式上做了让步，即无形国大改为有形国大，省宪改为省自治法，不解散立法院。但是我们同意的仅止于此。”接着周对这三点让步做了新的解释：“我们主张：（一）即使有了有形国大，亦决不能动摇将来实施代议制之立法院的全权，立法委员要由人民直接选举。（二）立法院可不解散，但行政院仍要对立法院负责，实行行政院负责制。政策通不过，就应该改组行政院。（三）省为地方最高自治单位的地位决不能改变，省有权在不抵触国宪之下自订省自治法，中央法律不得变更。”也就是说，在保留原来的三点让步的形式下，而将问题的实质又恢复到政协宪草原则。其一，国大改为有形国大之后，选民便不能直接行使选举权了，但周提出立法委员直选；其二，行政院可以不解散立法院，但仍向立法院负责，即仍不向总统负责，实际上仍为内阁制；其三，省制定的省自治法，中央法律不得变更，这种省自治法无异于省宪。

^① 《中央日报》1946年4月4、5日。

^② 以上均见《中央日报》1946年4月4、5日。

关于东北问题，周指出郑洞国在执行小组到达沈阳后仍计划近日攻占昌图、四平等地，“郑将军何以敢在执行小组抵沈之后，仍冒此大不韪，就因为有人说这种军事进攻是接收主权，不是冲突。”^①

针对蒋介石在参政会的讲话，4月7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胡乔木撰写的社论《驳蒋介石》，胡文用词辛辣，集中就东北问题和政协宪草原则问题反驳蒋的论点。

胡文指出，蒋以接收东北主权的名义，撕毁了3月27日的东北停战协议，“完全显出他的一副嗜杀成性的狰狞面目”。胡文表示：“中国人民已经决心为反对增兵东北，为制止东北的内战和其他地方的内战，为坚持东北人民与全国人民的民主权利，为坚持结束独裁训政即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为坚持政协决议的百分之百实现，为坚持民主的宪法即坚持国会全权制，立法院对行政院的同意权与不信任权，监察院的同意权与省得制定与国宪不相抵触而中央法律不得予以变更的省宪，为坚持国民党军队的彻底缩编与彻底国家化，而准备作不屈不挠的奋斗。凡此一切都是中国人民根本利益所关，人民绝对不能让步。”“如果法西斯反动派非要反动到底决不甘心，那么中国人民已经知道应该怎样正确应付得了。”^②

当日，毛泽东指示中共重庆代表团：“《驳蒋介石》一文，收到后请立即在《新华日报》照样全文发表”。^③由于蒋介石在政协已宣布言论出版自由，4月8日，《新华日报》全文转载了《驳蒋介石》一文。

4月9日，《中央日报》为此发表社论，称该文“编排字典

① 《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200～211页。

② 《胡乔木文集》第1卷，第245页。

③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65页。

上所有恶劣的名词，侮辱我中华民国政府主席蒋先生。……这是共产党即将一百八十度叛国而三百六十度造乱的宣言书。”

至此，双方在两个焦点问题上的立场，公开的、正式的、最后的宣布出来，这一态势的形成，标志着双方都没有回旋余地了。

本章小结 从现象上看，二中全会并未全盘推翻政协协议，仅就宪草原则做数条修改。问题在于，这种修改的依据——国父遗教——一旦得逞，便开创了一个恶劣的先例，据此，便可以通过对国父遗教的诠释权，对其他条款再做修改，从而引起层出不穷的争论。表面看，国共在宪草原则的对立，只是一个五权宪法的诠释之争，并不直接的、正面的表现为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的对立，其实，问题的实质是国民党不愿接受政协的安排，自动放弃既得利益，通过另一种方式继续与政协纠缠。因此，宪草原则的对立，说到底，还是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的对立，只是在五权宪法诠释之争的掩盖下，这种对立的性质较为隐蔽，不易看懂。

从现象上看，国共在东北问题上的对立，表现为外交问题还是内政问题的争论。由于东北问题带有相当程度的民族利益和国家主权的成分，因此，国民党力图将这个问题的争论导入维护还是破坏国家主权的范畴。任何问题一旦牵扯上民族利益，便极易引发民族感情，从而将问题的实质隐蔽起来。其实，这个问题的实质并不复杂，就是国共两军谁能控制东北更多的地区。问题在于，能否取得以及取得怎样的实力，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政治争论的结果，从而决定中国政局的走向。因此，东北问题的争论，说到底，仍然是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的对立。只是因为渗入了相当的国家主权的成分，这种对立的性质更加隐蔽，更加不易看懂。

归纳起来，政协会议之后，经过一段短暂的、不明朗的多向发展，国共在宪草原则和东北问题上形成两个焦点。尔后，经过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两个焦点最终形成两个死结。规律决定，回旋的余地一旦不复存在，那么，政治的继续只能是战争。

第十一章 政争之归宿： 四平决战

爆发于 1946 年春季的四平战役，是国共两党两军之间，以争夺长春从而决定各自在东北的地位为狭义的政治目的，以东北的军事胜利推动整个政治僵局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转化为广义的政治目的，而举行的一次从军事上讲是局部性的，而从政治上讲则是全局性的决战。

从狭义上讲，四平之役首先是由东北自身的局面所演成的。苏军滞留东北期间，国共在东北的最终地位都是不确定的，在“外交问题”的掩盖下，国共未能形成真正的谈判渠道。这一点决定了东北问题不可能通过谈判解决，双方都必须通过一次重大的军事胜利，从而奠定各自在东北的地位。这一点构成了四平之役在军事上的局部性的决战性质。

从广义上讲，四平之役则是由全国性的政治局面所演成的。自中共提出联合政府口号以来，围绕这一政治主题，国共展开了长时间的较量。其间，发生过多次政治反复，最终，在政协宪草原则和东北问题上形成两个政治死结。为此，双方都需要赢得一次重大的军事胜利，从而推动整个政治僵局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转化。由于负载了这样一些全局性的政治意图，构成了四平之役在政治上的全局性的决战性质。

一 三角格局的结束与东北问题的演变

——国共四平对峙的形成

由于国民党在东北问题上屡拒谈判，中共便只能以武力迫使国民党接受谈判。这样，中共在东北的方针，由1945年12月确立的分散建立根据地，再度变为集中作战。

1946年1月26日，刘少奇代表中央致电东北局并林彪、黄克诚，指出：“由于蒋军在进攻锦州、阜新、热河时，我未能给以有力打击，使蒋轻视我在东北的力量，相信杜聿明报告，认为可以不费大力即能击溃东北我军，控制东北。因此蒋现拒绝与我谈判和平解决东北问题的建议，不想承认我在东北地位，而仍想武力解决。”为此，要求“在完全自卫的条件下力求打一二个大胜仗。”同时要求：“将我们和平合作方针向辰兄切实说明，要求他们给以协助配合。”^①“辰兄”即苏军。

1月27日，刘少奇再电林彪、黄克诚：“在友方不坚决反对，我在完全防御的有理条件之下（在退避三舍之后），给进攻之顽以坚决、彻底歼灭之打击。……此为历史新阶段之最后一战，决定东北今后大局，望彻底向干部说清，不惜以重大牺牲求得这一战役之完全胜利，立下最后一次战功。”^②历史新阶段即和平民主新阶段，考虑到这个阶段即将到来，因此称该役为“最后一战”，要求“立下最后一次战功”。这表明，刘少奇是以“最后一次”为着眼点，来安排这次战役的。

那么，安排这一仗的底数是什么呢？2月5日，刘少奇致电彭真、林彪、黄克诚：如果国民党向你们进攻，马歇尔将会立即

^① 《刘少奇年谱》下卷，第12～14页。

^② 《刘少奇年谱》下卷，第14页。

要求双方停战，我们也只能立即答应停战，国民党亦不能不答应停战，停战执行人将立即到达东北召集双方签订停战协定。因此东北很可能再打一下，但绝不会久打，能打十天到半个月就必然被强迫停战。你们在锦州、阜新、热河丧失了作战的机会，此一最后作战机会，你们绝不要再丧失。你们如不能在东北打一个好胜仗，以后你们在东北的政治地位就要低得多。因此你们必须立即准备好一切，集中尽可能多的兵力，不怕以最大牺牲求得这一作战的胜利。因为以后可能再无作战机会，所谓以多胜少的原则，也不要机械执行。能完全消灭敌人更好，应努力争取，但能打个平，给敌人以数千人之杀伤，以表示我军之顽强勇敢，使敌人不敢放胆在东北横行，也是好的，也算完成战略任务。^①

这就是说，刘少奇将底数放在了马歇尔身上，战事一起，马歇尔便会要求停战，并主持签订停战协定。由于对马歇尔的调处能量估计过高，刘判断战事不会久拖，十天半月便会被马歇尔“强迫停战”。同时又因为是“最后作战机会”，因此以多胜少的军事原则可以不顾，打胜打平均可，但必须集中兵力放手一搏。该电的指导思想，实际上就是“毕其功于一役”。

就在中共做这一部署之际，苏军基于多种考虑，于3月12日撤离沈阳，开始了约一个半月的撤军行动。苏军是在经济合作问题未能获得协议，并且发生全国性反苏游行的背景下撤离的，因此其整个撤军行动不可能与国民党合作，最初甚至不将撤军的时间安排告诉国民党。

同样，苏军的撤军安排中共最初也不甚清楚。3月18日，中共合江省委书记张闻天致电北满分局并东北局，报告17日晚应苏方之约，在牡丹江会见了苏方“一上将级中央代表”，苏方

^① 《刘少奇年谱》下卷，第18页。

“他们已内定成立牡丹江省，要我今早提出省长、副省长，警察局长、副局长候选人名单。”“他们还说要依照日本时的规定成立东安省。我估计此举为其有比较长期驻防之意的证明。”^①

这表明，苏军撤防之初，其撤军的程度和整个安排，中共也不得而知，只能通过点滴情况做分析估计。

苏军撤退区为东北最重要地区，能否进占沈阳、长春、哈尔滨以及贯穿其间的长春铁路（旧称中东路），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国共在东北的地位。苏军3月12日撤离沈阳后，国民党军于13日进占沈阳，这样，国共的下一个目标便是长春。此时苏军仍滞留长春，能否于苏军撤离后抢占长春，关键在于控制进入长春的通道——四平。

苏军撤退之际，其态度再度转变为与中共配合。3月12日，彭真、林彪致电延安：苏军于十三日晨由沈阳撤完，友人希我们迅速攻入沈阳，认为这有很大利益。当日，东北局再电延安：友人告，红军最近要由沈阳撤退，不是全满皆撤。凡红军撤退处都可打。^②

此前，中共西满军区司令黄克诚、政委李富春于3月10日向东北局提议进占四平。为此，彭真于3月16日报告延安：友人再表示，凡友方撤退之地包括沈阳、四平街，我可以放手大打，并希望我放手大打。……我们已同意李、黄夺取四平，可否立示。17日，刘少奇复电：沈阳以北长春路沿线的苏军撤退区，同意你们派兵进驻……时间愈快愈好。^③

3月18日，黄克诚部于苏军撤离后迅速进占四平。四平此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传记组编《张闻天年谱》下卷，第732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

② 《彭真年谱》上卷，第385、386页。

③ 《彭真年谱》上卷，第389、390页。

时为辽北省省会，辽北省主席刘翰东等被俘。后经国民党与苏军交涉，刘翰东等于3月26日被释放后到达长春。^①

夺取四平的目的旨在夺取长春，为此，延安于3月25日指示东北局：力争我党占领长春，以长春为我们的首都。此事须迅速说服友方让我进驻。^②

综上所述，随着苏军的撤离，国共两军迅速在四平形成大规模战略对峙，东北的三角格局正在变为两方对阵。因中苏条约而造成的国共在东北的“合法”与“非法”地位，同样不复存在。

四平之役是根据情况的逐步发展，尤其根据政治要求的逐渐强化，而逐步演化为决战的。大体上讲，3月18日至4月14日为初战阶段，此时因苏军仍滞留长春，战役目的是控制四平，以取得对长春的控制权。4月18日至5月22日为决战阶段，在中共进占长春的条件下，战役性质演变为决定两党地位和政局发展方向的决战。

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因患肾结核，于2月中旬赴北平治疗，东北军事由熊式辉、郑洞国负责指挥。4月上旬，在熊、郑指挥下，国民党军以沈阳为中心，对南线本溪和北线四平同时展开南北两线进攻。

南线方面，由52军的25师和新6军的14师对本溪分进合击，中共南满军区以一部顽强阻击14师，另以优势兵力全歼25师一个团，并将25师击溃。北线四平方向，国民党军由71军和新1军做正面推进。4月8日，中共在昌图发起反击，将71军87师击溃。这样，熊式辉指挥下的南北两线均遭重挫。4月16日，熊式辉致电蒋，对中共战斗力做如下评估：“共军前在昌图

^①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1），第221页。

^② 《彭真年谱》上卷，第396页。

附近与我新一军对抗时，火力与我相较，并无逊色；又在本溪湖附近与我二十师（按：应为二十五师）对抗时，夜间照明弹甚多，是其装备已较前为优。”^①

以上两仗的胜利对中共是很大的鼓舞。4月14日，毛泽东致电彭真、林彪：本溪的胜利，“必能引起于我有利之变化”^②。这个有利的变化既指军事又指政治。当日，刘少奇致电在军调部工作的饶漱石等：我军在本溪、四平已获大胜……顽方兵力不够，困难增加，决无力在最近打到长、哈。马歇尔在十六、十七日可能到华，如美国不助蒋介石在东北大打，蒋的态度可能软下来。望你们在谈判中坚持无条件停战及停止运兵，并不要急于向美蒋求妥协。^③

以上两仗是四平之役初战阶段两个主要战役。

国共在四平形成对峙状态后，中共再度提出与国民党谈判。3月30日，周恩来在重庆约见张嘉璈，周表示：“闻国军大量北上，不能不为防卫之策，因此北上之国军已受阻于铁岭，恐将再受阻于四平。目前解决之道，惟有迅速在政治军事方面同时谋解决。在政治方面改组东北政治委员会，参加各党各派人士，在军事方面，迅速规定双方驻军地点及整军方案。……至外交仍归中央主持。”提出了军政两方面的要求。张嘉璈的答复是：“必须由中央先接收各地政权，再谈政治协商。”^④提出了谈判的先决条件。

4月2日，周恩来致电延安：“据张公权谈，蒋不如在苏军撤兵前取经济合作与国内政治解决，其目的在接收长春全路及九

①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2），第345页。

②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167页注③。

③ 《刘少奇年谱》下卷，第35页。

④ 张嘉璈日记，1946年3月30日。《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第703页。

省，是后组织政委会实行自治。”“蒋军于十五日接收长春后，中苏即谈经济合作，以换全路及省城。”^①这就是说，国民党的方针仍然是首先打开对苏僵局，为此，这才抛出导致国、苏关系陷入僵局的经济合作问题作诱饵，以求在苏军的配合下接收长春路和九省主要城市，取得优势地位之后，再来与中共作政治解决，仍然坚持这个先后顺序。

4月1日，蒋在参政会演说中称：“东北九省在主权的接收没有完成以前，没有什么内政问题可言。如果有人东北主权没有收回，外交问题没有解决期间，提出内政问题……那就不知道他的用意何在了。”^②坚持外交问题就是坚持不与中共谈判。对此，周恩来在4月4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如说解决东北问题，必先外交而后内政，必先军事而后政治，那就是有一种想法，想以外制内，以军压政”。4月5日，周恩来致电延安，判断：“解决东北先外交后内政，先军事后政治，这后一面是蒋的底盘。”^③

既然蒋的方针是先军事后政治，这就是说，蒋在此时仍然不会与中共谈判。

国民党一面拒绝与中共谈判，一面仍指望苏军协助其接收长春。鉴于苏军撤离四平时未予国民党军协助，而被中共进占，因此在长春接防问题上，蒋指示熊式辉向苏军发去一个照会，表示：“中国军队拟于苏军自长春撤退以前，由铁路运送至长春，请苏方协助早日起运。”^④该照会于3月20日由留守长春的东北行营副参谋长董彦平递交苏方。在四平已被中共切断的情况下，

① 《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189页。

② 《中央日报》1946年4月4、5日。

③ 《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209、223页。

④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1），第232页。

请求苏方协助运兵，实际上就是指望苏方面出面要求中共让路。

3月22日，重庆苏联大使馆通知王世杰，苏军将于4月底撤退完毕，但交接防问题，尤其是长春的撤退日期未予说明。^①

3月26日，董彦平再度与苏方接洽交接防问题。苏方表示：“苏军在长春以北所警备之区域，不能株待中国国军接防，而只能将防务交付当地现存之武力。如华军不及开到，则苏军不能因此停止撤退。”^②这就是说，不论国民党军到达与否，苏军都将撤退。

4月4日，苏方将撤军的大致安排通知国民党方面：4月14日或15日撤离长春，25日撤离哈尔滨，24日或27日撤离齐齐哈尔。^③这个时间表对于国共来说，意味着东北问题即将最终见分晓。

现在，摆在国民党面前的问题是，苏军即将由长春撤退，而四平已被中共切断，国民党军不能北上接防。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只得再度指望苏军予以协助，为此，国民党打出的牌，仍然是那个导致国、苏关系陷入僵局的经济合作问题。

4月4日中午，蒋召集王世杰、张群、张嘉璈等会商这一问题，“蒋主席意，因据董副参谋长电，苏方已规定撤退日期，马元帅于六日离长，似应即向苏方表示愿意商谈经济合作问题。”董彦平于4月3日来电称，苏军表示撤离后苏联民航飞机仍留长春使用，而民航问题是经济合作讨论事项之一。据此，张嘉璈判断：“就民航一节，可知苏方仍希望经济合作达成协议，亦可推测苏方仍准备吾方控制哈尔滨以南区域。”^④

①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1），第189页。

② 1946年3月27日董彦平致张嘉璈电。《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第698页。

③ 《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第708、709页。

④ 张嘉璈日记，1946年4月4日。《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第709、710页。

就经济合作而论，苏方只能与国民党合作而不可能与中共合作，既然要与国民党进行经济合作，便必须将一些地区交国民党接收。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因此张嘉璈推测苏方仍会将哈尔滨以南地区交国民党接收。

在蒋介石的要求下，原本对经济合作持消极态度的王世杰不得不行动起来，但其基本立场并未改变。王世杰日记载：“今日与蒋先生及张公权商议后，约苏联大使彼得罗夫来外交部面谈。予告以中苏（实即东北若干敌产问题）在东北经济合作问题，我政府准备与该使商谈，俟主管部准备就绪即开始。但予同时声明，非俟至苏军全撤与东北各省市行政经我接收之后，不能成立正式的最后协议。予并请该使注意，中共军队现时又在长春、哈尔滨等地阻挠国军接防，苏军既允协助我政府接防，应设法不使非法武力入占各该市。”

以完成接收为经济合作的条件，王世杰这个立场与从前并无实质性改变，将这样一个声明告知苏方，其实际效果只能使苏方断绝经济合作的打算。但这样一个表态在王看来已经是让步了，王写道：“予原意拟于苏军全撤后始与讨论东北敌产问题，惟公权深以长春等地危险为虑，蒋先生亦然，遂有今日之决定。”^①

在向苏军打出经济合作牌的同时，蒋亦把目光投向了马歇尔。马歇尔于3月11日回美，4月8日，马歇尔致电蒋，就与美国各方面接洽援华计划的结果告知蒋，并告将于4月中间返华。当日，蒋复电：“务望阁下能于十五日前后回华，使我政府接收东北工作得以顺利进行。”^② 蒋要求马歇尔15日左右返华，也就是指望马歇尔能于苏军14日撤离长春后，阻止中共进占长春。

① 《王世杰日记》1946年4月4日。

②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3），第110页。

4月8日，张嘉璈拟就经济合作中方对案，张记载：“午后五时，往王外长处，交其研究。渠仍坚持候苏方覆到，是否协助我军北上接防，再行开谈。”^①王世杰仍然坚持先决条件。

王世杰的无动于衷，使蒋更加焦急。4月9日，蒋再度召集吴鼎昌、王世杰、张群、蒋梦麟、张嘉璈会商此事，“蒋主席主张早日与苏方开谈，俾中长沿线早日接防。”当日，蒋下达一道手令，令外交、经济两部各派一名次长，在张嘉璈协助下，与苏方开始谈判。^②

在蒋的严令之下，王世杰只得再次行动起来。王氏日记4月13日载：“今日午前，蒋先生坚嘱务将所拟中苏经济合作对案，答复苏联大使。盖东北军事紧急，蒋先生欲借此稍减苏方之阻挠与操纵也。”当日为星期六，王世杰特意通知苏方下星期一即15日开始谈判，但此时一切为时已晚。

1946年4月14日，苏军最后撤离长春。当日，张嘉璈在日记中这样记载：“晨十一时，蒋主席来寓闲谈。渠意：‘东北问题，对于共方不能再让，共方必须让出铁路线两旁各三十公里，再行停战。否则政府将为傀儡之傀儡。’”从蒋的谈话中张嘉璈感到：“在言语间，可观其忧心如捣”。关于东北问题的处理，张对蒋的评价是：“其对于东北问题之见解，较之政府任何主管当局为深切。奈外交方面，只知刻板文章，不善运用，致酿成今日共方占上风之局面。”^③总之，苏军撤离之际，把一个极为不利的局面留给了国民党。

综上所述，苏军于3月12日撤离沈阳后，国共于3月18日

① 张嘉璈日记，1946年4月8日。《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第718页。

② 张嘉璈日记，1946年4月9日。《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第718页。

③ 张嘉璈日记，1946年4月14日。《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第723页。

起，迅速在四平形成大规模战略对峙，而双方在四平的的对峙，其着眼点均为四平身后的长春。长春为伪满首都，东北政治中心，能否进占长春，将极大地决定国共在东北的地位，亦将极大地增强各自在全国的地位。为此，延安于3月25日指示东北局：力争我党占领长春，以长春为我们的首都。首都这一概念的提出，表明中共已将长春问题上升到相当的政治高度，如果有了这样一个首都，将极大地提升中共的政治地位。在这种强烈的政治要求注入之下，国共在四平的的对峙演化为两军决战。

二 中共进占长春的考虑与决策 ——政治要求之下的军事方针

夺取四平，意味着长春已成为中共的囊中之物。从3月18日夺取四平，到4月18日进占长春，在这整整一个月之内，中共几位主要决策者就是否进占长春一事做过反复的磋商。

一方面，进占长春将极大地提升中共的政治地位，从而在接下来的谈判中处于极为有利的态势。另一方面，能否确保长春，取决于能否确保四平，由于四平作战是围绕长春而进行，因此作战方式只能是阵地战，而不能是中共所擅长的运动战。将问题归纳起来：中共一旦拿下长春，可取得有利的政治地位，同时又将给四平的守城作战造成极大压力。政治主动，军事被动。

那么，两者能否统一？怎样统一？此即全部问题的核心。林彪在东北主持作战，周恩来在重庆主持谈判，毛泽东在延安主持全局，三人、三地、从三个方面提出对问题的看法，构成一个典型的三位一体的决策过程。

3月24日，毛泽东致电东北局，就东北的整个战略方针指示如下：“我党方针是用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全线”。由于实

现这一意图的关键是四平，控制了四平，基本上便控制了长、哈和长春路。为此，毛要求：“黄李部动员全力坚决控制四平街地区。”^①翌日，刘少奇指示林彪、彭真：“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你们必须在苏军撤退后一二日内控制之。”^②

根据延安的指示，3月29日，东北局做出如下布置：我军必须迅速完成一切准备，于苏方撤退时以敏捷迅速手段进占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各市……抢占与确保长春的决定一环是开原、四平间的作战，请林彪、李富春、黄克诚注意。辽东（南满）军区部队为配合沈阳以北及长、哈、齐之争夺战，除集中主力坚决歼敌一部外，应分出适当兵力牵制大量敌人于南满。^③

中共南满军区为程世才、萧华部，以本溪为中心。东北局以上的部署表明，四平之役的总体布置是：以沈阳以北的四平地区为主要作战地区，以沈阳以南的南满本溪地区为辅助作战地区，以构成北打南拉的态势。

4月4日，林彪亲抵四平，当日，林致电延安：“我此刻已到四平街……集中近六个旅的兵力拟坚决与敌决一死战。”^④6日，毛复电林彪、彭真：“集中六个旅在四平地区歼灭敌人，非常正确。党内如有动摇情绪，哪怕是微小的，均须坚决克服。……我军即有数千伤亡，亦所不惜。”同时指示：“本溪方面，亦望能集中兵力，歼灭进攻之敌一个师。”^⑤

尽管毛严厉地否定了动摇情绪，但作为前线指挥员，林彪对于敌我力量的对比有着更为深切的认识，因此，在执行上级指示的同时，林向延安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①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63页。

② 《刘少奇年谱》下卷，第31页。

③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155页注②。

④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65页注①。

⑤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159页。

4月11日，林彪致电延安和东北局，就四平作战方针，较为全面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林彪认为：根据目前东北形势及蒋介石继续增兵东北的情况，我固守四平 and 夺取长春，迅速实现东北和平的可能性均不大。因此我军似应以消灭敌人为主，而不以保卫城市为主，以免既不能保卫城市又损失了力量，造成以后虽遇有利条件亦不能消灭敌人的结果。故我意目前方针，应脱离被迫作战，取主动进攻。对难夺取与巩固之城市，不必过分勉强去争取。建议我军以便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作为当前行动的基本方针，停止对长春之攻击，将一切攻击长春兵力的极大部分迅速向四平前进，求得我四平作战兵力之集中。南满方面亦应采取以上方针。^①

林电的核心，就是不主张拿下长春，只要不拿下长春，就不用固守四平，这样，四平的作战方式便可转换为以歼敌为主的运动战。林电中所提到的那些作战原则，其实就是毛泽东自己一贯倡导的，问题在于：林电只是从怎样有利于作战提出问题，而不是从怎样有利于谈判提出问题，而怎样有利于谈判恰恰是毛泽东考虑的重点。那么，怎样才能有利于谈判？这就必须拿下长春。

4月12日，毛泽东致电东北局并林彪，表示：“同意林真子电，以集中力量歼灭敌人为主，不以固守城市为主”。同时指示：“长春如有可靠之内应及在力量对比上有把握则占领之，否则放弃占领计划，但以一部力量占领飞机场……以利谈判。”^②显然，毛的考虑有两点，从作战来讲，毛赞成不固守城市，但从“以利谈判”来讲，毛并未完全放弃夺取长春的打算。问题在于，一旦拿下长春，必然导致守城，因此毛的两点考虑实际上并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164页注^②。

^②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163页。

未真正统一起来。

作为谈判的主持人，周恩来主要是从谈判的角度提出问题的。4月5日，周致电延安，判断蒋的基本方针是：“东北大打占领点线后再与我们商谈一切。”为此，周建议：“寅卯处准备大打……决勿幻想东北能让步。”寅卯为东北局代号。4月9日，周判断美国企图助蒋接收长春路，“非打不足杀其锋”。在这里，打从属于谈。

4月11日，周再次致电延安：陈诚“忽改口赞成先停战维持现状……我估计部队可能由于四平街打不过去，十五日前不能到长春，始赞成先停战以保长、哈现态势。……但为防止中间派主张维持现状，停止冲突，请中央速令东北在两三日内抢先开兵入长”。周认为蒋“如受些打击被阻四平街，或进入长春已受打击，还可能与我谈判。”^①

周电中的15日，指苏军于14日撤离长春后，国民党军因受阻于四平，因此不可能于15日抢先进入长春，为此，陈诚提出维持现状的建议，即双方都不入长。由于东北行营于上年12月重返长春后，对长春等地已做行政接收，并空运少量部队进驻长春，这样国民党在名义上已据有了长春，因此，维持现状的建议对中共不利。

陈诚这个建议中共不难拒绝，促使周建议延安“抢先开兵入长”的是另一原因。民盟于4月10日提出一个三点方案，要求中共退出长春路沿线，“使中央军可以顺利到长春”，“在中央军接收长春以后，双方再进行政治谈判。”^②这个方案中共肯定不能接受，但如果民盟也提出维持现状的方案，中共便很难正面拒绝。因此周建议在民盟提出这个方案之前，“抢先开兵入长”。

^① 以上均见《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224、230、240、241页。

^②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155页。

周是从怎样有利于谈判提出问题的，认为蒋不遭打击不会同意谈判，这个看法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东北的军事力量能否取得谈判所要求的重大的军事胜利，似乎不是周考虑的主要问题。

显然，林彪、周恩来的意见各有其道理。那么，能否既占长春，增强谈判地位，又避免四平守城作战而陷入军事被动？此即毛泽东考虑的问题。4月12日，也就是毛复电林彪，同意“不以固守城市为主”的当日，延安再电东北局，指示：按周电办。^①即明确下达了进占长春的指令。看来，中共找到了问题的平衡点，此即马歇尔的归来。

马歇尔预计4月中旬返华，他的归来与长春问题有什么关系呢？4月13日，毛致电林彪等：“马歇尔有于文日动身来华说。马到华后东北可能停战，国方必于数日内尽力攻夺四平、本溪。望注意在可能条件下击退其进攻，守住四平、本溪，以利谈判。”^②16日，毛再电林彪：“马歇尔到华后，可能迅速停战，马、周、陈诚之三人会议可能在二十号至二十五号之间到沈阳。长、哈问题必须争取于停战前解决。”^③毛判断马歇尔返华后，将能够迫使国民党停战，为此，要求林彪于马歇尔返华之前拿下长春。这样，随着马歇尔返华后停战令的下达，中共既可据有长春，又可避免在四平陷入军事被动。中共这一判断也有其根据，1月10日的停战令正是马歇尔来华后迅速下达的。这样，与刘少奇相同，毛泽东也将东北停战的底数放在了马歇尔身上。

鉴于长春问题牵涉到中苏条约关于接收东北主权问题，4月13日，周恩来在重庆举行记者招待会，表示：“中苏条约中惟一的规定是承认中国在东北的主权，并未特别规定只有国民党的军

① 《周恩来年谱》，第657页。

②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68页。

③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68、69页。

队才能接收，中共军队也是中国军队，因此不能除外，绝对有权参加接收工作。”^①把中共自己也包括到中苏条约之内，这是中共头一次对该条约做出这样的解释。这个解释是否说得通姑且不论，但这个解释实际上是为中共即将发起的对长春的进占，做政治准备和舆论准备。

根据延安“按周电办”的指示，林彪立即部署攻击长春，4月14日，林彪致电担任攻击长春任务的吉辽军区司令周保中、副司令陈光等人，指示：对固守长春之敌不应采取全线包围于四十八小时内解决战斗的计划，只派少数部队进行牵制，而勿进行正式攻击。应着重于占领飞机场，断其空运，然后逐次攻略城内诸目标。……如无全部占领长春可能，则应勇敢放弃全部攻占的计划，采取占领一部与敌对峙，以利谈判的计划。^②该电反映出林彪一贯的作战风格，即冷静、周密、谨慎，根据前线情况决定进退。

4月18日，中共进占长春，长春市长赵君迈等被俘。

进占长春必然导致作战方针变为“守城”，而守长春的关键则在守四平。4月18日，毛泽东指示东北局：“我应力争保持长春于我手中，如我能在四平地区大量歼灭顽军，此种可能性是有的。”^③

中共早有在东北与国民党决战的设想，以求“一战解决问题”，但迟迟未能实现。现在，随着长春的占领，决战的态势已经形成。4月19日，毛在致彭真、林彪的另一电中要求：“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于四平南北地区举行数次大的战役决战”。20日，毛又要求：“准备于必要时把长春变为马德里”^④。

① 《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245页。

②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167页注④。

③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69页。

④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70页。

在毛泽东的严令下，林彪在四平地区集结了约 10 万兵力，与杜聿明、郑洞国率领的国民党精锐之师，展开了长达一个月的决战。

三 四平决战与重庆谈判

进占长春，意味着国共政治僵局发展到了最后的极限，国共之间积累起来的全部问题，将在这里得到最后的澄清。

4 月 17 日，《大公报》发表社论《可耻的长春之战》，表示：“敌人投降了，盟军撤了，我们自己却打起来了，实在太可耻了！快停止这可耻的长春之战吧！”18 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可耻的大公报社论》，称大公报将东北问题“归罪于中共 and 中国人民”，“真是可耻极了！”“大公报社论作者如此反对人民，应该是够‘可耻’的了吧。”

4 月 20 日，《新华日报》就中共进占长春发表社论《庆长春》，认为：“只有当东北人民自己有了力量的时候，才会有自己的地位，才会迫得反动派不得不承认，不得不放弃其不承认主义”。也就是要以既成事实，迫使国民党承认中共在东北的地位。

在进占长春的情况下，中共曾有过相应的政治考虑。4 月 24 日，张闻天致电高岗并延安，建议：“在我们占领长春、哈尔滨之后，美国公开援助蒋介石侵占东北之时，我们应即考虑在最近召开东北各省人民代表会议，成立东北联合政府问题。这是目前国际形势所造成的成立这个政府的有利时机。这个政府可能取得苏方公开承认”。^①

5 月 6 日，刘少奇复电：“可以考虑召集东北人民代表会议

^① 《张闻天年谱》下卷，第 735 页。

成立东北临时行政委员会，成为东北临时政权机关并作公开号召。……恩来同志亦有此提议。”^① 上述考虑因情况变化，后来并未实施。

当中共进攻长春的消息传到重庆后，4月15日，张嘉璈在日记中这样写道：“照此情形，东北问题，除国共两方武力决斗之外，别无解决之道。苏方为维持其东北势力计，势不能不帮助中共……故此一武力决斗，乃国军与中共及苏联之斗争。以东北之地势，国军补给之困难，及国军长途远征之疲乏，与对北方寒冷气候之难受，胜负之数，不难预卜。”^②

张嘉璈这个预卜是不吉利的，此刻，国民党内一片沮丧。4月18日，王世杰在与张嘉璈的谈话中表示，不愿与苏方商谈东北问题，“宁愿与中共商谈”。张的反应是：“余闻之深为诧异。今日而与中共谈东北问题，何不早日与谈。中共知苏联已拒我而助彼，焉肯让步。”^③ 4月19日，张嘉璈焦急地等待着长春消息，其日记载：“竟日长春无电来，必已沦陷无疑。询之军令部刘为章次长，答云：‘吾军尚未越过四平街。恐在此尚有一场恶战。’”^④ 21日，张嘉璈又向刚由沈阳归来的秦德纯了解战况，“据其观察，国军不易越四平”^⑤。

长春问题，进一步激化了国民党内部对于中共政策的争论。4月20日，王世杰日记载：中共“借苏军之接济与其他协助攻

① 《刘少奇年谱》下卷，第43页。

② 张嘉璈日记，1946年4月15日。《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第724、725页。

③ 张嘉璈日记，1946年4月18日。《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第727、728页。

④ 张嘉璈日记，1946年4月19日。《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第728页。

⑤ 张嘉璈日记，1946年4月21日。《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第730页。

陷长春，政府与中共间之妥协几不可能。晚间余与陈立夫、邵力子、孙哲生、张厉生、张岳军、雷傲寰等，在吴铁城宅商讨今后本党之政策。予力主现时必须继续以忍耐之态度，与中共妥协，同时本党内部必须统一。予及邵力子力责陈立夫过去数月鼓励党中同志倡异论，以增加本党负责对外接洽诸人之困难。”^① 尽管王仍主张妥协，但王已意识到“妥协几不可能”。

那么，一向被王世杰视为一张牌的经济合作问题又怎样呢？王氏日记载：“苏联方面近日未来谈东北经济合作问题。苏方政策似已决定放弃与国民政府妥协政策，而以支援中共为基干。”^② 至此，这张牌完全失效。

综上所述，在中共进占长春之初，国民党在政治、外交、军事上全面陷入困境。

四平战役之际，国民党在东北的军力已有加强。1946年1月4日，杜聿明致电蒋介石，称：“查东北九省并热河境及冀东一带，共军约有三十五万余人，目前仍盘踞于交通要点外广大地区……故宜速予肃清，除此大患，巩固边疆。原定序列中，使用五个军兵力，于苏军北撤时，仅接防交通要点，共军势必到处窜扰，截断交通，围困据点，使国军无法应付……敬恳钧座增拨五个军迅开东北，以十个军兵力一面接防一面肃清，在共军根基未固之前，一举铲除，以竟收复东北九省之效。”^③ 杜聿明对中共兵力的估计大致准确，当年2月，彭真、林彪报告延安：目前东北我军实力总计三十四万一千零二百名。^④

① 《王世杰日记》1946年4月20日。

② 《王世杰日记》1946年4月22日。

③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2），第332页。

④ 《彭真年谱》上卷，第379、380页。

考虑到中共在东北的迅速发展，在杜聿明的要求下，蒋介石做出增兵的部署。4月1日，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在国防最高委员会做东北接收报告，其中讲道：“国军接收东北所用兵力，原计划使用五个军（即十三、五十二、九十四、三十、四十军），除十三、五十二、九十四三个军已到达东北，大部担任交通掩护外，其三十、四十两军被共军阻于豫北，迄今未能前进。复以苏军延缓撤退，东北情形日趋复杂，乃续派七个军（即新一、新六、七十一、六十、九十三、五十四、九十九军），增加东北接收兵力，现新一、新六、七十一三个军已到达外，余在陆续运输中。”^①

白崇禧的报告表明，截至1946年4月初，国民党在东北共为6个军。最终的总兵力共7个军，即13、52、新1、新6、71、60、93军。^②

在进占长春的同一天，4月18日，林彪就四平作战的战术原则指示各参战部队：“我军的战役方针：是求得在局部地区，集中绝对优势力量，各个击破敌人”。“望各部切实坚持一点两面战术，集中兵力，猛攻一点，力避同时攻击数点”。^③在这个战术方针指导下，四平守军在初期取得了战术性胜利，阵地基本坚守下来。

随着马歇尔即将返华，中共对即将到来的谈判做出周密安排。4月14日，刘少奇致电周恩来，指示：向即将来华的马歇尔表示中共再不能让步的立场，对东北问题应强调停战、停运，

①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1），第216页。

② 杜聿明：《蒋介石破坏和平进攻东北始末》，《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第30页。

③ 林彪关于四平战役方针及战术运用给各兵团的指示，1946年4月18日。

承认中共领导的民主联军及地方民选政府，改组接收机构，由各党派参加。关于宪法问题，刘少奇指示：中共坚持政协关于宪草原则等五项决议，反对修改。^①一切仍归结为东北问题与宪草原则两点。

4月16日，周恩来致电延安，就谈判问题提出判断与建议，周说：“马歇尔到前虽传说纷纷，但东北压我，维持政协、整军协议、借款，抵华后谈，已成为一致意见。”判断马歇尔的立场是在东北问题上压制中共，但仍将维持政协、整军协议，同时仍坚持对蒋贷款。周建议：“据此分析，我以两面对两面，决提高价求全盘解决。”“全盘解决，中心在人权、宪草、东北、停战、整军五个问题。”^②全盘解决问题，无疑是一个“高价”，而能否实现这个高价，便取决于东北的军事胜利。

4月20日，毛泽东指示周在与马歇尔的谈判中，“争取东北停战，并解决一切国内大问题。”同日，毛再电周，具体提出东北、宪草、国大、自由、组府、运兵、借款7项问题，要求“均应向马歇尔严正表示意见”^③。“解决一切国内大问题”，此即四平之役的政治内容，四平之役所以演变为“决战”，正是由这种政治内容决定的。

4月18日，即中共进占长春的同一日，马歇尔回到重庆。自此，中国的政治局面形成两个中心：一个是四平的战争中心，一个是重庆的谈判中心；这是两个互为条件、互相作用的中心。

总体而言，马歇尔认为：“中共进攻并占领长春是对停战令的重大违犯”。“这个行动使我在谈判中的地位和我的努力，即

① 《刘少奇年谱》下卷，第35页。

② 《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248页。

③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71页。

说服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领袖们，采取某种妥协的行动方针是可取的，要更加困难得多。这个行动大大加强了国民政府中的极端反动集团的势力”^①。

4月19日，蒋在与马歇尔的会谈中试图从根本上改变马歇尔的立场，表示：马歇尔非先改变其对共党之态度与方针，决不能达成调解之目的，惟有美国坚持积极助我政府之政策，方能达成其消极容共之目的。^②但马歇尔的立场并未完全倒向蒋，蒋在4月20日日记中写道：“美国对华政策与马歇尔特使对共党之方针，殊令人忧虑不置。”^③4月22日，蒋日记载：“东北我军既告顿挫，共军气焰猖獗……当共党气焰高涨之时，其要求条件之苛刻，决难忍受，故应对马歇尔直说之，以促其觉悟也。”^④

马歇尔18日返渝时，周恩来曾往机场迎接，但22日才安排与周会谈。周向马歇尔谈了政府改组、宪草、国大等八个问题，最后，归结到东北问题。关于进占长春一事，周这样说：因国民党不愿停战，“反用武力侵占了我们七个城市。鉴于他们占了我们的地方，我们遂也进占了长春。”^⑤当日，周报告延安：“蒋在东北尚不愿停战，目前等援军。马可能让蒋打着，故不甚急见（我）。我们应准备十天内，在东北破路，打大胜仗”^⑥。

经过数日与双方的磋商摸底，4月23日，马歇尔拿出了他的停战方案，起草了一份东北停战令草案，共四点：一、双方军队必须于接到命令后24小时内停战。二、根据整军方案确定双方军队在东北的位置，国民党第60、93军继续调入东北。三、

① 《马歇尔使华》，第114页。

②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3），第115页。

③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3），第115页。

④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3），第116页。

⑤ 《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260页。

⑥ 《周恩来年谱》，第660页。

国民党军接收东北必须根据三人小组的专门指令进行。四、东北的政治问题由国共协商解决，目前暂维现状。^①

此次谈判国、共、美三方均提出了复杂而广泛的谈判议题，问题在于，谈判只能在停战的条件下进行，因此，看似复杂的调停活动，全部核心问题实际上只有一个，此即停战的先决条件，具体讲，就是长春的归属。

蒋介石的要求是，中共退出并由国民党军接收长春，然后停战谈其他。周恩来的要求是无条件停战，当然，“无条件”本身就是条件，也就是不让出长春。马歇尔作为调停人，只能主张立即停战，然后谈其他。然而立即停战事实上还是无条件停战，因此马歇尔的方案不能为蒋接受。

4月23日，马歇尔与周恩来举行第二次会谈。由于中共的主张是无条件停战，因此周在会谈中不提具体的停战方案，周说：“我不是胸中有何方案，故意不肯告诉你，事实绝非如此。以前我每次总是自己提出方案，吉伦将军很知道的，现在实在是我很难于提出方案。但我坚信，只要停了战，不运兵，必可有解决的方案。”^②

当日，军令部长徐永昌接替陈诚，出任三人会议国民党代表，并于当日会晤了马歇尔。徐记载：交谈中“马歇尔历述谈判以来，我方每不遵守协商条件，予共方以口实……尤其我方常认不利为有利，结果招致今日东北之不利形势。余谓国军之进入东北，目的原在接收失地，初不料共军如此之众（关外共军已达四十万以上，关内已逊）与装备之精速。”^③

① 转引自牛军《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第229、230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

② 《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267页。

③ 《徐永昌日记》1946年4月23日。

当日，马歇尔对王世杰说：“国共谈判之障碍在双方中任何一方均不了解对方之恐惧”。马歇尔向王指出：国民党“希冀以武力解决东北共军为错误”^①。

同一天，马歇尔还会晤了蒋，蒋氏日记载：“马歇尔氏于谈话中，全用压力，意在迫使我政府对东北问题再作让步”^②。

由于马歇尔于23日提出了停战方案，并在与徐、王、蒋的一连串会晤中施加了压力，中共根据对美、蒋关系的通常认识，即蒋“非随美国意旨走”，为此，判断问题已接近解决。4月25日，延安致电林彪、彭真：“渝周四月二十四日电称：目前政治形势，随马歇尔之来，尤其是长春胜利，可能逼近于解决”^③。

如前所述，中共是基于马歇尔能够迅速制止战争这一判断，而做出进占长春的决定的，因此对于马歇尔的期望是很高的。马歇尔4月18日返渝当日，延安指示东北局：马歇尔今日到渝，东北停战必很快；速催友方从哈市立即撤去，以利我军马上占领。^④同日，刘少奇指示中共重庆代表团：我军十七日晨已占长春。哈尔滨苏军于二十四日才能撤退完毕，我军可于其撤退当日或次日进占。“马歇尔来后东北可能迅速停战，望推迟时间至少到二十五日以后签字停战，才于我有利。”^⑤担心过早停战不能进占哈尔滨，要求25日进占哈尔滨之后再停战，可见对马歇尔制止战争的估计是很高的。基于这一判断，延安在四平守军甚为困难的情况下，一再电令坚持。

中共西满军区司令黄克诚说：“我历来考虑问题，总是把不

① 《王世杰日记》1946年4月23日。

②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3），第116页。

③ 中共中央致林彪、彭真电，1946年4月25日。

④ 《彭真年谱》上卷，第408页。

⑤ 《刘少奇年谱》下卷，第37页。

利因素尽量想得多一点，以便有备无患。”又说：“我是一个从坏处设想的人，所看到的现象亦是坏的方面较多”^①。黄克诚性格上的这一特点，在四平战役期间有过数次表现。

4月18日，李富春、黄克诚致电延安，内称：“新一军已到距四平七八里之地点，连日飞机助战，四平已难保持。目前最大问题，敌有新力量源源增加，而我无新力量增加。”四平决战的头一天，黄克诚即感到“四平已难保持”。4月20日，毛复电李、黄：“望克服一切困难争取胜利，十天之后可能好转。”^②毛所说10天后好转，不是指战场局势的好转，而是预测重庆的谈判局面会好转，故要求李、黄坚持。

马歇尔提出停战方案、周恩来估计“可能逼近于解决”之后，4月26日，毛电令南满军区程世才、萧华，要求“死守本溪”，“停战时机已不在远”。同日，毛又电令林彪、彭真：“马歇尔已提出停战方案，有停战之可能。望加强四平守备兵力……争取时间。”^③

4月27日，周恩来在与马歇尔的会谈中说：“我知道，无条件地停止冲突也是你的愿望”。又说：“我很清楚蒋的决心是先拿到了长春再来谈判……你和他有区别”。^④马歇尔与蒋确有区别，这种区别使中共继续判断停战将很快实现。

4月29日，延安致电东北局：许多国民党人表示不能打了，故停战协定之签订为期似不甚远。当日，毛泽东致电林彪：东北停战协定可能于两三日内签字，望努力奋斗，不要松懈。^⑤

正当中共判断停战已不甚远之际，停战的可能性实际上已经

① 《黄克诚回忆录》，第328、350、351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

②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72页注①。

③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73页。

④ 《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271页。

⑤ 《彭真年谱》上卷，第418页。

没有了。这一回中共低估了蒋，蒋并未“随美国旨旨走”。4月24日，王世杰见蒋，转告了马歇尔关于不能以武力解决中共的意见，蒋表示：“对中共要求东北方面无条件停战之议，认为不能接受。”^① 拒绝中共的无条件停战方案，等于拒绝了马歇尔立即停战的方案。

与马歇尔同样处于调停地位的是民盟，民盟对于中共攻占长春的行动是怎样看的呢？

梁漱溟说：“4月18日中共军攻占长春是时局一大转折点，是关键性的一天。”怎样一个转折点，怎样一个关键性，梁未说，但梁说了这样的话：“中共军攻占长春，当时张表老就表示不满意，所以提出要中共军撤出长春的方案。”梁又说：“中共拿下长春，我和张表方都不表同情。”^② 张澜为民盟主席，梁为秘书长，张、梁的意见基本上代表了民盟的意见。

据梁漱溟回忆：“马歇尔于4月22日派人来找民盟，请民盟帮助出任调停”。“马歇尔之所以要民盟出来，是想让民盟了解共方的打算，摸摸周恩来的底，看中共对东北究竟是要什么，以便他着手调停”。^③

民盟最初的调停方案是：中共撤出长春，国民党军队也不进去，由无党派人士莫德惠主持接收长春，长春秩序由警察维持。对此方案，周恩来表示要请示延安，不能立即答复。^④ 民盟的方案就是国共双方都不入长。当初，周恩来正是防备民盟提出这一方案，才向延安建议抢先开兵入长；现在，中共的决

① 《王世杰日记》1946年4月24日。

② 《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907、910、912页。

③ 《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907页。

④ 《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907页。

策又是无条件停战，因此民盟这个有条件的停战方案中共实际上是不能接受的。

此次代表民盟出面斡旋的主要是张君勱和罗隆基，张嘉璈日记4月28日载：“今日马歇尔将军复约君劼家兄及罗隆基谈话。彼二人建议设一三人委员会，前往东北实地考察，并提出下列数点：1. 从速停止冲突；2. 国共两军撤离至距离若干公里；3. 恢复交通；4. 恢复各市之中央政权；5. 改组东北政治机构。马听后，深以为然”。^① 这个方案未提到长春归属问题，不可能被蒋接受。

4月29日，周恩来致电延安：民盟于二十九日晚又提一调解方案，即先停战、停运，但说明在停战后即改组政委、经委，与行营分开，成立三三制联合的东北临时行政委员会，驻长春，行使东北政权，到时长春不驻兵。马歇尔表示不能接受。^② 政委、经委指东北行营下属的政治委员会和经济委员会。该方案主张先停战，这是马歇尔能够接受的，但停止运兵则又是与马歇尔的方案相抵触的。

在一连串的调停方案不能取得结果的情况下，马歇尔采取了一项出人预料的行动，即退出调停。4月29日，马歇尔向周恩来提出一个口头声明：“现在提出这个声明，即表示我实际上已经不经手调解这件事情。我看不出我再进行调解，能有什么更多的成就”^③。

此时国民政府即将还都南京，4月25日，蒋飞成都，出席一系列活动向四川父老告别，28日返渝。4月30日，周恩来就

^① 张嘉璈日记，1946年4月28日。《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第733页。

^② 《刘少奇年谱》下卷，第40页。

^③ 《马歇尔使华》，第121页。

近日谈判情况报告延安：“卯俭（按：4月28日）蒋自蓉回渝，马当日自十七时与蒋谈至夜半，不得结果。如我所料，蒋非接收长春不能停战不谈其他。蒋自认为除长春外其他各点可留待停战后谈，惟长春中共不让出即武力接收”。“蒋仍在说中苏条约是他负责签的，不能不让政府派兵接收。”周在与马歇尔的会谈中看到：“马情绪不高，数月来第一次看到他这样颓丧。”在谈判未得结果的情况下，周建议：“请东北以最大之力守住四平、公主岭……以保长春，而促停战成功。”^①

由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4月30日，马歇尔离渝赴宁，徐永昌前往机场为其送行，徐记载：“在机场中谈约半小时，渠谓长春问题如不能解决，即将退避不问云云。”也就是将退出调停的决定通知国民党代表。徐永昌尔后见蒋，“蒋先生仍述共党如不退出长春交国军接防，则一切问题皆可不谈。”^②

显然，马歇尔退出调停并未使国共双方改变立场。

关于此一僵局的形成，王世杰是这样看的：“东北问题，因中共强占长春不肯退出，蒋先生遂不愿接受中共所谓无条件停战之议，马歇尔将军之调停遂暂告无效。……中共问题及中苏关系已转入新阶段，此一新形势之酿成，其因虽不一，而二月十六日及二月二十二日之重庆大游行，实为苏联放弃与国民政府妥协之大原因。”^③这是王世杰对于中国政局转入新阶段的近因与远因的看法。

马歇尔所以退出调停，其意图是：“我认为，我退出调停地位，可以对双方施加压力，使他们在各自的立场上做出让步。”^④

① 《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281、282页。

② 《徐永昌日记》1946年4月30日。

③ 《王世杰日记》1946年5月2日。

④ 《马歇尔使华》，第123页。

其实，决定双方能否让步的关键，并不在于马歇尔个人的施压，而在于四平的战局。马歇尔的调停所以不得结果，从根本上讲，是因为四平的战局尚不明朗，因此谈判的局面也不明朗。反过来，谈判愈是不明朗，便愈是要求战局明朗起来。这样，延安对于四平作战的督导，逐渐完全被谈判进程所左右，四平作战完全从属于谈判的需要，这种指导思想，事实上必然导致置前线实际情况于不顾。

5月1日，毛泽东致电林彪：“东北战争中外瞩目。蒋介石已拒绝马歇尔、民盟和我党三方同意之停战方案，坚持要打到长春。因此我们必须在四平本溪两处坚持奋战，将两处顽军打得精疲力竭……那时，便可能求得有利于我之和平。”^①

就军力而论，中共本来并不具有与对方的精锐之师做战役决战的实力，中共所以敢于决战，主要是判断马歇尔能够迅速制止战争，而一旦马歇尔未能做到这一点时，四平守军必然陷入苦战，终于，出现了林彪所担心的既不能守城又不能歼敌的被迫作战的局面。

四 战局的转折与谈判的转折

中共于4月18日进占长春之后，21日，蒋在官邸召开作战会议。军令部次长刘斐的方案是：“拟一举攻占四平街，如攻占顺利，并追占长春，然后转移有力一部南下，消灭张学诗部”。这个方案的要点是先北后南。徐永昌不赞成继续北进，认为：“我孤军深入，今已为甚，奈何再进”；“军事力量仅能以锦州为主，沈阳左近为最大限”。最后，综合双方意见，蒋于当日给熊式辉、杜聿明下达一道手令：“如四平街有迅速攻克把握，则全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195页。

力图之，否则应即缩短战线，撤至开原、彰武线，暂取攻势防御”。^① 蒋未提是否进攻长春，但作战重心显然放在北线四平方向。

杜聿明于4月中旬回到东北，研究了东北战局长期胶着的原因，认为主要是以争城夺地为目的，未能击溃中共主力。为此，杜聿明并未按蒋对四平“全力图之”的手令执行，而是采取先南后北方针，首先攻击南线本溪，尔后抽兵北上，会攻四平。

当国民党在做判断与部署之际，中共方面也在做新的判断与部署。4月19日，林彪致电彭真并延安，建议迅速抽调南满部队北上增援四平，以利大局。^② 林彪这个意见得到毛泽东的肯定，4月21日，毛致电林彪、彭真，判断：“过去蒋军作战重心放在南面，是因估计长、哈苏军不会速撤，现在蒋军作战重心已经放在北面，以争夺长、哈为目标，故南满我军宜多抽调向北，并须兼程开进”^③。

4月21日，彭真致电程世才、萧华：“你们是林总直接指挥的，而四平以南之战则是决定全局的，有决定的战略意义的……务望兼程赶到清原，搭车北进。”^④ 4月22日，延安再令程世才、萧华：“速遵林彭令先调两个旅，星夜兼程北上作战，愈快愈好。”^⑤

按照上级指示，程世才率南满3纵北上增援四平，这样，本溪守军受到削弱。

中共的上述判断，从战略上讲是正确的，但从战术上讲，与

① 《徐永昌日记》1946年4月21日。

② 第四野战军战史编写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第8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8。

③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180页。

④ 彭真致程世才、萧华电，1946年4月21日。

⑤ 中共中央致程世才、萧华电，1946年4月22日。

杜聿明先南后北的方针恰恰相反，本溪守军必然陷入极为不利的境地。

4月29日，杜聿明调集新6军和52军会攻本溪。5月3日，毛泽东致电萧华：“你们决心保卫本溪，中央甚为欣慰。”^①然而就在当日，本溪陷落。

本溪失守，成为四平之役的转折点。

不知是巧合还是一种相关反应，本溪易手后数日，苏联大使馆武官向蒋经国转达了斯大林邀请蒋介石访苏的意向。对此，王世杰的看法是这样的：“予一再考虑后觉史氏（按：指斯大林）目前正以中国共产党在东北之武力为对我挟持之工具，蒋先生此时前往，如接受苏联之要挟，则必须承认中共之东北地位……如不接受其要挟，局势或将更僵。因主张暂不拒绝亦暂不应允即往……蒋先生以为然。”^②而蒋在5月11日的反省录中这样认为：“史达林邀余访俄，此乃离间中、美关系之最大阴谋。”^③王、蒋对苏均采取回避态度，以避免苏联再度插手东北问题。

本溪易手之后，马歇尔开始策划第二次出面调停。5月10日，马歇尔向蒋递交了一份东北问题备忘录，主要不是谈停战条件，而是对国民党的东北战略提出建议。马歇尔从中共的行动、苏联的反应以及国民党军的后勤保障几个方面做出分析后，认为：“国军力量之集中应在东北之南部，大部分集中于沈阳附近及葫芦岛以北。”马歇尔判断：“国军向长春北进，则获致协定之希望即甚微，除非能击毁在东北之共党军力，此点余意非政府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200页。

② 《王世杰日记》1946年5月9日。

③ 《蒋总统秘录》第14册，第58页。

力量所能及”。最后，马歇尔建议在长春设立军调部前进指挥所。^①

长春的归属是停战的关键，为此，马歇尔绕了一个大圈来说明这个问题，其意思归结为，从战略上指出国民党军应集中力量控制南满，以此说服蒋不必北上拿下长春，以军调部前进指挥所进驻长春的方式解决长春问题，从而实现东北停战。这个备忘录实际上就是马歇尔为其第二次出面调停，所做的一个铺垫。

5月11日，马歇尔提出一个4点方案，开始了他的第二次调停。4点方案如下：

- (1) 中共撤离长春，在长春设立军调部前进指挥所。
- (2) 政府军在不超过六个月的时间内占领长春。
- (3) 满洲驻军比例以共军一个军对政府军五个军为基础。
- (4) 中共不占领长春以北的关键城市。^②

以军调部进驻长春的方式解决长春问题，就是国共暂时都不进驻长春。一周之前，马歇尔已经探询过徐永昌，“长春将来国共可否皆不驻兵”。^③但国民党军可于此后数月内进占长春，因此这一点对国民党是有利的。

5月12日，蒋答复马歇尔，大致同意该方案，同时蒋要求马歇尔：“不要做出努力同共产党代表开始讨论，最好由共产党提出初步建议。”^④蒋在与中共的交道中有一条经验，即不首先提出谈判方案，而使中共首先提出，包括毛、蒋重庆谈判和其他谈判就是如此，其意图是防止中共转移议题、变更条件。

蒋的这个经验传授看来马歇尔并未接受，5月13日，马歇

①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3），第120~124页。

② 《马歇尔使华》，第125、126页。

③ 《徐永昌日记》1946年5月4日。

④ 《马歇尔使华》，第126页。

尔与周恩来再度会谈。此时，中共方面仍未改变无条件停战的主张，因此周恩来表示：“现在对东北问题尚无新方案”，“我将使我们的党知道你的话和现在的这种情形，以考虑问题。现在我暂保留不再谈。”^①

马歇尔向周提出了他的新方案“共产党撤离长春，在长春设立军调部的前进指挥所，国民政府的军队留驻他们目前的阵地，那时便开始就军队配置和政治问题进行进一步的谈判。”^②对此，周表示将转告延安。

当日，周恩来致电延安，判断在东北问题上，“马蒋之距离已不相远”；其原因：“很难希望马既认识苏在东北助我而他仍会去要蒋无条件停战。故我方利用美马的可能性已日益狭窄，而欲麻痹之则更难。”^③利用马歇尔的可能性收窄，也就是说，无条件停战的可能性不大了。

5月3日本溪失守后，5月6日，毛致电萧华：“本溪虽失，你们牵制敌人甚多，这就是胜利。望鼓励各旅继续在本溪周围阻击敌人，并派部袭击敌之来路，务使新六军、五十二军不能北上为要。”^④毛已看出杜聿明下一步即将抽兵北上会攻四平，故要求萧华将该两军牵制于南满，但这一意图未能奏效。

本溪得手后，杜聿明随即抽调新6军廖耀湘部北上加入四平作战序列。5月13日，杜聿明完成了对四平的攻击部署，以新6军廖耀湘部为右翼兵团，攻击方向为公主岭；以新1军孙立人部为中央兵团，击破中共当面阵地；以71军陈明仁部为左翼兵团，

① 《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318～322页。

② 《马歇尔使华》，第128页。

③ 《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327、328页。

④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79页。

击破中共当面阵地后向三江口、郑家屯方向追击前进。^①

由于四平战局长时间处于胶着状态，最后时刻，重庆统帅部已呈动摇迹象。5月13日，在蒋召集的一次会议上，原力主攻下四平的军令部次长刘斐“亦主东北不可再攻”，但杜聿明没有动摇。14日，在蒋召集的另一次会议上，“据杜聿明派来参谋称：一月来攻四平街无进展，近调新六军两个师及七十一军之八十八师加入我右翼，希望一举攻下四平街，结束对北之攻势。”^②也就在当日，杜聿明下达了对四平的总攻命令。

此刻中共四平守军的处境已极为不利，黄克诚连续给林彪发去几个电报，建议撤退，而林彪概不回电。5月12日，黄克诚直接致电延安，认为：“四平坚持有极大困难，四平不守，长春亦难确保。”此为，黄建议：“故如停战不能在现状下取得，让出长春可以达到停战时，我意即让出长春，以求得一时期的停战也是好的。”^③黄克诚是这一战役中，明确提议让出长春的中共高级将领。

看来黄克诚的电报触动了毛泽东，5月15日，毛致电林彪、彭真：“现在是马歇尔第二次出面调停，请你们考虑军事全局，再打下去是否有利，应否考虑有条件地让出长春换得其他地区的合法，并取得时间整补军队”。^④当日，毛指示周恩来，可向马歇尔提出：（一）东北停战一星期；（二）长春国共双方不驻兵。^⑤长春双方不驻兵的意见，表明毛开始从无条件停战转向有条件停战。

长春双方不驻兵，此时已有两个方案：一个是马歇尔提出的

① 杜聿明：《蒋介石破坏和平进攻东北始末》，《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第46页。

② 《徐永昌日记》1946年5月13、14日。廖耀湘所率新6军为3个师，加配属的71军1个师，廖部共为4个师，徐永昌所记不甚准确。

③ 《黄克诚回忆录》，第347页。

④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81页。

⑤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81页。

军调部前进指挥所进驻长春的方案，一个是早些时候民盟提出的由莫德惠主持接收长春方案。5月17日，根据毛的指示，周恩来与马歇尔会谈，由于此前周一直坚持无条件停战，所以周不便将双方不驻兵的意见直接提出。周采取的方式是，将话题引入马歇尔方案，由此而将问题提出。

周这样说：“东北问题。我上次把你的意见报告了延安，延安还得考虑，同时也要征询东北的意见。因此在这个时间内我还愿意聆悉你的更具体化的意见……例如，那天你所说的，中共军退出长春，政府军仍留原地，由执行部另派一部分人去长春。”^①

马歇尔的方案基本为军事方面的安排，而未涉及长春和东北政治方面的安排，为此，周恩来提到民盟的方案，即改组东北行营政治、经济两个委员会，由莫德惠或张嘉璈做主席等等。马歇尔告诉周：“蒋委员长不欢迎民主同盟提出的改组东北政治委员会和经济委员会的建议”。为使中共和民盟不能打东北行营的主意，蒋已在考虑一个釜底抽薪办法，5月12日，蒋告诉马歇尔，准备撤消东北行营，东北九省由政府直接控制。^②

此次会谈中，马歇尔一再强调他不愿再一次卷入僵局，“另一次僵局将不仅更加降低我的影响，而且也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冲突的恢复。”^③这是在给中共施压，强调他的第二次出面调停，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周恩来最后表示：“现我愿先研究你的意见，我们再交换。”^④

然而，由于战局骤变，留给谈判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① 《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334～337页。

② 《马歇尔使华》，第130、126页。

③ 《马歇尔使华》，第130页。

④ 《周恩来一九四六谈判文选》，第337页。

5月14日，杜聿明指挥71军、新1军、新6军从左、中、右三个方向对四平发起总攻。廖耀湘率部加入四平作战序列后，廖研究了新1军和71军在四平长期打不开局面的原因，认为主要是该两军正面攻击点过于狭小，这样，“使解放军可以集中兵力在一个狭小正面上作有力的抵抗”。同时，也由于正面过窄，“致使自己之侧背及后方交通完全暴露，引起解放军之侧击与迂回”^①。有鉴于此，廖将所属四个师编为两个纵队，实施宽正面的两路分进合击，5月14日发起总攻后，廖部于18日下午4时，推进到火石岭子地区。

新6军出乎预料的快速突入，造成四平守军有被封闭退路的危险。18日，林彪致电延安：“四平以东阵地失守数处，此刻敌正猛攻，情况危急。”^②不待延安复电，林彪果断下令18日晚撤守。19日，新1军孙立人部进占四平。

四平易手，接下来的目标便是长春，东北问题进入最后时刻。

战局的转折，蒋的要价随即提高。蒋原本已大致接受马歇尔关于军调部前进指挥所进驻长春的方案，现在，蒋再次回到最初的必须进占长春的条件上。

5月20日，蒋“召集党政最高小组会议，决定对中共采取严厉态度，协商已告无效，如果中共不退出长春，彼此无谈判可言。”^③当日，蒋致电三人会议和北平军调部，实际上是通知周恩来和马歇尔，表示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本已为政府接收，如果中共“将其共产军队自动退出长春等我政府前所业已接收之

① 廖耀湘：《蒋军新六军迂回四平街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第67页。

②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83页注①。

③ 唐纵日记，1946年5月20日。《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619页。

各地，而由三人小组或执行部负责调处，则我军极愿竭诚接受其调处”。^① 在长春即将得手的情况下，蒋提出了对哈尔滨等地的要求。

5月20日，周恩来、董必武等致函民盟的张君勱、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等，表示：“东北已演成规模空前之大战”，“当前局势严重如此，吾辈惟有以披发纓冠之心，为奔走和平之举”，“亟盼民盟方面，速有代表来京，共同努力”。^② 民盟此时已基本退出调停，呼吁民盟干预东北战事，实际上就是呼吁民盟再度参加调停。

5月21日，周恩来与马歇尔会谈。此次会谈是在四平失守的背景下举行的，因此和以往不同。周恩来首次提出了中共的停战条件。由无条件停战到有条件停战，这个转变无疑是战局转换在政治上的反映。周恩来所提条件基本上就是民盟的原方案，即将东北行营的政治、经济两个委员会改组为临时行政委员会，由国、共、民盟三方组成，长春市长由中立人士担任。^③

5月22日，周致电毛：“现在四平街已失，请中央考虑下列可能及方案：甲．我如不让长春，则迟早美必助蒋攻下长春，届时我结城下之盟，条件必苛；乙．我如能坚守公主岭，一方给蒋以有力打击，一方准备让出长春，以交换其他较有利条件”。周同时表示：“在今天东北问题上无条件停战只是宣传口号，而无解决问题可能，故对中间分子乃至民主派，已不易完全接受”。由于各民主党派不能接受无条件停战，因此，“现各党派在上海迟迟不来”。^④ 可以看出，周是倾向于乙案的，但乙案能否成功，则又取决于撤离四平后，能否守住公主岭。

当日，毛致电周：“在目前条件下我应决心让出长春，请你

①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3），第126页。

② 《周恩来年谱》，第666、667页。

③ 《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348、349页。

④ 《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351、352页。

根据此项决心负责进行谈判”。“让出长春有三种方案。第一种如中央上次所提，双方不驻兵，中间派任市长；第二种如马歇尔所提，执行小组先去，一切谈好后蒋军再去；第三种蒋军无条件即进长春，这种情况最坏”。^①显然，中共是力求避免“最坏”的第三种情况。

5月22日，民盟的张君勱、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梁漱溟联名分电蒋、毛，表示：东北战争，“外失盟邦友情，内失全国人心”，如再不停战，“势必牵动全局，举累月以来之协议而破坏之。同人宁愿今日死于公等之前，不愿身见其事。”他们提出三点方案：“（一）中共军队撤出长春；（二）中央不再进兵长春；（三）东北政务委员会驻长春，主持政务，就地组织警察行使职权”。^②与民盟的原方案基本相同。5月23日，毛泽东直接复电张君勱等，表示对他们的方案“原则上极表赞同，一切由恩来面商”。^③

中共如果要把长春“让出”，以作为交换其他的条件，则必须据有长春。5月19日，毛电令林彪：“长春卫戍部队应立即开始布置守城作战，准备独立坚守一个月”。但在当日另一电令中毛授权道：“究应采取何项方针，由林根据情况决定之。”^④也就是将长春问题决定权授予林彪。

5月20日，林彪就此向延安和东北局提出如下意见：“我们估计敌人攻长春时，则可能放弃四平的方法而改为一般的攻城方法，即先围城尔后攻城。长春人口近90万，防线百余里，需要大量的守军，敌如集中飞机、大炮、坦克，掩护步兵攻一点，则可能既

①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85页。

② 黄炎培日记，1946年5月21日。

③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85页。

④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226页、225页注③。

不能守住城市，又丧失运动战的机会。故今后主力以打运动战较好”。^① 林彪没有正面提出不守长春，但这个意思却是明白的。

5月22日，中共部队撤出长春，长春未能成为“让出”的一个谈判条件。

蒋在杜聿明即将攻下四平之际，曾担心杜聿明深入过远，于5月17日派白崇禧前往东北以节制杜聿明。白对杜说：只要将四平街打下，对中共的和谈即有面子，并说蒋介石的意见，不拟再向长春北进。杜聿明说：鉴于去年11月26日到锦（州）后奉令停止，到今年3月底为止这三个月之间，共军兵力增加一倍多，国军当时以两个军可以顺利打到锦州，而现有七个多军却到处被共军牵制，尚不能顺利打下本溪、四平，说明停战是对共军有利而对我军不利。白崇禧被说服，同意进占长春。^②

在杜聿明向长春进军的同时，中共撤退的迹象基本上被国民党掌握。徐永昌记载：“据东北空军王司令叔铭报称：（一）公主岭一带共军两万余分两路退却，经轰炸扫射，溃乱颇甚。（二）长春有颇多物质车辆向永吉退去，又长春沿站空列车颇多，亦无新增部队。”^③

此时前方的局面已是一片混乱，5月22日晚，蒋召集何应钦、陈诚、徐永昌、刘斐、俞大维在官邸磋商。据载：“饭后白健生到，渠午后归自东北，述攻克四平街时，林彪之作战科长王瘦芳来降”。王瘦芳的供词有：“因畏美关系，队伍中无苏联人。”“如追的快长春可下”。并称仅黄克诚、林彪所部有战斗

^① 林彪致中央、东北局的报告，1946年5月20日。

^② 杜聿明：《蒋介石破坏和平进攻东北始末》，《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第47、48页。

^③ 《徐永昌日记》1946年5月21日。

力，“今日作战全凭黄、林关内来之十一二万而已”。^①

王瘦芳的供词对于国民党下决心向长春推进提供了重要信息。国民党长期怀疑苏联红军直接帮助中共作战，因此蒋对是否进攻长春本来是有顾虑的。蒋曾对白崇禧说：“据报长春有六千着便衣红军，万一肇事起冲突，怎样？”^②王瘦芳证实中共队伍中“无苏联人”，这便消除了国民党军进攻长春的顾虑。

5月22日晚廖耀湘部进入长春，23日占领全城，出现了毛泽东所说的“最坏”的情况。

五 关于四平之役的评价

四平之役是中共在战后所遭遇的最为严重的军事失利；同时，由于该役是在一系列政治意图和政治判断的基础上做出的一项政治决策，因此，也是最为严重的政治失利。

迄今，关于四平之役尚没有一个一致的评价。头一个对该役做出肯定结论的，是该役的决策者毛泽东。毛于5月19日致电林彪：“四平我军坚守一个月，抗击敌军十个师，表现了人民军队高度顽强英勇精神，这一斗争是有历史意义的。”^③

在东北和与战的问题上，中共中央、中共重庆代表团和东北方面的看法是有分歧的。总的来看，延安与重庆方面认为有和的可能，而东北方面则认为无此可能。

1946年1月26日，刘少奇致电东北局并林彪、黄克诚：“现全国停战业已实现（这在蒋是被迫停战的并不是蒋的阴谋），

① 《徐永昌日记》1946年5月22日。

② 《白崇禧回忆录》，第339页，解放军出版社，1987。王瘦芳于1946年5月25日在《中央日报》发表《投诚自述书》。

③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224页。

东北亦必须停战”。“我党目前对东北的方针，应该是力求和平解决，力求国民党承认我党在东北一定合法地位的条件下与国民党合作”。^①刘少奇特意向林等解释蒋之停战不是阴谋，看来林等认为是阴谋。

3月13日，刘少奇致电东北局和中共重庆代表团：“东北同志的想法和你们及我们都有很大距离，他们雄心很大。不了解为什么要让出许多地方给国民党，东北全党全军都是这种心理”。刘认为，在蒋军不承认中共东北地位时，这种强硬政策是好的，“但在国民党真意与我谈判，并承认我在东北地位时，我们必须有某些让步才能达到妥协。也只有到那时，才能说服东北同志。”刘判断：蒋介石“不论他的兵力、士气与民心，也不论国际国内环境，都无在东北大打久打与反苏反共到底之可能。”^②而林彪4月11日仍然致电延安认为：迅速实现东北和平的可能性不大。^③

和平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个问题直接牵涉东北的军事方针。1946年1月5日，林彪致电延安，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国内和平是否完全可靠，如完全可靠，则我在东北部队目前应集中力量做最后之一战；如不可靠，则仍分散和建立根据地。^④也就是说，集中力量作战还是分散建立根据地，是由和平与否决定。同样，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四平作战的方式。如能实现和平，便要求进占长春，坚守四平，从而在一个有利条件下停战。如不能实现和平，便可不攻长春，在四平采取运动战，以歼敌为主，而不必守城。

四平之役的失败是因守城造成的，而守城则又是对和平的判

① 《刘少奇年谱》下卷，第12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91页。参照《刘少奇年谱》，可知该电为刘少奇起草。

③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164页注②。

④ 《彭真年谱》上卷，第347页。

断所决定的。因此，林彪在下令四平撤守时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和平空气，在我们今天的东北是最害人的。”^①对和平空气的否定，实际上就是对这一战役政治决策的否定。

关于四平之役中共伤亡人数，通常说法是8千多人，这个数字大约是指4月下旬至5月下旬决战期间的伤亡人数，并且很可能还只是四平一处的数字，不包括本溪。如果从3月下旬的初战阶段算起，数字就不同了。黄克诚于1946年5月24日致电延安，其中提到：“从三月下旬国民党军进攻起，到长春撤退，我军除南满外，总伤亡一万五千人，仅西满四个旅及一部地方部队，伤亡达七千左右”。^②这就是说，伤亡15000人，还只是四平地区，如果加上南满本溪地区，伤亡肯定在15000人以上。

四平之役的失败，在部队中也产生了消极影响。5月31日，林彪报告延安：部队逃亡现象严重，士气日益涣散，战斗力薄弱。^③黄克诚在给延安的电报中反映：“干部中一般情绪不高，特别是营以下干部一般有很大厌战情绪，负伤到后方抢扰打人嫖赌（表现）很坏，伤愈后不愿归队。比较好的则要求到地方工作，坏的很多逃跑……有些干部则装病到后方。这些现象是抗战八年所未有。”^④抗战八年未有的不良现象出现，这当然是四平之役的后果之一。

中共在四平战役中所采取的守城作战方式，国、共、美三方都对此做出了战术总结，有趣的是，三方看法大体上差不多。

① 《辽沈决战》上，第228页。

② 《黄克诚回忆录》，第349页。

③ 《彭真年谱》上卷，第427页。

④ 《黄克诚回忆录》，第349、350页。

5月27日，林彪致电延安，认为：“四平之守，乃因敌未料我军防御，故逐次增兵来攻，被我各个击破……故四平街防御战乃一时特殊条件所形成，而不能作为我一般的作战方针。”^①

由于毛已对该役做出了“有历史意义”的政治肯定，因此林不可能就“和平空气”之下的政治决策提出政治总结，而只能就纯粹的战术问题提出意见。该电回避正面的将四平之役作为经验教训提出，而实际上又提出并吸取了这一教训，并明确排除了此类作战方式的继续采用。

大约因为林电既可避免政治争论，又可避免此类十分不利的作战方式继续采用，因此林电的意见被毛相当迅速地采纳。5月27日当日，毛致电各战略区，表示：“东北四平街之所以能久守，主要是因敌未料我军有防线，故逐次增兵，便于为我各个击破……故四平防御战为一时特殊条件所致，不能成为我一般的作战方针。”^②以正面解释的方式而否定了守城作战。

当中共对守城作战做出经验总结之际，蒋介石也做出了他的判断。6月初，蒋在南京的一次军官会议上说：“共产党将来同我们作战，一定不敢采用阵地战”；“他们最近在东北四平街得到一次教训，当然是不敢与我军作阵地战了。”^③

蒋的判断没有失准。7月7日，中共东北局在一项决议中指出：“我军作战的原则，不在于城市和要点一时的得失，而是力求消灭敌人。”“一般地不作阵地战，广泛地使用运动战和游击战。”^④重新确立运动战原则，正是从四平之役中引出的教训。

三年后，马歇尔在与顾维钧的一次谈话中说：“共军对政府

① 林彪致中共中央电，1946年5月27日。

②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236页。

③ 《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1，第328页。

④ 《辽沈决战》上，第47页。

军仅有的一次鏖战是在四平街，结果共军败北，这对他们是一次沉痛的教训。此后，他们留心不再重蹈覆辙。”^①

笔者曾于另文指出：“四平失守，是中共政治意图与军力不相符的结果。”^②至今，这仍然是笔者的基本结论。

本章小结 四平之役是国共战争史上一次特殊的战例。通过局部性的军事决战方式，而体现全局性的政治决战意图；这种特殊的战役性质构成，是由中国政治特殊的内容构成决定的。

东北问题是战后中国政局中一个相对独立、甚为特殊的问题，独立性指它处于苏军的控制下，特殊性指它具有外交与内政的双重性质。这种独立性和特殊性，造成东北问题未能同步地被纳入战后中国政局的一般进程，处于一种既不停战、又不谈判且又无人能够出面调停的局面。苏军撤离后，东北问题必然失控。

政协会议是战后中国政局中又一特殊事物。孙科曾将政协会议称作“和平革命”。一般说，中国政治遵循这样一个原则：在战场上得不到的，在谈判桌上也得不到。然而政协协议恰恰是一个尚未经过战场上的决定性的较量，却在谈判桌上达成的变更国家政体的协议。从这个意义上讲，和平革命并不符合以武力决定国家权力的民国政治的逻辑。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所爆发的强烈的不满情绪，从根本上讲，就是民国政治逻辑的反弹。

东北问题的失控，决定国共两军必然发生局部性的军事对抗，国民党掀起的政治反复，决定国共两党必然发生全局性的政治对抗，这种政治对抗的意图注入到军事对抗之中，从而使本来只是一次常规意义上的四平攻防战，反常规地演变为局部性两军

^① 《顾维钧回忆录》第7册，第130页。

^② 邓野：《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六年间国共力量的“平衡”与政争》，《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

决战，由此而构成四平之役特殊的战役性质。

四平之役以武力决战的方式，为国共之间的政治争论，做出最终的结论。这个以武力做出的结论在政治上的反映表现为，国共谈判的样式骤然间返璞归真，国共不再就抽象的问题做抽象的争论，而是直截了当地做实力范围的争论。问题在于：谈判样式的返璞归真，意味着谈判本身的终结也就为期不远了。

第十二章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 终结

——最后的谈判

四平之役的性质既然是通过局部性军事决战的方式，而体现全局性政治决战的意图，那么，其后果与这种性质基本相等，也就是在军事上反映为局部性后果，而在政治上则反映为全局性后果。1946年6月至7月的国共南京谈判，正是四平之役的后果在政治上的反映。

一 停战条件与停战令

1946年5月22日晚，即廖耀湘部进入长春的当晚，“蒋先生定明日飞沈阳”^①。蒋在此时前往东北，显然是要实地评估前线战果，从而为停战条件也就是谈判条件，开出价码。

23日临行前，王世杰见蒋，“询以四平街既下，可否将东北战事告一段落，与中共续作政治商谈。”蒋称：“必须中共退出长春与哈尔滨。”当日下午王又见马歇尔，“告以国共商谈使人沉闷，但望彼无松懈其调停之努力。”马歇尔说：“国民政府应利用四平街之胜利，立即停战，求取和平解决，不可因此而萌武

^① 《徐永昌日记》1946年5月22日。

力解决全局之念。”王表示：“予当尽力促成休战之议。”^①但随着长春的易手，马歇尔对蒋的影响力已大为削弱。

5月24日，蒋由沈阳以宋美龄的名义致函马歇尔，提出他的停战条件，共四项：

- (1) 应即完全实行1月10日的停战协定。
- (2) 应按计划继续进行2月25日签订的整军方案。
- (3) 应即履行2月11日商订的恢复交通办法。

(4) 先决问题：中共不得阻碍政府接收东北主权；中共不得阻碍政府修复全国铁路；履行上述三项协定，必须予以执行部美国代表解释权、仲裁权、决定权。^②

上述条件中，最主要的是先决条件，而先决条件中较为突出的是，提出了美方决定权问题。当日，宋美龄还有另一补充函致马歇尔，表示中共如接受前函条件，蒋可接受中共在东北保有三个师，即交换条件。

马歇尔使华以来，国共之间达成的协议主要是四项：停战、恢复交通、政协、整军，蒋的上述条件惟独不包括政协协议。蒋原来的停战先决条件是由国民党军进占长春，然后停战商谈其他。现在长春得手之后，又提出了另外的先决条件。蒋为什么变更条件提高要价？24日蒋还有一密函致宋子文，要宋就上述条件向马歇尔详细解释，蒋称：“此间军事情势共军之惨败实为意想所不及也。”^③这就是说，蒋是根据四平之战果而开出的相应的要价。

与此同时，蒋还做了另一手安排，即重提中苏经济合作一事，力图以此争取苏联，从而切断苏联对东北地区中共的支援。

^① 《王世杰日记》1946年5月23日。

^②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3），第127页。

^③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3），第129页。

王世杰日记载：“蒋先生自沈阳来电，嘱对中苏在东北经济合作问题，加速与苏联大使谈判，并谓以苏方所提将琿春煤矿列入合作范围一节，可予同意。”但王世杰对此仍不积极，认为：“予意此事仍不宜急速进行，以长苏方之欲。”^①最终，经济合作一事不了了之。

5月26日，宋子文按蒋的意思与马歇尔谈话。马歇尔表示，根据他的情报，“此次共军死伤一万二千，俘虏仅四百余人，如是共党主力并未击散，共军现在避战，如国军跟踪而进，则必延长战线，予共军以处处可以截击之机会。”马歇尔的意思是，中共主力既未被击散，国民党应适时停战，不能提出过高的停战条件。宋子文则说：中共“经此打击，势必瓦解无疑”^②。宋之所言显然是外行话，但反映出马歇尔的意见已很难为国民党方面听进去了。

5月26日，马歇尔致函蒋，要求立即下令停止进攻，“余觉继续阁下目前军事上之推进，徒足招致国军初入东北时所遇不幸结果之重演”。关于美方决定权，“余觉事实上将使美国人浸至美国政府负责决定甚多即将发生之重大问题，其范围似觉太广。”没有完全拒绝决定权，但建议美方决定权“限于特定之事项”，如执行小组应如何前往何地、接见何人等等。^③马歇尔显然不愿过深地陷入国共之争，而愿为自己留出余地。

当日，周恩来致函马歇尔，就宋美龄24日来函所提条件做出答复。关于蒋所提停战、恢复交通、整军三个协定，周表示原则上完全同意，而对于蒋所提先决条件，周则表示疑义。关于蒋提出的东北主权问题，周指出苏军已撤，意即东北已无主权问

^① 《王世杰日记》1946年5月25日。

^②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3），第131页。

^③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3），第133、134页。

题。关于美方决定权问题，周表示在调查程序的决定权上愿作努力。^①

5月28日，蒋复函马歇尔，关于东北主权问题，坚持凡中苏条约所规定者均应由政府接收，尤其是长春路全线及两侧地区，称周恩来的说法是“巧辩”。蒋坚持“必须由美国代表能负其责任，并赋予美国代表有决定之权能。”当日，宋美龄另外致函马歇尔，实际上是将一些不便由蒋对马歇尔直说的话，由宋来说。宋称：蒋希望中共遵守诺言，“否则，委员长认为惟一之途径为在东北占领军略要点，以强使共产党真正遵行其所签订之各项协定，届时则阁下之谈判必可成功矣。”^②此言表面看是对中共而言，实际上是对马歇尔立即停战的要求而言，其潜词是，中共如不接受条件，便将置马歇尔的停战要求于不顾。

收到该函后，马歇尔激动起来，5月29日，马歇尔通过宋子文向蒋提出一份备忘录，表示：“阁下除于蒋夫人函中独自指定停战条件外，复无其他终止战争之行动，此种情形，使鄙人之调停工作，极端困难，且可使鄙人之调停，实际上成为不可能之事。”^③也就是警告蒋，他可能会第二次退出调停。

在对蒋介石施压的同时，马歇尔也对周恩来施压。5月30日，马歇尔将蒋28日函交周阅，并与周会谈。马歇尔向周表示了三条意见：“（一）交通即行设法恢复；（二）美方对于若干事件，保有决定之权；（三）共军应退出哈尔滨、齐齐哈尔。以上三点，应由共方接受，除此以外，无法调停。”^④周说：“蒋这次的信和蒋夫人的信各节如都是停战的前提，即这些不解决便不能

^① 《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359、360页。

^②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3），第135~138页。

^③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3），第139页。

^④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3），第140页。

停战，如一定如此，仗便会从东北打到关内，全面破裂，一切推翻。”强调首要问题是停战，如不停战而谈恢复交通，“那将是一边修，一边破了”。周同时表示：“关于美国军官决定权问题，我可直率地告诉你，小组中的决定权，我方不能接受。”^①

当日周恩来致电延安：“马受蒋怂恿，竟提出美方决定权三条，以难我。”蒋一再强调美方决定权，其意图是什么呢？周的判断是：“以推马与我斗，而拖美下水。”^②周对蒋的确知之甚深。关于此事，周恩来在6月3日与马歇尔的会谈中做了深入的说明。周说：最后决定权“在形式和本质上都应将把美国朋友放在更困难的地位上，弄得左右都不是。”“如果你做得只对国民党合适，中共自然反对，造成你和中共的对立；如果你做的事，中共觉得对，而国民党反对，则总有做不下去的一天”。周指出，蒋这一提议是“使美国上当，把美国推到与我方对立的地位上去。”^③

蒋原定5月30日返宁，因停战令只有蒋返宁之后方可望下达，因此各方人士均盼蒋如期归来。5月29日，张君勱、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梁漱溟联名致电蒋：“深盼钧座公毕，早日言旋，俾得承教，至所殷切。”^④

但蒋由于其停战条件未得满足，5月30日，蒋忽改行程飞往北平。拖延在外逗留时间，就是拖延停战令的颁布时间，以此对各方面继续施压。这一回马歇尔被激怒了，5月31日，马歇尔通过宋子文致函蒋，表示：“鄙人兹特重向钧座申述，政府在东北军队之继续前进，不但使鄙人之调解愈趋困难，即鄙人之信

① 《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372、373页。

② 《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375页。

③ 《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392、393页。

④ 《大公报》1946年5月31日。

用人格，亦已大为动摇，因之鄙人特再恳请钧座，立即下令停止政府军队之前进攻击与追击。”^①

眼见马歇尔被激怒，宋子文沉不住气了，当日，宋亦致电蒋，表示：“马帅心情，由此可见，恳钧座即日返京，以便面商。”^②

与宋子文等人相较，蒋的政治经验老到得多，不为所动，继续他的北平之旅。蒋在北平做什么呢？6月1日，蒋出席观赏荀慧生等人的京剧演出，被邀一同看戏的顾维钧记载：“委员长像是非常认真地欣赏着这次演出，并不时对不同的演员加以评价。这些评价似乎相当贴切，说明委员长对京剧有很好的素养。”^③蒋当然不是要在顾氏面前表现他的京剧素养，而是要将南京各方人士置于极度焦虑与不安的境地。

与蒋在北平悠然赏剧形成强烈反差，南京的气氛更加紧张。王世杰日记6月2日载：“今日为星期日，午后二时，马歇尔来予寓，极称如我不停止东北军事行动，则彼将被迫采取退出调停之决定。”马歇尔发出最后警告。

6月3日，蒋在时局最为紧张的时刻出巡11天后回到南京。6月6日，蒋发布停战令，规定从6月7日起停战，期限为15日，同时规定：“下列各点必须在此十五日内获得完满之解决：一、完全停止东北冲突之详细办法；二、完全恢复国内交通之详细办法及进度；三、获得一确切之基础，迅即实施本年二月二十五日有关全国军队复员、整编、统编之协定。”^④同日，周恩来发表声明，措辞与蒋不同，但接受了三项谈判。

①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3），第141页。

②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3），第142页。

③ 《顾维钧回忆录》第5册，第714页。

④ 《中央日报》1946年6月7日。

停战时限仅 15 日，而三项谈判必须于 15 日内“完满之解决”，因此，这个停战令并非无条件停战，而是有条件停战。正因为如此，6 月 7 日，杜聿明发表谈话，表示：“十五日后国军仍将继续分赴未接收各省接收领土主权。”^①此即对停战条件的强调与呼应。

四平决战之际，中共曾提出“解决一切国内大问题”的一揽子谈判方案，包括改组东北行营、反对修改政协宪草原则等等，而现在的三项议题与之相去甚远。这是中共自提出联合政府要求以来，国共谈判在议题的确定上，头一次被全盘纳入蒋介石的议事范围。

1946 年中国发布过两次停战令，两次停战令的性质与形式有所不同。1 月 10 日的停战令是为召开政协做准备，以解决国民党一党训政的国家政体为政治基础，形式上则是蒋、毛分别发布命令，以示对等。而 6 月 7 日的停战令是以中共为对象的三项议题为基础，形式上则是蒋单方面发布命令，这种性质与形式的转换，正是四平之役的结果在政治上的反映。

二 各方面对时局的看法

四平之役进行期间，鹿死谁手尚难料定，因此《中央日报》大致保持沉默。长春得手后，它立即兴奋起来，连续发表社论，尽情地宣泄其快感。社论说：“东北问题已教训了共产党”，“今日长春之役，则更教训了共产党”，要求中共“回心转意的来做一个共谋国家繁荣发展的合法政党”。字里行间洋溢着招安对手的奢望。同时又威胁道：“政府是有救平叛乱维护国家统一和平的责任的。……不要迫令政府为救平叛乱而采取不得已的最后

^① 《中央日报》1946 年 6 月 8 日。

手段。”^① 看来，国民党对于武力救平似乎底气十足。

停战令发布后，各界人士纷纷发表对和平的观测。6月15日，上海《周报》发表郭沫若、茅盾等多位文化界人士的各自观点，那位对政治从不发表意见的钱钟书写道：“近来所见所闻使我们对自己的情感也得使用权术。我们失望得够痛苦了。我们不敢坦白地愿望，我们教自己不存愿望。”^② 钱的意思是，希望和平，但又不敢断定和平能够实现，因而不得不对自己的希望“使用权术”，“教自己不存愿望”。这段隐晦难懂的话所反映的是，一般平民对于政治的无奈。

顾维钧于当年三月出席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之后，被内定为驻美大使，为充分了解政局以为赴美上任做准备，顾滞留国内数月，与各方人士进行广泛的交谈。顾与国共两党均无历史渊源，加之长期驻外，与国内政治没有任何牵扯，因此各方面人士均可将真实的看法与顾交谈。

此时，马歇尔及其调停活动对于国民党来讲，已经成为一种麻烦。5月16日，顾维钧拜会宋子文，在谈到马歇尔时，宋说，“他已告知这位美国将军，为什么他身为行政院长而不参加对中共的谈判。他说对中共没有信心”。“马歇尔认为中共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人，而宋不能接受这种见解。”

5月17日，顾与蒋共进晚餐，交谈中，“委员长担心如果马歇尔不能洞察中共的策略，他的努力必然要失败。”蒋是从中国政治的角度来看国共问题的，希望马歇尔能够和他一样认识中共问题，但马歇尔始终未能与蒋保持一致。5月20日，顾拜会了

① 《中央日报》1946年5月25日、6月13日社论。

② 《周报》1946年6月15日，第41期。

马歇尔，两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便相识于华盛顿。在谈到国共问题时，马歇尔说：“在两个敌对政党之间，除了斗争没有别的，这很自然，一方想保持其权力，另一方则想夺过来。从政治对手方面遇到障碍是可以预料到的。”马歇尔是以美国式的两党斗争的视角来看国共关系的，因此将国共之争视为政党之间的正常的行为。马歇尔还说了这样一句话：“听说共产党人是不能信赖的，但另一方丝毫不比共产党人更值得信任。”

马歇尔还对国共军队做了这样的比较与评估，他说，“如果人与人比，中共军队的战斗力要比国军强。中共每名士兵都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战，与之相反，国军的部队，少校军官以下的就不知道”。由此而引出的结论是：“武力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政府军不可能摧毁中共军队。从武器装备和训练上说，政府军也许稍胜一筹，但在士气和作战能力上，中共军队远远优于国军。”

关于马歇尔为什么竭力调解国共冲突，顾维钧的看法是这样的：“马歇尔是负责与苏俄制定雅尔塔政策的人，他必然渴望在中国政府和共产党人之间取得和解。他在中国的努力如遭失败可能影响1948年民主党竞选的胜利，因为共和党人似乎不会忘记雅尔塔协定给东北局势带来的后果。”这是顾对马歇尔赴华使命的理解，即调停国共是出于其国内政治的需要。

在与国民党的文臣武将的会晤中，其意见是多种多样。邵力子说：“国民党内部几乎所有的军事将领都赞同摊牌，其中包括白崇禧、何应钦和陈诚。可是，大多数文职领袖都不赞同使用武力。”邵力子认为：中共过去“力量较弱，但并未能将其摧毁，现在随着他的力量的不断壮大，这项任务更难办到。”与邵力子的意见大致相同，孙科也表示“反对再打下去”。

陈立夫是文臣中的主战者，陈对顾说：“美国人不一定了解

共产党人。美国把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员等同看待，使共产党占了便宜。”这是对调停的批评。陈的结论是：“苏俄目前还不会公开支持中共，因为中共的力量尚不足与政府抗衡。因此，目前正是解决中共问题并消除美苏战争之一切可能性的时刻。”意思是消灭中共才是美国利益所在，而不是调停。吴鼎昌也认为马歇尔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吴说：“政府不宣而战，已经发生的战斗将继续下去。”

5月30日，即廖耀湘攻占长春一周之后，顾前往访问东北。5月31日，杜聿明向顾谈到他的军事计划：“向南推进到旅大地区边缘；向北进军到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杜聿明“最焦急不安的是想知道美国是否会与苏俄打仗。他个人的看法是有可能的。”杜聿明所以关注美苏之争，是希望将国共之争纳入其中，从而获得美国的全力支持。但熊式辉与杜的意见不同，“认为军事手段只能到此为止，主要问题应用政治办法解决。”熊的意见基本上是政学系的意见。

返回北平后顾访问了叶剑英，顾称叶是头脑清楚的雄辩家，顾提出中共能否放弃长春路，叶表示他将研究这个问题。

顾还抽空到天津拜访了北洋时代的老友靳云鹏，靳对当局甚为不满，称“上中阶层人士都难以谋生。他们只能苟延残喘”。北洋遗老的落魄，反映了时局的动荡对上中阶层的影响；他们的怨言表明，国民党的政治基础正在削弱。

最后，顾于离华前再度拜访蒋，就赴美使命接受指示。蒋说：“在一个国家里，不能同时存在着两个政权和两支军队。如果当初林肯没有把美国统一起来，能有今天的美国吗？和平统一是可取的，但是面对一个拥有一支有实力的独立军队的政党，政府不能只是采用政治手段。”^①将国共之争与美国当年的南北之

^① 以上均见《顾维钧回忆录》第5册，第687~726页。

争相类比，从而争取美国对其内战的支持，这是对顾游说美国朝野的指示。

当王世杰和蒋把斯大林邀请蒋访苏理解为苏联将出面对国民党施压从而予以拒绝之际，中共与苏联的关系已发生微妙变化。1960年夏，周恩来在北戴河一次会议上讲道：“国民党到了长春以后，苏联很怕国民党再往北进”，“对我们也估计错误，对我们赢得胜利根本没有信心。”^① 如此看来，本溪易手后斯大林非正式地邀请蒋访苏，这应视为对中共没有信心的反映，蒋、王把斯大林的意思理解错了。

大约因为这种微妙的变化，1946年6月底，毛泽东致电即将前往苏联治病的罗荣桓，指示：“你到目的地后，除治病外，请找菲里波夫（按：斯大林代称）对满洲情况有所陈述，但勿作过高与过多要求，东北斗争主要靠自力更生。此外，请就你所知对关内解放区情况有所陈述，勿作任何要求，因关内应完全靠自力更生。”^② 意思是中共将自己承担一切，并不会给苏联增加困难和麻烦。这些微妙的言辞反映了政治的微妙。至今，没有看到斯大林与罗荣桓有过会见的记载。

以上各式意见，是全面内战即将爆发之际，各方心态的反映。骄矜、无奈、不安、观望等等，总之，尘埃落定之前，这种状态还将持续。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此刻，马歇尔对国民党没有信心，苏联对中共也没有信心，美苏均未形成坚定而明确的国共政策。另外，不论中国社会各阶层还是国民党内部，均未形成统一意志。

①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第323、324页。

②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102页。

三 中共的部署与反击

四平之役尚在进行之际，黄克诚于5月12日致电延安，建议：“应在全国打起来，以牵制国民党军向东北调动”；“目前关内不打，关外单独坚持消耗的局势感觉绝（对）不利。”^①这个意见当时未被接受。

四平失守之后，刘少奇于5月21日致电各中央局，指出：“现全国性的内战危机极端严重……如不能制止，亦必须使全国性内战爆发的时间尽可能推迟，方对我有利。如不能推迟半年，即推迟三个月两个月以至一个月的时间爆发，亦将使我之准备比较充分。”在这个总的方针指导下，中共采取了两项部署：第一，“避免挑衅，拖延时间，积极准备。”第二，“对于顽军在各处的进攻和蚕食，我应在当地积极予以打击。”“如果没有这种报复，顽军的部分进攻和蚕食必然更加猖獗”。^②此后，中共的行动便是围绕推迟内战爆发时间这个总体方针而展开。

5月21日，毛泽东致电陈毅、粟裕等，指示：“四平已失，为不给顽方以发动大战之借口，各地除对顽方进攻之地区例如定远、夏邑、萧县等处予以还击收复失地外，仍应保持平静，不要有所动作。”^③保持平静即避免挑衅，而定远等地的还击，即制止对方的蚕食。毛电提到的几个县，分属安徽、河南、江苏，这表明，中共最初的还击报复方案，是一个分散的、小规模、战术性的。

中共在关内的军力，最强的是山东和苏中（当时称苏中为

^① 《黄克诚回忆录》，第347页。

^② 《刘少奇年谱》下卷，第46页。

^③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231页。

华中)。5月23日(梗日),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陈毅致电延安,建议:拟以一部配合华中对徐州进行运动防御,而集中三十余团围攻济南,至多一个月可以攻克。^①华中即华中军区张鼎丞、粟裕部。

在这里,陈毅提出了进攻济南的问题。显然,这个意见不属于前面那种战术性报复行动,而是继长春之后又一重大的战略考虑。进攻济南的建议未被延安立即接受,也未被立即否定,但延安选择还击报复的地区,则由原来的安徽数省集中到山东。

5月28日,刘少奇指示,以陈毅的名义向军调部和徐州执行小组发出照会,要求解散枣庄伪军,“如限期到,执行小组无办法,即攻下枣庄。”^②在长春易手的背景下,中共加快了山东的行动部署。

5月30日,毛致电陈毅,就山东作战方针指示如下:“我宜从小的打起显得有理,不宜从大的打起,显得无理。”毛指示先打泰安、大汶口、张店、周村、德州等地。^③对于进攻济南一事,仍未同意,亦未否定。

5月30日,华东局致电延安:我们拟就一个照会,分致南京三人委员会及北平执行部,拟于五日送出,十日不得答复,即于十一日开始夺取泰安、大汶口、周村、张店、德州、枣庄。^④该电表明,中共最初安排的行动时间是6月11日。

毛迅速做出答复。5月31日,毛致电华东局:“国民党在东北扩大战争,占我长春、吉林等十余城,现正向哈尔滨进攻中。在关内五个月来,占我城镇乡村数百处”。指示:“你们已用不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243页注②。

② 《刘少奇年谱》下卷,第47、48页。

③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242页。

④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245页注③。

着事先提出照会即可动手攻取泰安、大汶口、张店、周村、德州、枣庄等地。”^① 该电表明，中共此次山东行动是与东北局势联系起来的，具有战略牵制的意图。

6月1日，毛再电华东局，明确答复陈毅梗电：“经考虑后，同意你们辰梗电所提战略方针，但应先夺取泰安、大汶口、张店、周村、德州诸点，然后进攻济南。”^② 进攻济南的计划，使中共此次山东行动的战略意图明朗起来，只有夺取济南，才能根本扭转退出长春后的被动局面。

此时，新四军的行动时间一再提前。担任进攻泰安、大汶口的是新四军一纵，该部于6月4日接到命令：“规定10日开始攻泰安、汶口”。6月5日，毛电令陈毅等：“望于数日内攻取泰安、大汶口……枣庄等地，愈快愈好。”^③ 所以催促陈毅，是因为此时停战令即将于6月7日生效。6月6日，新四军一纵再次接到命令：“改7日开始攻击，务于12日完成任务。”^④

6月7日起，陈毅部对泰安等地相继发起进攻。6月11日，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致电蒋，报告战况并对中共意图判断如下：“查共匪此次在山东全境各要地发动之攻击，总共兵力确在十五万以上，截至本真止，张店、周村、胶县、蓝村等处地区，已先后失陷，泰安、德州已陷情况不明之状态……揆其企图，主在夺取济南、青岛后，占领山东全部。”^⑤ 新四军部队迅速形成对济南、青岛的威胁态势。

前线战报使毛的精神为之一振。6月12日，毛泽东致电周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244页。

②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248页。

③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248页注①。

④ 《赖传珠日记》，1946年6月4、6日，人民出版社，1987。赖时任一纵政委。

⑤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3），第363、364页。

恩来：“我占枣庄、泰安、德县后，声威大震，美怕我攻青，国怕我攻济，此时我如在彼方不攻五师及不增加军队等条件下保证不攻青、济，美蒋即可安心。”^①

五师指新四军五师李先念部。抗战结束之后，延安拟将该部由湖北调往华东，行至宣化店地区时，遇1月10日停战令下达，关内军队一概禁止移动。这样，五师在鄂豫交界的狭小地区停留下来，处境十分困难。为此，毛提出不攻青、济，以换取国民党不攻五师。

山东是中共力量最占优势的一个省份，国民党仅占有济南等少数城镇，青岛则为美国海军驻地。由于1月10日停战令禁止关内地区的军队调动，因此国民党不能向山东增兵，中共仍保持着力量上的优势。6月12日，周恩来与马歇尔会谈。关于中共在山东的行动，周的解释是，国民党方面也采取了行动，“新四军被迫采取报复行动”，“同时现在这些地方的伪军，又不断挑衅，也是造成我们报复的直接原因。”按照延安关于不打青、济以换取国民党不打五师的指示，周接着说：“我可保证绝不会打青岛、济南，尽管政府的军队是在济南，我们不会打……除非政府军要消灭我们的第五师，那情况就难说了。”^②

这个交换看来未被接受，为此，毛于6月19日电令陈毅：“准备夺取济南”^③。此时，蒋迅速将54军调入青岛，73军调入济南，6月21日，毛再电陈毅：“蒋在济南增加一个军，暂难攻击”。^④ 济南未能得手，与五师的交换条件也未成立，6月26日，五师开始自行突围。

①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90、91页。

② 《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417、420页。

③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275页。

④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94页。

中共此次山东行动当然是有政治意图的。6月12日，毛泽东致电南京中共代表团，通报山东战况和其他部署，指出：“我愈取坚决有力之报复行动，美蒋对我愈有所顾忌，和平可能性愈增加。”^①也就是说要以坚决有力的行动，改变南京谈判的局面，求得有利的谈判结果。可以说，这是毛观察和处理问题一贯的方式。

综上所述，中共此次山东行动大约有三个意图：第一，牵制国民党军在东北的进兵；第二，构成保障新四军五师的交换条件；第三，给予南京谈判有力的支持。然而，中共的这种意图在济南遇到与长春（四平）相同的一个问题，此即中共的军力尚不足以取得战略意义的效果，因而难以从战略上扭转态势。济南未能得手，南京谈判的局面也未能改变。

四 最后的谈判

周恩来于停战令生效的当日即6月7日飞抵延安，关于周此次回延磋商的情况，迄今，基本上只有一句话的披露，即“竭力争和平，哪怕短期也好”。^②中共究竟是怎样评估和战大局的，尚待材料的进一步公布。6月9日，周再返南京，随即开始了停战令所规定的三项谈判。按停战令的时限，三项谈判应于6月22日完成。

中共参加此次谈判的策略，重点放在谈判的程序上，力求将三项谈判分开，以期分别解决问题。6月11日晚，周恩来就谈判方针向徐永昌表示：“中共可打消政治、军事配合解决之原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269页。

② 《周恩来年谱》，第671页。

则，决先求‘停战’、‘交通’、‘整军’三问题之各别解决。”^① 6月14日，中共代表团发言人又表示：“我们愿就此次协商的程序，实事求是按部就班的解决问题。”^②

中共的总方针是推迟内战爆发的时间，主要步骤便是拖延谈判，而拖延谈判的主要步骤，正是三项谈判“按部就班”地“各别解决”，而各别解决的步骤则是：求得交通、停战两协议先行签订，使整军方案延长讨论。^③

周恩来关于各别解决的意见引起徐永昌的警觉。6月17日，徐向马歇尔提出一份备忘录，要求三项协议“同时签字”^④，也就是将三项协议捆在一起，一项不成立，其余各项也不能成立，以使谈判不能拖延。

各别解决与同时签字，此即国共主要的谈判策略。

此次谈判蒋介石启用了一位新人，具有无党派身份的交通部长俞大维，这是蒋为改变其一党训政的形象有意做出的一项安排。三项谈判的草案，分别由徐永昌草拟整军补充案，俞大维草拟恢复交通案，而东北停战案则由马歇尔草拟。三项谈判的草案均由国、美草拟，这一点反映出中共在此次谈判中的地位。

交通问题是一个由战争派生出来的问题，实际上是不能单独解决的，因此这个问题的争论最少，很快达成协议。此次谈判的焦点问题有两个：一个是东北停战案中的美方决定权问题；一个是整军补充案。

6月13日，美方在东北停战草案中提出：“倘意见不能一致时，则应以调处执行部长春前进组美方高级官长之决定为依

① 《徐永昌日记》1946年6月11日。

② 《新华日报》1946年6月18日。

③ 《刘少奇年谱》下卷，第51页注①。

④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3），第336页。

归。”^① 此即美方决定权，对此，周恩来表示反对。尔后，国民党方面玩弄文字游戏，将较为硬性的决定权改为仲裁权。6月18日，徐永昌、俞大维与周恩来磋商此事，周强烈表示：“此举有辱国体，如中共方面提出请苏人仲裁，则周恩来便不是周恩来”。说罢，“徐、俞均为之愕然。”^②

由于在此问题上形成僵局，6月19日，黄炎培、张君勱、罗隆基、梁漱溟一同拜会周恩来，黄炎培记载：“对最后决定权问题，我等提出调解意见，恩来允待会商答复。”^③ 当日，中共南京代表团致电延安：民盟有希望中共能让到在军事三人小组中美方有调查决定权的建议，以区别马歇尔、蒋介石，使马歇尔勿消极，而继续谈判。代表团拟同意，以此争取马歇尔，而蒋介石会连此也不同意，必欲三个协定同时解决，这就大有利于动员和宣传。6月20日，刘少奇复电周：“为了在民盟朋友面前证明我们的诚意，同意你的建议，承认美方人员在小组中关于调查的决定权。”^④

周的意思是，因国民党坚持三项协议同时签字，因此决定权问题不可能单独签字生效，而中共这一让步姿态又有利于宣传。

然而此时蒋对这个问题又提出一个新方案。6月21日，徐永昌见蒋，“蒋先生已修正过去对共产党提出之请美方人员仲裁一点，改为‘三人会议必取决于多数之惯例’。”^⑤ 此一改动的奥妙在于，国、共、美三方中，国共两方肯定处于对立地位，这

①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3），第183页。

② 郭汝瑰日记，1946年6月18日，未刊稿。郭原任军政部军务署副署长，当年2月整军谈判时郭为张治中助手，此次为徐永昌助手。

③ 黄炎培日记，1946年6月19日。

④ 《刘少奇年谱》下卷，第50、51页。

⑤ 《徐永昌日记》1946年6月21日。

样，只要美方支持何方，何方便成为多数，既避开了有辱国体的决定权、仲裁权问题，而实际上仍然是美方决定一切。

6月21日，周恩来就此事对马歇尔说：“关于最后决定权，政府自己都弄不清”，“今天又变了，来了个新提议，说也不用最后决定权，也不用仲裁权，而改成多数表决。这问题，政府自己的意见都未成熟，而竟故意为难”^①。这个问题形式上几经变动，然其实质无非是周恩来所说：“推马与我斗，而拖美下水”。

最后，美方职权问题形式这样一个协议草案，规定：“倘意见不能一致时，执行小组美方代表有权决定该执行小组在其管辖地区以内何时何地有关军事行动之调查。”此外还规定：“若于执行上级之命令或指示意见不能一致时，则北平或长春军调部之美方资深人员有权指导该项命令或指示之执行。”^②这表明，美方不仅有一定的调查决定权，还有一定的对上级命令的指导价，美方这些职权的范围，包括执行小组和北平军调部，但不包括南京三人会议。

美方职权问题原来列入东北停战案，周恩来建议：“最好另成立协定，因此事亦关系关内各地，以免到处提到此问题。”^③这个意见被采纳，最后形成一个单独的协议草案。

此外，国民党方面还提出，按停战令生效时间，双方军队恢复6月7日位置。这是针对中共山东行动提出的，意思是要中共退出泰安等地。对此周恩来向马歇尔表示：因关内停战是自1月13日开始，“我赞成恢复一月十三日的位置，而非六月七日的，这才合理。因为六月七日是东北停战，而非关内停战。”“如果

① 《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469页。

② 中共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编《国共谈判文献资料选辑》，第240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

③ 郭汝瑰日记，1946年6月22日，未刊稿。

说只解决山东这些对于政府有利的事，我们不能接受。因为山东的冲突使我们占了地方，解决了伪军，而别处政府占了许多地方。如仅算山东，这很难公正。”^① 此议未得结果。

东北停战案，恢复交通案，美方职权案，均于6月24日达成协议，但因整军补充案未能达成协议，以上协议均未能签署。

此次南京谈判的全部核心是整军补充案。国共曾于2月25日签署整军方案，该方案规定全国军队最终为60个师，按5:1的比例，国共各为50与10个师。中共的10个师分别为：东北1个师，华中2个师，华北7个师。现在时过境迁，双方都提出了补充意见。

关于中共在东北的军队数额，周恩来于5月21日向马歇尔提出，中共在东北应有5个师。而蒋在视察东北时致函马歇尔，表示在军队总数不变的前提下，可同意中共在东北有3个师。以总数不变为前提，也就是说，中共在东北增加的2个师，将从其关内的9个师的数额中扣除。

关于中共东北军队驻区，徐永昌于6月9日提出甲乙两案，“甲案：中共之三个师分隶于两个混合军，一个军中共两师，政府一个师，驻黑龙江省……一个军包括政府两师，中共一个师，驻兴安省。”“乙案：则将所有之三个中共师置于黑龙江省。”6月9日晚，徐永昌将该两案呈蒋，结果：“委员长对于驻中共军之地区，同意采甲案。”^②

此外，另一个问题是中共关内地区军队驻地问题。2月25日的整军方案仅就驻军地区划出一个大致范围，如华北、华中等等，没有规定具体地区。在蒋视察东北期间，徐永昌萌生了为中

^① 《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446页。

^② 郭汝瑰日记，1946年6月9日，未刊稿。

共关内外军队全部划定驻区的设想，徐于5月28日对马歇尔说：“拟为共军划定驻地，果能按期入驻，彼此既有确定界限，互不相犯，不但和平，且可达于和好，如此交通岂不自恢复耶。”蒋返宁后很快肯定了此议。徐记载：“不论关内外拟为共军划定驻地一节，蒋先生极以为然。”^①

以上设想为基础，徐永昌拟定了整军补充案，该草案于6月17日由马歇尔转交周恩来，此时距停战令的截止时间不足一周。

徐案坚持全国军队最终总数为60个师，在此前提下同意中共在东北驻军为3个师，同时提出国民党亦在东北增加一个军。该案的要点在于，同意中共在东北增加2个师的同时，取消了原整军方案规定的中共在华中的2个师，也就是说，中共在华中将无驻军。为表示对等，国民党在东北增加的一军，也由其关内军队数额中扣除。此外，该案坚持中共在华北驻军为7个师的同时，将国民党的华北驻军增加2个军。同样，为表示军队总数不变，在华北增加的2个军由其他地区扣除。

徐案的另一要点是，为中共关内外军队均指定了具体驻区。东北3个师为黑龙江省2个师，兴安省1个师。华北为5个地区，计有山东临沂地区，河北大名地区，山西长治地区，陕北延安地区，以及察哈尔与热河之间的多伦地区。^②收到该案后，周恩来于当日致电延安，称该案“混蛋之至，战意已大明”^③。

在研究了徐案之后，周于6月19日向马歇尔提出中共对案，关于中共在东北的驻军，周表示：“我方仍重提增加五个师的要

^① 《徐永昌日记》1946年5月28日、6月4日。

^② 以上均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3），第326～328、340页。

^③ 《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442页。

求，其驻地，我方提议在安东、牡丹江、齐齐哈尔、洮安（北城）及哈尔滨五处各驻一师。此五个师不应计算在关内中共九个师之内。”

关于中共军队华北驻地问题，这本来是徐永昌强行指定的一项安排，按照常理，中共只有接受或拒绝两种选择，然而就谈判而论，徐实在不是周之对手，周的答复是：“若云规定关内整军驻地，则应由军事小组另案办理，且应规定双方部队驻地，而不应单提一方一地之移动。”^① 规定双方驻地，也就是说国民党军也应划定驻地。由于这个意见无懈可击，因而得到马歇尔的支持。这样，徐永昌这根本是套向对手的绳索，结果却套向了自己。

徐永昌接替陈诚参加三人会议的当日，马歇尔即提醒徐：“周恩来精敏异常，为鲜见之人物。”此言徐当有所领教了。由于自己的动议却使自己陷入窘境，徐永昌恼羞成怒，徐日记6月19日载：“因周、马皆向蒋先生要求华北国军亦须划定驻区问题，十时半特诣蒋先生，陈其不可，并以此作最后之试探，共党果有稍事相安，似应知难而止，否则我人当毅然进剿，今日不办，仅就断交通厄我经济一事，即倒政府而有余，所以国军驻区不受政府以外之约束，而共军则必就政府指定之区域驻扎，否则无商讨余地。蒋先生是之。”^② 当日，蒋指示：“仅将中共驻地意见提出，政府军驻地则不提出。”^③ 这个指示实际上就是拒绝磋商双方驻区问题。

由于谈判受阻，而停战令的时限即将到期，一度缓和的气氛再度紧张起来。6月20日，周恩来致电延安：“昨日南京空气紧

① 《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455页。

② 《徐永昌日记》1946年6月19日。

③ 郭汝瑰日记，1946年6月19日，未刊稿。

张”，“马歇尔表示悲观”，“决今上午再与马谈一次，以拉其做到停战和休战延长。”^① 当日，周对马歇尔说，国民党的驻军方案是要将中共“分成一块一块，包围起来，将来第二步再消灭我们”。“政府说要保证，说中共威胁它，但政府未反过来想，要中共接受这样的条件，地区摆得如此分散，中共就不怕威胁了吗？这又如何保证？”周表示：交通、停战、整军三个问题，“我觉得一、二两项问题并不难，如为了求妥协，二十四小时以内即可谈好。困难的是第三项问题。”^②，周的意思是，前两项可于停战令截止时完成，而第三项则不然，因此停战令必须延长。马歇尔接受了这个意见。

6月21日，蒋再度发布命令，将停战令延期8天至6月30日。继续为停战令规定时限，也就是继续坚持停战条件。6月24日，交通、停战、美方职权三项草案达成协议，但因整军补充案未得结果，三个协议均未能签署。当日，周恩来致电延安：“谈判将临最后关头，我在停战、交通及美国职权上均做了某些让步，留下的争论在整军”，“请中央批准我们在此相机行事，以便使谈判破裂做得愈于我们有利愈好”。次日，延安复电：“你可根据既定方针，便宜行事。”^③

以整军补充案为焦点，南京谈判进入最后时刻。

6月25日，徐永昌、俞大维与蒋磋商后，决定不再与中共纠缠，直接就中共驻区和入驻时间提出一个“最后规定”。当日，俞大维向马歇尔提出一个修正案，其要点为：热河、察哈尔中共军队向两省边境集中，政府军于签字后一个月内，“必须进

① 《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457页。

② 《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459~463页。

③ 《周恩来年谱》，第676页。

入承德、古北口”；“胶济铁路沿线之共军，须于签字协定后十日内全部退出，由中央政府军接收”；“苏北各共军，须于签字后一个月内全部让出”；“凡自六月七日以后被共军侵占地区，如山东、山西、河北等省所属城镇乡村，共军概须于签字十日内退出，由中央政府军进驻”。^①

最后规定的提出，是力图迫使中共再一次在接受或拒绝之间做出选择，也就是在妥协和破裂之间做出选择。在这种严峻的局面下，周恩来再一次显示出他的意志与睿智。

6月26日，周恩来与马歇尔就俞大维方案会谈，周没有正面拒绝撤出某些地区，而是首先提出军民分治的原则，指出这些原则“也是政协精神和美国式的方法”。尔后周说：“政府不应提出我们退出何地由政府军来代替”，“政府只能提出中共军应在中共区驻扎……其他地方空出”。^②也就是说，中共退出的地区，国民党军也不应进驻，而是“空出”。理由是随着国民党军的入驻，地方政权便会改变，因而不符合军民分治的政协原则和美国方式。周的意见是，中共撤出后，该地区原行政机构继续保留，即军队撤，但行政不撤。这样，撤军问题又引出地方行政问题，并成为新的争焦点。

6月28日，周恩来向马歇尔递交一份备忘录，表示中共可以退出下列地区：安徽东北部地区，淮安（不含）以南地区，山东枣庄地区，山东胶济铁路线，张家口（不含）以南地区，承德（不含）以南地区等。周同时强调：“政府方面须保证，政府军队决不开入这些地区，而这些地区的地方政府及其保安部队仍应当于原地维持治安，实施行政。”^③

①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3），第347、348页。

② 《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447～483页。

③ 《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493页。

面对中共这一方案，徐永昌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连日共方提出之对案仍系拖延政策，一味胡缠，如言苏北、热南某某地区可让出，但既不许另去官吏接收，且须留多少地方团队防卫，而又说不能改变其政治设施，彼此谁也不许驻兵。是真滑稽到极点，欺人到极点”^①。

在国共立场严重对立下，马歇尔的意见备受关注。陈诚说：“政府要求中共退出苏北、胶济线、承德、古北口等地，需有理由使马歇尔折服。”^②也就是要争取马歇尔在这个问题上支持国民党。

6月29日，马歇尔综合双方意见提出一个修正案，坚持国共兵力总数不变，也就是说，中共在东北增加的驻军，将从其关内军额中扣除；要求中共同意政府在哈尔滨驻兵一个团，并在该地组成混合政府，也就是中共不能独占哈尔滨，等等。该修正案同时提出，中共退出某些地区，但政府不派军队进入，当地政府继续维持秩序。^③这显然是一个顾及双方要求的折中方案，但在最为关键的中共撤退区的地方行政问题上，马歇尔接受了周恩来的意见。

6月30日，第二次停战令8天届满。当日，国民党宣传部长彭学沛发表声明，要求：“指定驻军地区之协定，限期成立”。该声明未再提停战日期问题，这样，停战令的时效实际上已不存在。

6月30日，蒋与马歇尔长谈，马歇尔说：“余党除东北外，政府条件颇苛”。蒋坚持中共退出苏北、胶济线等地区，“所有撤出地带，地方政权交中央”。马歇尔说：“交出地方政权为最

^① 《徐永昌日记》1946年6月28日。热南指热河南部。

^② 郭汝瑰日记，1946年6月28日，未刊稿。

^③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3），第189、190页。

大困难”。蒋说：“关于地方政权问题一节，余欲特别声明，一政府之下不能另有他政府，一国家之内不能另有他国家”，“中共如此不近情理，使政府不成为政府，国家不成为国家，如此余宁中共不撤出苏北，不愿撤出后又保留中共地方政权”。^①

当日，周恩来在与记者谈话中介绍了中共的观点，周说：“现在政府提案，要把军队驻地和当地民政连在一起，变成以军干政的防区制，这就是国共两党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政府认为苏北威胁南京，承德、张家口威胁北平，铁路沿线中共部队威胁交通，应一律撤退”；“如果我们也说南京威胁苏北，北平威胁承德、张家口，铁道线上驻军威胁附近各县村庄，那么，问题便无法解决。”^②

问题至此，双方都没有妥协余地了。7月2日上午，蒋亲自出面与周恩来谈话，王世杰、邵力子、陈诚在座。蒋单刀直入，提出承德、安东、胶济路和苏北4个问题，蒋说：“如共军必须占据以上地区，威胁政府，则政府认为一切无法续谈。”周说：“淮安为余之故乡，当地情形余知之甚稔”，“无论就平均地权与耕者有其田之原则而论，皆无违法之处……如中共一旦从苏北撤退，地方秩序必成问题。”坚持中共必须保留地方政权。蒋说：“即令淮安有此情形，亦系一极小的地区，吾人决不应以此小的地方而影响整个大局。就军事观点而论，共军占据淮安一带，政府实已无安全可言。”蒋最后强调：“此为政府与中共和平谈判之基础，倘此点不能实现，则一切无法再谈。”^③

无论从哪个角度讲，此次谈话都是蒋的最后摊牌。这样，以中共撤退区的地方行政问题为最后争执点，南京谈判形成最后的僵局。

①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3），第191、194页。

② 《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507、508页。

③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3），第196、198页。

7月2日的会谈，是蒋、周两人一生中最后的一次正式会谈。

五 不宣而战

蒋于6月6日下达停战令的同时，即开始做战争动员。6月7、8日，在南京召开的特种兵会议上，蒋连续两天发表长篇讲话，其核心是“剿匪”。蒋说：“我们今天认定共党的用心，无非要使我们全国民心不安，社会动摇，政府的威信颓落，国军的精神萎靡，然后他好乘机篡夺革命，推翻政府……我们政府到今天不仅是恢复秩序、保护人民的职责无可旁贷，而且经过的事实，实在是无法再忍了。”

蒋对剿匪的不可避免性做了这样一个政治论述，他说：“剿匪工作是抗战以后，与建国以前的革命历史必经的阶段”。这就是说，蒋决心走向这个必经阶段。

第二次国共合作以来，尽管两军时有冲突，但是，能够体现两军战略实力的对抗却没有发生，因此国民党不少人对于中共战斗力尚不知底。四平之役头一次将两军的战略实力展现出来，蒋根据四平的经验对部下这样说：“我这次到东北，曾召集前线将领，问他们这次在东北的剿匪战役中，共产党的战术，究竟比在江西的时候有什么进步没有？他们一致认为，无论在四平街，在本溪湖各战役，共产党的战术和江西时代一样，并无多大进步。”据此，蒋的结论是：中共“并无什么多大的实力”。^①

与此同时，主战派亦不断向蒋进言。徐永昌对蒋说：“请蒋先生斟酌，力量如其胜任，应即向共逐渐进攻。盖已确切证明，共党处处挑战，而日日言和，如此下去，供共党遂其阴谋而已，如此愈拖，我政府经济、政治愈日就削弱，此时由局部证明的决

^① 《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1，第324~333页。

裂，世人皆能谅我矣，只是整个力量究否胜任，惟有委员长知之详切也。”^①徐永昌主张打，但对力量“究否胜任”却又心中无数，看来四平之役的胜利并不能完全消除国民党的疑虑。徐永昌这番话是一个不祥之兆。

但蒋对其力量似乎是自信的。6月16日，在黄埔军校建校22周年纪念会上，蒋说：“共产党过去以在日本掩护之下，得以发展割据一方，今日人投降，共产党再无幸存之理……黄埔力量不可侮，今日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抗衡。”^②翌日，在总理纪念周上，蒋宣称：“共果不就范，一年期可削平之。”^③

“剿匪”既是军事行动，也是政治行动，因此蒋在做战争动员的同时，也展开了一系列政治部署。6月5日，蒋在情报会上指示：“对民盟不必姑息，罗隆基、沈钧儒、章伯钧，应施打击。”^④对民盟的打击，目的在于限制其对中共的支持，而手段则是压迫民盟的政治空间，不给民盟留出“中间”的余地。7月26日，在杜月笙约集的一次宴会上，陈立夫对黄炎培明确表达了两点意见：“（1）国民党不能容许共产党并存；（2）第三者以国共并称，忽视国民党之为正统，从事调解冲突，即延缓对中共问题之解决。”^⑤国民党不与中共“并存”，因此民盟亦不能以第三者立场将国共“并称”，必须二者择其一，自此，第三方面的政治空间日渐收窄。

7月2日的蒋、周会谈，是蒋对中共的最后摊牌。作为这一摊牌的政治配合，蒋于7月3日采取了一项重大的政治行动，在

① 《徐永昌日记》1946年6月12日。

② 唐纵日记，1946年6月16日。《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623页。

③ 《徐永昌日记》1946年6月17日。

④ 唐纵日记，1946年6月5日。《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622页。

⑤ 黄炎培日记，1946年7月26日。

未与他党协商的情况下，蒋直接向国防最高委员会提出于当年11月12日召开国大的议案，该案当即获得通过。^① 不与他党协商而单方面宣布召开国大，等于公开宣告与中共的政治破裂，这是围绕即将展开的军事行动而展开的相应的政治行动。

其实，蒋氏此举不仅未与他党协商，为撇开主和派的异议，蒋也未与党内相关人士磋商。王世杰这位负责与中共和各党派联络的人士，在当天日记中不无情绪地写道：“蒋先生事前未与予谈及此事。”^② 当周恩来为此向邵力子询问时，“邵力子说事前毫无所知”。^③ 蒋所以避开王、邵，大约因为二人难解此举的意图。在国共关系破裂之际，召开国大本身已没有意义，蒋的意图是以此举起一面民主立宪的旗帜，既可为剿共战争做政治掩护，又可做给美国看，以争取美国。

作为整个破裂行动的一个步骤，接下来蒋于7月5日做出一项直接取消政治谈判的决定。蒋对徐永昌说：“三人会议已不得要领，可乘便往重庆陆大视事”。^④ 国民党于6月初进行机构改革，撤消军事委员会，改设国防部，原任军委会军令部长的徐永昌，改任重庆陆军大学校长，因三人会议的关系，徐仍留宁。蒋要徐赴渝就职，也就是说蒋决定结束三人会议了。随着三人会议的结束，国共谈判主要的常设机构也就不存在了。

在和谈帷幕即将落下的最后时刻，发生过一个小插曲。为解开苏北等地的地方行政问题这个死结，马歇尔方面有人提出一个典型的、美国式的解决方案，即在联合国或美国监督下，在当地

① 《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会议记录》第8册，第363页。

② 《王世杰日记》1946年7月3日。

③ 《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516页。这是7月5日周恩来对马歇尔所说的。

④ 《徐永昌日记》1946年7月5日。

举行地方选举，以此解决地方政权的归属。7月11日，王世杰“以之告蒋先生，蒋先生甚愤愤”。^①当一切政治手段用尽之后，战争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7月9日，王世杰记载：“今日午后与马歇尔及辞修、力子晤商如何解除国共谈判之僵局——此一僵局大半由于政府要求中共退出苏北行政。马歇尔谓：如四五日无办法，则现时之零杂战争将变为公开的全国的内战。”^②马歇尔的预言不幸言中，四五日后全国性内战爆发。南京谈判最后的焦点与僵局，既然归结在苏北与胶济路等地，那么，战衅必然由此处开启。7月12日，周恩来报告延安：“苏北大战即将开始”。7月14日，苏北大战爆发之际，蒋以避暑为名前往牯岭，实际上是避开马歇尔。7月15日，徐永昌飞往重庆就职。至此，三人会议这个半年前权倾一时的调处机构，无形中悄然结束。^③王世杰在7月15日日记中这样写道：“国军近在胶济路沿线及苏北与共军大冲突，战事有燎原之势。”苏北大战为南京谈判画上了句号。这是自6月以来，国共围绕一系列问题的谈判无法取得协议而形成的政治的继续。

苏北大战标志着战争全面爆发，但由于此时的国际、国内环境不同以往，因此蒋亦采取了不同以往的战争方式，此即“不宣而战”。头一个对这种战争方式做出判断的，是知蒋甚深的周恩来，周于6月17日致电延安，判断：“蒋用兵有可能不下讨伐令，而仍以和平、立宪为口号。”^④10天后，蒋自己证实了周的

① 《王世杰日记》1946年7月11日。

② 《王世杰日记》1946年7月9日。

③ 1947年1月29日，司徒雷登和吉伦正式通知中共，美国政府决定结束对三人会议和北平军调处的关系（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397页，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此举可视为三人会议在手续上的正式结束。

④ 《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442、443页。

这一判断，蒋在6月27日日记中写道：“目前军事行动，仍不宜用正式讨伐方式。”^①

蒋所以不采取公开讨伐方式，是有其一系列政治考虑的。当年8月，蒋在一次会议上对此做了说明，他说：“我们在抗战以前，对于奸匪是基于国法的立场，本着政府的责任，明令讨伐的。我们今天的剿匪是不是还用这个方式呢？如果不用这个方式，又是什么缘故呢？”蒋接着说：由于国际舆论“他们不认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武装叛变的集团，而以为中国共产党也和其他民主国家里的共产党一样”，“所以中共虽然是我们中国的叛逆……而国际间仍不得不承认其与政府处于相对的地位。如果政府下令讨伐，则依照国际公法的规定，双方就成了交战团体，这对政府实在是太不利了。”也就是说，如果国际舆论将双方视为交战团体，国民党的政府地位也就削弱了。

蒋继续说：中共“他对于政府就是‘不宣而战’！我们现在对付奸党，就必须用他自己的方法来打击他自己。他既然不敢公然叛变，而用‘不宣而战’的方式来攻击我们，那我们就用‘不宣而战’的方式来还击他！因为用这种方式，可以使得许多不明了中国国情的友邦人士，祛除一种不必要的疑虑，不至于误认我们剿匪是要继续一党专政，而不肯容纳其他的党派，实行民主政治。”^②

为避免给国际社会造成维护一党专政而武力讨伐异党的印象，既是蒋采取不宣而战的原因，也是蒋为什么强行召开国大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要将问题反过来，向国际、国内表示国民党不是在维护一党专政。可以看出，蒋采取不宣而战的方式，是有其多种政治考虑的。

^① 《蒋总统秘录》第14册，第62页。

^② 《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1，第382~384页。

由于是不宣而战，因此中共代表团仍留在南京，马歇尔仍继续他的斡旋，这种不宣而战的状态，一直持续到1947年7月蒋发布戡乱动员令时才告结束。

本章小结 南京谈判的主题是议和，战罢议和，从而将战与和的政治规则，格外清晰地表现出来。毛泽东于6月19日致电刘伯承、邓小平等：“观察近日形势，蒋介石准备大打，恐难挽回。大打后，估计六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①毛之所言，其实就是政治的规则，也就是说，能否议和以及议和的程度，取决于战争的胜负以及胜负的程度。南京谈判既然是在四平之役“蒋军大胜”的背景下举行的，因而一开始便注定了“不能议和”的结局。从这个意义上讲，南京谈判实际上是为四平的战争结果提供了一个政治展现的舞台。

南京谈判几乎没有正面涉及政治问题，最后归结为苏北等地方行政问题的争执而宣告破裂。也就是说，南京谈判并不正面体现为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的对立，因此，国共关系并不以这一对立而正面地宣告破裂。其实，全部问题的实质仍然是这一对立，只是由于这一对立本身不能获得解决，为此，派生出某个或某几个其他问题，通过这种派生的其他问题的对抗，从而将政治对立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展开。蒋介石说：苏北等地为一“极小”问题，孤立地看，问题本身的确不算大，然而实质上却是整个政治对立的缩影。正因为问题的实质在这里，因此，关于这个“极小”问题的争执，最终宣告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终结。

^①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93页。

结束语 民国政治的逻辑与 民国政治的历史局限

任何历史活动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民国政治的基本特征在于，政治与武力高度统一，政党作为政治集团的同时，又是一个武装集团，武力是政治的出发点和最终依据。这一点构成了民国政治的基本逻辑。同时，这个逻辑本身又构成了民国政治基本的历史局限。1944~1946年间，国共围绕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的对立，展开了长达两年的较量；这一对立的发生、发展与终结，都是这个逻辑直接或间接的体现，同样，也都是这个逻辑本身的历史局限直接或间接的体现。

民国政治的逻辑与国共关系的转型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方式，是在原有的一党训政的国家秩序之内，建立的一种不对等的合作方式。所以采用此一方式，从根本上讲，这是当时的国共力量的对比在政治上的反映。这种力量对比在抗战前期和中期没有实质性变化，因此，国共合作的基础与方式也没有实质性变化。

1944年4月至12月，日军在中国战场发动了最后的战略进攻——一号作战；该役对于抗战末期中国政治最为深刻的影响在于，迅速引起国共力量的消长，极大地改变了国共力量的对比。1944年12月，中共中央在一文件中指出：“最近八个月，中国

政治形势起了一个大变化。国共力量对比，已由过去多年的国强共弱，达到现在的国共几乎平衡”。^① 几乎平衡当然是过高的估计，但国共力量的对比的确起了一个大变化。力量对比的相对平衡，必然引出政治平衡的要求。联合政府口号的提出，正是这种政治平衡要求的反映。这样，也就引出了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的对立。

对立的形成是民国政治逻辑发展的结果。接下来，双方又是如何推动这一对立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转化的呢？同样，也是按照这个逻辑而展开。在这个过程中发生过两次重大的政治反复。

第一次是重庆谈判。蒋介石借助中苏条约和垄断日军受降权这两张牌，扭转了在一号作战的打击下所形成的被动局面，阻止了中共进占中心城市的意图，巩固了他的政治地位。在这个背景下，蒋迫使中共收回了联合政府的要求，并再度承认国民党的国家法统。这样，中共七大所确立的联合政府政治路线遭受重大挫折。

尽管联合政府的口号被取消，但国民党取消解放区的要求则被中共顶了回去。问题在于，解放区的存在，是联合政府口号得以提出的基础；这个基础仍然存在，表明重庆谈判并非问题的最终解决，而是一次暂时的反复。

第二次重大反复是政协会议。政协会议是一种较为特殊的政治现象，它的召开基本上不是以武力的对比为依据，而是以一个超强的国际背景为依据。因此，政协会议的召开及其成果，无不表现为对民国政治逻辑的脱离。

在现象上政协会议表现为武装的与非武装的、执政的与非执政的中国各党派，在一道国际“圣旨”——杜鲁门声明——要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656页。

求之下，相当一致地遵奉西式学说为原则，相当一致地遵奉西式政体为范式，在一位重量级国际“钦差”——马歇尔——亲临督导之下，尝试着将西式政体及其理念全盘引入中国，尝试着将武力的作用从国家政治中一举剔除，从而全盘改造民国政治的逻辑。

自国民党执政以来，将孙中山的国父地位神圣化，同时也将其训政学说神圣化，以国父的名义作为推行一党训政的神圣依据。杜鲁门对华声明的主要作用便在于，他以美国总统的地位，直接的公开的点了孙中山和一党训政的名。这个中国各党派从来不能正面提出的问题，却被一位美国总统正面提了出来。这样，杜鲁门公开抹去了国民党罩在国父以及国父遗教身上的那层神圣的光环。国父以及国父遗教一旦失去神圣地位，国民党及其一党制亦从此失去其政治庇护的藏身之地。

政协会议实际上是一次对一党制的政治清算，实际上为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的对立，做出了理论上的最终裁决。从此，国民党再也不能正面地为了一党制辩护。问题在于：对一党制的清算，就是对国民党的审判。正如唐纵所感觉那样：“在政治协商会，政府好似在受裁判”。^①可以说，一党制一经推上被批判的地位，实际上已经宣告了国民党政权在政治上的失败。

政协的五项议题看上去是一个天衣无缝的议事程序，五路出击，四面围剿，没有给一党制留出任何得以逃脱的破绽，以至于“无形国大”这类事实上并无可操作性的议案，也被人们生吞活剥地接受下来。于是，看上去一党制相当彻底地被废除，国共以及各党派的政治利益相当理性、相当公正地被重新分配。一个以武力取得的政权，以非武力的方式在一纸协议上交出了半壁江山。

^① 《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580页。

政协会议的议程及其结果，都是与民国政治的逻辑相背离的，这种现象可以是一时的，但不能是最终的。当政协会议以雄辩的方式，引经据典、酣畅淋漓地将民国政治的逻辑排斥殆尽之后，国共政争的方式骤然间返璞归真，重新回到逻辑上来。

政协会议一个月之后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反过来，成为国民党对政协会议的“裁判”。从现象上看，二中全会对政协协议的修改并不算多，仅宪草原则数条，但问题的实质是一党训政制不愿就此退出舞台，只是由于这一政体本身不能正面坚持，为此，派生出某个或某几个枝节性问题，通过这种派生的问题的对抗，而使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的对立，以另一种方式继续纠缠。

最后，国共选择东北问题作为全部政争的归宿，从民国政治的逻辑来看，这是一种最为符合逻辑的选择，最为适宜将逻辑的游戏规则充分地展示出来，因为，东北问题的争执，最为适宜变政争为兵争。

何以说东北问题的争执最适宜变政争为兵争呢？因为东北问题有两条看上去无懈可击的理由，足以作为兵争的相当正义的依据：第一，外交问题；第二，恢复国家主权。以外交问题的名义，拒绝谈判便名正言顺；以恢复国家主权的的名义，武力进兵便师出有名。

四平决战的意义在于：以战争的胜负，为政争做结论。四平决战标志着国共政争的方式，完全回到民国政治最原始的逻辑上来。

综上所述，国共关系的政治转型，从问题的提出、发展到终结，清晰地显露出一道民国政治逻辑的踪迹。其间，发生过一次试图摆脱原有逻辑的尝试，但这个尝试只不过是验证了原有逻辑的牢固性。按照逻辑提出的一问题，同样，只能按照逻辑本身而

获得最后的澄清。

民国政治的逻辑与第三方面的生存空间

第三方面的政治主体即民盟。从第三方面的全部历史记录来看，1944～1946年间是其最为活跃、最有成就的一段时期。第三方面的崛起，对于民国政治的逻辑来讲，极具理论意义。

第三方面的构成，以一批遵奉欧美政治学说的知识界、实业界人士为主体。关于第三方面与国共两党的基本区别，民盟机关报《光明报》在一篇社论中这样说：“就是大家都没有武力，作其政治要求的后盾。”“他们的前途，只能以言论以理性去活动”。^①一个以言论和理性为武器的政派，无疑是最为远离武力的，因而也是最为远离民国政治的逻辑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民盟的崛起及其理论意义在于，它为民国政治的逻辑提供了一支标尺；通过这支标尺，人们可以准确地测量出一个问题：一个以言论和理性为武器的政派，在民国政治中到底可以走多远。

关于第三方面的政治空间的来自，民盟之父梁漱溟这样说：就是“国共两党之矛盾对立”，“若是两大党融洽无间……亦许没有此第三者之出现。反之，他们的尖锐对立，恰便促成了现在的民盟。”^②这是对第三方面生存条件的诠释。

梁漱溟的话说对了一半，甚至是一小半。民盟各党派大都诞生于二三十年代，当时国共两党处于更为尖锐对立的状态，但并未因此而产生出一个第三方面。这就是说，第三方面得以生存、得以发展的主要条件，首先必须是国共合作。合作前提下的对立，这才为第三方面提供了最适宜生存的温室。正因为如此，国

^①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11页。

^② 《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596页。

共合作破裂之日，也就是第三方面消亡之时。第三方面的生存与消亡，都是以两个武装政党的关系的转移为转移，它没有也不能独立地掌握自己的命运。

其实，第三方面所以能够取得中国政治力量的第三地位，主要得益于中共这个第二方面的发展。周恩来说：“各党派今天之所以有地位，是共产党与人民的努力取得的，连青年党也不得不暗自说，因为有共产党才能有他们的地位。”^①这个道理是十分明白的，第二方面的力量愈是发展，与第一方面的力量对比愈是接近，第三方面的政治空间便愈是获得拓展的余地。第三方面与中共之间的这种天然的关系，说到底，就是第三方面与武力的关系，就是第三方面与民国政治逻辑的关系；只是这个逻辑不是通过第三方面自身直接地体现出来，而是通过另一方面折射出来。

综上所述，第三方面的生存与发展，既是又不完全是民国政治逻辑的一个例外。

第三方面最为著名的基本口号是：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前者反对政治独裁，后者反对武力割据，前者要求国民党交权，后者要求共产党交枪。可以说，这个口号集中代表了第三方面的中间立场，集中反映了第三方面的政治理性。

有趣的是，真正代表第三方面现实利益的口号，并不出自第三方面自身，而是中共，此即中共的联合政府口号。这个口号最大限度地代表了第三方面的政治利益，因而最大限度地调动了第三方面的积极性。事实上，正是在接受了联合政府口号之后，第三方面这才开创了其全部历史活动中最为有声有色的政治局面。正因为这个口号是第三方面实际利益所在，因此，当中共在重庆谈判中一度放弃此一口号时，引起民盟长时间严重不满。可以说，民盟的这种不满情绪，这才是第三方面真正的“理性”的

^① 《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703页。

表现。

本来，第三方面并无过高的政治欲望，《光明报》曾在一篇社论中，就民盟的政治姿态做了这样一个低调的自我界定：“他本身不是一个政党，所以不要看做国内两大党之外，政治上又增多一竞争的单位。”^① 民盟是否构成一个竞争单位姑且不论，但他原本是缺少些许竞争的底气的。

政协会议前后，杜鲁门声明的发表和马歇尔的到来，为第三方面撑起了保护伞，这样，第三方面发展到其鼎盛时期。这个远离武力的政派，一改旧态，放胆向武力拥有者叫板。施复亮说：“现在国民党的军队虽然号称国家的军队，共产党的军队虽然号称人民的军队，但在我们第三者看来，双方都是党军……必须国共两党的军队一律同时交给国家”。^② 这个论点至少反映了第三方面上升的政治姿态。

鉴于第三方面日渐活跃，于是，一位美国人萌生了一种设想，将第三方面整合为中国政局中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单位，此人即马歇尔。作为一个西方政治家，马歇尔最为心仪的中国党派，当然不是共产党，但也不是国民党，而是思想与行为更接近西方政党的第三方面。马歇尔为国共设计了一个美式两党制，为此，马歇尔设想组成一个强大的第三方面，以作为两党制的补充。

马歇尔希望第三方面的各个小党派，“团结起来并在中国组成一个自由派集团以充当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平衡势力”。他对罗隆基说：“中国的自由主义分子应该联合在一个单一的自由主义的爱国党派之内……这样一个党派可以站在两大政党之间，而任何一个大党如果得不到这个自由主义党派的支持，在正常情

①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10页。

② 《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上卷，第105页。

况下，就不可能采取有决定性的步骤。”^① 马歇尔所说的“正常”指民主制，问题是在民主制并不存在的情况下，却指望一个非武装的党派在两个武装政党之间起决定性的平衡作用，这种构想本身就很难说“正常”。

为提高第三方面的反对派的地位，马歇尔曾竭力劝说蒋吸收他们参加政府，但同时马歇尔又对蒋不甚放心，担心蒋会以此收买他们。为此，马歇尔劝告蒋：“不是照老一套的做法以有诱惑力的任命收买他们以消除反对派。”^② 其实，不待蒋出招收买，有的人已经自愿上钩。第三方面的第一大党是青年党，1946年10月，曾琦当面要求蒋：“行政院必须改组，吾辈无所谓，吾辈部下就希望分得几部做官吃饭。”^③ 这就是马歇尔寄予厚望的自由主义反对派，马歇尔如若先知，当作何感想？

第三方面的生存方式，本身的确与武力没有直接关系。从这一点来讲，这种方式本身表现为对民国政治逻辑的否定。那么，这个以反逻辑的方式而生存的政党，到底得到怎样的承认呢？蒋曾在与顾维钧的一次谈话中对中国各党派这样评价，蒋说：他认为中国在国民党以外，除了共产党，再没有什么其他党派了。所谓其他党派实际是不能算数的。^④ 蒋氏此言，是一个标准的按照民国政治的逻辑对中国各党派所做的精彩评价。在蒋氏看来，只有国共这两个武力拥有者才是政党，那些非武装的党派，其政党资格便“不能算数”。这就是说，那些不承认民国政治逻辑的人们，同样，也不被这个逻辑所承认。

第三方面的政治空间因国共合作而存在，如果说这种关系在

① 《马歇尔使华》，第435、436页。

② 《马歇尔使华》，第447页。

③ 黄炎培日记，1946年10月29日。此言为曾琦对黄所说。

④ 《顾维钧回忆录》第5册，第475页。

通常情况下尚不十分明显，那么，国共分离对于第三方面的消亡，其影响则是直接的。1946年7月，陈立夫向黄炎培表示了两点意见：“（1）国民党不能容许共产党并存；（2）第三者以国共并称，忽视国民党之为正统，从事调解冲突，即延缓对中共问题之解决。”^①此言的意思是，既然国共不能并存，第三方面便不能保持“国共并称”的中间立场，而是二者必居其一。既然不能保持这个中间立场，第三方面的政治空间也就不存在了。

一个本身远离民国政治逻辑的政派，以自身的兴亡证明，它到底还是不能生存于这个逻辑之外的。

民国政治的逻辑与马歇尔的赴华使命

马歇尔使华是此一时期发生的诸多事件中，另一起颇具理论意义的事件。所谓理论意义不是指马歇尔的调停活动本身，而是指马歇尔所带来的西方政治原则与民国政治逻辑的碰撞。

马歇尔是整个民国年间出使中国的外国政治家当中，地位与声望最为显赫的一位。由于马歇尔所具有的超强的地位，他的到来，为中国政治构筑了一个超强的国际背景。他试图依恃这一强大的外部力量，将一系列西方民主原则移植于中国，改变民国政治的逻辑原有的运行轨道。

马歇尔入手解决中国问题，其采取的程序看上去是颇为严谨的。杜鲁门对华声明有三个要点：停战，政治改革，军事改革。按照这三个要点，从1945年12月下旬至1946年2月下旬，马歇尔以两个月的时间，一口气促成国共签署了三个协议：停战协议，政协协议，整军协议。安排了一个在停战的基础上，以政治改革为先导，以军事改革为最终目标，这样一个完整的程序。三

^① 黄炎培日记，1946年7月26日。

项协议的达成，至少在协议上表明，国共之间全部重大的原则问题已经解决，强大的西方原则一举将民国政治的逻辑排挤出局。

然而，当全部原则问题解决之后，马歇尔这才开始遭遇麻烦，他再也不能朝前迈进一步，将那些原则付诸实施。因为，他再也无法解决原则之下层出不穷的“细节”问题。

在马歇尔前后使华的几位美国人，对于国共政争都留下一相似的看法，即国共争论往往注重细节，并不注重原则。重庆谈判期间，赫尔利报告美国政府：“昨晚我告诉共产党和政府的谈判人员，根据我的意见，他们企图在解决太多的细节。……我说如果他们基本的笼统原则能表同意，那么根据这些原则，细节就能迎刃而解了”。^①

马歇尔的继任司徒雷登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司徒曾在一份报告中谈到周恩来时这样说道：“他如此顽固地追求问题的细节，以致对我奉劝应集中关注两个真正关键的问题——停战及起草名副其实的代议制宪法——的呼吁全然不顾。”^②

马歇尔本人的此类见闻更多一些，他曾致函蒋，称：“余所主持之三人会议中，常有因一句措词而辩论一小时以上者。”^③

美国人大概最终也未弄明白，为什么国共往往能够解决原则，却不能解决细节？为什么国共对于细节的关注往往超过原则？美国人颇感困惑的这个头足倒置的现象，正是民国政治的逻辑在强大的西方原则面前，所采取的十分隐蔽但却十分顽强的自我保护。

这个问题的正确解释是，在美国人看来是原则的，在国共看来其实是细节；在美国人看来是细节的，在国共看来其实是原

①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170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

② 《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第33页。

③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3），第188页。

则。在这里，原则与细节的关系已经悄然异化，因此，国共之间往往能够解决原则——细节，但往往不能解决细节——原则。可以说，马歇尔几乎使所有重大原则都达成了协议，而这些协议最后又都无疾而终。

马歇尔是怀抱着他的政治理念出使中国的，他的一个基本设想是，把美国的两党制政体移植于中国。马歇尔对周恩来说：“我惟一的目标是在中国终止冲突和建立一个两党制政府，必须要有一个反对党，因为这是保证一个像我们在美国所理解的那种民主政府成为可能的惟一途径。……没有一个真正的反对党作为竞争对手、提出批评、催促改革，就不可能出现国民政府或国民党的任何改革。国民党不可能自上而下自行改革，必须要有反对党。因此，我曾想到，关心农民、关心中国这个最大阶级的共产党，可以作为一个有组织的合法的反对党而为中国人民做出非常重要的贡献。”^① 这些观点马歇尔曾对许多人提及。

马歇尔将民主的核心解释为必须要有一个反对党，他是以美国式的反对党的观念来认识并设计中共的未来地位的。然而，马歇尔关于在中国建立两党制和反对党的设想本身就难以成立。因为，在一个武装的执政党之下，没有武装便没有“真正的反对党”，如果有那么一个或几个非武装的反对党，其反对党的地位只能如蒋介石所说“不能算数”。这样，马歇尔自己给自己出了一道解不开的题：没有真正的反对党，这不符合美式民主制；而真正的反对党则必须拥有武装，这又不符合美式民主制。这就是说，马歇尔的这道命题其实连假设的基础都没有。

1946年12月18日，马歇尔在即将离华打道回府之际，对罗隆基说：“过去我常常觉得，国民政府愿意有美国的调解，是为了给它的军事行动充当盾牌，现在我觉得，共产党已不再需要

^① 《马歇尔使华》，第388页。

美国的调解，但如果正式拒绝这样一种调解，又担心因此而陷于不利的地位。因此，我说，正像以往我一度为国民党所利用，现在我已经是在为共产党所利用。……但是，我不能听任我被任何一方当作一种便宜来利用”。^①

这是马歇尔对自己的调停活动及其在华地位的最终认识。马歇尔的赴华使命所留下的理论意义在于：试图改造民国政治逻辑的西方原则及其执行者，在中国的命运十分尴尬，只能是辗转于国共之间，反复地被“当作一种便宜来利用”。马歇尔是一位具有国际地位的政治家，一生中取得过许多重大的成就，但在中国这一年的经历，肯定是其最为失败的记录，并且输得干干净净。

最后，还应当补充一点。马歇尔是一位严肃的政治家，其调停活动大致保持了公正的立场，因此中共对于马歇尔个人的态度始终留有余地。胡乔木说：“毛主席对马歇尔的态度始终非常慎重，从未听到毛主席说过马歇尔的坏话，即使后来我们党与美国当局的关系很坏了也没说过他个人什么。”^② 在先后使华的几位美国人当中，得到中共宽容的仅马歇尔一人。

民国政治的逻辑与民国政治的历史局限

1944 ~ 1946 年间，在多种背景、多种方式、多方参加的多种条件下，国共两党时断时续地进行了两年的政治谈判，最终，两党未能取得双赢的结局，由政争走向战争。

有人问梁漱溟：国共谈不拢症结何在？梁答：症结么？转移不定，今天在此，明天又在另一点，层出不穷，令我无法可

① 《马歇尔使华》，第 436 页。

②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 93 页。

指。^① 梁之所言，大概代表了当年参加调停的相当一部分人士的困惑：不知国共之间到底症结何在？

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其实，症结如果层出不穷、转移不定，那就不是症结。国共之间的症结，说到底，就是民国政治的逻辑以及这个逻辑与生俱来的历史局限，造成问题的基础与问题本身不能统一。根据这个逻辑，问题的提出只能以武力为基础，然而这个所提问题本身，却又是一个超武力的民主与和平的要求，但是，根据这个逻辑的历史局限，以武力为基础提出的问题，很难以武力之外的方式予以最终化解。

问题的基础与问题本身不能统一，这就是民国政治的历史局限的表现。由于这种历史局限的存在，反映在现象上，必然是具体问题层出不穷、转移不定，梁漱溟不能认识这一点，于是便有了症结“无法可指”的困惑。

1944 ~ 1946 年间，是民国政治依据其固有逻辑的发展过程，同样，也是这个逻辑的全部政治局限的表现过程。这个逻辑与这个逻辑的政治局限，基本上是同步展现出来的。

这个局限反映在谈判上，表现为谈与打高度统一，谈的进程以打的进程为依据，构成一个“谈谈打打”的方式。这个方式的最终效果如何呢？周恩来对马歇尔说：“现在的问题好像是一个圈子，打，便是绕这个圈子不休。”^② 这就是说，谈谈打打的方式，很难终止过程，而极易演成一个新的过程，最终形成一个循环往复、欲罢不休的“圈子”。

这个局限反映在心态上，表现为两党之间很难取得相互信任。周恩来对马歇尔说：“军队的统编、整编和训练是蒋最不放心的，所以一切他都可以不谈，而先把此事弄成合乎他的愿望。

^① 梁漱溟：《忆往谈旧录》，第 244 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② 《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 272 页。

如一切都照他的希望实现，他放心了，而我们就不放心了，因为一切都无保证了。”^①

这就是说，国共之间始终存在着一个放心与不放心的芥蒂。民国政治既然以武力为基础，双方的放心与不放心，必然取决于武力有保证还是无保证。问题在于，武力从本质上讲是排斥性的，这种排斥性限制了民国政治的包容性。因此，以武力作保证很难做到双方放心。其结果往往是一方有保证而放心了，另一方便无保证而不放心了。如果双方都有保证，结果恐怕是双方都不放心。

联合政府的口号本身是一个双赢的构想，政协协议也是一个双赢的协议，但是，从民国政治的历史局限来看，至少在当时国共没有双赢的可能。

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的对立，是两种国家政体的对立。关于这个问题的谈判，也就是国共两党全部历史关系的最高形态的政治对立。围绕这一对立的发生、发展和终结，本书全程跟踪，做了较为系统的考察，现在，可以将问题做一个归纳。

国共两党所以能够就国家权力的再分配举行和平谈判，从本质上讲，这是双方武力的对比所产生的政治现象，也就是说，和谈本身就是武力的派生物。然而，和谈的本质却又在于制止武力、取消武力，这样，便产生了一个头足倒置的关系：以武力的派生物——和谈，反过来剥夺这个派生物赖以存在的依据——武力。这种倒置的关系具体表现在实际活动中，必然构成一个解不开、走不出的怪圈，最后，形成“绕这个圈子不休”的现象。

武力与和谈之间的这种倒置的关系，就是民国政治的逻辑与这个逻辑本身的历史局限的关系。企图剥夺武力的和谈，反过来，最终却被武力剥夺。这个结果无非说明，在历史局限的条件

^① 《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466页。

下所产生的问题，一般说，只能以历史局限的方式而解决，历史的局限是难以超越的。